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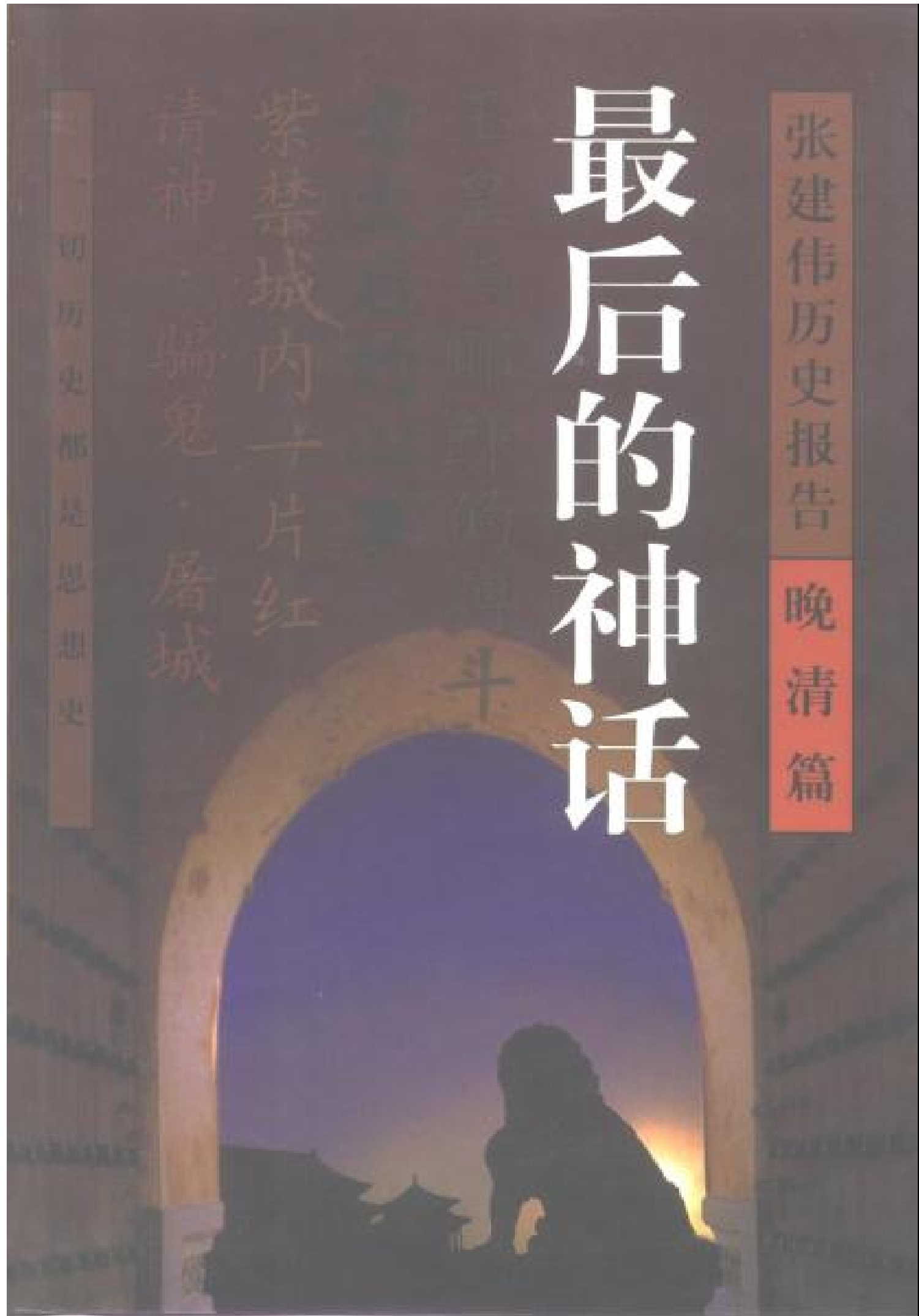
张建伟历史报告

晚清篇

# 最后的神话

紫禁城内一片红  
精神 · 魔鬼 · 屠城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

# 最后的神话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12  
(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  
ISBN 7-5063-1809-1  
I. 最…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435 号

## 最后的神话

---

作者: 张建伟

责任编辑: 华 沙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王 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14 千

印张: 14.75 插页: 10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09-1/I·1795

定价: 24.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袁世凯** 义和团兴盛时期的山东巡抚。他果断地做了一次政治期货，将山东义和团消灭在它的诞生地，从而为自己未来的政治进步扫清了道路。



**裕禄** 义和团转战河北后的直隶总督，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的前敌主帅。他能在政治上永远进步，在于永远能向当权者提供对方最需要的东西。在本书中，他唯一的政绩，便是将大沽口沦陷谎报为伟大胜利，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对外决策。后被八国联军追击而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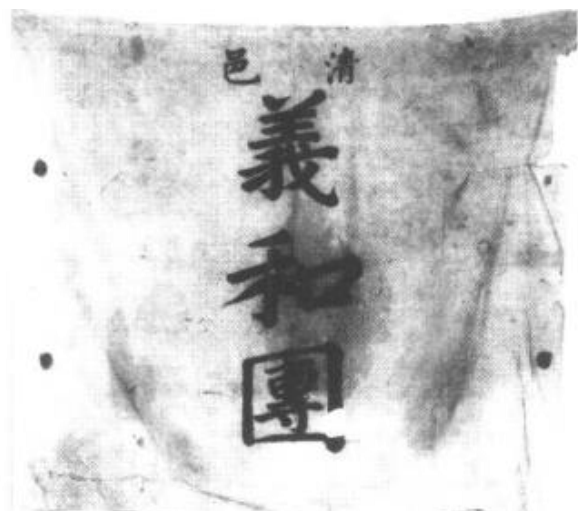
**山西清兵团员** 在义和团与清政府“合体灭洋”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场景毫不奇怪，当时，连慈禧老太后都是一身的义和团打扮。当年的义和团，决不仅仅只是个农民组织，而是革命不革命的试金石。



**被毁的北京某教堂** 一切洋事物（据说除了洋钱）都在义和团的毁灭名单上，西洋教堂自不在话下。



**在北京的义和团员** 多么朴实、憨厚的小伙子，一把火烧了京师最繁华的前门商业区并将之抢劫一空的肯定不是他们。但又是谁干的呢？



**义和团旗和义和团碑** 上面的字写得不错，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团员”肯定没这两下子。看来，义和团虽是农民运动，但有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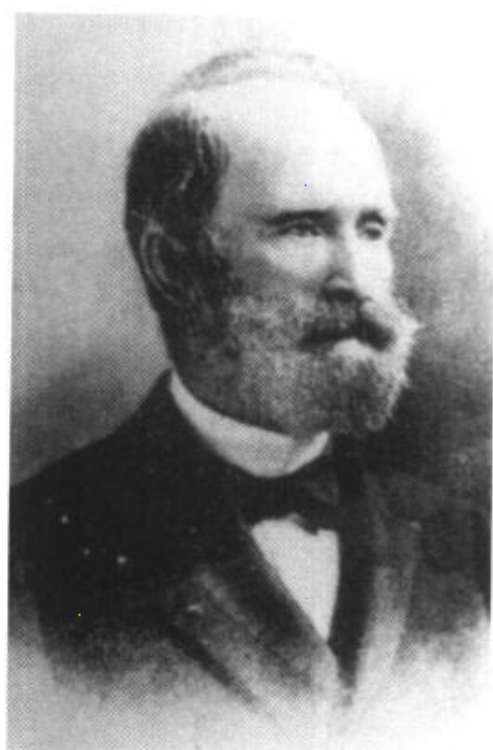
**董福祥** 清军甘军提督，庚子年围攻使馆的前线指挥。他的名言，“奴才无它能，唯能杀洋人而已！”记载在《清史稿》上。但考虑到他有奶便是娘的官场人格，那句名言包裹有多少真货，便很值得怀疑。

**聂士成** 清军武卫前军提督，庚子年亲临前线与西方侵略军浴血奋战并血洒疆场的军队高级将领，只有他一人！他以生命昭示：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屡遭不幸，但在不幸中也能产生我们民族的英雄传奇。





**赫德** 爱尔兰传教士，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四十三年。毁之者称他为西方打入中国要害部门的间谍，誉之者称他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奠基人。



**丁韪良** 美国传教士，中国第一部国际公法专著《万国律例》的翻译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方学校同文馆总教习。

**樊国梁** 法国传教士，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在义和团进攻该教堂时，他领导教民与四十名护教士兵进行抵抗，达六十二天之久，是北京之战中时间最长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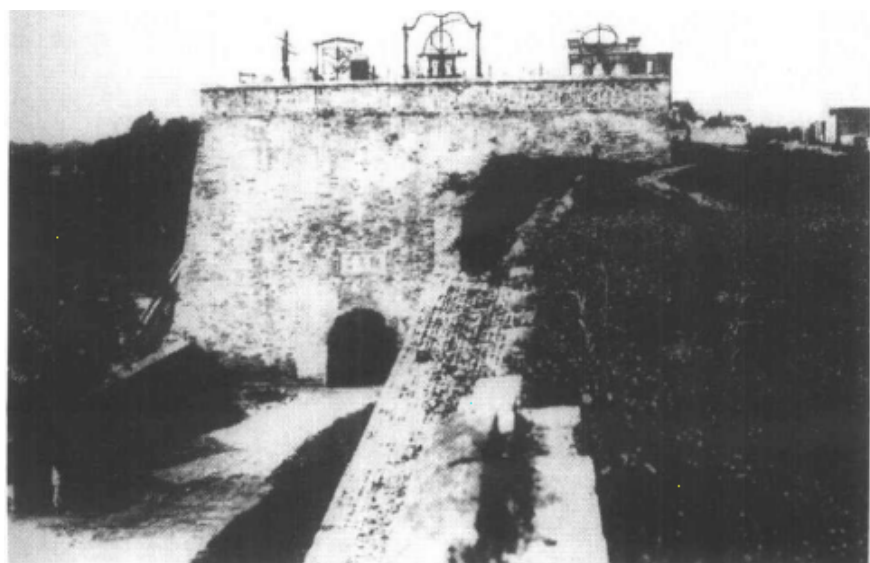




**汤若望** 德国传教士、中国历史上首任钦天监洋监正、北京古观象台首任外国台长。正是他、使西方近代科学的星辰第一次在华夏上空闪耀。



**南怀仁** 比利时传教士。在汤若望被迫害致死后，他在古观象台上通过“天文科学大比武”，给汤若望平反昭雪。从此继任古观象台台长，并成为康熙皇帝的第一位西学老师。



**古观象台** 在今北京建国门外，汤若望和南怀仁工作过的地方，西方近代科学叩开古老的中国大门的历史见证。





**教会学堂中的中国孩子** 在他们中间,很可能有中国第一、二代留学生,并成长为中国近代科教事业的奠基者。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教民** 难道真的是他们引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义和团运动?将他们扫荡出中国,义和团运动就不会爆发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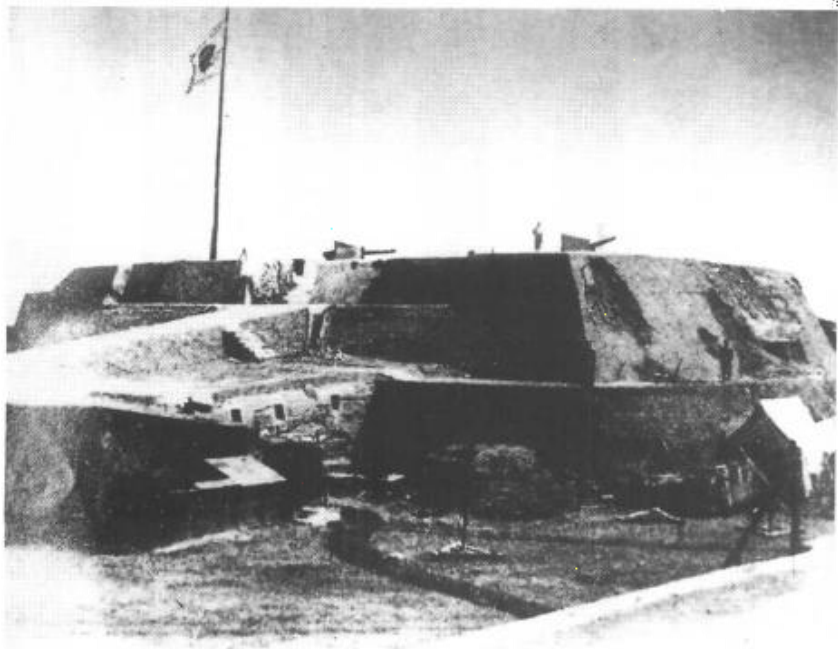


**传教去** 在这些洋教士的行囊中,肯定不会只有《圣经》,还有现代教育和科学的书籍。不应忘记:科学是他们在中  
国传教的敲门砖。



清兵在菜市口斩杀义和团员 在朝廷与义和团“合体灭洋”的时候，义和团是朝廷的“护符”，怎敢斩杀？可能，这个额头上有“镇符”的团民，在动乱中做起了“改朝换代”的美梦，使朝廷不得不痛下杀手。

英国海军总司令西摩 他率领的两千名“八国联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其赴北京救援使馆的任务没有达成。



失陷后的大沽炮台 这是“北京的门户”第几次失陷了？江山变色，残阳如血，它让我们想起刚刚发生过的大沽口之战，也想起我们脆弱的海防。



**洋人街垒** 这简陋的街垒，挡挡风还差不多，要挡住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和清军的进攻，简直就是做梦。但竟然挡住了，真不知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背枪的法国大使** 大使拿起了枪，可见形势之严峻。但其意态如此悠闲，又好像没什么战事发生。



**清兵去攻打使馆区** 使馆区内有一支四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持枪卫队、四百六十三名平民、十二名外交使节、二千三百名逃入使馆区的中国教民。中国方面投入使馆之战的，有卫戍部队的神机营、虎神营、董福祥的甘军和数万名义和团。这场“使馆之战”持续五十六天，中方始终未能攻入使馆。





红灯照 又称“仙姑”，据说她上法以后，能腾空驾云，扇子一煽，洋人大炮顿时哑巴，轮船立刻爆炸，城楼起火自焚——你信吗？

义和团攻打教堂的告白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清廷为义和团所立团规 不知是否如下内容：“现谕王大臣等，确切查明，务将真正的义和团，让他们恪守戒规，义以和众。如有匪徒假托义和团之名，寻衅焚杀，著照土匪之例，即行惩办。”

告白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  
特请  
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  
告成 再者 每日家家夜晚掛紅燈一箇時  
長京城內可徧為營曉  
新城板家窩本月拱手全勝  
西四牌樓磚塔胡同口袋底糧台  
張存瑞啓



**慈禧太后** 试图利用义和团将西方列强驱赶出中国，是这个“铁女人”一生中最勇敢也最出格的一次决策。



**荣禄** 义和团运动时，他是大学士、领军机大臣，当此动乱之秋，他如果是个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个政客，当年的历史可能会改写。

## 前 言

本世纪头一年，公历一九〇〇年，旧历庚子，因选择皇帝的接班人的问题，清政府同西方闹别扭。恰在此时，河北平原农民也正大闹教案，赤地千里的旱地上，飘扬起“扶清灭洋义和团”的旗帜。政府与民间合为一体，一致对外，扯开喉咙，同声说“不”，声音自然很大。后来又攻使馆，烧教堂，毁铁路，杀洋人，举凡一切外来事物，尽在消灭之中。于是就有了庚子国变。

庚子国变以闹义和团始，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满清政府被迫流亡终，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创巨痛深。事情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中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仍在不断地重复这个故事。总有新的发现。而且，每一次新发现，仍强烈刺激着中国人的心。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主人公有句著名台词：Yes? Or no? It's a probelem。对这句话，我至少看到过两种翻译。第一种，直译：“是？还是不？这是个问题。”第二种，意译：“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我不是翻译家，不能评判何种译法最为妥帖，只是生发出一种类似文字游戏般的想法：原来，说“是”或者说“不”，是个好像“活着”还是“去死”一样的重大问题。

这太邪乎了。当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许多人

## 2 / 最后的神话

这样看待中西冲突，以为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非要诉诸战争不可。而实际上，在庚子年间，中国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常常受人欺负。这没办法：两个平等的国家外交，外交就是力量；两个不平等的国家外交，力量就是外交。西方强而中国弱，外交自然不会平等。只是欺负得太狠了，弱者拍案而起，挑战强者，虽属以卵击石，感情上势所必然。这就是民族大义。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冲突，在感情上，仍作如是观。然而，人要有感情，更要有理智。一边高呼着“不”，一边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那结果不是悲壮，而是可笑，虽然笑的时候会有眼泪淌出来。人有嘴巴，说“是”说“不”，悉听尊便，只是别变成闹情绪，淹没了理智。总之，说“不”之前，以理直气壮为好：不仅真理在你的手里，而且你确实有力量把对方给灭了，旁边最好还站着个执法公平的好裁判。

另一方面，下面两点也供参考：

第一，当有人鼓励你说“不”的时候，要想一想他的动机。当年慈禧太后和肇祸大臣鼓励义和团说“不”，各有各的私心，总之是要民众当炮灰，决非鼓励爱国主义。

第二，当成千上万的民众打着旗帜拥护你，说他们“刀枪不入”，定能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时候，你也要当心。你要听听天气预报，是不是大旱了，或者大涝了，老百姓挨饿了，而且他们又不敢说别的，只好顺着你的情绪，讨你的欢心，好从你那儿弄碗饭吃？

总之，沉思会减少盲目，理智能弱化情绪。一百年来，许多中国人将西方妖魔化，同时，许多西方人也将中国妖魔化，那结果，便是不断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人民在冲突中

饱经苦难。这种中西双方“互相妖魔化”的严重性，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本书倘有意义，当在这人生（也包括治国邦交）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吧。

当然，但愿书还好看。它是描述的历史，不是教科书。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上帝叩门	1
1. 梅开三度	1
2. 红衣大将军	6
3. 科学的星辰闪耀时	12
4. 院士·疟疾·皇舆图	35
5. 从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	52
6. 又有一块新铁在炉里	64
第二章 教 案	81
1. 一个疑点	81
2. 在圣人的家乡建教堂	83
3. 中国人为什么要信教	86
4. 该出手时就出手?	95
第三章 风起巨野	111
1. 死于非命	111

## 2 / 最后的神话

2. 寻找义和团	113
3. 兵临胶州湾	117
4. 神父做官	120
<b>第四章 雾锁梨园</b>	<b>124</b>
1. 走进梨园屯	124
2. 玉皇与耶稣的搏斗	128
3. 两肋插刀赵三多	132
4. 知县知府双探索	135
5. 义和拳	138
6. 干集谈判	141
7. 一个口号的诞生	142
<b>第五章 森罗殿战斗</b>	<b>147</b>
1. 神拳出世	147
2. 庙会上的骗术	150
3. 杠子李庄的战斗	156
4. 毓贤的心事	160
5. 义和团的诞生	165
6. 红灯灭了	169
<b>第六章 验 神</b>	<b>176</b>
1. 袁世凯抚鲁	176
2. 炮打神仙	180
3. 释疑	183

4. 义和团没了	185
<b>第七章 复活</b>	<b>189</b>
1. 火与火的嫁接	189
2. 王顾左右而言他	193
3. 打架与打仗的区别	196
4. 涑水之战	199
5. 百姓放火，中央点灯	201
<b>第八章 神仙会</b>	<b>205</b>
1. 紫禁城之谜	205
2. 国家命运一念间	210
3. 出使涿州城	213
4. 魔术表演	217
5. 信息要命	221
6. 义和团进京	225
<b>第九章 宣战</b>	<b>228</b>
1. 战与和	228
2. 脸皮问题	237
3. 颐和园内鬼见愁	245
4. 宣战诏	256
<b>第十章 战争（上）</b>	<b>268</b>
1. 廊坊战斗	268
2. 血染大沽	273

## 4 / 最后的神话

3. 苦难的历程	281
4. 津门登陆	285
<b>第十一章 北京战非战</b>	<b>294</b>
1. 不可思议的“战争”	294
2. 北堂之战	297
3. 使馆之战	304
4. 中国农民皇帝梦	309
5. 老太后的心事	317
<b>第十二章 战争（中）</b>	<b>328</b>
1. 最后的神话	328
2. 最后的英雄	335
<b>第十三章 太原屠城</b>	<b>347</b>
1. 为什么是山西	347
2. 请神	349
3. 骗鬼	358
4. 屠城	365
<b>第十四章 战争（下）</b>	<b>372</b>
1. 津门劫难	372
2. 联军北上	384
3. 永远正确的证明	395
4. 紫禁城内一片红	408

5. 神话消失的时候	413
<b>庚子国变大事记</b>	<b>419</b>
<b>参考引用书目</b>	<b>440</b>
<b>后 记</b>	<b>450</b>

## 第一章 上帝叩门

### 1. 梅开三度

一九四九年——关于义和团——一道分水岭，泾渭分明。此前，对义和团运动，很少的肯定，很多的叹息，称之为迷信、愚昧、落后，甚至祸国殃民。此后，对同一个运动，很少的否定，很多的赞颂，称之为爱国、勇敢、伟大。

一切都源于那个西方的上帝和随他而来的一切。自从他来到中国，一个超稳定的中国开始变化。到上个世纪末，接踵而来的两次农民运动，把上帝一刀劈成两半：

太平天国——把上帝奉为神圣的革命意识形态。

义和团——横扫一切与上帝有关的人物和事物。

上帝，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值得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他如此热爱，或如此痛恨？

上帝在中国曾经梅开三度。

## 2 / 最后的神话

一六二三年（明天启三年），古长安的废墟上挖掘出一块奇特的石碑，经鉴定，是《景教流行中国碑》，有序言，有颂文，是基督教早在千年前便在大唐帝国传播的确证。可惜，上帝与中国的这第一次握手，除了这块石碑，再也没有留下别的任何痕迹。只好这样想象：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肯定很是宏阔，因为盛唐时代的中国，对待异域文化，宽容优渥，容纳百川，气象恢弘。然而，这历史太过模糊，其盛如何，其衰何因，其断何时，莫可名状。

过了六百年，也就是《景教流行中国碑》得见天日的那个时代，明朝末年，借海上丝绸之路的方便，上帝的仆人们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传教士们在中国留下了无尽的苦难、无上的辉煌以及最奇特的经历，持续时间达两个半世纪。那时，他们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可以依靠，一叶小舟投向怒海，一匹单骑跨越荒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在这次“上帝发现东方”的奇异冒险中，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勿略是第一人。一五四一年四月七日，他从里斯本启程，到东方传教。他仆仆风尘，在亚洲各地，步行十万里，却只能在中国的周边转悠。十一年后，一五五二年八月，最后一周，他登上离广州仅三十海里的圣约翰岛，准备登陆中国。但明朝的海禁使他不能前行。他在岛上徘徊到十二月，在该岛的一个茅棚中仙逝。他在完成他的使命前献出了生命，仅留下上帝“远征”中国的崇高理想。<sup>①</sup>

前仆后继。许多传教士都曾踏上沙勿略仙逝的圣约翰岛，眺望着那块中国边境的界石。一位传教士叹道：“哎，

磐石呀磐石，什么时候你才能开裂！”<sup>②</sup>终于有一天（沙勿略死后二十九年），利玛窦来了。这一次，西方的上帝变成了中国人。他穿起儒服，戴上儒巾，刻苦学习中文，同时，使用了贿赂、收买、道德感化等一切手段，终于获准入境中国，在南方的肇庆开教。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汤若望等一批传教士，沿着利玛窦的脚印，小心翼翼地由南而北，从边缘向腹地渐进，终于在北京获得了立足点。

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苦难与辉煌并进的时期。他们穿越了明清之交的战火，遇到了引导中华帝国进入全盛时期的康熙大帝，走过了上帝在中国最辉煌的十七世纪，最后，在十八世纪被逮捕、被驱逐，被赶出了中国。

这是一个上帝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每一名传教士在中国发展教徒的数量居然达到四千六百名，到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前夕——上帝在中国的信徒已达三十万之众。

这一时期，未闻“教案”——教徒与非教徒发生的纠纷案件<sup>③</sup>，但见“教难”——由清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禁止、迫害和驱逐传教士的事件。从康熙末到道光中，清廷五世禁教。一七二四年，雍正皇帝下令驱逐教徒，传教士们被迫转入地下。但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组成传教游击队，穿越层层封锁线，一次又一次，秘密潜往内地教堂。真不幸，一七八五年，四个前往陕西的基督教徒刚刚走到湖北便被逮捕。其时，陕西正闹回乱，传教士们的秘密行为很容易被看成“地下党活动”、反政府行为，遂引起朝廷疑心。于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一次全国性的



#### 4 / 最后的神话

对传教士的“严打”行动开始了。一八〇一年，最后一名西班牙籍传教士死去。遍体鳞伤的上帝结束了在中国梅开二度的历史。

一八四〇年，西方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四年后，西方列强终于迫使道光皇帝发布上谕，解除传教禁令。一个在战争中被打败了的皇帝不再有说“不”的权利。据说，当时的大清帝国没有翻译，在条约谈判时，担任中外双方翻译的是精通汉语的西方传教士。本来，双方口头商定，传教士只准在开放口岸和地区传教。但担任翻译的传教士偷偷加上了“内地”二字。等到中方发现这一欺骗行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经双方签字的条约文本成了必须执行的法典。

在如此“法律”保护下，上帝在中国死去活来，梅开三度。欧美来华传教士和发展教徒的数量猛增。到义和团运动终于爆发的一九〇〇年，在中国的洋教士几达四千人，发展中国教徒近百万。这一时期，未闻“教难”，但见“教案”——与梅开二度时期相映照——上帝在中国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跟斗。

于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上帝的实相被画为两个不同的面目。

一八四〇年之前，上帝的脸好温柔，好可爱，他的仆人——那些传教士们好乖，好懂事儿。允许他们传教，他们高呼皇恩浩荡。不允许他们传教，他们无怨无悔。朝廷需要他们，他们招之即来。朝廷讨厌他们，他们挥之即去。打他的左脸，他把右脸也给你。不需要他的宗教，他给你需要的科学。总之，这些传教士们很好很好。因此，朝廷

的官员禁止传教便是保守，皇帝迫害传教士便是残暴，至少是不宽容。不能说传教士们没犯过一点错误，但总是对多错少，成绩是主要的。不能说中国皇帝禁止传教和迫害传教士们就没有一点道理，但总是理屈辞穷，没那么理直气壮，说起来，带着点不好意思。至今，北京市委党校大院内，留着这些传教士们的先驱——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墓地，有碑文颂词，供人瞻仰。

一八四〇年之后，上帝忽然变脸，变得面目可憎。他的仆人，那些传教士们好狠毒，好可恶。他们跟着帝国主义的炮舰，一路轰进中国。他们传教不过是幌子，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他们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西方间谍，每个人都像“007”。他们是手捧《圣经》的杀人不见血的魔鬼。他们发展中国教徒，不过是让他们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建设教堂，为的是建立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基地。他们的育婴堂是残害中国儿童的秘密场所，刺孩子们的眼，挖孩子们的心。他们的医院是杀害中国人的基地，怀孕的女人来了，他们刮胎以制药，生病的男人来了，他们取肝以生吞。总之，这些传教士们很坏很坏。不能说他们中没一个好人，但总是坏的多、好的少。不能说他们没做一件好事，但做着好事的也不那么让人放心，总之是居心叵测。因此，倘若是中国人杀了洋教士，那肯定是该杀，非杀不可。倘若是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发生了教案，不用说，肯定是教徒欺负非教徒。至于洋人教士依靠官府，仗势欺人，中国教徒狗仗洋势，鱼肉乡里，更是这些上帝的仆人们的典型特征。

就这样，两个上帝，两段历史，两种行为，黑白分明，

不容分说地走进了教科书中的中国近代史。但这就是上帝在中国的一切吗？在这些爱憎分明的价值解说之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还应该知道些什么？

## 2. 红衣大将军

至少，我们还应该知道：上帝的信徒们来到中国，也带来了现代科学在中国发轫的源点。那首先是一个大炮的故事。<sup>④</sup>

十六世纪晚期，荷兰战舰侵入中国海域。这批海盗，红头发，红胡须，引人惊异。于是，中国人称之为“红毛番”，或“红毛夷”。

一六二一年，荷兰入侵者企图夺取已被葡萄牙人侵占的澳门，被葡军击退。在遗弃的破船上，葡人发现了“红毛夷”的火炮。其口径之大，射速之快，命中率之高，均使人惊讶。当时，澳门是明军火炮和炮手的主要来源地。不知是明军要求进口，还是葡萄牙人要求出口，总之，这批被缴获的西洋火炮很快到了明将毛文龙的麾下。

此前四年，一六一八年，满族首领努尔哈赤造反，发布檄文《告天七大恨》，向明朝政府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辽东感冒，北京发烧，天朝皇帝立刻召回在天津养病的科技专家徐光启，命他主持训练新兵，防御京师。徐光启接连上疏，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并加仿造。他说，“今日之战争，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如果没有大炮，那就好像空着一双手，却遇到了老虎和豺狼。当然，只有大炮也还不够，还

要有坚甲利兵，否则，那就好像你手持宝剑，而那宝剑却没有柄。”然而，他的建议没人理睬。

八年后，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围攻宁远。这是关外明军的最后要塞。当其时，宁远守将是袁崇焕，虽奋力抵御，但兵员仅两万余，而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却达六万之众。如此兵力悬殊，自然寡不敌众。危急中，袁崇焕忽然想起，当年进口的红毛夷大炮，就封存在宁远城的库房里<sup>⑤</sup>。于是立刻将这一批西洋大炮架上城墙。

进攻开始了。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兵向宁远城奋勇挺进。忽然，城头冒出一团火球，轰然一声，在八旗军中爆炸，硝烟散时，尸横一片。努尔哈赤大恐，弄不清这是什么神奇杀伤物，不禁挥兵后退。但火球仿佛长了眼睛，不断从天而降，八旗兵伤亡惨重。一颗炮弹在努尔哈赤马前爆炸，热浪把他从马上掀翻下来，被部将救起。但终于大伤元气，竟至卧床不起。不久，这位清朝开国皇帝壮志未酬，命归西天。

此前，满族造反，所向披靡，明军几无胜算，这一次居然以少胜多，全军大捷。明帝大喜，特颁谕旨，予以表彰：“敌人遭到重创，打死了其头目，这是七八年来所绝无仅有的大胜利啊，真真让朕扬眉吐气。”<sup>⑥</sup>于是下令：“这样的西洋大炮，要如法炮制，以资防御。”

为了保密，火炮试验场居然在紫禁城内开辟<sup>⑦</sup>。开阔而空荡的皇宫大院里，站立着一位西洋传教士。他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生着一双绿盈盈的碧眼，下颌堆着蓬乱的紫髯，身上披着神父的黑袍，手上捧着镶嵌金边的《圣经》。他就是明朝西洋火炮试验和制造的总指挥、来自德国的耶

稣会传教士汤若望。

一六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汤若望偷偷溜进北京城。鉴于以往的教训——沙勿略终生未能踏入中国领土，利玛窦赢得朝臣支持方得北京居住权——汤若望决定，要传教，就要先打动皇帝的心。然而，几年过去了，他几乎一无所获。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官员和科学家徐光启告诉他，这想法太天真了：中国人不要上帝，正是因为皇上不要上帝呀！而且，满族正进攻中国，皇上下令仿造西洋炮，却找不到懂得造炮法的人，正着急呢！哪里会有心思同上帝打交道！

汤若望一听，立刻说：“造西洋大炮？我会呀！”

徐光启大惊复大喜，立刻向皇上报告。皇上也很高兴，立刻接见汤若望。我们可以想象，倘非如此特别时期，对这位金发碧眼的洋教士，政审一定很严。但战争期间，特殊人才，自然一切从简。为了手中有炮，为了保家卫国，顾不得那许多意识形态了。皇上竟赋予汤若望以“紫禁城试验”的特权！

按照汤若望的要求，铁、火药及各类工具都运到紫禁城。三十多名太监，穿上工作服，成为汤若望的“学徒”<sup>③</sup>。除了汤若望，没一个懂得生产兵器的点滴知识。汤若望从头讲起，太监们渐入门径。炉火在紫禁城内熊熊燃烧起来，铁水蒸腾，炮身成形了。然后就是造炮弹——在发明火药的故乡。竟然也很顺利。太监们高兴了，急着试验自己的创造性成果。但汤若望说：“不行！”

一天，趁汤若望师傅不在，“伙计”们把一颗炮弹装了进去。然而，炮弹未曾就位便卡死在炮膛里。太监们你推我拽，想把炮弹退出来，可炮弹就是不听话。“伙计”们急

得团团转，只好把汤师傅请来。汤若望赶到现场查看，告诉大家：炮弹所以卡死，原因很简单：炮筒尚未磨光。遂命众人装上一些火药，设法把炮弹放出来。

药信燃烧着，“嗤嗤”作响。人们期待着，这些许火药的力量能把炮弹顶出来。但火药竟引爆了炸弹。只听轰然一声，如霹雳，如地震，一眨眼功夫，已是满城硝烟。如此巨响，爆发在一向肃穆、寂静的紫禁城——皇帝的家里，众人大惊失色，全吓傻了。后面肯定是接踵而来的龙颜大怒，弄不好还会掉脑袋。

身居内宫的天子果然吓坏了。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太监哆里哆嗦跑进来，汇报说：“汤师傅在验炮。”

皇上一听，立刻露出关切之情：“汤师傅无恙否？”

一太监说：“汤师傅安然无恙。”

另一太监忽然跪倒，说：“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皇上问：“何喜之有？”

太监说：“如此巨炮，如此巨响，亘古未闻，正说明大炮之伟力啊！以之御夷敌，必将无往而不胜！”

皇上一听，惊去喜来，感到江山社稷多了份保障。立刻传谕：“去看汤师傅和他的大炮。”

然而，眼前的景象使皇上怎样地疑惑不解呀！大炮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祭坛。汤若望身披祭服，头戴祭巾，手捧《圣经》，跪着，正在祭坛前读经祈祷。

没人知道汤若望在祈祷什么。但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带着上帝的期待来传教的，而不是来为天朝制造杀人武器的。作为神父，他未操正业，却来造什么大炮，倘不祈祷一下，来一个灵魂深处闹革命，上帝如何会饶恕他！

太监们愤怒了。一边是中国的皇帝，一边是西方的祭坛，汤若望竟向祭坛汇报思想，对中国皇帝视而不见。如此大逆不道，简直就该千刀万剐。一太监怒吼一声：“汤若望，你大胆！”便要上前揪拿汤若望。

但皇帝拦住了太监。

是的，他正是崇祯皇帝。他是一个好皇帝，一个宽厚的皇帝。他望着那可能保卫大明江山的西洋大炮，望着他内心亦很反感的上帝祭坛，微笑着，下达了御旨：“任何人都不要阻挠他。都要尊重汤神父的作法。”

从此，汤若望有恃无恐，又在紫禁城内的大炮试验场，先后设过二十个祭坛。因为，紫禁城内曾铸成二十门四十磅重的大炮。后来，汤若望与中国的工匠们一道，又制造了五百门小炮。

今天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来到北京，几乎无一不登临长城。那正是明朝重修的长城。但是，长城没有能够挡住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进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烽火遍地，当其时，有效打击用传统骑兵战术南进的满蒙联军的，是用近代科学技术仿造的西洋大炮。而后来明将郑成功收复台湾（一六六一年），中国军队击沉荷军旗舰，攻克荷军主堡，靠的也正是缴自荷军、后经仿制的“红夷大炮”。这当然是“以夷制夷”的重大胜利。

历史要“阐明真相”。但在我们的历史上，常常“见人不见器”。我们总是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我们总是觉得“爱国主义才是战胜强敌的法宝”，至于武器嘛，那“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又亲眼目睹过海湾战争的中国人，尤其是历史学家，是否该对上述

“永远正确”的历史结论，有些许的反思？

历史要“取得教训”。忽视技术进步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我们最大的历史教训。挖几条地道，便吓跑了日本兵（电影《地道战》）；一硝二磺三木炭，便造出了地雷，炸得鬼子飞上天（《电影《地雷战》<sup>①</sup>）；小米加步枪，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此浪漫主义的历史，至今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影视文学中张扬。但技术无情。战争是硬碰硬的实力较量，进入近代，更是科学技术的较量。如此忽视技术的力量，使我们的历史书，变成了烂漫的爱国主义的口号集锦。

当然，西洋的大炮并没有能挽救明朝的覆灭。但明朝的灭亡，不是因为清朝比明朝更“正义”，更“爱国”，更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恰恰相反，是清朝的“夷人”比明朝的“汉人”更善于学习，接受近代技术，造出了更好的西洋大炮。

努尔哈赤死后，满人被“红夷大炮”吓破了胆，被迫向敌人学习。历史分明记载着：皇太极即位后，更重视改革战术，特别重视炮战。一旦夺取明军大炮，便竭力仿造。到一六三一年（崇祯四年），经过一批汉族工匠的努力，满族军政权铸造西洋大炮成功，并且创造了“失蜡法”，使铸炮技术领先于明朝。

今天，我们走进沈阳故宫，清朝开国前的龙兴之地，一进大院，满眼皆是大炮。那正是清军当年仿制的“红夷大炮”。只是因为“夷”名犯讳，清朝新铸的“红夷大炮”，被改称“红衣大炮”，又称“红衣大将军”<sup>②</sup>。正是这位从西洋引进的“大将军”，使清军武器之劣势顿为改观。



请在史书的字里行间细细地打量明末清初的战局：明军用汤若望仿造的“红夷大炮”守城，清军用仿制的更先进的“红衣大炮”攻城，加上骁勇的骑兵战术，竟然无往而不胜。就是灭亡了明朝的农民军，也在清军的武器优势面前丧失了抵抗力。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李自成退守最后一道天险潼关，仍被清军用“红衣大炮”攻下。此后清军南下，凡遇顽强抵抗，无一不以炮轰致胜。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记录，南明小朝廷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都是被“红衣大炮”轰开的。

这惨烈的战争景观，竟是近代技术与古老中国的第一次亲缘。而这一切，竟是一个西洋传教士带来的。

清兵入关后，延续了二百七十年的明王朝寿终正寝。可怜的崇祯皇帝独自逃出皇宫后门，进入煤山苑内，在东山坡上自缢而亡。汤若望对这位皇帝的死感到十分遗憾。他对崇祯的评价是：“天分甚好，命运不佳。”

但汤若望的命运却很好很好。

### 3. 科学的星辰闪耀时<sup>①</sup>

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军鼎定中原。各路大军蜂拥入京，一时间，京师爆棚，大街小巷塞满了军人。睿亲王多尔衮下令：城中居民，只要不是满洲人，限期三日，通通搬到外城去，为清军让房。胜利者的语言就是法律，谁敢不从。

这时，汤若望神父仍然居住在他的教堂内。得知消息，立刻决定与满清人谈判，务使教堂得以保存。他是洋人，其

礼义廉耻与中国汉人完全不同。他居然以已经灭亡了的“明臣”身份，给此时操揽清朝一切大权的多尔衮上了一份奏章（译文）：

臣从大西洋八万里开外，航海东来。不结婚，不当官，主要任务是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主要业务是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臣在北京，建筑了一所天主教堂，在里面朝夕虔修，祈求普佑。我这样子在北京作宾客，已经有那么好几年啦。

在你们来北京之前，臣曾奉前朝故帝之谕令，修撰历法，并写了历书多卷，请来工匠，制作刻板，准备出书。书还没出版，板片已堆积垒垒。还有堂中供像的礼器，传教所用的经典，修历应用的书籍，测量天象的各种仪器，都有许多件。如果按照您的命令，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而且肯定会损坏。这些测量仪器，由西洋带来者居多，倘有损伤，修整既非容易，购办又不是你想什么时候要就可以随时寄来的。因此，臣特别写了这份奏折，说出情由，恳请皇上恩赐臣等仍居原来的寓所，就像从前一样。

奏折递上，多尔衮居然接见了，要他暂且回家，次日再来候旨。第二天清早，汤若望果然领到皇上下达的谕旨一道，携回寓所。

走近教堂，忽见挤满了人。走进去，见几位教友正千方百计劝说前来占房的满洲旗兵，且正在“神父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要大打出手的时候。汤若望真来得及时，他

拿出刚刚得到的谕旨，打开来，让众人同声诵读。士兵们上前一看，上面写道（译文）：

恩准西洋汤若望传教士等，安居天主教堂。各旗兵弁等人，一律不准擅自闯入滋扰……

确是皇上朱谕，且已用玺，虽薄纸一片，胜过千军万马。方才还气势汹汹的士兵立即疲软，连声道歉，井井有序，退出大门。当其时，北京所有的西方传教士都觉得匪夷所思。这汤若望真神了，或者，他在八辈子以前竟与清朝皇帝是亲戚不成？

其实，原因很简单。汤若望那不伦不类的奏折，正合时宜，撞到满清统治者的心事上。

一个新王朝，在其建立以前，多靠武功；新建之后，便要文治。文治武功，首在用人。满人初入关来，百业待兴，当然大力招贤纳士。对此，摄政王多尔衮尤其开明，“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满人没文化，但汉人有文化，这话说得多好，拿来用就是。

翻开满清建国史，开头数页，记载着比其艰难的开国战争毫不逊色的人才之战。满人虽为少数民族，但开国之后，励精图治，胸怀宽阔，对明朝降兵降将，多能大胆录用。但明代官吏文人，有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标签：汉族人。而满人是什么人？与洋鬼子差不多的“夷人”罢了。非我族类，却立新朝，是为伪朝，委身事伪，不忠不孝，是为汉奸。于是汉族官吏文人，大义凛然，纷纷殉节，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怜可笑、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忠诚悲

喜剧。

并非没有屈身事夷的“明白人”，但都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且，为了争取到一个人才，清朝统治者可是费了死劲儿，有时，竟要拿皇后的贞操来换。那个洪承畴降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他在被满人俘虏后，决心以死殉国，绝食多日，粒米不纳。这时，精干、聪慧的孝庄皇后出现了。她并不说出自己的皇后身份，亲自伺候洪承畴，喂饭穿衣，晚上还陪他睡觉，待对方慢慢回心转意，这才道出真相。面对如此“美人计”，面对如此让人舒服的感化功夫，洪承畴没法不被感动。据说他立刻拜伏在地，在皇后的裙裾下痛哭着，心甘情愿地当上了“汉奸”。

但汤若望，这样一位对满清统治者来说更有用的人才，却心甘情愿地投上门来，不由得多尔袞不心花怒放。对汤若望来说，所谓中国士大夫们痛心疾首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为了一个名字而殉节自杀，简直就是大傻瓜。而他是洋人，他从小就懂得“独立”意味着什么。他的行动由自己负责，他的信仰由自己斟酌而定。什么中国伦理，什么君臣关系，那都是捆绑中国人的绳子，同洋人无关。以明朝臣子的身份上疏新朝怎么啦？哦，你们中国人把这个叫做“屈节投降”，言重了，言重了——不就是写封信吗？什么，好狗不事二主？对不起，我不是狗，我是人，所以，我选择主人的时候，你们别拿狗的伦理来说服我。是的，我就是个自动报到的“贰臣”，我愿意同新朝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现在，就看你们是否愿意“需要”我啦。

满清人当然需要他。汤若望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红夷大炮”轰死了满人的国父，汤若望就是仿制该炮的洋人！那时，满人恨死了汤若望，恨不得生吃他的“红番”肉。但恨与爱实在是同一心理的两极。满人嫉妒，明朝政府居然有这样能干的洋人；满人更庆幸，对这样伟大的人才对方竟不知善加利用。现在，和平了，没有战争了，这个洋鬼子竟投上门来。杀之还是重用之，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他在奏折上说了什么？他不仅会造大炮，他居然懂得修撰历法，观测天象。天哪！此时此刻，再没有比他更需要的人才了。圣朝起鼎，天运已新，亟需的正是新历法。我满清皇帝不是“夷”，同汉人皇帝一样，也是奉天承运的“天子”。明朝的“大统历”自然不愿证明这一点；满族的“回回历”愿意证明，但连满人自己都知道，那里面充满了谬误。现在，汤若望说他手中有“西洋历”，这可是个好东西。如果连洋人的“天道”都能证明我大清统治乃“奉天承运”，那么，看那些汉族人还有什么话好说？！因此，杀不杀这个洋人就不再是个问题了。至于国父之恨，算啦，您老人家之伟大的献身，不就是为了看到您的后代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吗？而这个洋鬼子可以帮助咱们名正言顺地立国啊！

然而，汤若望的天文学知识真像他说得那么棒吗？这是最主要的。含糊不得。

汤若望明白对方的心理。他向新朝廷主动地进呈新仪器，主动预测日食月食，并送上一份图表，上面列出本年八月将发生的日食，次年正月月食的起终时刻，还有北京城及各省的见食时刻，都分秒不差，准确地列入表内。

这还不算，一个多月后，即一六四四年七月，汤若望又向清廷进呈三件仪器：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一件，望远镜一台。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

前面述及：明朝的历法称“大统历”，清朝的历法称“回回历”，统为旧历，各自应用了数百年，难道真的都充满了谬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好，本年八月初一将有日食。这一点，汉人用“大统历”、满人用“回回历”、汤若望用“西洋历”都推算出来了。然而，日食将出现于这一天的几点几分，甚至几秒，在何方位，谁能推算得精确无误，方是真科学，方有资格代表新朝“应天承运”。

于是朝廷下令，各历法代表人物于此日进行“历法大比武”，且看龙虎榜上何人第一。

时候到了，弘文院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员及汤若望等人，一同登上观象台，当场验证各人推测日食的结果。

在中国，日食被看作不祥的天象，民间称作“天狗吃太阳”。所以，消息传出，京城气氛异乎寻常。这天一大早，百姓便聚集街头，有的拈香祈祷，有的敲锣打鼓，意在为太阳助威，避免它被天狗吞食。就是吞了，也要在万众的呼号、祈求声中，迫使它吐出来。因而，简直就是一场紧张的助日搏斗。

京东观象台上，“搏斗”更为紧张。大统、回回和西历的代表人物，共同面临一场严峻考验。这一考验，将决定各历法的生死。

日食出现前，他们各自出示了自己所测的日食起复时

刻与方位。汤若望也正是这样做的。此时此刻，他胸有成竹。他先让两个弟子向在场的人作了一番介绍，然后拿出自己测算的时间表，并把日食即将再现的过程，提前画在了纸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众人屏住呼吸，等待时辰——这无情考官的裁判！只听得报时辰的官员一次次地大声宣告，眼看着大统历、回回历代表测算的时刻已过，但天上的日食情况并没有得到验证。

现场观测最后证实，汤若望的推算最为准确。

大学士冯铨等向朝廷回奏了实情：此次历法比试，“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sup>⑩</sup>

西法推算的“密合天行”，产生了充分说服力，得到大多数人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才真正对汤若望阐述的天学道理公开予以首肯，之后顺理成章地正式表态（译文）：

敬授民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的昼夜时刻为重。如果节气的时日不真，那么，太阳出入昼夜的刻分就都错啦！以往人们使用的《大统》、《回回》旧历，所用节气都是老掉牙的记载啦，而且，北方直隶省的节气，春分秋分前后，相差居然有一两天之多，更别说全国会相差多少啦！而新的西洋历法，其能推测太阳何时何地在地平线上升起，何时下降，这是白天，那是黑夜，此入而彼出，俱有道理。如果用旧历法，以一时一地而推测全国的时刻，那么，种种差讹，将难以枚举。而现在，只要我们使用这新历法，所有全国各地的节气，太阳出入的昼夜时刻，都照着其道里

远近进行推算，真正是提纲挈领，开卷了然。<sup>⑬</sup>

根据上述认识，朝廷才决定颁旨实行：

从现在开始，使用西洋新法编造《时宪书》，颁行各省。这是我大清朝用西人治历之始。<sup>⑭</sup>

近代科学的星辰在古长城上空首次闪耀了。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一个西洋传教士的功绩。

那时的大清朝，胸怀大度，容纳百川。三个月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帝正式发布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谕旨称（译文）：

钦天监的大印，由汤若望掌管。凡该监官员，从此都是汤若望的属下。嗣后一切有关天象占候事宜，汤若望让怎么办就怎么办，别人不许乱来。钦此。

但汤若望为大清朝在天文学上露了一手，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传道。他的科学是为了给他的上帝开辟道路。因此，他具书谢辞，在奏疏中写道（译文）：

臣这样思想：从小辞家学道，誓不当官，不结婚，现在怎么能违背誓言，当起官来。况且，皇上您只要下令，任何时候要臣料理历法方面的事情，都没什么困难的，至于要臣掌管大印，臣何敢当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别选贤良……<sup>⑮</sup>

然而，礼部很快就奉到如下圣旨：“通知汤若望，要他



遵旨任事，不准推辞。”时间为顺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为了今后能顺利地在大清朝传教，看来只好从权——汤若望出任了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并担任了北京古观象台首届外国台长，由此开创西洋人执掌中国观象台之始。在清朝，这一职位为五品，在官僚九品制梯队中，正好属于中段。从此，上帝的仆人变成了中国士大夫。

这决非一次普通的官员任命。这是两股历史潮流的砰然相撞，其涵意深邃，恰好构成本书报告的主题开篇。上帝来到中国，其第一个可见的成果，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由上帝的仆人在古老中国的观象台上准确观测到的被“天狗吞蚀”的日食。日食过后，满天星斗，现代科学的星光开始闪耀于中华大地。

今天的人们，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东行不远，到达建国门内，买一张门票，登上巍峨的古观象台，仍能为那些巧夺天工的天文仪器所震撼。那仪器，已不再是古老中国的观天仪。那天象台，也不再是古老中国的司天台。在科学星辰的照耀下，古观象台早已薄古厚今，古观天仪更是推陈出新。

北京最古老的司天台建于元代，据悉在贡院东街与西街之间，由元世祖忽必烈谕令修筑，一二七九年告竣。经年累月，到明朝时该台已完全报废。于是，利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的一个角楼，明朝重建观象台，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北京古观象台。

然而，那的确是个“古”观象台。汤若望来这里办公前，观象台内没有任何观象仪器，全靠钦天监人员目视观

测<sup>⑥</sup>。只因地点不错，适宜观象，它才保留下来，使汤若望及其以后的中外天文台长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走进观象台，朝西行，西北角处静静地排列着几间小耳房，那便是汤若望曾经办公的地方，也是历届台长用过的工作室。走进房中，迎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醒目的大匾，底色海蓝，横书四大金字，“观察惟勤”，肃穆之气，跃然匾上。汤若望便在这里任职二十年，制造仪器，批阅文件，撰写奏疏，日以继夜，与监员们共同观察天象。

不能说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没有中国人的智慧。例如，观象台上有一简仪，是汤若望按照中国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所制的简仪仿造的。郭守敬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古代的伟大并不一定会遗传为近代的伟大。在近代，伟大的意思是不断改进、不断进步，决不墨守陈规。在汤若望的努力下，“简仪南端的正方案被改造成地平式日晷”<sup>⑦</sup>。这不是普通的改造。据考证，仪器上的地平式日晷装置是传教士们带到中国的；原有正方案上的日晷度盘采用了今制，即九十六刻，而中国的古制是为一百刻的。今后我们还会看到：这相差的四个刻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总之，一“今”一“古”，不可同日而语。

不能说观象台上的仪器都是汤若望制造的。在“台上”，标有“汤若望制造”的仪器，保留在观象台上的并不多见。最多的，倒是他的弟子和继任、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的。但在“台下”，在北京的文物收藏中，汤若望的仪器仍有迹可寻。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有他制造的象牙日晷，很袖珍的样子，小巧、精致而且美观。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眼就可以看见一台青铜日晷，一座浑天仪，都

是汤若望的杰作，其用料精选、工艺缜密、极其实用，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从一六四四年始，整整二十年时间，汤若望绘星图<sup>⑮</sup>、修历法、制仪器、考天文，引进、编著西方天文学著作<sup>⑯</sup>，为科学星辰闪耀华夏天空做出了划时代贡献。

这时，一六六四年来了，科学的星辰再次熠熠闪耀。但这一次，科学为汤若望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生命的终结。

一六六四年，那是汤若望的大凶年。

那一年，汤若望的保护人顺治皇帝死了，而康熙皇帝还小，不能亲政。一意反洋的中国士大夫，觉得有机可乘，向汤若望痛下杀手。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悲剧和喜剧都是：科学也罢，反科学也罢，都是君主的选择。君主一变，科学的地位立变。他们是科学的保护神，或者，科学的天煞星。

当然，中国士大夫亦自有其严正立场。在他们看来，汤若望这样的洋鬼子，早就该杀，该千刀万剐。瞧他那样子：长须碧眼，非我族类，其心必殊，竟绣鹤朝服，独钦天监！而普天之下，莫非中土，这中土上空的星辰，凭什么要洋鬼子来管？！

仇恨汤若望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叫杨光先的朝臣。他本来出身武将世家，从小熟读兵书，但阴差阳错，他的武功竟无从施展。但中国古代的兵书，夹杂着天文、星占、撰择、卜算等内容，也是武官应备的基础知识。因此，虽未从武，但杨光先对天算、术数之学颇多涉猎，虽然不过半瓶子醋，却也够他对别人酸一壶啦。因此，他自认为，只有他来掌管大清朝的钦天监才最够资格。

他有一个优点：从不讳言自己的性格。他这样描述自己：“和别人谈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军事、法律、礼仪、音乐，还是上下尊卑的问题，一定要提高嗓门，怒睁双眼，就好像要与人家决斗。”<sup>②</sup>

他早想同汤若望决斗了。这个可恨的洋鬼子，居然占了他的位置。这个西洋来的什么新历法，居然成了中国的天象法典。可二十年啦，皇上支持汤若望，他杨光先想吃掉汤若望却不敢张嘴。

现在好啦。老皇上死了，新皇上还小。对汤若望和他的西洋历法不满的大有人在。杨光先决定出手。

先造舆论。只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打垮了汤若望，后面的事情就好说了。他写了一部书，名《辟邪论》，印数竟达五千册！在当年，这样的书籍印数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公平地说，此书的主要论点并非杨光先创造，连书名都是抄的。早在十五年前（一六三九年），一个浙江学者兼官员叫徐昌治的，便编了一部反基督教文集，名《圣朝破邪集》。何其相似乃尔？

观点更是相似。

在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奏折《请诛邪教疏》中，杨光先给汤若望戴了三顶帽子：潜谋造反；邪说感人；历法荒谬。每顶帽子下都将是一个被杀的脑袋。这些罪名简直就是十五年前《圣朝破邪集》中攻击基督教传教士之罪名的翻版。在那部书中，传教士被指控为外国侵略的间谍和先驱，基督教是一种荒谬的邪教，敌视中国文化的异端。

今天，翻开现代史家的一些史书，我们仍能看到对来

华基督教徒同样的指控，因此，三百年前，给传教士们戴上这些同样的帽子又何足为奇。

一八六四年九月，就凭那三条指控，汤若望、他的弟子南怀仁等八名被告，竟被押上刑部大堂开审。此时的汤若望，为中国服务了大半生，已是年逾古稀，重病在身，肢体瘫痪，言语不清，受审时，由南怀仁代其申辩。也有的时候，要把问题写在纸上，汤若望看一下，小声与南怀仁用德语交谈一下，再由南怀仁对大堂发言。

先审潜谋造反之罪。

这第一条罪状审理多日。原告指控：汤若望之耶稣会教友，胸佩圣像，那是他们组织秘密团体的标识；门口粘贴礼单，更是阴谋造反的标记。有行动吗？当然有。杨光先早就说过：所谓耶稣徒党，都是借口搞什么历法，私下却进行颠覆活动。他们在北京和各省开了三十个窟穴（教堂），广东、澳门地区，聚众数万人，“整天暗地送往迎来，棋布党羽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这还用说吗，当然是“随时准备暴动”！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暴动。但杨先生终于说出了中外关系史上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大清国卧榻之旁，岂容若辈酣睡耶？”<sup>①</sup>

然而，罪名虽重，却无法查证。杨光先急了：怎么能没有罪证，他们在中国居留本身便不合法；他们既未奉本国派遣，又没有我国准许，擅越边境，这不是来搞颠覆又是什么呢？！

这才有点门道了。于是派人彻查传教士的入境许可证。每名传教士都拿出了本国政府的派遣证，和中国皇帝允许其传教的准许证。显然，杨光先先生在造谣诬陷。

又往澳门查看有无军事据点，是否纠集数万人马，正待命发往大陆实行颠覆活动。去了，发现更是无稽之谈。当其时，在华的传教士总共二三十名，且分散各省，没有组织，没有兵器，如何聚众起兵？

此条罪证无法成立，罪状自然不了了之。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

于是再审邪说惑人之罪。

这一条，汤若望等竟遁无可遁。指斥天主教书籍乃妖书邪说，竟是几乎举朝一致的意见，连刑部审判官亦持此见。审理此罪，过堂十二次，汤若望、南怀仁等拼命为自己辩护，毫无用处。廷审认定：天主教宣传荒诞不经、蛊惑人心，此罪成立！

最后，三审历法荒谬之罪。

这是一次颇具戏剧色彩的审讯：当众观测天象，以“用事实证明西洋新法的荒谬”。杨光先太自信了。他真诚地相信：古历法一定胜于新历法，中国历法一定胜于西洋历法。据一份史料记载，为了取得胜利，他进行了精心准备，派人把中国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当年制造的仪器，从外地运至北京。但运回来的已经是一堆破铜烂铁，根本不能使用。

但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法大比武”还是如期举行了。

那是在一六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因预测到本日有日食，杨光先让中国、回回、西洋三种历法，再次同时登台表演。事先，三家历法代表都报告了自己预测出的日食准确时间。汤若望已经病人膏肓，他的弟子南怀仁代表西洋历法出席

比武。中国历预测：两点十五分日月交会；回回历推测为两点三十分；但南怀仁宣称，据西洋历的推测，日食将于三点整出现。

时间快到了，众人登上北京观象台。不久，司仪宣布：中国历所测时间已到。但日食杳无踪影。

过了十五分钟，回回历预测的时间也到了，日食仍然没有发生。

最后，西洋历预测的时间到了，人们架起透镜，让太阳投影射入墨屋，果见日已有食：日食第一线黑斑在三点整准时出现！<sup>②</sup>

科学的星光再次闪耀于长城上空。但迎来的却是死一般的沉寂。

正确的预测没有减轻对正确的惩罚。错误的预测也没有受到任何应有的惩罚。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学术是非无足轻重，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婢女。因为，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杨光先另外一段流传至今的名言（译文）：

在我杨光先看来，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就像汉朝人，不懂合朔之法，让日食多出现在倒霉的日子里，但汉朝还是有四百年之久的天下。有西洋人，我恐怕他们花钱收买我中国人的人心，就好像干柴拥抱烈火，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sup>③</sup>

这“宁可……不可”的阶级斗争逻辑，我们并不陌生。三百多年后，我们不是听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

这不容置疑的虚拟逻辑，像“莫须有”之罪一样可怕。反科学的谬论成了杀死汤若望的颈上剑，科学的结论反成了汤若望的墓志铭。他被中国法律宣判为散布邪说的首犯，立即革职并判死刑，南怀仁等也被投入了监狱。挂着刑枷铁链，只待行刑的汤若望被投入刑部大牢。可怜他清苦一生，漂泊万里，为近代科学进入古老的中国贡献了一生，却要蒙受如此千古奇冤。

一六六五年四月中旬，终审判决宣布：对汤若望处以中国最重的刑罚——凌迟；南怀仁等十四名同案被告，不论轻重，亦一律处斩。看来，这冤案再难转机。

然而，国家之外有世界，人的头上有天空。这天大的冤案该当由老天干预平反。宣判刚刚结束，北京城内忽然地动山摇——不过一刹那间的事情，四城之内，墙倒屋塌，朝野臣民，失魂落魄——北京地震了。

如此天谴，自然是上天告警。第二天，吓破了胆的主政大臣（此时，康熙尚未亲政）立颁谕旨：实行皇恩大赦，狱中犯人，多数释放。汤若望等也幸免于死。

但中国科学史上的这场大是大非，却未因地震而有公正的结论。

汤若望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追踪。出狱后，他在忏悔的心情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四个月，于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在中国——北京仙逝。

这一天，在西方，正是圣母玛丽亚升天节。

死前，汤若望口述、南怀仁执笔的忏悔书完成了。但他没把握自己能否随同圣母升上天堂。他觉得自己没能很好地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任务；相反，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



贡献给了中国的近代科学事业。

他在忏悔书上签名的时候，握笔的手颤颤发抖。

一年后，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十四岁的康熙皇帝临朝亲政。

转年（康熙七年）十一月的一天，已是夜半时分，南怀仁等三神父刚刚作完晚间弥撒，忽然有人来访。来说，他是皇帝的内侍。他来此的目的是皇上请神父们细查杨光先历法中的错误。

亲政后的康熙大帝，对杨光先实在是忍无可忍。其治历之粗糙，竟使皇帝不得不作了一次检讨！

汤若望死前下狱之时，杨光先便已夺了钦天监的大权。他派人砸了汤若望教堂的耶稣像，并在汤若望出狱后，又把病中的汤若望赶出教堂，然后，他心安理得地占领了汤若望的住所。如此心想事成，自然踌躇满志。但在这世界上，小人可以得志，才能决难作伪。杨光先并不精通治历，在钦天监的岗位上勉强混了两年。但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再也混不下去了。

原来，在专制帝国，钦天监正，职位不高，责任重大。每年，都要作出第二年的准确历法，向全国公布。康熙亲政头两年，一六六七——一六六八年的历法，汤若望已经造出，杨光先虽然整死了汤若望，每年公布第二年的历法，他使用的还是汤若望的西洋法。这样混了两年，到一六六八年，需要公布一六六九年历法的时候，杨光先不得不自己出马造历。不料竟然一造就错，让皇帝大丢面子。

众所周知，中国历法俗称皇历，其词源，正因为历法虽由钦天监推算，公布者却是皇帝。而皇帝也不是代表他

自己，而是以“天子”身份代表“上天”公布历法的。所以，在人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老大，无论作错什么事情，也不必检讨。但面对“上天”，皇帝也矮了一辈儿，倘有错误，必得检讨，以免遭天谴。这正是钦天监的责任重大之处。

杨光先正是在这方面出了大错。其在一六六八年底所进一六六九年历书，本当闰十二月，他竟把闰月推错了。待要更改，皇历已颁布全国！唯一的挽救办法，便是皇帝出面更正。于是康熙不得不颁布圣旨一道，宣布“停止闰月”。如此一来，杨光先自然貽笑大方，而皇帝也大丢面子！这就是康熙派人夜访南怀仁的原因。这位具有超群气魄和才智的少年天子，已经决定重整钦天监。

几天后，一六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下达谕旨（译文）：

谕杨光先……南怀仁：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你们不要心怀仇恨，各执己见，以彼为非，互相竞争。谁的对了，就应该照谁的办；谁的错了，就应该改过来。一定要实事求是，把天文历法详细制定，让它成为完善的历法。<sup>④</sup>

在同一份谕旨中，康熙下达命令：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天文科学大比武”：测验日影。

这一次，中方天文主帅是杨光先，西洋天文首领自然是南怀仁。

南怀仁来自比利时，获得牧师职位后，决心步汤若望

后尘，成为“拯救人民灵魂”的传教士。他很早就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传教，但直到一六五九年初，始得中国当局批准。一六六〇年二月，汤若望去世前六年，他受皇帝聘任，来北京协助汤若望工作，很快便陷入杨光先对汤若望的迫害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出，他的天文学知识较之汤若望毫不逊色，甚至可能更扎实。因此，康熙皇帝的谕旨使他看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又一次重大转机。他热爱自己的老师，希望通过这次“天文科学大比武”，给汤若望平反昭雪。<sup>④</sup>

康熙谕令颁布的第二天，一六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廷大臣多名与杨光先、南怀仁一道，来到北京观象台。人们发现，康熙皇帝是如何地重视这次测验！测验的题目是：杨光先和南怀仁当众分别测验及推算正午日影所到之处，换句话说，当正午的太阳高挂天际时，计算其高度与角度。但按照康熙的指示，所有的测量仪器都在两周前便置放妥当，由天文官们固定入位。机器的可移动部件都覆以封条，加盖上私人印章，以责任制方式，避免作弊。<sup>⑤</sup>

见此情景，杨光先怯阵了。听罢圣旨，他说：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日后才能推算出来的。

对此，在场官员感到“惊愕”。一官员质问他：你们不是很早就声称可以测日影吗？怎可自食其言！

按照康熙的指示，为保证测验的公平性，此番测验连续三天，进行了三场。三场下来，杨光先的测量，误差都很大。而南怀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一场测验，地点在观象台。南怀仁制造了一张“木表”，把当天中午的日影清晰地画在木表上。正午时刻，众

人一同观看，其推测分厘不爽。

第二场测验，地点在紫禁城午门前。在这个庄重的场所，南怀仁标出了线条，再次与正午的日影吻合。

第三场测验再次换了地点，南怀仁的计算又是精确无误。

现场没有结论。大臣们向康熙汇报的，只有测验后的事实。

看到事实，康熙全明白了。他首先下达了一道谕令：将钦天监官员所推算的《七政民历》，“着南怀仁验看，差错之处写出。”看起来，这仅是一项造历工作的检验，但实际上，这无异于褫夺了钦天监的造历权。

杨光先看出了他面临的灰暗前景，那前景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他很狼狈，很惶恐，但他不甘心。他向康熙上了一份奏折（译文）：

皇上您坐的这个位子，是尧舜相传之位。皇上您所继承的大统，是尧舜相传的大统。因此，皇上您颁行的历书，便要用尧舜用过的历书。皇上您事事都按照尧舜定下来的规矩办，怎么独独在历书问题上不一样啦……那个南怀仁是什么人？他是天主教的人啊！一个按照尧舜定下来的规矩办事的圣君，怎么能服从天主教的规矩……那大西洋至我大清国，相去八万里。那天上的星宿官度，自然不一样。岂可以八万里之外国的什么东西，拿来毁我从尧舜时代便继承下来的仪器啊……那西洋人，只能称之为制造器械的精巧工匠，里面没有贯穿圣贤的大道理；只会说没有根基的大话，而不知合理数之精微。如果皇上您用这样的人，臣

以为不可以啊！<sup>⑥</sup>

如此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将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造成一次又一次对科学的反动。杨光先这样的中国士大夫从不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不认同任何意识形态。科学便是事实。后来的科学结论要证伪前人可能过时的科学结论，不靠别的，也只是靠事实。科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本应只有事实。只有事实才能构成科学的结构，它不动摇。如果中国能很早地认识到科学的这一特征，并避免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冲击，中国便早已不是后来的中国。

幸运的是，康熙大帝是个愿意尊重事实的皇帝。

他刚刚读完杨光先充满大道理的奏折，南怀仁的奏折也到了。这一次，他看到的只是事实（译文）：

皇上您让我查对历书的差错……我便把我推算出来的历法，与《七政民历》进行核对，发现两者相去甚远。臣从小学习教规，不能说别人的短处。现在我查对完了，不敢不按照事实，把它分析明白，以免使用起来失实。现在，我把我查对出来的错与对的地方，详尽列出，造成册子，同时，把过去的《七政民历》一起，一并恭呈御览。结论由您来下。

看了奏章，康熙心中已有结论。康熙的伟大，便是他仍不遽下结论。他还要看事实，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不动

摇的事实。于是，我们后人竟有机会看到中国天文科学史上的“第四次大比武”。

是在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正月下旬，康熙派二十名大臣监察此次“比武”。这一次，考察项目仍是测试日影，但却是要检验西洋历法和中国历法，哪一种法度能精确地反映天象。前面已经论及：西洋历法采用的是“九十六刻度法”，中国历法采用的是“一百刻度法”。正如杨光先强调的：“以百刻推算，系中国之法；以九十六刻推算，系西洋之法。”而且，如果使用西洋法——杨光先警告说——“这个国家的气运便长不了”！这可是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太阳升起来了。日影在汤若望改制的九十六刻地平式日晷上反映出来。大臣们在写给皇上的报告中说：“逐款皆符”。而按一百刻的中国之法推算的数据，“逐款皆错”。

这一次，康熙要求大臣们，拿出你们的结论来。

结论本应很简单，但如按照杨光先的逻辑，便将会很复杂：西洋的科学方法是正确的，但如果采用，国家便完蛋了；中国的方法是错的，但既是祖宗传下来的，便必须采用。

真幸运：二十名监察考试情况的大臣，一致认为杨光先所说的是个混蛋逻辑。他们郑重建议皇帝：“既然西洋法度合乎天象，那么，明年就应开始采用。”

这正是康熙要下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之后，康熙给杨光先以严厉的处分：“妄称国祚，情罪重大”，撤消其钦天监正的职务。

康熙谕令南怀仁继任钦天监正，并为汤若望等平反昭

雪。科学的星光再次闪耀于中华。

于是，我们今天便还能看到一块铭刻着“皇帝谕祭汤若望”碑文的墓碑。它立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旧称栅栏墓地。皇帝的祭文是：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赐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可歆享。

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至一八四〇年前，这块墓地安葬过八十名来华传教士。

至一九〇〇年——本书主题故事年代——这块墓地的墓碑被推翻、砸毁，坟被掘开，墓地被夷为平地。汤若望碑幸运地保存下来。

至一九〇三年，该墓地由政府出资重建，并立“纪念碑”。

至一九六六年，正是汤若望三百周年祭日，墓地再遭劫难。

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墓地渐次整修，但汤若望墓已变得断壁残垣，“仅剩下一只孤独的石羊，兀自蹲在汤若望墓碑小院的门口，它仿佛满怀着失去伙伴的凄楚之情，默默无言地蹲在那里。石羊若是有口，一定会滔滔不绝地向一批批谒墓者诉说汤若望墓地三百多年的变迁史。”<sup>②</sup>

## 4. 院士·疟疾·皇舆图

一六六六年，汤若望在北京去世的同一年，世界科技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钦封本国顶尖科学家为“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是“院士”一词首次在世界科技史上出现。从此，科学的金字塔上，镶嵌上一颗闪闪发光的科学明珠。

没有国界的科学，有无限的扩张能力。在路易十四主持下，法国科学院准备测绘出世界上第一张“世界地图”。这将是一项震撼世界历史的艰巨工程。此前，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曾在科学实测的地图上，将整个世界一览无余。

然而，据说这世界上有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国。没有中国，这张世界地图就不会完整。几乎无人懂得她的语言。没人知道，倘若在中国开展这项工程，会不会得到她的支持。但由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的贡献，路易十四知道中国有一位皇帝叫康熙，这个神秘国家的皇帝居然雅好西学，而且并不讨厌传教士。于是，路易十四有了一个主意：派六名科学家兼传教士，到这个神秘的国家去趟趟路子。这六名传教士同汤若望一样，全是耶稣会会员。

一六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路易十四签署了资助六位法国耶稣会士赴中国任命书：

为了使我们的海运事业日趋安全和我们的科学艺术日



益发展，并为了稳步取得成果，我们已作出了我们方面的充分准备，并认为有必要从欧洲派出一些富于实地考察能力的学者前往印度和中国，基于此目标，经过审查，我们认为耶稣会神父是最佳人选，我们观察到，他们具有突出才能，深为器重。现依我王国之权力，遴选耶稣会六人为“王家数学家”，并经国王特准任命。<sup>②</sup>

路易十四签准：国库拨款九千二百镑，作为远赴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年俸。此一拨款说明：这一法国传教团系受法国政府派遣，传教行动被纳入法国“保障海运事业日趋安全”的国家政治经济战略计划。然而，中国的幸运是：这六位法国传教士中，有两位是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通讯员<sup>③</sup>！他们到达中国后，取了两个中国名字：一个叫张诚，一个叫白晋。

此时，距世界历史上出现“院士”一词，仅仅过去了二十二年！

一六八八年二月，六位法国传教士抵达北京，正赶上汤若望的学生和继承人、康熙的第一位西学老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葬礼。

在康熙皇帝的记忆中，南怀仁是比汤若望先生更伟大的传教士。他亲政不久汤若望便死了。但汤若望的弟子南怀仁继承了老师的遗志，开始进行工程浩大的北京古观象台改造工程。这是十七世纪的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工程刚刚完成，南怀仁便仙逝了。

那天是三月十一日，六位法国传教士都参加了那隆重的葬礼。他们中的洪若翰神父把一切都描述了下来：

皇帝派来出席南神父葬礼的官员早晨七点就到了，我们走进了停放灵柩的大厅。中国的棺材很大，棺木有三四指厚，外面上了漆、镀了金，密封得很仔细，不让空气透进去。人们把棺材放在一个有四根柱子的豪华的圆顶车中，拉到街上。四根柱子上都挂着白色丝幔（在中国办丧事都用白色），柱子与梭子之间都挂了好几条其他颜色的花边，效果很好看。圆顶车固定在两根直径一法尺的横杆上，横杆的长度和它们的粗细相适应，六十或八十个杠夫分立两旁，用肩扛着柩车。院长神父带着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跪在大街中央的灵柩前。我们深深拜了三下，头一直碰到地上。出席这个伤心的葬礼的基督徒们都泪流满面，他们发出的呼喊催人泪下。队伍开始行进了。

人们首先看到一块二十五法尺高，四法尺宽的牌子，四周饰有丝织的花边，红色塔夫绸作底，上边用金色的汉文大字写着南怀仁神父的名字和他的头衔。好几个男人高高举着这块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乐队；一队人举着各种队旗、彩旗、燕尾旗跟在后面。然后是放在一个大壁龛里的十字架，还有几本丝织封面的书籍。一队基督教徒跟在十字架后面，有的像第一队人那样举着小旗，有的手里拿着大蜡烛。他们两人一排地走在北京宽敞的大街上，他们是那样地谦逊，令人敬佩。他们后面是一幅放在镜框里的圣母怀抱圣婴耶稣的像，圣婴耶稣手里拿着地球。跟在圣母像后面的基督徒和前边的队伍一样，手里举着小旗和蜡烛。

一幅护守天使画接着而来，也同样有一队基督徒跟着，

接着就是南怀仁神父的画像，人们把皇帝赐给他的所有头衔的象征都捧了出来。我们穿着白色丧服紧跟其后。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丧服是白色的；我们按中国的习惯一路行进一路号哭，我们实在也伤心至极。

接着是南怀仁神父的遗体，皇帝派来光临这位著名传教士葬礼的官员相伴而行。他们都骑着马。第一个是国丈；第二个是御前侍卫大臣；第三个是他的近臣，还有其他较次要的官员。整个队列令行禁止，秩序井然。

最后是五十个骑士。大街两边站满了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鸦雀无声地静静地目送我们走过。

我们教会的墓地坐落在城外的一个园子里。那是明朝一个中国皇帝赐给我们首批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的。这个园子四周有围墙，里面建了一个小教堂还有几间小屋子。

到了墓地门口，我们在路中央向着遗体跪下，拜了三下，哭丧的人又开始号哭。人们把遗体抬到落葬的墓地；那里已经设了一个祭坛，上面已经放好了十字架和蜡烛。我们的院长神父穿上白色祭衣，背诵了祷文，按照礼仪常规点香。我们又向着棺材拜了三下，人们把棺材从车上抬下放进墓穴里。哭丧的人又号哭起来，他们哭得那么厉害，真叫人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墓穴是一个六法尺深，七法尺长，五法尺宽的土坑；土坑四周砌了一道砖墙。棺材放在中央，好像搁在两道砖砌的约一法尺高的支架上。然后人们又把砖墙砌到六七法尺高，然后把墓穴封上，再在拱形的墓顶上放一个十字架。

最后，人们在离坟墓几法尺处竖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这块大理石连底座带碑顶共有六法尺高，碑上用中文和拉

丁文刻了死者的名字、年龄、国籍、去世年份和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园子头上第一座坟是利玛窦神父的，它的位置很突出，表明他是这个传教会的创始人。其他的坟都在他之下排成两排。

汤若望神父的坟在另一边，很有皇家气派，是当朝皇帝为了平反纪念这个伟人，在他去世几年以后下令为他修建的。<sup>①</sup>

这珍贵的史料，让人感慨万千：在本书主体故事发生时的二百多年以前，在中国，居然出现过这样一次中西合璧的葬礼！它使我们感到：二百多年后，以反洋教而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在这个葬礼上，西方人，而且是西方传教士，竟然接受了中国式葬仪：牧师脱下了黑袍，穿上白色的丧服；传教士不能下跪，但他们跪下了；他们在本国送葬时没有号哭的仪式，但这次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号哭了。他们并未认为中国的礼仪风俗与西方格格不入。他们能够宽容地对待中国乡土文化。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眼前出现的，并非一个“妖魔化的中国”。

在这个葬礼上，中国人，而且是在中国本土，竟然接受了西方式葬仪：圣母和耶稣的画像被拥抱着，高举着，成为葬礼的旗帜；祭坛上是十字架和蜡烛，有中国人从没有见过的“祈祷仪式”；基地的旁边甚至还有一座教堂——中国人宽容地希望，死后的传教士在阴间还能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教。他们并未认为西方的宗教礼仪与中国格格不入。中

国人宽容地对待了西方的宗教文化。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眼前出现的，并非一个“妖魔化的西方”。

中国和西方，西方和中国，只有走出互相妖魔化的历史，才能看到这感人至深的和谐。

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当时的中国有一位伟大、自信而宽容的皇帝——康熙大帝。

于是，在有案可稽的史料指引下，穿过历史岁月，在一个春日凌晨，追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脚步<sup>⑧</sup>，我们从紫禁城出发了。这是年轻有为的皇帝正有理想的时期。经常簇拥在他周围的常常不是他自己的大臣，而是一批来自西方世界的传教士。他并不特别了解那个世界。但他认为那个世界与他统治的世界并不冲突，同时，他能从那个他并不特别理解的世界学到许多东西——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都大有用的东西。对此，他有切肤之痛。

在南怀仁葬礼后的第四年，一六九二年的冬天，康熙皇帝发出了一道谕旨，让正在广东传教的洪若翰和刘应神父，立刻赶回北京。此时，路易十四派来的六位法国传教士，两位有院士通讯员头衔的，张诚和白晋，被康熙留在身边，当他的自然科学老师，而其他传教士在他的准许下，正在中国各地传教。

在距离紫禁城好几里地的地方，两位神父发现，皇帝的一位侍卫大臣和在北京的所有神父，正在那里等待着迎接他们。原来，皇帝又病了。这一次，他决定使用西药。

在今天看来，康熙的病并不严重，不过是疟疾（打摆子）而已。但在当年，康熙皇帝的疟疾病简直就是顽症。每当病发，忽然冷如冰窖：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棉被都捂在

身上，还是禁不住浑身哆嗦；忽然热似蒸烤：一件件地把衣服扒下来，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撕扯下来，还是高烧不退。他发现，中医很难治好他的病。

传教士们得知皇帝的病症后，曾劝他服用西药金鸡纳霜（奎宁）。传教士们告诉他：这种病是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染的，在法国，每到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法国国王便命令国家医疗机构，把这种药粉分发给全国的穷人，以免传染。即使染上此病也不要紧，吃了这种药，病便被控制住。

康熙不信。天下哪有这种药！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传教士告诉他：有一种树叫做金鸡纳树，在它的树皮中可以提制出一种白色结晶体，或者是一种无定形的粉末，有苦味，因此叫金鸡纳霜。它正是疟疾病的克星。

真是这样？那就试一试。当然，先得让别人试。据传教士的记载：一个个已经奄奄一息等待死亡的人，服了药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看到这惊人的疗效，康熙皇帝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但他仍然不敢服用。

病情在发展着。康熙的疟疾病，总是一开始就发高烧。每当这时，他便想起金鸡纳霜，便找一些同样的病人来，再次试验它的疗效。最后，他终于确信，这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

御医们坚决不同意给他服这药粉。天下能有什么药能比我们的中药锅子更保险，更有疗效？！

有一天，康熙感到自己简直就要烧死了——

他怕疾病发展到他的脑子，自己决定服一半剂量的金

鸡纳霜药粉，晚上就退烧了，后来几天他好多了，不过还有低烧，还要发作，也许因为他服用剂量不够。尽管发作不厉害，只延续了两个小时，他仍有点不安。他向全城公布寻找谁有治低烧的良药。他还不断通告，患同样病的人可以进宫治病。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让他们作试验。有一个和尚与众不同，他要求搬来四桶凉井水，和尚盛了一杯井水，走出大殿，抬头对着太阳举起双手，然后朝四个方向转了一圈，他作了一百种令异教徒们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作完以后，他让一位跪着热切等待治愈的病人喝下那杯水。但是疗效全无。和尚被当做骗子赶走了。<sup>③</sup>

洪若翰和刘应神父正是这时走进了紫禁城。他们有备而来，带了刚刚从法国寄来的整整一斤金鸡纳霜。皇上还在病中，但他派了四位大臣来接见两位神父。

第二天，先让三个病人试服金鸡纳霜。一个发作以后吃，另一个发作的当天吃，第三个在发作的间隙那一天吃。这三个被临床观察的病人一下了都好了。

消息马上报告了康熙皇帝。四位朝臣自告奋勇来试尝，皇帝同意了，并要他们当场服用。

内侍端上盛酒的杯子和金鸡纳霜。皇帝亲自把酒跟药搅和了，傍晚六时，四位朝臣当着康熙皇帝的面，把药喝了下去，然后便退下了。

康熙没有喝药。他想再坚持一夜，等待大臣服药后的结果。但夜里，他的病忽然又发作起来。他觉得自己等不及了。凌晨三点钟，他召见索额图亲王，要他立刻去查看大臣服药后的反应。他得到的回报是：四位服药的朝臣都

安然无恙，睡得很是香甜。

于是，再也不顾御医们的反对，康熙命令把金鸡纳霜拿来，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高烧终于退了。康熙不相信会这样容易，便等待着高烧再起。但是，没有再发烧。一天一宿平安地过去了。宫廷里一片欢腾。

第二天，四位朝臣向神父们祝贺金鸡纳霜的成功。神父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是上帝对中国皇帝的恩宠。

从此，康熙继续每天服用金鸡纳霜，病情一天天好起来，直到痊愈。

三个宫廷御医倒霉了。按照他们的“疗法”，疟疾病发作时，不能服用任何药物，只须“挺过去”。而在康熙要求服用金鸡纳霜时，是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负责任”的拦阻。

康熙皇帝指斥道：“你们见危不救，就怕我死了归咎于你们，你们就不怕我真的死了，什么抢救措施都没有！”

他下令刑部审查他们，依法处置他们。刑部认为这“见危不救”之罪是个大罪，判他们死刑。最后还是皇帝开恩，将判决改为流放。

重惩御医后，便重奖传教士。康熙公开宣布：是洪若翰和刘应神父带来的金鸡纳霜让他退了烧。他的奖赏是：让内侍取出紫禁城内所有的房屋图，他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赏给传教士们居住。

西方传教士终于在森严的紫禁城宫墙上打开了一道传播基督福音的缺口。这一伟大的理想，从利玛窦开始，已经坚持了上百年。他们发现，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家，虽然



对上帝没什么兴趣，但对传教士们带来的“奇技异巧”——西方科学技术却充满了好奇。于是，科学传教派无形中便形成了。它的宗旨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包括西医），然后，潜移默化地渗透上帝的教义。

许多历史学家太重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科学的目的，以为他们存心不良。但手段和目的的错位，从来都是历史决定论者的无奈。在历史上，手段变成目的的事情经常发生。它提供了一个手段，以达到它特定的目的。但到头来发现：手段变成了目的，而它特定的目的却无可奈何地退居次要地位。这些科学传教派的功绩就在于此。他们要在中国传播上帝的宗旨，但他们传来的和中国人接受的却是科学的福音。

一个疑问产生了。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西方的宗教历来是迫害科学的凶手。我们都知道：由于宗教迫害，哥白尼的日心说历尽磨难；伽利略被囚禁在教堂；布鲁诺被烧死在广场。在我们的印象中，宗教与科学，互相对立，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但除了这些，我们对基督教还知道什么呢？论述这些问题不是本书篇幅所能完成，但简单说明不无益处。

我们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结论：中世纪末期，西方进行了宗教改革后，从总体上说，基督教不仅不是发展科学的阻力，相反，它以下述三个原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鼓励人们赞颂上帝。

——赞颂上帝的最好途径有二：①研究和认识自然。因为上帝的智慧完全体现在它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中。②上帝要求人们为社会谋福利，而其最好的途径是运用科学技术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提倡以辛勤的劳动颂扬上帝，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感谢上帝。<sup>④</sup>

这就是西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原则，在最多的情况下，它们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一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这样解释：

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sup>⑤</sup>

那么，怎样解释宗教对某些科学家的迫害呢？答案是：那是一段时间的事情。当科学结论与宗教教义相抵触时，宗教便会排斥、压制科学。然而，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总原则并未因此而改变。当科学的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屡试不爽的实验为社会接受后，即使在科学与宗教相抵触的情况下，该调整的也不是科学，而是教义。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日心说已经被上帝接受；伽利略已经被教皇平反。

还有一个证据：西方的科学家多数信奉基督教；西方的基督教徒，许多是科学家，至今如此。如果上帝是迫害科学家的，如果上帝不允许研究科学，那么，这持续了数世纪的科学与宗教现象便不可思议。

是的，西方的传教士们往往正是科学家。而且，在康熙年代，为了以传播科学而打开传播宗教的途径，西方世界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往往还是较优秀的科学家。他们终于

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康熙的赞扬——西方传教士捧着西方近代科学的敲门砖，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现在，让我们继续随着传教士们的历史脚步，去看一看康熙皇帝是怎样接受西方科学的。

神父们每天都进宫，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平时，他让他们到他的御座前，要求他们坐在他身边，让他看到他们的脸，让他们给他讲课时更自在一些。

康熙皇帝上课的兴致很高。<sup>⑥</sup>

但多数时间，康熙“上学”的“课堂”在北京郊外的畅春园。众所周知，它是后来的圆明园的前身。那时，康熙皇帝还没有梦见圆明园的建设格局图吧。

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早晨四点就离开北京城，到天黑才回来。他们一回来马上就又要工作，准备第二天的讲课直到深夜。来回的奔波和熬夜使他们疲劳不堪；但是要讨得皇帝的欢心，使皇帝能对神圣的教会好一些的愿望支撑着他们、减轻了他们的痛苦。他们回去以后，皇帝也不空闲，他自己复习他们刚给他讲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他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他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这样学了四五年，他始终很勤奋，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sup>⑦</sup>

康熙不仅勤奋学习，而且勇于实践。传教士们发现，康熙在学习“并不只认死理，总是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他学习得很开心，对于给他上的课程理解得很好”。

给他讲到固体的成分时，他就会拿起一个球，精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测出它的直径。然后，他就会算出同样材料、直径不同的另一个球的重量，或者算出另一个比较大的或比较小的球的直径该是多少。然后他转动一个同样直径或同样重量的球，他要证明实际情况和理论是否相符。他同样仔细地验证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或圆台、棱锥体和球体的比例和性能。

康熙皇帝曾亲自一气平整三四里河坡地。有时候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形式的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在场的朝臣仍不失时机地表示赞叹。他很高兴地接受他们的掌声，但是他总是向他们赞扬欧洲的科学和教授他这些知识的神父们。<sup>⑤</sup>

多数情况下，康熙皇帝的私人教师是那两位法国科学院院士通讯员：张诚专门为康熙皇帝撰写教材，而白晋就为康熙讲课。白晋为自己学生的魅力深深吸引。他写过一本《康熙帝传》献给路易十四。他描述道：“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过异教诸王。”

在这期间，传教士们帮助康熙大帝，不，应该说是帮助我们中国，办了一件永载史册的大事情。这就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sup>⑥</sup>

长城和黑龙江之间广阔的土地本来便属于中国。但俄国人侵占了雅克萨，并不断地前来抢占土地，抢夺黑貂猎场，还建起了防御工事。中国人虽一次又一次摧毁了这些

工事，俄国人却一次次毁了再建。双方的争执愈演愈烈，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这期间，两国都曾经试图谈判解决争端，但进行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结果。这一次，双方都提出建议：划定两个帝国的疆界。俄国沙皇和中国的康熙大帝都派出全权代表，到尼布楚进行谈判。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康熙皇帝委派出葡萄牙神父徐日升和法国神父张诚一同前往，给中国谈判代表充任翻译，并可与谈判大臣平起平坐，参与谈判进程。

为此，康熙“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两位神父”，并指示说：“允许耶稣会士脖子上挂上他们的十字架，让别人从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和圣牌认出他们的身份。”

康熙要求：在谈判中，每个细节都要遵守国际法；条约的撰写、签署、盖印和互换都严格遵守国际惯例；条约的正式文本使用拉丁文。在外交上，康熙大帝看来没有称“大”，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傲视邻国的态度，试图在中国外交史上，创立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解决边界争端并签订平等条约的先例。

如果他的子孙们也这样做，不知中国的近代史是否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改写？

当然，谈判并不容易。俄国人很傲慢，谈判时目中无人。但康熙时代的中国全权大臣也不吃醋。中方带去了大队人马。一面争取着和平，一面也并不怕打仗。问题是：怎样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对此，张诚神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来自法国，在那里，人们经常谈论各国君主们的利益，连年的战争、和

约使人们千百遍地权衡其后果对民族是否有利。而要通过外交解决争端，就必须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权宜之计”。

谈判旷日持久，双方进退两难，处于很尴尬的境地。

那天，张诚神父与中方谈判大臣讨论谈判中的难点。张诚问：要让俄国方面让步，中国方面能给予对方怎样的回报呢？

中方代表团团长索额图亲王沉吟了一下，说，临行前，康熙皇帝说，如果俄国方面让步，他甚至愿意让莫斯科人每年来北京做生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张诚神父说道，“放心吧，先生们，跟他们讲和，让他们符合你们的意愿就不难了。”

索额图亲王很高兴，请张诚神父到俄国人那里，向他们提出中方的建议。

不出张诚神父所料：每年到北京来从事自由贸易，是俄国人所希望得到的最大好处。为此，俄方愿意把雅克萨还给中国，并接受康熙皇帝提出的疆界。

傍晚时分，张诚神父带着已经成文的条约回来了。两天后，两国全权代表签了字。

和谈成功，两位耶稣会神父很风光，整个中国军队都向他们致敬。

最高兴的是康熙皇帝。这次谈判，中国收回了两千余里失地。他亲自到离北京八天路程的地方，去迎候谈判代表团归来。他说：“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谈判总算结束了。这件事做得合乎朕的心愿。”他令人高声宣读：“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力图使朕满意。朕知由于尔等才干与努力而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事竭尽

全力。”

但路易十四给神父的指示还没有完成。神父们乘机提出了在中国实地测绘地图的设想。康熙大喜。此时，他已即位十二年，平三藩，收台湾，完成了统一大业。此番又与俄国划定了北方边界。踌躇满志之余，他正要看看自己国土究竟有多大，状况又如何？他打定主意，搞一次前无古人的、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工程。

他要白晋神父来主持这一庞大的工程。

一六九三年，白晋奉康熙之命返法，觐见路易十四，并广召人才。越四年，率同会巴多明等十人返华。一七〇八年，康熙皇帝决心把绘制皇舆全图的计划付诸实施。

那一年的六月四日，白晋等“传教士——科学家”登上了中国长城。这里将是他们测绘的起点。到转年的十月十二日，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他们才返回北京，完成了中国的长城地理图。

如此艰难的工程，如此耗费时日，全国地图何日能绘完？康熙谕令：加派人丁，组成测绘队，每队都由传教士中的科学家们率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测绘工作。

就这样，到测绘工作全部完成，已经是一七一七年一月一日。整整进行了九年！

最后，白晋等绘成全国地图一张，分省地图各一张，于一七一八年进呈康熙。中国的皇帝（也是此前所有的中国人）第一次能在有实测依据的地图上，把自己的万里江山一览无余，其心境如何可想而知。康熙大喜，当即挥毫，奋笔直书，命名地图为《皇舆全览图》。

即使在欧洲，这桩地质科学工作也令人瞩目。尽管有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助动，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工作仍尚未开始。倒是他最担心的中国率先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地理科学工程。当其时，科学家们证明地球是椭圆柱体也还是一个刚刚提出的假说！因此，来自中国的这份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实在是世界地图史上的大事。

一些科技史家认为，此事不过是帝王的意志而已，与开运河、修长城一样，谈不上“走在世界前列”云云。然而，科学的发展，其最初往往正是帝王的意志促成的。西方院士制形成初期，西方的帝王把院士们招来，常常是要这些科学的泰斗们运用他们的科学知识，测算出赌博胜负的概率，挑选出跑得最快的那匹马；或是计算出皇家花园的喷水池设多少喷水孔，才能使喷出的水花又大又美观——总之，用科学来为娱乐服务。两相映照，康熙皇帝利用西方传教士——科学家们的科学知识，为中国测绘出第一张地图，所强多矣。

当然，一八四〇年后的西方向中国的传教，是炮舰打进来的。中国再次通过西方传教士接触西方科学，其滋味已经大大不同。但是，科学传教派并没有销声匿迹，或者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间谍。就在一八四二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魏源在林则徐组织人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成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其材料都是传教士提供的。此后，传教士们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从宫廷走向社会，建造翻译馆，开办科学书院、科学出版社，出版大量西方科学书籍，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可以说，不是别人，而是西方的传教士，客观上发出了中国科学救国的先声。



## 5. 从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

有一个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科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仅仅靠别人的赐予终将受制于人。科学的辉煌从来都与教育的辉煌相生相伴。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培养不出现代化的学子；没有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学子，从事不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没有现代科学研究，便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团体的基础；没有现代科学团体的存在，就产生不了科学家。而这一切的基础，不是别的，是教育。在这方面，又是西方传教士，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堪称伟大的贡献。他们可称之为“教育传教派”。

传教士们利用教育传教的故事太多，有一个不能不讲。他是美国人，英文全名为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但他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丁韪良。他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sup>⑩</sup>

一八四七年，二十二岁的丁韪良神父启程赴华，随身带着希腊文、修辞学、光学知识，当然，也有上帝教义。

他沿着中国海岸进入宁波，为上帝的理想而献身的想法鼓舞着他。他讲述道：

当我从船上一步步踏上海岸，一大批抗议人群拥上来。他们叫道：“番鬼！番鬼！砍头！砍头！”我开玩笑道：“这就是人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文明么？我难道就是为这些人

而离乡背井的么？”但是，我很快纠正了自己的看法：正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所以需要我来。<sup>④</sup>

他的传教士先驱们已在宁波城设立了一个传教团，办了一所学校，还经营着一家印刷厂。丁韪良很快开始学讲宁波土话和汉语。

十六年后，一八六三年，他从朋友那儿借了一笔钱，在北京内城购置了住房，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和一所学校。利用教育进行传教的想法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实践。但是，他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每年，他只能招来六七个信徒。而这些所谓的上帝信徒，一旦最初的好奇得到满足，除了最贫穷的人以外，再也不进教堂。

教育也不乐观。科举制度还是中国读书人唯一的道路。富裕人家的子弟不愿意跟着“鬼子”学科学而放弃仕途。丁韪良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家徒四壁的穷人子弟。他们从丁韪良那儿免费获得衣服和食物，聊以度日。

但丁韪良决不认输。挫折给他的梦幻装上了飞升的翅膀。

在丁韪良的心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欲在中国传教，必自教育始。只有更多的科学教育，才能导致中国人对上帝的皈依。又一个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但是，要想成功，只能自上而下。丁韪良研究了前辈传教士的传统战略：利用学术在官场中立定脚跟。更研究了利玛窦的韬略，总结道：“不犯上，貌宜恭，学术为纲，纲擎目张。”

为了打入中国高层，他翻译了《万国律例》<sup>⑤</sup>——关于

国际外交的法律书籍——于一八六三年上呈中国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各国总理事务衙门。

最初，大清朝官员对此书的价值表示怀疑。有人斥之曰：“该书文辞艰涩，一派胡言乱语，倘不当面解释，则茫茫然无从理喻其义。”

但满清贵族中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恭亲王却看出了丁韪良的目的，他向皇帝奏道：“臣窃以为，丁韪良之目的有二：其一，夸示外国亦有法度，其二，步利玛窦之后尘，仰能在天朝建功立名。”

真是天从人愿。假如不是时来运转，丁韪良和他的书只会湮没无闻。

一八六四年，总理衙门官员依据《万国律例》中的原则，迫使普鲁士释放了在中国领海捕获的一艘丹麦船。

恭亲王大喜：“虽然此书所记之外国律例与中国体制大不相同，仍不乏有用之处。”

梁启超先生在介绍此书时说（译文）：

该书第一卷讲国际公法的来源。第二卷论各国的自然权利。第三卷论和平时期的外交往来。第四卷论战时状态下的外交。凡是加入了国际公约组织的国家，都要受这种国际公法的管辖，从中得出判断，维护本国的利益。中国不加入国际公约组织，这叫做“法外之国”……<sup>④</sup>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不懂国际公法，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那亏可就吃大了。但这个道理在大清国，竟然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后仍未懂得。直到二十年后又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才痛定思痛。

那是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谈判桌上，中国不得不与西方再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条约中的有些“被逼”款项，也迫使中国走向平等的开放。例如：大清国终于同意西方国家可以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在这份不平等条约的第五十款中，有这样三项规定（译文）：

（一）今后，英国的外交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二）但鉴于中国之缺乏翻译人才，英国方面的文书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三）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没有错误之处，亦照此例。

这样一来，倘若中国没有翻译人才，进而推之，没有懂得国际公法的近代外交人才，那可就等着吃大亏吧！

毫无办法。大清国被逼无奈，决定在北京开设同文馆，以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并聘任丁韪良为总教习。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方学校却要聘请西方人主政，这当然不是件让人痛快的事情。当时朝论大哗，纷纷指责主持外交事务的恭亲王丧权辱国。于是恭亲王上折，谈了其中的原委（译文）：

在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冬天的时候，臣等与英国等签订了条约，当时便认识到：与西方各国办理交涉（外

交)事件,一定要首先知悉他们的性情。于是请旨,飭下广东、上海的督抚,分别派出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携带各国书籍到北京来。我们这里,派八旗子弟,进行外交上的学习和训练。

然而,所请委派的教习,广东方面说“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说,倒是有这样的人,但“艺不甚精”。

这样过了好长时间,翻译学校也罢,外交人才学校也罢,根本举办不成。臣等细思细想,要熟悉各国情形,一定要先熟悉他们的言语文字,这才不会受人欺蒙。

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授中国的语言文义,而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恐怕我们没办法知悉对方底蕴。

这样一来,(开放最早的)广东、江苏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这才不得不从外国人中访查、聘任。

对一个国家来说,这当然很耻辱,至少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便到了一八六五年,中国方面决定聘任丁韪良为同文馆英文教习。这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最初意在培训翻译人才。丁韪良接受了任命。退掉了传教士应领的那份工资,成为中国政府雇员。这一聘任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向总署推荐的。起初,丁韪良很看不起这个位置。

“诚然,这个位置并不大,”蒲安臣对丁韪良说,“但是你可以使它变大啊!”

一语点醒梦中人。

于是中国方面择了一个吉日，派了一位大臣，亲到使馆，当着蒲安臣的面，把总理衙门的任命书交给丁韪良。他还记得那是张用红纸写的聘书，上面不提薪水，只说每年致送“车马纸笔费”一千两银子。这使他感到很奇怪。后来又有一张新约，上面写的是“柴火之资”（“炭敬”二字的直译）五千两。他终于明白了：中国人耻于说“钱”，使用各种名目来代替这个字，叫做“炭敬”。他于是想起，其实英国人也有同样的“毛病”，也是常常把薪水叫做“盐资”的。

当年的一两银子比一个英镑还要值钱，对一个英文教习来说，这笔“盐资”实在不算少。但干了几个月丁韪良便要求辞职。总理衙门不许辞，派了两位大臣前来挽留。

大臣问：“你为什么辞职？是嫌‘炭敬’少吗？”

丁韪良说：“不是。”

大臣问：“是什么人侮慢了你吗？”

丁韪良说：“决不是的，学生们以及别人对我都很和蔼有礼。”

大臣不解：“那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丁韪良说：“老实说吧，十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这宗事业在我看来太没出息了。我的光阴等于白费了。”

大臣说：“假如是这个缘故，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即是这十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十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

听了这番话，丁韪良再次感到自己的“短视”。自己的

学生能够成为中国皇帝的老师——他想：“这倒是一句大可注意的预言。”他于是留任了。他写道：

这个前景令人欣慰。我人生第一个大目标，乃是建立永久的有力影响。我决意撤回辞呈，虽然我曾走得太远，自告奋勇去找一个替身。我决定在同文馆呆下来，因为中国人保证开发一个远比我在北京路边的教堂更能发挥影响力的领域。<sup>④</sup>

从此，这个叫丁韪良的上帝信徒，割断了他与传教工作的最后正式联系：一八六七年，他接受了同文馆授予他的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他将传教工作交卸给了接替者。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同文馆馆长，并正式向纽约传教团理事会呈递了辞职书。他决意亲手点燃中国近代教育之灯。

他决定扩展他的教学内容。但这很难办。必须总署批准才成。

一天，他弄来一套电报机，想通过这“新奇的发明”诱导中方同意他的“科学——教育”。

他请总理衙门派人到他家里看他作电报实验。恭亲王派了四个人来，都是曾经帮助丁韪良校阅过《万国公法》的。

丁韪良兴致勃勃地作实验，发现对方只是望着，既不了解，也没兴趣。

其中的一个翰林说：“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诱导失败。丁韪良于是送给这四个人一些玩意儿。这

下子，他们高兴了。那是带磁性的鱼和鹅。他们看着，玩着，抚掌欢笑，叹为神奇，摆弄了很久。丁甦良心中叹道：“唉，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还是孩提啊！”

丁甦良害怕这四个人向总署的汇报，使中国高级官吏对他的“科学——教育”生出偏见，因此请求把电报机带到总署衙门，请他们亲自考察。

于是中国的外交部腾出一间房子装设电报机，届时全来参观这新奇的“玩意儿”。丁甦良描述道：

一切进行都很顺利，各老大臣都和秘书们是一样的孩子气，不过秘书们是弄着带磁性的鱼、鹅玩，他们却是弄着电报机玩，时而发送信号，时而把钢丝缠住身体，时而闭塞电路，时而接通电路，看见电花飞跃，报槌上下，则狂笑不已。作完实验，照例就在衙门早餐，是时在座的客人除我以外，只有赫德一人，他是刚从欧洲回华的，正坐在我的身旁。我告诉他表演成功了，他却漠然答道：“这种小事也是有益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户部大臣董恂看来也不是一件小事，他常常来看电报机，仔细研求，居然学会了发报的方法。他又帮我制成一套字母，报针指着两种记号便可拼成一个字，简便得很。

大学士文祥也认为我的电机有用处，来看过多次。

我的电报机在总理衙门整整放了一年，后来看见一时不易有什么结果，方才把它带走了。现在当作破铜烂铁藏在同文馆的陈列室内。

一天，丁甦良登上北京西山，看到一位粗手粗脚的农



民正在山上耕田，二人便攀谈起来。

农民问丁韪良：“为什么你们外国人不灭我们的国呢？”

丁韪良问：“你以为我们灭得了吗？”

农民说：“当然灭得了。”

说着，那农民手指山下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够灭我们的国。”

但中国的多数人民和士大夫并没有这位农民的见识和危机感。丁韪良发现，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让人们作出理智的抉择困难重重。为达到他的教育目标，他需要吸引才华出众的学生，并让他们走上仕途。然而，他的学生们却认为，丁韪良的课程设置与科举无关，不可能带来这一前景。

他们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学英文，他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汉语上。因为，只有掌握了汉语，他们才能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无论他们的外语造诣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险。<sup>④</sup>

他的第一批学生的素质不佳。来的几个人都是因仕途落魄，功名坎坷。他们来学新学——近代西方科学，不过是因为中国政府付给他们的薪俸较高。他们为士林学人所不屑，被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自己也觉得是这么一回事。“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同文馆初设，丁韪良还没有当总教习的时候，来学习所谓“外国语文”的有四十个“老青年”。当然，多数不久便被淘汰，只留下六人继续学习。有一天，他看见其中的一位领着一个孩子在街上，便问：“这是你的令郎吗？”

“是我的小孙。”对方微笑着答道。

丁韪良这才发现，原来同文馆的学生几乎都是已经结了婚的。在他的学生中有两对父子。

又一天，丁韪良问一个没有胡须的学生，“你为什么满面愁容？”

“老师，我的孩子死了。”他答道。

尽管如此，丁韪良并未丧失信心。相反，愈是深入了解，他对中国便愈加同情。他在一八六八年写道：

没有哪国的伟大人民，像他们一样遭到误解。他们被斥之为感觉迟钝，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手段把现代观念传达给他们，或者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我们被丑化为“蛮夷”，因为我们未能对不同于我们的文明作深入全面的了解……，民族意识以庄严的步调一代一代地走了过来，虽然它并非一帆风顺，但当其到达每一个重要关头，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都记下了一个明显的成功；一如北极的黎明，东方的曙光先要消失几个时辰，然后再出现朝霞绛色，此时其亮度加大，随着每一次黑暗间隙的出现和消亡，喷薄欲出的太阳也步步逼近。<sup>④</sup>

他认为，他的目标就是加速黎明破晓，因此他必须把学校，从“萤火虫变成一座发电站”。这样，“千百万有志学生，才会像他们目前钻研古文那样，严肃认真地学习现代自然科学。”

为此，丁韪良花了四十年的工夫。

几经风雨，同文馆决定加设“科学教育”一馆，招收

具有中文根柢的学生，把学校升为大学程度。

为了点燃这盏“科教神灯”，丁韪良在这所本来仅仅是培养翻译的学校，引进了各种西方教育科学：先是物理、数学，随后办起了化学、生理和医学诸科。只有宗教在这所学校严禁传播，成了这个基督教徒终身的遗憾。但他相信，一旦中国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通往基督教的道路定会畅通无阻。

他制订了一个八年教学规划，试图以此学完西方科学的主要学科。前三年学外语、地理和西方历史；第四、五学年学数学，第六学年学机械、微积分和航海术；第七学年研究天文、地质和矿物学；第八学年则了解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

黎明步步来临。在丁韪良的私人信件中，他一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的夸张手法，严肃地说：“可以认为正在兴盛起来。进步每日可见。”

学生中的杰出之辈仍然在缓慢崛起。他们终于在“总理衙门”干上了额外的口译工作。有的人开始翻译西方著作。在七十年代后期，有的学生当了官，有的人被派往海外，在中国的公使馆供职。丁韪良成了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其功劳获得了承认。

一八八〇年初，中国政府派他出访美国、欧洲和日本，考察这些国家不同的教育制度。又五年，一八八五年，他被赐官三品。十年后擢升为二品。

他的心永远盘桓在中国。尽管不断有人警告他：“我们是在修补一口裂了缝的锅。”但他为中国人接受现代教育科学的理想始终不改。

一八九八年，丁韪良担任了中国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京师大学堂校长<sup>④</sup>。众所周知，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我们今天的北京大学，正是由京师大学堂和燕京大学合并而成的。前者是一位传教士贡献一生的结晶，而后者本来就是一所教会大学。

到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一九〇〇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传教士马礼逊开办的第一所中国洋学堂在澳门开学，是为中国新式教育之始。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便是这所洋学堂的学生。

——一八七七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各类现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种，三万册。是为中国民间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

——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四千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学生总数为十一万三千名！

——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绝大多数为初等学校或理工学校，学生总数达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名！<sup>⑤</sup>

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不是别的，正是西方来的教会和传教士为中国形成现代教育科学体制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中国的著名科学家，包括许多院士（学部委员），都曾经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

今天，科教兴国已经是我们的国策。那“科”，是现代科学之“科”，那“教”，是现代教育之“教”。饮水思源，

我们能忘记传教士们的贡献吗？

## 6. 又有一块新铁在炉里

或许，还应该说说传教士中的“改革派”。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或受雇于官府，或见知于大吏，出入侯门，游说公卿，广交士绅，所造成的改良中国旧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历史效应不可低估。

可能，这批传教士从传播上帝的声音转为改良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受了李鸿章的启发。时值一八八〇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一天，传教士李提摩太来见他，说了自己在传教中的苦恼。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他不惮辛劳，走街串户，巡回讲道，散发传单，不久却发现中国人围观他只是为了看洋鬼子。李鸿章大笑，忽然认真地说道：“直接不如间接——在我国，办一切事情，情同此理。”李提摩大受到启发，恍然大悟。从此接近官场，逼进朝廷，戊戌变法期间，险些成了光绪皇帝的改革顾问。

当然，所谓改革，一旦涉及政治体制，毕竟充满凶险。实际上，钟情于中国改革的传教士，其成就大者在经济管理领域，其中，一个叫赫德的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成绩斐然。<sup>⑩</sup>

正是“中国”二字使赫德打定主意要当传教士的。他本来想当律师，但听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讲座，十七岁时的他便要到中国去传教了。两年后，十九岁的赫德便来到了中国，从此，他的一生都在这片龙的国土上度过。

但他连一天宗教也没有传播过。简直是宿命，一八五八年，他一登上中国的海岸，便在宁波担任了英国领事馆的业余翻译，开始与中国官员建立紧密的联系。太顺利了：六年后，一八六五年，他就担任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从此，中国的全部关税收入都要通过他的手。

真不知道，这个叫赫德的传教士采用的是何种方法，创建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最为复杂的组织——国际性的海关税务管理机构。在他死时，他组建的外国职工队伍，竟达如此规模：

——一百五十二名英国人、三十八名德国人，三十二名日本人，三十一名法国人，十五名美国人，十四名俄国人，九名意大利人，七名葡萄牙人，六名挪威人，六名丹麦人，五名荷兰人，五名比利时人，四名瑞典人，三名西班牙人，还有一名朝鲜人。

他的海关税务司的业务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规定范围。及至一八九八年，它为清朝政府提供的资金占其全部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它还经管中国邮政，管理中国内陆通商口岸关税。

赫德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典范。他和丁韪良是朋友，后者这样形容他每天的工作：

一年中无论哪一天，从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都可以发现他坐在办公室。短暂休息，仅是午餐后打个盹儿，而且不是非有不可。从不休假，甚至足不出北京一步。他从未有过郊游，充其量遥望一下远山。他没有体育活动，只在花园散散步。他有时听听音乐，阅读小说，调剂单调乏

味的紧张工作。在他办公时，他还经常下令管弦乐队吹打弹奏，表明他的写字速度与音乐节奏合拍。一当他放下笔，拿起小提琴弓，管弦乐队的演奏便戛然而止。

丁韪良对赫德永怀感激之情。他知道，倘若没有赫德，他的同文馆就很难办下去。办学要花钱，而丁韪良在钱的问题上永远紧张。他记得那是一八六九年九月，他刚从英国休假回来，赫德就告诉他，他已被任命为同文馆的校长。

丁韪良说：“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意思是说校长的责任丁韪良可以担当，但是财政方面须由赫德负责。

赫德答应了。从此，二十五年间，赫德践行约言，从来也不短缺同文馆的办学经费。丁韪良这样说：“在这所学校来说，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保姆而已。”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韪良的就职仪式上，总理衙门各大臣及美国驻华代办都来了，赫德却没有到。他只是派人送了一张贺笺，上面写着：“祝日进光明。”

同文馆学生的第一次外交考察活动也是赫德促成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出使”，被称为“特异之举”。那是在一八六六年，他适逢告假归国，便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向朝廷“申呈”，主张派遣大臣，携带同文馆学生，与其同行出国，“乘机游历欧洲各国，以资日后派委出使大臣之先导。”此议得到朝廷批准。

中选出使的共有同文馆学生三人，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瑞典和俄国，受到有些国家的隆重接待，赫德亦以此而自鸣得意。当然，这次出

使历时一年，花了不少海关税收，却并没有完成总理衙门交付的任务——“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只有赫德的中文教员斌椿，回国以后作了一卷诗，描写外国人物生活，煞是有声有色。然而，对同文馆学生来说，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实践。出使的学生，到中国第二次派遣使臣时，便能被派充翻译人员了。而且，这次出使本身，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潮流中，毕竟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sup>⑨</sup>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赫德的“业余活动”。他为中国贡献终生的本职工作，是掌管中国的海关。

赫德给海关税务司的定义如下：

我们管理的机关，叫做海关税务司，它的职责范围异常宽广，它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从各方面为中国效劳。

不能低估这位为中国服务的“洋官员”的“方法”为中国经济管理模式与西方近代企业制度接轨所做出的贡献。下面这段引文很长，但还是值得一看。它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在哪里肇始的。在当年，他在中国所实行的这一套“企业制度”，不但在中国是革新，就是在英国，也不过刚刚实行十年的时光。<sup>⑩</sup>

赫德在中国海关以外的活动，有许多称得上是“创新”。他引进了西方许多新的事物，如新式教育制度，新式邮政制度，新的海运和港口管理制度，他主张在中国创办



新式工矿交通企业，引进外国新的科学技术……这里只就他在中国海关工作中的“创新”，提出几个重要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是新的会计制度的建立。对海关税收的上交与留用和海关经费的开支，赫德强调必须有充分的、真实的一笔一笔的记录。在一八六五年以前，海关的会计帐目只有一个笼统的、类似中国传统的四校清册式的总帐。一八六五年起，在曾经受过严格会计训练的金登干的主持下，海关会计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将全部收支总帐分为A、B、C、D四个帐户。A号帐户为海关经费的支出帐，B号帐户为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帐，C号帐户为吨税（船钞）收入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帐，D帐户为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帐。A号帐目每月结清一次，B、C帐号每季结清一次。所有海关可以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海关总税务司指定的丽如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税务司不得截留。这个会计制度，当时被誉为新的国库制度。这个严格的会计制度，从一八六五年开始，一直维持到赫德的任期終了，在赫德离开海关以后，还沿用了二十七年之久。

第二是新的统计制度的建立。在赫德主持总税务司工作以前，中国海关还没有编制过系统的贸易报告和统计。到一八六四年为止，只有各关就地编印了一些规格不一的本关贸易统计。从一八六五年起，这项工作集中到上海进行。这一年海关总税务司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印刷局，专门印刷各关的贸易报告和统计。一八七三年进一步成立了贸易造册处，即独立的统计科，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统

计年报，编写贸易报告，以及监督各种海关出版物的印刷出版事宜。在海关的出版物中，这时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集中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的《统计集》以外，还有《特集》、《业务集》、《公署集》、《税务司集》和《杂集》以及不属于上述各集的出版品等六种。其中不仅包括了海关本身的材料、而且广泛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特别是关于中国进出口大宗如鸦片、丝、茶、黄麻、大豆等项的调查，保存了比较有用的材料。而海关的贸易统计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却是现时中国保存下来的时间序列最长的一项经济统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它保存在人民的手中，为人民所利用，就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富。

第三是考核制度的建立。赫德在海关维持个人的绝对统治，用人的权力始终保持在自己的手里。他有一套办法维系他的统治。

首先，有一套录用人员的考核制度。在赫德统治下的海关，一个新人的录用，都要通过考核以至考试。拿外籍人员来说，人们可以直接向总税务司提出申请，他个人也可以提出要求或自荐的意见，但是，录用与否，一般要通过长驻伦敦的税务司金登干的考核以后，才能作出决定。在赫德与金登干的三十多年的通讯中，可以经常看到有关录用海关各类人员的考核问题。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中，赫德说道：“我现在准备把所有的申请者都加以推荐，一共有六七十人。这一次用自由竞争的办法。打算在十二月举行一次竞选考试，我要的是那些知识最广博、最有才干的人，不要那些没有头脑只会依样画葫芦的人。因

此,对那些考卷中有见解的和一般印象好的都给以高分。通过选拔考试,首先要取消那些不合格的。”经过考试录取的申请者,试卷和本人照片都要送给赫德亲自再作审查。应该说,这是通过正当的审查以凭去取的办法。

其次,有一套日常工作的考核办法。赫德对下属的工作考核,首先由他自己亲手做起,而不是轻易假手他人。在最初的几年间,赫德多次历访海关各口。经常亲自检查各关的工作。在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三年代理海关总税务司期间,他几乎成年在外,可以说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他到哪一个口岸,就在哪一个口岸的海关办公,同时筹划或检查那个海关的工作。一八六三年正式担任总税务司以后,最初两年,总税务司名义上驻扎在上海,但他仍继续巡视各口岸。一八六五年八月,总税务司移驻北京,这种经常的巡视依然没有中断。不仅检查海关内班,而且巡视港口,检查海关巡逻和引水船只,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一八七〇年以后,检查人员有所增加。除了总税务司本人以外,他的总文案也要“随时到各关检查帐册,核对帐目,清查现金库存。”至于总税务司本人,则不但一如既往,“在业务需要和环境许可之时,也要访问各口”,而且还具体规定:在总税务司访问期间,要求各关全体人员到场,亲自当面陈述工作,解释问题,提出建议和申诉。在总税务司不能按期检查各口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委托一名税务司代替工作。后者的任务是受理任何申诉人的陈述和解释,并且进行调查;指示各关业务进行的方式;检查各关的建筑和财产;帮助各关税务司试验本关工作人员的中文能力和一般工作水平以及比较各关工作的高下优劣和

繁简，然后向总税务司提出检查报告。它给总税务司判断各关的工作，提供了比较客观的根据。

一八七四年，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会计、稽核制度以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各关的财务检查。规定正稽核每年至少巡视各关一次，专门检查各项帐目，这在上面已经提到。当第一次进行检查之时，赫德在这一年九月给金登干的信中说道：“我已命莱特访问各关，检查帐目，至少每年一次，他可以不经事先通知，采取突然行动，并且检查：（1）帐目是否及时登录。（2）库存现金是否和帐面结余相符。（3）同时，他让人们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这样通过他的访问，人们就要加倍小心。”这个总税务司的代表，权力极大，他每到一处，就立刻接过保险柜的钥匙和全部帐册，进行核对，以便准确地向总税务司报告本关的财务状况。如果发现重大情节，他还有权接过本关的全部工作，以待总税务司的指示。有贪污舞弊行为的人员，会受到立即开除的处分。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赫德任总税务司的近五十年中，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除了上述三项以外，还有三项由海关承担的工作，也被认为是一种创新。一是世界博览会的参加，一是商标注册的筹划，一是税务学校的设立。关于世界博览会的参加，始自一八六七年的巴黎博览会。从一八六七年到一九〇五年，中国参加全球各地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前后至少有二十八次，均由海关总税务司经手。其中在一八七三年的维也纳博览会上，中国的展出被认为是“惊人的成功”。它所展出的“中国和国际交往的各种产品的样品”，“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 and 欣赏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一九〇五年以

后，这项工作才转为农工商部专办，不再由海关经手。

关于商标注册，最初出自外国的要求。在一九〇二年的中英通商行船续约和一九〇三年中美、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中，都有有关保护外国贸易牌号（商标）的条款。中英条约第七款还特别规定：“由南北洋大臣在各管辖境内设立牌号注册局所一处，派归海关管理其事。”在海关总税务司的主持下，由总文案安格联拟定了商标挂号章程十三条，在一九〇四年三月移文外务部转新设之商部审核，商部改为十四条，旋增为二十八条。在商部设立挂号总局，并令津海、江海两关设立分局，对华商、外商贸易牌号，一体注册保护。但是，由于各国对其中某些条款的异议，这个章程并没有得到实施。以后这项工作，由海关移至商部。赫德在海关，这时也到了他力不从心的时刻。他在一九〇四年四月六日给外务部侍郎伍廷芳的信中说道：“我非常高兴商部接过这项注册工作。我手中的东西太满了，连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都找不到。”赫德脱手以后，这项工作迁延了近三十年，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中国才有了第一个商标注册的法律——农商部公布的商标法和条例。

关于税务学校的设立，这是赫德早已有意于此的一项计划。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同文馆筹办之时，赫德就有过把同文馆作为造就海关后备人材的设想。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一直拖了四十多年，当一九〇六年中国成立税务局直接管辖海关总税务司以后，赫德的设想才由税务学堂的成立而实现。这个学校的成立，已经是在赫德离开北京准备回国的一九〇八年四月末，然而在赫德最后离

任之前，由他手中已经指定了一名税务学堂的总办——海关税务司邓罗。在赫德离去之后，这所专科学校一直存在到一九三五年。二十七年中，一共培养了六百名海关税务的专业人员。

所有这些我们今天阅读起来都可能觉得很累的工作，赫德干了整整五十年。每当有一次新的改革，每当为中国的企业建立一项新的制度，他便说，“又有一块新铁在炉里。”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除非我每天把一天的工作搞完，每礼拜把一个礼拜的工作搞完，否则，接下来的时间，实在是苦不堪言的。面临着这么多的铁在炉子里面要打，这么多的织机要同时启动，在这一个门口有一批公众等待结果，在另一个门口有一个衙门在等待报告和建议，我的惟一保险的办法是严格遵循着我的工作方法。<sup>②</sup>

当时，海关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赫德自己则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不论在什么地方，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他都站在一个高台面前，不停地工作。他在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信中写道：

严格讲起来，海关的工作是那样地繁重，以至我简直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为了在开辟新的出路方面，我们的朋友的腰杆子能直起来，同时，也为了不让那些贪婪之鸟接近我们，我随时准备承担把事业推向前进的任何工

作。

他在一八九七年七月四日的信中又写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对应该做的工作来说，是太不够了。即使一天有七十二小时，我也不见得有多少空闲的时间！

怎么办呢？那就是别人一天工作六小时，他就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乃至十二个小时。他的下属有固定的探亲休假，而他自己却有十七年和他的妻子儿女没有见面。即便如此，他也心甘情愿。他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信中写道：

我每天难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完成我一天的工作，但是，我不敢进舱里休息，怕的是别人来掌舵，会把船搞翻或者偏离航向，我真是又累又困，但是我得忍受。

他讲究工作纪律，特别是在遵守财务制度方面，要求十分严格。但是，他也勇于承担责任。贪污失职的人会立刻受到撤职或者更严重的处分，但是，实际的亏空，也往往由他自己的口袋中拿出钱来弥补。一八七三年四月由于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他一次拿出二万三千两银子，弥补这位失职者的亏空。

时光催人老。五十年繁重的工作终于榨干了赫德的精力，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一八九八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承认：

我已对工作感到抑闷难耐：假若我有四个副总税务司，由他们分管关税、邮政、厘金，杂务，并且像我一样工作，我就相当满意了，我就有时间休息了。照现在这样干下去，我将被窒息闷死。

但他还是不懈地干了下去。他希望中国能“进入一种改革进程，然后……逐步地开发资源，开办工业，获得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进步”。他希望他领导的海关税务司能为中国的前进创造模式。

对自己支持的清政府，他“恨其不争”。他于一八九九年写道：

至今尚在昏睡，全然没有认识到真正变革的必要性。打击与高压，就可使他们屈服，放弃一切权利，然而却没有哪一个建议——哪一种警告——可以使他们觉悟，奋起强国脊骨，砥砺利爪。

然而，他又无限热爱这个古老国家的科举制度，当他的朋友丁韪良正致力于改革掉科举制的时候，他却一心向往科举，希望能给自己的儿子弄个举人当当。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原因就是因为他外国人。

赫德之子名承先，特喜欢中国的制艺八股之文，投中国名师，悉心学习。在北京，有人见过这个洋人后代的制艺八股文稿，试帖楷法端谨，文章饱满畅达，根本看不出是洋人的墨卷。

赫德觉得时候到了，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请准许自



己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但中国方面坚持不许。时人讽刺说：吾国外交，国权所系，轻以予人，绝不少惜；独此科举，虚荣所在，竭力争之，真可谓不识轻重矣！

但无论如何，赫德的儿子难入中国翰苑。但因为他是赫德之子，中国政府破例赏给他儿子三品衔候选道。官可以给，但要参加科举考试，不行。

实际上，赫德在本书的故事发生八年后才离开中国。中国人可以独立管理自己的海关了，而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容许他再干下去。他的侄女写道：

我记得他走的那天上午的情形，天气异常晴朗，总税务司乐队奏起了《美好的时光》。一曲终了，他大声说：“我准备好了！”然后步伐坚定地列队致敬的士兵面前走过。乐队高奏《家园，美丽的家园》。所有的人在说“一路顺风”时，无不热泪盈眶。最后，他离开人群，朝火车走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鞠躬……

用这么多的篇幅，描述来华传教士中的科学传教派、教育传教派和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改革派，我们能看出他们中的什么共同的特征吗？

他们都是不务正业的传教士。他们背离了传播上帝福音的传统方针，被本国的教会屡屡申斥，却在中国受到青睐。他们不再是上帝的仆人，而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中国兴办教育、科学和经济事业的高级雇员。他们为中国贡献才智，推进中国进步，得到中国赐予的高官厚禄。他们离中国越来越近，离上帝越来越远。他们由于对中国的贡

献，获得了在中国的特权。对他们中的许多人，别说是下层的百姓，就是高官大吏，也无不敬畏三分。

那么——关于本书的主题——义和团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呢？义和团的旗帜是“反洋教”，如果仅仅是这些不务正业的、有特权保护的“洋大人”，义和团会反吗？一言以蔽之：义和团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洋教”？

## 【注 释】

- ① 见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版，P. 123。
- ② 同上。
- ③ 在许多情况下，因传教纠纷而引发的外交事件，亦称“教案”。
- ④ 以下关于“红夷大炮”或“红衣大炮”故事，除特殊注明外，均据朱维铮《“红夷大炮”》，见《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版，P. 218—220。
- ⑤ 据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P. 20。但前引朱维铮《“红夷大炮”》中说，当时，红夷大炮未在宁远库房，而是守军呼救，前来增援的毛文龙将军带来了该炮。
- ⑥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
- ⑦ 魏特《汤若望传》说在煤山，即今景山公园内。此据李兰琴之《汤若望传》。
- ⑧ 以下关于造炮的描述，据李兰琴《汤若望传》P. 23—26。
- ⑨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冀中抗日的胜利，地雷起了很大作用，但农民造的土地雷，不仅炸不了日本鬼子，相反，常常把自己炸上天；后来是吕正操将军请来一批科学技术专家，教会了农民造现代地雷，这才取得了冀中抗日的伟大胜利。详见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书《中国院士》，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P. 387—388。
- ⑩ 到本书故事的描述时间，一九〇〇年，这些大炮当然又已落后。但在此前两

百多年，这些大炮是最先进的武器。

- ⑪ 本节征引史料及叙事史事，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据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页码分别是：P. 46—47，48—50，58—60，146—180。兹不逐一注明。
- ⑫ 《东华录》顺治二年。
- ⑬ 王之春（清）《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版卷一，P. 2。
- ⑭ 同上。
- ⑮ 《汤若望奏疏》P. 72。
- ⑯ 伊世同《坐更台考》，载《文物》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 ⑰ 伊世同《几件新发现的涉及汤若望的天文仪器》。为一九九二年纪念汤若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 ⑱ 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绘制的星图名《见界总星图》。据潘鼎先生考证，此一星图，“是西学东渐后的第一幅新颖实测星图”，其新的形式“突破了我国两千年的传统”，其星象组织“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它是“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汤若望为此星图所作的贡献是：传授制图原理；担任撰文工作。见潘鼎《梵蒂冈藏徐光启〈见界总星图〉考证》，载《文物》杂志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 ⑲ 例如《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法历书》等，虽在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一定缺陷，但俱为首次引进中国，对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之发展，居功甚伟。
- ⑳ 杨光先《不得已》。
- ㉑ 同上。
- ㉒（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版，P. 23—24。
- ㉓ 杨光先《辟邪论》。
- ㉔ 《熙朝定案》手抄本P.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 ㉕（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P. 23。
- ㉖ 同上，P. 25。
- ㉗ 《康熙定案》P. 6—7。
- ㉘ 李兰琴《汤若望传》P. 180。
- ㉙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P. 11—12。

- ⑩ 这一结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办公室主任樊洪业先生考证的。
- ⑪ 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见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P. 35—36。
- ⑫ 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很少关于这段传教历史的记载；本章所描述的事件，几乎全部依靠来自西方的“直接史料”。
- ⑬ 关于皇帝的病与治疗过程之史料，均采自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见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P. 44—46，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
- ⑭ 这些原则，在（美）伊安·G·巴伯的著作《科学与宗教》中有详尽的论述，见该书P. 56—63，“宗教对科学兴起的贡献”。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版。
- ⑮ 爱因斯坦持同样观点，他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普朗克也说：“宗教和自然科学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 ⑯ 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见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P. 41。
- ⑰ 同上。
- ⑱ 同上。
- ⑲ 以下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史事叙述，均据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见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P. 39—40。
- ⑳ 本节关于丁韪良事迹，除特别注明外，均据丁韪良自己的回忆录《同文馆记》，傅任敢译，见于华东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P. 158—186。
- ㉑ （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版，P. 129。
- ㉒ 一译《万国公法》，（美）惠顿著。
- ㉓ 梁启超《书目提要》，转引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插页。
- ㉔ （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P. 136。
- ㉕ 同上。
- ㉖ 同上。
- ㉗ 北大的一些研究者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首先，那时的京师大学堂不叫校

长，而是管学大臣；其次，即使管学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丁韪良也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因此，所谓丁韪良担任校长之说，不过是他的自吹自擂。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国的这第一所大学堂，其课程几乎全部是西学，而中国的管学大臣，如孙家鼐等，没有任何一人有西学根底，因此，大学的学科建设仍有赖于担任总教习职务的丁韪良。从这方面说，他说自己是“实际的”校长，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

- ④⑧ 以上数字据邵雍《传教与教案》，见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改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版，P. 485—486。
- ④⑨ 本节关于赫德事迹，除特别注明外，均据（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
- ⑤⑩ 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P. 381）当然，我们的史书上，都把两年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由任期届满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所带出的中国出访欧美外交使团，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这是从其重要意义上讲的。从时间上讲，似仍应以赫德带出的“出使团”为第一个。
- ⑤⑪ 下面的略有改动的引文据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P. 379—381。原文未注出处，但根据文前提示性文字，关于赫德的事迹，似乎出自中国国土上最后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度的文章《作为创新者的赫德和海关》。
- ⑤⑫ 赫德的这些信件均转引自《“创新者”的真面目》一文，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P. 382。

## 第二章 教案

### 1. 一个疑点

上帝发怒了。

传教士中的科学派、教育派、改革派在中国大行其道，对此，上帝再也不能容忍。

上帝在世俗世界的总部是罗马。因此，这些派别中的传教士一次又一次地向罗马教廷申诉理由，说在中国传教必须如此，必须先科学、先教育、先实行世俗的改革，而后才能传教。但上帝觉得，这样的理由已经不再能够容忍。上帝的教义传播当然希望科学的辅助，但基督教毕竟不是科学院；传播上帝的福音也不反对教育学的介入，但教堂毕竟不是学堂；上帝更希望自己的信徒能够打入中国的上层，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教，而不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当官。我们从史料中得知，这些不务正业的传教士派别，其中的许多人被教皇开除了教籍。上帝把在中国传教的殷切目光，注

射在他纯洁的精神赤子身上。这就是基要派和社会福音派。

这两个纯情的派别也有矛盾。基要派是不折不扣的基督教义传播者，认定上帝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人的罪恶灵魂，他们是“救灵派”。而社会福音派却认为人的灵魂附着在人的身体上，要救人之灵，必先救其身，因此，他们被称为“救身派”。于是，在中国，这两个传教派别以完全不同的世相展现在城乡各地。救灵派穿着黑色的教袍深入穷乡僻壤，“带人归主”，然后便钻进教堂，很少出来。而救身派却给穷困的百姓带来物质福音：施医、济贫、救孤儿，等到施救的对象被感化了，这才把他们拉进上帝的怀抱。在基要派看来，社会福音派太热衷于救身，必定导致舍本求末。但在社会福音派看来，基要派太性急了些，为中国的百姓办慈善事业是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样有效手段。从本质上说，两派没有根本的冲突，倒是殊途同归，同为上帝的旨意在民间操劳。

真奇怪，正是这两个最忠心耿耿地为上帝服务，同时也为最穷困的百姓服务的传教派，在中国遭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往深处看，在所谓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正是这两个教派。基要派太“基要”，严守宗教传统，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们也不诉诸本国政府，虽被杀害也不接受清政府的赔偿。而社会福音派，怀着帮助中国贫苦民众的善意，却更经常地遭到流言的诽谤。<sup>①</sup>

今天，许多史家已经证明：义和团所宣传的传教士荼毒中国人的所谓“罪行”，正是社会福音派的“善举”。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疑问是历史的眼睛，体验是文学的灵魂。在这个疑点的指引下，让我们倒转光阴，追随传教士的足迹，到山东省——义和团起源的地方，亲身体验一下：传教，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 2. 在圣人的家乡建教堂

对上世纪末的山东农民来说，所有的传教士几乎都是一个模样：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生着一双绿盈盈的碧眼，下颌堆着蓬乱的紫髯，身上披着神父的黑袍，手上捧着镶嵌金边的《圣经》。

他们的传教地点在靠近曲阜和邹县一带的衮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固的堡垒地区。曲阜，是圣人孔夫子的家乡，邹县，有亚圣孟夫子的圣堂。他们起初并不明白：在此地传教，不啻是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宣战！在他们来到此地之前，许多传教士曾经明确表示不敢在这里传教。传教士开始走进山东的头二十年，九十八位传教士，十五人死亡，四十三人离去。就这样，他们也未能进入衮州地区。

但这些传教士似乎不怕死。献身基督是他们的理想，为上帝而死，虽死犹荣。于是，尽管头上笼罩着死亡的黑翼，他们还是来了，并始终与上帝保持着最密切的通信：

现在，我们穿过一片平原，那里人口稠密。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庄，村里有土坯房，屋顶用麦秸或芦苇盖成。这些村庄大都有久经风雨的土围墙，有的甚至还有



门楼和笨重的大门。村里有树，但旷野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者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这些沉闷的现象令我很想家。到处都是肮脏的、行将坍塌的土坯房，一些过年时糊的褪了色的红对联依然残缺不全地留在破败的门洞上。<sup>②</sup>

很想家的这些传教士，就在这样的村庄里安顿了下来。他们决定把这里发展为上帝的第一个基地。首要工作是征地。没有地，盖不起教堂，一切都无从谈起。

他们被告之，要征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哦，当然，就是绅士，只有他们有决定权。于是，一个传教士就这样来到了一座城堡前：

我可以说说他的城堡。城堡四周环绕着深深的护沟，坚固的墙壁，两个方形塔楼足有四层楼那么高，雄踞于他的青砖宅舍之上。他的花园，亭子，以及珍奇花草也许是这一带最美丽的。在乡邻中，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一声咳嗽，立即有半打人来侍候。在他的门口每天有上百个邻居恭领施舍。他尽管拥有六百英亩土地，但今年却也够穷的了，所以他的贴身仆人的孩子显得面黄肌瘦。

这类地主的富裕证明，该地区有足够的剩余财富来供养其拥有的珍奇花草等奢侈品。但那些用堡垒护卫的宅院其实并不安全。

这个地方，在中国以无法无天的匪徒乐园而闻名。这里的居民像是生活在封建的城邦中，高墙和深沟护卫着家宅与财物。没有人外出时不带上火枪或长矛，几乎所有值

钱的交易都在武装保卫下进行。<sup>③</sup>

他被这样的乡绅告之：他们不愿意把家乡的土地供给外国人盖教堂，他们的土地有限，要种庄稼。他说：他不购买庄稼地，他只要一小块坟地就行了。乡绅勃然变色，说：“你想挖我们中国人的祖坟吗！”

官司只好打到县里，由县官裁决。从此，传教士们知道了一个以后他们会经常遇到的词儿：教案。他们慢慢还会知道：在中国发生的成千上万起教案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因为征地引起的。县官也不愿意把地——任何种类的土地卖给传教士，但县官没办法。传教士的手里有中国政府签订的《保护传教条约》。传教士们要买地传教，是“合法”的。

还算顺利。地，买到手了，教堂，开始兴建。但很可能，那未来将要矗立起来的教堂，正面对着一座中国菩萨庙，或者，比菩萨的级别还要高：玉皇大帝庙。当时，传教士们把这作为对自己信仰的考验，还没有想到，这将是引发更大更多的教案的又一根源。

教堂终于建起来。传教士们把自己闭锁在忏悔室里，开始铸造教堂的灵魂——上帝的形象。

那是一座基督受难像。魁伟的、裸体的基督，用象牙雕刻出，陈列在乌木架上；那像，不仅是血淋淋的，而且是血肉模糊的，既丑恶，又富丽，肘端现出白骨，膝盖现出皮膜，伤口有血肉，戴一顶白银荆棘冠，用黄金铸成的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额上有一串串用红宝石琢出的血珠，眼睛里有用金刚钻石装成的眼泪。金刚钻和红宝石都好像是

湿润的，至于身体上，更是有意弄成遍体鳞伤，以符合基督死时的形象。胸部被柳条网紧紧束住。

传教士们肯定对自己亲手完成的这基督像非常满意。圣像充满了死亡的黑光。他们想象着，当中国的基督信徒在他面前祈祷时，头脑会受到震撼，灵魂会得到洗礼。

然后，他们打开教堂的大门，满心喜悦地等待着中国人蜂拥而来。

他们错了。没有一个人来。中国人不信上帝。从此，像所有的来华传教士一样，他们开始了自从进入中国以来最艰难的一项工作：发展中国教徒。

### 3. 中国人为什么要信教

在西方，教徒的产生大多因为信仰，因为对原罪的恐惧，因为向往着遥远的上帝所在的天堂。在中国呢？教徒的产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毕竟，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夕，中国已经有了百万基督徒。

因为苦难。苦难是在中国产生教徒的温床。在中国，教徒的产生不是传教士传播上帝教义的结果，而是由于民众自身的原因——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苦难首先来自贫穷。一位传教士这样向上帝汇报“贫穷”二字在中国的含义：

农户大都居住在阳光不足、潮湿狭隘的茅草屋里，窗户很少。屋内的装饰非常简单。更为贫穷者，一间茅屋则

具多种用途。炉灶锅碗均挤在茅屋一隅，煮饭时黑烟蒙蒙，恰如浓雾弥漫，甚至人的面孔也难以辨别。乡村使用的燃料，大体为树叶、高粱秆、麦秸、豆茎之类……。其食物亦非常简单，每年只有极少机会吃肉，以粗茶淡饭为主。只有新麦打下之后，才吃几顿面条和菜蔬。园内所产菜蔬，并不全部食用，还担去城镇换些粮食以维持生活。城里平常使用的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在乡间视为贵重品。若吃香油时，则用小棍穿过制钱孔从罐中取油，滴到菜里调味。平常吃饭时，水里煮些大蒜、辣椒、大葱，就是一顿。除了喜庆丧葬或新年外，很少见到荤腥。老人也不例外。平时饮料即是将槐叶放入滚水中，加些颜色。到农忙时，只是饮些生水而已，顾不上卫生。衣服都是自家手织土布，多为黑、蓝颜色。<sup>④</sup>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贫穷，中国人也不会信奉基督教的。信教的人多数都“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夜无归所。”

佃户不仅受到地主，还常常受到狗脚子的压迫。当看到村里有了教堂，而县官竟也亲来拜访那蓝眼睛的传教士时，被欺负得走头无路的农民，咬一咬牙，走进了上帝给他安排的“家”。这时，受到特权保护的传教士们会找地主“谈话”，并接受这些佃户入教。以后，地主手下人的压迫就停了。传教士们得意地发现，他们做这种事影响很大。不久，附近村庄的人都会有人来入教。

本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份调查也印证说：“当时庄稼人要是受了气，就信教。信了教，依靠教会的势力就不受气了。有的人信了教，在年岁好的时候连地租也少交了。说是淹

苗，收成不好。”

一些村里的手工业者也来入教，原因也是贫穷——开放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贫穷。对此，传教士们也有充满同情的记录：

在直隶的高阳——最近变成中国北部织布中心——机纱织布业得到发展，但却无法弥补山东植棉区的农民在收入上的损失。

可以从写给各轮船公司负责人的报告中获悉棉纺织品的对华贸易有了发展，而且其前景在广州到天津和牛庄的沿海商业网上十分广阔。但是没有一个人了解，这项贸易的发展对生活在辽阔的直隶平原上的成千上万中国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到不久前为止，他们一直在依靠纺织十五英寸宽的布来勉强维持贫苦的生活。织一匹布需要辛苦劳作两天，在市场上所卖的钱只够购买整个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和足量的棉花以继续不断地织布。有时，织布会持续一整天和大半夜，但是现在由于外国棉纺织品“前景广阔”，当地产品已没有了市场。批发商的代理人已不像过去那样再露面了，织布工作已无利可图，没有一个生产行业能够代替它。在一些村子里，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织布机，许多工作都是在地窖里完成的。地窖里成年累月响着织梭声。但是现在织布机闲置无用了，织布的地窖正在变成废墟。

没有织布机的人能够勉强依靠纺线维持生计。这是许多中国人免于饥饿的辅助措施。但是近来孟买、日本甚至

上海纺织厂非常活跃，中国的产棉区到处充斥着数量多质量好而且价格又比土纱便宜的机纱，纺纱的轮子已不再旋转，青年、老年、病弱者和无助者微薄的收入来源永远断绝了。许许多多深受这一“进步”之苦的人对造成他不幸的原因并不是很了解的……，然而也有不少人清楚，在外国商品冲击中国古老的社会秩序之前，曾有一些能够吃饱穿暖的年份，然而现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不足，并且前景十分糟糕。由于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所以不能指责中国人对新事物所持有的抵触情绪。<sup>⑤</sup>

不过，这一情况，对传教士们发展教徒的工作却有极大的促进。

然而，只有饥荒才能吸引更多的教徒。在山东的农村呆过几年以后，传教士们都会发现，他们发展的教徒中，有三分之二是饥荒发生后入教的。正是在中国人面临大饥荒的大苦难中，传教士们看到了上帝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当饥荒来临，父母出卖子女甚至把他们杀掉当饭吃。饥民与狗争吃死者尸体以维持生命。所有能出卖的东西包括房顶上的木料都被卖掉以购买食物。树皮供不应求，谁也不知道饥荒何时才会结束。这里滴雨不落，路上尘土飞扬，预示着饥荒还会持续下去。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史以来展示我们的宗教精神的最佳时机。我们可以布告四方：基督教让我们爱邻人如爱自己，四海之内皆兄弟。<sup>⑥</sup>

传教士们说着好话，同时确也干着好事。

就在我们的故事发生前的一八七八年——一八七九年间，山东、直隶等华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约有一千万人饿死。一八七八年，在华传教士与外国商人、外交官组成“中国赈灾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从事救济活动。这个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赈灾会，在欧洲各国募集捐款二十万两白银，在华北五省发放赈款和食品。<sup>⑦</sup>

善有善报。善事之后，传教士们果然发展了大量中国教徒。但同时，传教士们也明白了：他们吸纳教徒的成就，并不是通过上帝的教义“救灵”的结果。中国人人教，是为了“救身”。在这方面，传教士们建立的教会医院也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引发了众多的教案，并成为后来的义和团反洋教的重大原因之一。

一个传教士很可能也是个医生，这并不新鲜。许多来华传教士都是医生。救人于苦难之中是基督教的“慈悲”，行医是传教士最希望掌握的本领。“上帝看到我们救助无钱无助的病人，会发出最欣慰的笑。”

让我们在这里插入一点资料：

自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美国一位有很高医术的传教士伯驾（他为林则徐看过病）在广州设立“中华医药传教会”，到一八八六年成立基督教在中国的全国性团体“中华博医会”，向中国介绍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传教士们为中国西医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堪称伟大的贡献。到本世纪初叶，教会所办的西医医院已达二百六十所！这些教会医院挽救了数不胜数的中国人的生命。当我们今天谈到“西医科学”的时候，那时是一个起点。<sup>⑧</sup>

但问题正是在这里产生的：他们的“医”是“西医”。今天，关于西医已经无需多说。但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民间，尤其在山东，西医被视为恐怖的恶魔。

关键在于西医的诊治原理、医疗手段和医疗工具。中医将人视为一个整体，他表里如一，虚实相通，一旦有病，则辩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而西医却将人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分的零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耸人听闻。当西医为了辨明病症而开刀检视，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将切除部分藏之玻璃器皿之中，加以不同颜色的药水使之不腐烂时，更令迷信的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疑窦丛生。可以说，正是传教士医生解救中国普通百姓病痛的这最大的善举，遭到了最大的误解，受到了最大的攻击。他们由此被视为神秘的恶魔，采取恐怖手段杀害中国人的凶手：挖眼、剖心、熬药、炮制红丸、蒸食小儿，种种不经之说，越传越邪，越编越恶。

并非没有思想解放的大臣和致力于普及科学的学者为传教士的善行和西医辩诬。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经实地考察天主教义和西医实践，告诉朝廷，所谓“迷拐孩童，挖眼剖心”之说，纯属造谣之词（译文）：

国人说教徒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制药……说之流传也久，国人笃信者众。臣出洋以后，留心访查，大抵天主教徒所崇信者耶稣，耶稣之说是以慈悲为宗旨的。这个西方洋人的上帝，对待虐人之事，害人之物，都是一定



禁止的，更不用说会有什么残酷至挖眼剖心的事情啦！

在南方，就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夕，一个叫吴獬的，写了一首《大家思想歌》，也是竭力为西医辩诬：

有人说他的电报线，是取眼球合药造，又说洋人水药灵，用的人心人眼睛。人死如同灯灭样，哪里眼球还有亮。西洋犯法人刚了，医生剖肚来查考。查他肚肺与心肝，哪有平民准你剝。又有洋人怪病死，嘱咐医生剖肚子。查明病症告人知，中国古时常有之。不知谁把话说错，说是死人都要剖……

然而，朝廷是把这样的科学普及工作当做小事情的。明智的大臣的声音湮灭在紫禁城内堆积如山的奏折房间里。而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南方，历来被北方朝廷视为应该“小心留意”的地方。

因此，对在中国北方腹地山东省传教的神父们来说，他们救穷救灾、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发展中国教徒的速度仍然较慢。

突然有一天，传教士找到了能够吸纳更多中国教徒的新途径。他们发现了土匪：

渐渐地，我发现，山东人勇敢好武，非常有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名声愈来愈大。他们身强力壮。过去，中国海军中最优秀的兵员均来自他们当中。很明显，山东人的尚武精神既能利于政权亦可加害于政权。从古至今，军

队都是去山东募征那些强壮、忠诚、勇敢的士兵来保卫国家。但是，同样的性格也使另外一些人沦为盗匪。山东人以“好义”著称，而这种“见义勇为”也极易使他们变成那种“土匪”。

这种情况在我传教的地区尤其如此。社会不稳定促使自卫性习武风尚日益发展，天灾人祸也帮助一起打乱社会秩序，这一切都导致盗匪活动。这里是古代中国的罗宾汉地区，小说《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流芳百世。

他们甚至比中国的地方官员还要细心地考察了盗匪的活动规律：

现在，正是盗匪劫路嚣张的季节到了。高粱长得正旺，有七八英尺高，十分浓密，正适合半路伏击抢劫。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独自走在偏僻的路上也不安全。但这些盗匪不仅犯案无常，抢劫无事，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并且定期回去。其绝大多数人并不专门从事盗窃活动。这些人都是农民，当地里有农活或者过年过节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都要回村。盗匪活动有节性，和农忙农闲密切相关。

是的，冬季，按照中国人历法，从阴历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是盗匪的主要活动时间，因为这时华北农田无活可干。阴历十一月和二月是冬季盗匪活动的高潮期，因为盗匪在这期间要回家过年。春天是农忙季节，盗匪明显减少。直到六月份，通常是七月中旬前后盗匪才开始活动。<sup>②</sup>

正是这种社会现状和传教条约中保证对基督教徒加以保护的条款，使传教士们“心生一计”：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愿意当盗匪呢。没有一个人乐意过这种日子。但他们又怕官府的逮捕。如果由上帝来保护他们，教导他们，他们定会改邪归正，成为上帝的顺从的羔羊，而我们的教友兄弟姐妹队伍也将更加壮大。<sup>⑩</sup>

当这个“计谋”传到正处在险境中的盗匪家人中时，他的话就像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不久，数以千计的成员开始为了自己和家庭而要求皈依到上帝的怀抱。其他传教士也开始仿效他的方法。本世纪六十年代，当历史学家进行义和团运动的“口述历史调查”时，有位当时还活着的义和团员吼道：“那时，多数教民都是土匪！”

许多史家极为重视这样的史料。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教徒的“成份”坏，因此在后来发生的义和团对教徒的大屠杀中便“该杀”，而义和团的“成份”好，因此便杀人无罪，杀得好吗？实际上，如果不是官逼民反，穷逼民反，谁会离开温暖的家园去当土匪呢？义和团的队伍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同样也是土匪。当年，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不也是土匪吗？他们被朝廷招安了，似乎没什么人说他们不对，但他们——就像上面说的那些盗匪一样——被上帝招安了，怎么就成了该杀该剐的罪人？

无论如何，传教士们的“这一招”很灵：

每当朝廷要求限期解决土匪案件的时候，县官就派衙

役出去不加区别地逮人。这时，只要我们答应保民免受官府的此类骚扰时，全村的人都会入教。

有一个镇叫张桥，是有名的顽匪窝。常有居于该地的拖儿带女的寡妇哀悼她们死去的丈夫。他们是抢劫富家大户时被当场抓获、经受了非人的折磨后被处死的。张桥土匪的劫掠曾使县官们忍无可忍。他们准备把镇子夷为平地，并流放所有的居民。这时除一家之外，全镇居民都决定加入我教，而我们也成功地求得了县官对他们的宽恕。这样一来，张桥避免了毁灭的命运。在基督教的熏陶下，这些从前的土匪成了遵纪守法的农民和模范的天主教徒。这是上帝恩典的又一次胜利。<sup>①</sup>

就这样经过千谋万虑、千辛万苦，上帝“牧羊”在山东，“羊群”越来越大。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信奉上帝的中国教徒数量，已经有五万多人！

#### 4. 该出手时就出手？

现在，通过他的代理人，上帝开始授徒了。饿了给你饭吃，穷了给你钱花，病了给你治，如果你是土匪，还帮你逃脱法律的惩罚。所有这一切，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走进教堂，诚心祈祷，弃恶从善，皈依天主，灵魂深处闹革命。

于是，教案，从中国教徒走进教堂的那一刻起，便开始酝酿了。

必须澄清一种误解。教案，在最一般的情况下，首先不是中国人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纠纷，而是中国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仇恨。

从理性角度说，在教堂中修身祷灵的基督教制度应该受到谴责。教堂发展过多，就成了行动的累赘，绊脚的机构，在劳动的中心成为懒惰的中心。因为它是寄生的。它的肥壮，正是地方上的贫瘠。它慈悲，可以减少强暴风气。但正如许多好的事物所表现出的一样，所有一切在它纯洁时期使之成为有益的因素，都会成为有害的因素。

教堂里教徒的一切都是非教徒看不惯的。他们不是一家人，却住在一起，岂有此理。他们闭门幽居，岂有此理。他们不劳动，成天只是唧唧嚷嚷，岂有此理。他们细声说话。他们低着眼睛。他们放弃交往。他们不要感官的享受，快乐，虚荣，傲气和利益。他们穿粗布衣服。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财富。进了那扇大门以后，有钱人都自动地变成了穷人。他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大家。过去的一切身份啦、等级啦，全没有了，现在都一律平等。每个人在教堂里都一模一样，大家都接受同样的剃发式，穿同样的教服，吃同样的食品，睡在同样的麦秸上。假使决定了要赤脚走路，大家便一同赤着脚走。连姓也没有了。他们都只用乳名。大家都在平等面前低下了头。解脱了骨肉的家庭，在教会组织里组成精神的家庭。除了整个人类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亲人。他们帮助穷人，他们照顾病人。他们选举自己服从的人。他们彼此以朋友相称呼。对世俗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生活：既引人误入歧途，却又劝人存心为善，既使人愚昧，又使人虔诚，既使人备受苦难，又

使人离苦得乐。当我们谈论它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说又对又不对。它是一对矛盾。目的，是幸福；方式，是牺牲。

对非教徒来说，教徒不干活，是极端的自私。对教徒来说，他们与世无争，是极端的克己。他们在教堂里以受苦为达到欢乐的途径，签发由死神兑现的期票，在尘世的黑暗里预支天上的光明。在教堂里，地狱般的生活是当做换取天堂的代价而被接受的，穿上黑袍就是一种取得永生的自杀。

在比比皆是的义和团反洋教史料里，不是教徒的中国农民，一旦提到这些皈依了“洋教”的中国教徒，多半这样说：“他们不干活，两手一插，先是唧唧嚷嚷，然后，在教堂里就看着房顶，出门就望着天儿！”这是他们最烦的“洋相”。

不错，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上帝的仆人们要的就是思想，是静观。山东的农民似乎苦惯了，永远不承认思想也是劳动。交叉着的胳膊能工作，合拢了的手掌也能有所作为，望天也是一种业绩。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望天，伽俐略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因为望天，牛顿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地上有引力。他们都首先是基督教的教徒，其次才是科学家。

今天的我们已经明白这样的道理：物质的繁荣，我们需要；意识的崇高，我们坚持。即使是那些成不了科学家的教徒，他们每天双掌合什，也未尝不是为了你我未来的利益。他们在为人类的所有罪孽祈祷。总得有人来替那些不肯祈祷的人们不停地祈祷。因此，在西方，越是崇高的场合，越是重要的活动，便越是有祈祷的郑重。在这个多

少人低着头、鼓不起劲、以享乐为荣、以追求短促无聊的物质享受为急务的行尸走肉的环境当中，凡是离群遁世的人总是可敬佩的。教堂是退让的地方。意义不明的自我牺牲总还是牺牲。脱离世俗生活自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但它被当做天职来奉行，又自有它的伟大之处。

这就是教堂生涯。那不是人生，因为没有自足；也不是坟墓，因为还不圆满；那是一种奇特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有如置身高山之巅，朝这一面可以望见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朝另一面又可以望见我们将要到达的世界；那是两个世界接壤的狭窄地带，那地方，烟霭茫茫，依稀隐现在两个世界的中间，交错着生命的残辉的死亡的冥色；那是坟墓中的那种半明不昧的光。

瞧啊，一个真正的教徒是这样祈祷的：他生活在真诚的信仰中，他充满谦卑，他有严肃的心灵，他敢于生活在神秘世界的边缘，守在已经杜绝了的人世与尚未开放的天国之间，望着那看不见的光辉，仅仅凭心中一点所谓的自知之明而引为无上幸福，一心向往万丈深渊和未知世界，两眼注视着毫无动静的黑暗，双膝跪着，胸中激动、惊愕、战栗，有时一阵长风，来自太空，把他们吹得飘飘欲起。今天，当我们想到此情此景，总不免耸然动容，又惊又敬，如见神明，悲悯和钦羡的心情油然并起。

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始终在犹豫，是否应该向今天的中国读者，传达一点当年传教士们布道的声音。我本人是无神论者。我对西方传教士的布道也毫无兴趣。但我总觉得，应该听听那声音，它们是有害的吗？或者，竟然是有益的？直到我发现了这位传教士，“看”到了他的声音——

我决定了。

我把他的“声音”转录在下面。没兴趣的读者自可以不听不看。

这位传教士叫乔治·B·法辛，在本书主体故事发生的时候，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与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被义和团杀害了。他的这篇很长的布道词，是他被害一年前的“最后的说教”。其主题是：耶稣基督关于生命、生活和工作的意义<sup>⑫</sup>：

对于密切注视这位奇特的基督的每一个人来说，基督生活中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他一贯头脑冷静、心地坦然。在他的力量产生巨大的效果面前，他总是保持平静庄严，他既不惊奇也不激动。在与人间的关系上他也是如此。激情澎湃、兴奋异常的人们可能会欢呼、赞美，发出纷嚣的赞叹、感情热烈的效忠声言；或者是狂暴的愤怒声、仇恨交杂着恶毒的语言，这一切都无力打破他的安宁。

在基督生命的接近最后的几日里，充满了骚乱和苦难，但他并没有改变性格。在他被出卖的地方，在审判厅里的喧嚣声中，在被钉在十字架时极度的痛苦中，很明显，他都保持镇定自若。这一特性从未离开过他。

但是，不能把这一特性解释为清高冷漠，纯属若无其事。他的感情不是禁欲主义者或者苦行僧般的冷漠无情。谁都不如他更有人情味，更有同情心。他对人类的一切事务兴趣都很浓厚，对自己的事业热烈真诚，对一切需要宽宏慷慨，对一切痛苦体贴同情。一直伴着他的宁静的是他高涨的热情。这宁静似乎是围绕在他周围的一种气氛，这宁



静是他的灵魂所创，它是庄严、自觉的力量，最深奥的知识。

生活对他来说不是支离破碎的。他把生活看做是一个整体。他看到了生活的目的，理解了生活的条件，并毫无保留地献身去完备生活。

这种认识促使他根据这个目标从容不迫地去实现它。这样便不存在什么险事，不存在什么能阻挠他的事业。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分量、一切事物都发挥适量的影响。

在耶稣周围的那些人也许时时会踌躇和推断。耶稣是精明的，不需经过常人的判断推理步骤。

看看圣经原文中的事例吧！

在耶稣与门徒们的对话中显示出同样的心平气和的特点。当耶稣听说一个朋友得了致命的重病，他的门徒们毫不怀疑耶稣会不顾所有危险，匆匆出发去给那病人医治。不用解释，门徒们愿意伴耶稣前去。如果那样作了便近似于人类的急躁鲁莽。耶稣却没有这样作，他在住的地方呆了两日。然后对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太吧。”什么？门徒们认为危险已胜过了友情。可是既然旅程危险已确定无疑，他们在推迟上路期间对这些危险已有了充分地认识。既然很可能已不需基督出面，既然困难已千倍增长，——为什么基督还要去呢？

他一定是忘记了危险。于是门徒们怀着极大的恐惧对耶稣说：“主啊，最近犹太人要用石头砍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回答：“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基督平息他门徒的警言不是以他的力量平息任何反对他的人，战胜一切可能联合一致反对他的力量这类保证，而是用了暗示。暗示一切与他作对、企图伤害一个至死一直行进在责任之路上，直至上帝注定敲响结束他辛劳和斗争的死亡之钟的人是徒劳的。

基督向他的门徒们讲述了一个多么卓越的人生观哪！人一旦生活中有了目标，便有了一盏明灯。它能照亮一个真正过有益的生活的人前进的道路，并有足够长的生命期保证那个目标的圆满实现。

只有当一个固执己见者，看不见生活的目标，熄灭了指路的明灯时，他才会感到害怕。只有当那时，灵魂才会恐慌不定，这个人才会垮下去。

就是在对生活意义的认识上，才显示出了基督生活和我们生活的清晰对比。耶稣进入这个世界，是为了作一项工作，而且作成了。工作起来他无忧无虑。他对于胜利与失败分辨不明。一切都是成功。上帝需要这样，计划了的事注定要完成，也许不是在现在，也许在那时，在上帝的时代，以上帝的方式。因为“永恒的事物无需匆忙”。

这是基督看待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也应为我们所用作吗？耶稣提出“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的问题不正是含有这层道理吗？的确这正是他的教导所含的意义。让我们就我们的生活来探讨基督教导的意义吧。

基督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竖起了一个目标。

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不同方式承认这一点。然而把理解并试图实现这一目标，说成是一种思想还不如说是一种生

来的本能的感情，说成是一种注定的愿望还不如说是一种虔诚的赞诺。我们需要明白，虽然作为一个个不同的人，我们是有区别的，独立的。但我们一个个人之间又互为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特别工作要作。这工作只能由我们作，它与上帝造物计划有确定的联系。在上帝的头脑中，人类是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计划出来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失去上帝之父的孤儿，被遗弃在人世之海中自谋出路，随波逐流。也许被吞没，也许幸运些，虽在受尽颠簸之后仍被抛到某个海岸边。

不。我们有慈父上帝。他创造了我们，他的手指导我们，他的目标我们决意实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些特别的印记，负有些特殊的使命，出自上帝的心。在我们伟大的造物主的计划中，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

上帝创造了我们就是今日的我们，我们目前还没有破坏他的工作，还是他创造来完成某种最终目的的。他用无穷的智慧创造了我们。在某种方面，只有我们适合为他的目标服务。

他原可以用他造物的语言创造更优雅、更圣洁的造物。这些造物的忠效、崇拜和虔诚都会比我们作得更完美无瑕。但他选了，并选定了我们。他一开口我们便有了生命。我们可能占据些地方按照他的意愿作某些事。

别的人可能被赋予多方面的天资，充配了各种渊博的才华。他们似乎是被创造出来去作更重要、更辉煌的事业的。但是对我们任何人来说，谁都不比别人更尊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我们生命的造物主那儿接受的一切。有千差万别，但没有千篇一律。是否有两个人，他们的工

作丝毫不差地一致，这真值得怀疑。因此，我们自愿、积极地实行上帝的最高指示才是当务之急。所有的职位都一样荣耀，我们的身份、地位也一样荣耀。我们是上帝的特别产物，上帝赋予特别产物以特别使命。

啊！如果想使生活纯真，就让我们记住这个真理。这将给生活以完美、庄重和美满。它将激发热情。那时每个人都将变得圣洁，每一个人就成了一座上帝降临的祭坛、上帝留居的庙宇。

经文教导我们：我们生命期的长短和上帝目标相一致。当救世主答曰：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他除了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完整的，都有十二小时的一整天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吗？

一个婴儿即将问世前又放弃了机会，回到它那刚走出的无形世界中去。这时，婴儿的生命便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不能向上帝那样为这个婴儿数着钟点。没有什么事会毫无结果地失败落空。我们吸进的每一口气都会对整个宇宙发挥影响。

我们是否知道，被我们认为是失败的事的结果会有多大。我们能否讲出我们已完成的而尚未见分晓的事情有怎样的价值？我们能否讲出这些事情并没有泯灭而还沿着并且已走向世间。那么我们应当惊异吗？我们能不再那样经常为生活的表面无价值而悲叹吗？“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工作业已完成，日暮口的暗影显示了最后的时刻，工作的人被唤走休息。事业完成前，人是不灭的。

我们以基督为例来证实这种说法。我们面对所有的福

音叙述，当主用卓智的问题提醒我们无论在哪儿生活和劳动的人都会有十二小时的生命期，我们的经文便会把这种说法带给我们。我们的主向他们提出问题。虽然他们只能点头称是，无可置疑的是上帝之手主宰他的子民的命运，上帝的力量使一切敌人屈服就范。上帝是人类事务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人的生命的赋予者，生命之保持者，成全者。上帝给每一个人十二小时，一个完美、充足的生命期。

我们的经文进一步教育我们说：我们可以得到在生活中实现上帝目标的合适的工作机会。“倘若一个人在白日里走，他不会跌倒，因为他看见了世上的光。”可能是在早上，救世主站在他们昨晚休息的房子门口，指着正在冉冉升起的巨大太阳这样说道。他称太阳为监护人、守护者，太阳使他们避开了危险，使回穴巢的野兽看见路上的坑洼和陷阱。基督像是说：“上帝于是这样向我显露了他的心愿，他用外部光照亮了我的前进道路，使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危险，借助这显明上帝意志的白昼般的光明，我会毫不动摇，安然前行！”

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愿，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撒下光明。上帝把他的目标藏在我们中间，他让我们配合去完成他为我们选择的任务。但为了向我们解释职责，打通我们前进的道路，创造机会，我们必须依靠上帝。没有他的帮助，便不能理解他对我们召唤的奥秘。

你是怎样作的呢，我的朋友？你是在为这个目标的不定和深奥而叹息、悲伤吗？

你是不是伤心地说，我肯定不能明白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怎样的才能。我不知道上帝让我作什么。只有一件事

能肯定，那就是我没有具备十项才能，连五项也没有，甚至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我连一项都不具备。

你的怨叹是这样的吗？也许你误解了此时的责任，只在自己心里寻求光明和含义，而不是把眼睛转向上天。不要只眼盯着自己，应转向上帝。

你也许紧闭了眼像个盲人一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黑暗，却悲叹太阳还未升起。睁开双眼小心看，阳光撒满了你脚下的路。如果我们随时准备观察、注意倾听、甘愿屈从，上帝就会启发我们认清责任。谁想实现上帝的意愿，谁就首先应去了解上帝。如果不断地去了解上帝，便会明白上帝的意愿。“在上帝的光明中，我们会看到光明。”上帝已经并正在尽自己的职责。我们目前所有一切经历一直是真诚的并且已产生了神圣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作了拥有这种生来就有的权利的准备。

每一简单的事都有一定作用使我们觉醒去认识知识，一旦我们加快行动，它会使我们更快地去行动。

那么，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干起来吧！用我们的悔悟、快乐，用我们的诞生、成就，用上帝赐我们的他人需要至上的观点回答上帝的召唤。无论上帝用什么方法召唤，我们都要回答。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白日的光，我们必须在这光还照亮的时刻前进。

我们的经文悲伤的提醒我们：有这样一种可能使上帝的意愿遭破坏、计划全落空。“如果人在夜里行走，必然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我们的救世主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画呢？这幅图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自私想法使他忧心忡忡，他变得缩手缩脚，他惧怕路上的危险，想着会向他

投石的犹太人。于是，他从上帝为他指出的路上溜掉了，而没有把握送上门的机会。也许对他来说这似乎不叫逃避责任。他最终会完成这任务的，但不是现在。现在太危险了，他要迟一段时间直到情况好转，不过如此。哎呀！这可没那么简单。因为这天空为他阳光普照的时间只不过是短短一会儿，现在天空又阴沉了。

对他来讲，再也不是白日了，而是黑夜，一个阴沉沉的黑夜。因为他没有光明在心中，而靠这光明，他才能发现道路，辨别、了解自己的义务。“十二小时”过去了，但不是光明的白日，而是在茫茫黑夜。这似乎就是救世主描绘出的，忽视上帝指定任务的人可能遭遇的图画。这个人本可以拯救生命但却失去了机会。因为他没有把握关键时刻，没有屈从于上帝指派的神圣任务。他的整个生活失去了协调，失去了意义。

但是，感谢上帝的仁慈。上帝以仁慈让我们悔悟。把我们曾是这般徘徊不定的人领出了黑夜。以上帝的方式再造了我们，并仍然用他的光明照亮我们的道路。这使我们相信，上帝会继续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愿上帝能这般赐给他的帮助，这般激发我们的力量，以便我们能追随基督。基督能坚定不移、满怀希望地前进。因为他永远生活在光芒普照之下，屈从上帝的明确指引。那么，像基督一样，愿我们从容、镇定地过完我们的十二小时，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

向中国人传达如此这般“基督教精神”的传教士死了，被义和团杀害了。因为什么？因为不理解，或者，不赞成？

在所谓的“教案”中，这种“不理解”或“不赞成”，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竟然凝聚成一股股的杀气？

真的，假如在那个时代，有像今天一样对各种宗教的宽容，假如在那个时代，有像今天一样对不同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理解，那么，所谓教案就成了非常可笑的事情。理解与宽容的要旨都是不为己甚。有些东西当然必须毁灭，但有些东西却只要拿到阳光下看个清楚。阳光充足的地方便一点不再需要点起火炬。检索一个又一个教案的由头，无非是：

——村里如果只有一口井，没人教的村民便不准教徒从中汲水。于是口角，于是大打出手。

——教堂要做礼拜，村庄也有节庆，如果赶在一天，便成了双方的对台戏。于是口角，于是大打出手。

——传教士要购地建堂，假如要购之地属于教徒和非教徒两家所有，教徒要卖，非教徒不卖，于是口角，于是大打出手。

——谣言：例如，传教堂内剖眼取心，拐卖儿童，村民要进堂搜查，不准，则口角，则大打出手。

翻开教案史看看，只要你不先人为主地把一切事件都归结为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先别进行价值判断，只看事实——只有事实不容易被击退的，它不动摇——那么，所谓教案的爆发点，大抵是这样的小事情，起码，只要经过解释，就能弄明白、就能解决的事情。

但就是解决不了。几乎每一次这样的小事情，都发展为波及全村、全镇，甚至省城的大案。这至少使我们觉得：许多事件的是非曲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是非，那么多



的正义和非正义，它们肯定有更为复杂的幕后的因由。在历史上，历史事件的爆发点往往都是小事，它们不过是有能力操纵事件的人们放出的烟幕。

今天，已经有历史学家敢于这样看待教案：

只要不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更不把扭曲的观念当作裁量的尺度，那么，应该说，晚清入华的欧美传教士，多半都是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又有一定的献身精神的宗教人士，居心叵测的殖民主义者只占极少数。传教士数量最大的是坚持传教即“救灵”的基要派，其次是把“救身”看作前提的社会福音派。这两派传教士都对帝国政治（也就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侵略中国”）抱着不过问或不参与的态度。

但传教士们所得到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凡坚持为传教而传教的大抵没有好报，得其反者即适应中国中世纪晚期腐朽的政治逻辑者，反而相对地能在晚清“行道”。从扬州教案到义和团运动，多数的严守宗教传统的传教士，以及怀着帮助中国贫苦民众的善意救助百姓的传教士，首当其冲，遭受的打击最重。几乎越是不诉诸政治便越受政治打击，越想解厄消灾便越自讨苦吃。

个中缘由很复杂：士绅恼怒他们侵权，官吏嫉视他们亲民，医巫忌恨他们攘利，愚氓怀疑他们用心，以及语言障碍、风俗不明等造成的传教士与平民的沟通困难等……因而劣绅策动于后，流氓打砸于前，官吏偏袒于上，愚民喧嚷于下，鄙视世俗特权的传教士反而遭难，好弄治外法权的洋大人却最少受损。

至于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反洋教便是对宗教的批判，那么，具有“人民的鸦片”资格的，无疑应包括仍在互争的所谓儒、佛、道三教，以及在民间混杂不清的多神信仰。一如近代教案史所证明，很多反基督教的事件，正是由于当地绅民憎恶教民拒绝参加迎神祭祖一类的传统迷信活动，犹如吸毒者宁用土膏而拒绝洋烟，能说这是对宗教的批判么？<sup>⑩</sup>

然而，从教案中的反洋教到史无前例的义和团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注 释】

- ① 见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P. 99。
- ② (美) 满乐道《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医学、政治和社会》，转引自周锡珊(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P. 1—2。
- ③ 天野元之助《山东农业经济论》，《北华捷报》卷五十八，均转引自《起源》P. 115。
- ④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大公报》：《鲁西农户生活一斑》，转引自《起源》P. 30—31。
- ⑤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转引自《起源》P. 76—77。
- ⑥ “长老会”微缩胶卷第22盘，转引自《起源》P. 85。
- ⑦ 邵雍《传教与教案》，见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改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版，P. 487。
- ⑧ 邵雍《传教与教案》P. 486。

- ⑨ 苏北通讯，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见《起源》P. 26。
- ⑩ 《起源》P. 95。
- ⑪ 《起源》P. 99。
- ⑫ 原文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P. 147—156。转录中略有删节。
- ⑬ 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P. 99、P. 105。

## 第三章 风起巨野

### 1. 死于非命

那天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在西方的年历上是万圣节。深夜，德国传教士薛田资、韩理和能方济在山东省巨野县张家庄的传教士住地相聚。这里是薛田资的布道地，离济宁约有二十五公里。

韩理和能方济是来拜访薛田资的。他们都在为发展中国教徒而奋斗，韩理对自己工作进展缓慢深感沮丧。今天是万圣节，薛田资请他来，是要他休息一下，松弛一下自己紧张的神经。

在西方，万圣节是个可以胡闹的日子。人人可以装神弄鬼，互相刺激一下。那天晚上，三位传教士竭力打起精神，唱着他们孩提时代的歌曲，薛田资拉起了手风琴，一边唱，一边为他的两位客人伴奏。但他们似乎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民众，如果整夜都这样子胡闹，不合身份。于

是渐渐变得严肃起来，还是唱着，但已经是在练习第二天要为中国的教民作的安魂弥撒曲。

太累了。该入寝了。薛田资将他的卧室让给两位客人，自己抱了床被子到仆人的房间去睡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非常偶然的移居，救了他的老命。

大约午夜前一小时，忽然枪声大作，院子里布满火把，二三十个手持刀枪的人径直冲到薛田资的住处破门而入。能方济和韩理似乎连呼喊都没来得及，就被乱刀砍死。

杀人者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目标明确。这种看法是后来的史学家分析出来的。因为他们杀了能方济和韩理后，又意识到当地的那个传教士不见了踪影，于是便冲向圣器收藏室，并搜遍整个教堂，寻找薛田资。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搜查薛田资暂时居住的仆人房间，村内教民便前来保卫自己的传教士了。

杀人者随即消失在黑暗中。

这就是巨野事件<sup>①</sup>。在上个世纪末，它引发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事件。

三天后。德国皇帝威廉听到这次凶杀事件，立即将德国东亚海军舰队派往中国，占领了地处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西方列强争夺租借地由此开始。

随后几个月内，俄国攫取满洲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口，英国要求租借山东半岛北岸的威海卫，并提出协议，租借香港对面的新界九十九年，不得将长江流域让给他国，以保证使其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也讹诈到一个相应协议，使福建成为它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法国划中国西南地区为其势力范围，租占了广东省的广州湾。“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的进程开始了。<sup>②</sup>

莫名其妙的是，巨野事件的起因被弄得模糊不清。长久以来，德国人一直寻找借口攫取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他们全神贯注于夺取港口。并从中国榨取他们所希望的更多特权。而中国许多史学家认定：巨野教案是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第一个源点。

那么，究竟是谁、为什么杀了那两个传教士？真的是义和团吗？

## 2. 寻找义和团<sup>③</sup>

没有义和团的踪迹，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一些史学家的推断是：既然这些杀人者是有目的地来杀害一个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就是反洋教，那么，它们就是有必然联系。虚拟的逻辑。无中生有。

事实上，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地方官立即紧急行动起来，逮捕了九个流浪汉和地痞，并将其中两个处死。但没人相信他们就是那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薛田资就根本不信。根据后来调查的关于这个事件的口述史料判断，巨野的村民也不相信。这种草率处置的后果是：人们从未进行认真的调查以追究这次杀害传教士的原因和具体证据。因此，所有对事件原因的分析，所依据的都是假设。

中国政府向西方人宣称：一群盗匪是凶杀的元凶。但盗匪盗匪，是要盗东西的土匪。而杀人后盗匪所得到的东西，除了薛田资卧室里的一点衣物，再没别的。没有更多

的抢劫证据，但却使用了暴力。于是史书肯定：这次凶杀是对德国传教士蓄谋已久的攻击。

不过，巨野事件的攻击目标更可能是薛田资本人，而不是别的传教士。薛田资在本地传教，而当晚那些人径直冲到他的卧室。薛田资自己也回忆说，那些进攻者找不到他时甚至喊出他的名字。这大概倒是可信的。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要杀薛田资，是公仇，还是私愤？这样的分析更是史学家的特权。但分析的结果，问题似乎弄得更加复杂。

一个假设根据薛田资本人的性格作出：他有让人生厌的个性，因此，和他交往的人心生杀机就不足为怪了。例如，薛田资有好斗精神，他的自传第一行就写道：“一八九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在施泰尔收到布道十字架，它立刻成为我为上帝而战的武器与旗帜。”这样的人，还不该杀吗？

另一个假设说他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并不加掩饰。证据是：那年年末当他到达上海时，他使用了如下字眼来描述所见：

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在我们面前。眼睛细长的中国人像蜂群一样围着码头——趾高气扬的商人们穿着沙沙作响的绫罗绸缎，可怜的苦力身上的褴褛破衣遮不住他们肮脏的身体。我们进入这天朝之国的大门时发现没有信心，他们用狡诈、骄傲和藐视来回答我们探寻的目光。

实际上，许多西方人登陆中国的第一个印象都是如此。如果说这就是种族歧视，而且有一点观感性的“种族歧

视”就该杀，那么，还有不该杀的外国人吗？

第三个假设有点令人毛骨耸然。薛田资这样的传教士发现中国官员懒惰、因循。中国食物常常“难以下咽”。有一次，他在旅途中忘记带上叉子和勺子，于是“使用两根短棍”吃东西。由此，这位传教士认为难以适应中国的生活，传教士的经历是“一个悲伤和痛苦的锁链……精神的监牢”。这使他产生一种“被弃异乡的感觉”。于是，他产生了“受苦，殉难，为信仰而死”的愿望。于是，一位史学家说：他这种“以死为荣的信念我们确应认真看待”。鉴于薛田资没有明确表示立刻就死，史学家便引用了果然被杀死的能方济神父给家人写的信：“我不止一次向上帝祈祷，要求殉难的荣耀，但很可能它将不会恩赐予我。上帝认为我的血不够红，它仍然搀杂着现世的尘土。”史学家这是在暗示什么呢？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传教士自己愿意死，那么既然真的死了，那么，死就死了吧！

这些假设肯定于解决历史的迷踪丝毫无补。还是要从事实出发。六十年代，我们的史学家深入到巨野。那是个以当义和团为荣的年代。史学家记录下一些口述材料。后来的史学家于是说“绝对可以肯定，薛田资冒犯过很多人。”他除了“一般的干涉讼案、无事生非、欺压乡民以及勒索盘剥贫民外，还强奸了十多个当地妇女。”这确是一个该杀的理由。但就连愿意以最大的程度相信这些“口述材料”的史学家也说：“引用这些口述材料，一定要警惕口述者造假！”

只有一点，口述历史调查与薛田资的个人叙述相符，这就是遵照传教宗旨，薛田资将一个村庄里为数众多的前白



莲教徒（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在他的教堂注册，但拒绝该村的头领入教，因为据说此人曾偷窃并杀死一头牛。薛田资的拒绝引起村民反感。同时，新人教的都是这个村最富有的家庭。他们入教后便把好东西贡献给上帝，从此拒绝给村里的节日提供例行的物品，这使乡民的反感更为加剧。薛田资相信，那个首领后来加入了大刀会，并领导了对教士的攻击。

这才有了点门道。大刀会！相信许多史学家正是看到这个词儿才眼前一亮的。因为他们曾经给出过这样的考证：义和团的前身正是大刀会！

但“前身”不等于“本身”。猴子并不就是人。人的许多特征是猴子所不具备的，它还需要艰难的长期进化。大刀会确是反洋教的。这和义和团一样。但除此以外，二者没有任何相同点。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并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大刀会没有这样的口号，也没有这样的旗帜。

——义和团有众所周知的“神魔附体”和“刀枪不入”的迷信仪式。大刀会没有。

——由于中央政府支持（估计有的史家不同意这一点），义和团才有可能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因此，义和团运动是“上下合体”的运动。大刀会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好运气。

关键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症结。人区别于猴子，因为他能站着走路，能说话，能制造各种工具。没有这些特征，即使猴子和人长得一模一样，也不能说它变成了人。这是常识。

巨野教案并没引发出一个义和团运动，甚至没有引导出一个义和团员。这是结论。

### 3. 兵临胶州湾<sup>④</sup>

但巨野教案所引发的政治后果极为严重。

事件发生后，德国公使指责中国政府对教徒保护的失败，说，这将使“我的政府除了自己设法保护以外别无选择”。

现在，已经很难知晓，当时是否还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事件的可能。但肯定尝试过。

在处理巨野教案的中德谈判中，德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今后，永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总理衙门大臣的答复是：“中国自然希望能制止这类事件；而且也愿意在其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但曹州委实是一块极难控制的地方，所以不可能‘担保’不再发生进一步的事件。”

真是好诚实的答复。但仅仅靠诚实能保证外交的成功吗？

德方于是回答说：“既然你们无法担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要求我们的军舰停泊在胶州湾，协助你们处理这种事情。”

中国方面的反应当然是：“此系中国内政，无庸贵国干预。”

但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要寻找一切可能，使其干涉中

国内政的行动变得“合理”。现在，不管中国政府怎么想，他们觉得终于找到了这一“合理”逻辑。

巨野教案发生一个半月后，十二月十六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给他的兄弟送行。后者将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阅兵台上，威廉二世把这种侵略逻辑赤裸裸地表达出来：

向那里的每一个欧洲人，向德国商人，而且，最重要的，向那些我们身处其国不得不去对付的外国人表明，德国人已经拿起了他的盾牌，上面装饰着帝国的鹰徽，坚定地站在大地上。任何向他请求保护的人将永远得到保护。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你们应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在你们年轻的额头上扎上桂冠，全德国将无人嫉妒你们。<sup>⑤</sup>

兵临胶州湾。中国政府屈服，答应了传教士提出的所有要求。在传教士遇害的村庄，中国政府出资，建立大教堂，并在门上铭刻：“钦建天主教堂”。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巨野、菏泽、郛城、单县、曹县、城武和鱼台等鲁西南县份，为传教士修建住宅。

这些县份的所有官员都倒霉了。惹出这么大乱子，还想当官?! 于是，五个县令被撤职，一个被参劾；道台调任；知府和军队首领被革职。但最倒霉的是山东巡抚李秉衡。此前，他本已被提升为四川总督，正在山东等待他的继任。但现在，他不但失去了他的新职位，被连降两级，而且不准日后再莅大员之位。

在晚清的历史上，李秉衡以保守著称，但对中央政府来说，他是一位好官。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提倡改革，李秉衡却上奏折反对修建铁路、矿山、邮局、印刷纸币，至于推行西式教育，那更是万万不可。他认为，要让中国变得富强，只要厉行节约，消除腐败就够了。

然而，一个保守官员，却不排除他是一个大胆而诚实的官员。他反对改革，但对自己提出的反对腐败，却在执政的山东身体力行。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他时，以《一位清官》为题，说：“他对外国人，对西化的变革抱不友好的态度，但他是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反对官衙中的一切欺骗和渎职行为，渴望尽其所能给山东带来清廉的政治”。<sup>⑥</sup>

山东百姓也喜欢李秉衡，认为他是位不可多得的好巡抚，建立了一个好政府，节俭衙门开销，为治理黄河而辛勤地工作。<sup>⑦</sup>

然而，他坚定地反对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不知哪来的一帮子传教士，把他治下的子民灵魂勾走了，从此不再崇拜他，而去崇拜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上帝，“只知有教，不知有官”，他不仅不理解，而且怒不可遏。对此，他有一段被史家经常引用的议论：

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欺凌乡里。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

没有证据表明，李秉衡曾经直接鼓动过反洋教群体，也

没有证据表明，他应该对巨野教案负直接的责任。但他丢官后的一位继任者毓贤——我们很快就将认识他——说：“要说义和团，他们的领导人有两个，一个是李秉衡，一个就是我！”这话说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话有夸张，但李秉衡仇视洋教，且山东领导人与义和团得以星火燎原之关系，说得再明白不过。

早就对李秉衡的仇教憋了一肚子气的德国人，借巨野教案，一定要把他搞下台。交涉中，德国公使质问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一个无能的官员会被擢升为未来的总督？总理衙门官员回答说：“李抚台历办河工，岁省百十万；又为户部筹款，岁亦十余万，不得谓无能，所以升官。”最终，清朝政府还是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让李秉衡靠边站了。

#### 4. 神父做官

巨野教案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在长期纠纷而难分胜负的民教之争中，这一次，是传教士和加入洋教的中国教民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对传教士们来说，这一胜利是划时代的：

两位神父死了，我们这些同事都无比悲痛。但他们没有白死。他们的鲜血感化了异教徒：上帝的教民异乎寻常地增加了……异教徒们乞求入教，向我们蜂拥而来，数目如此之多，以致无法全接纳他们。不久，整个教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sup>⑧</sup>

中国的百姓要求入教者多了，这是真的，但因为传教士的“鲜血的感化”却是胡说八道。无论信仰任何宗教，中国人的目的都是实用。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百姓不信教，不怕教，却怕官，怕权。就在中德纠纷平息后的转年，一八九九年三月，清政府发出谕令：

从总署奏：定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五条，主教与督抚平行，副主教与司道平行，教士与府县平行。

同时颁布《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

(1) 教会和中国地方政府交涉，代表教会一方的必须是欧美等外籍人，如不会中文，可让中国教民担任翻译。

(2) 主教更换新任或遇有节庆之日，中国地方大员利用某种形式致礼祝贺。

原来如此。从现在开始，传教士们不仅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且有了和地方官员同样的干部级别，同等的礼仪方式。传教士的权能大了——这才是百姓争先入教的原因。

让我们看一看这权能是如何起作用的。

巨野教案后，在汶上县靳家庄，出现了一场对于村庙所有权的争端。混战中，一个教民被打伤。德国传教士送信给县令，说他的教民已被杀死。县令急急赶到现场，却发现他只受了“极轻微的伤”。

传教士准备了一份有二十名肇事“罪犯”的名单，“罪

犯”们立刻吓坏了，跪下，并乞求入教。传教士于是将他们称为“好人”，并说不再控告他们。

传教士另外又拿出五名“犯罪”村民的名单。这五个人赶紧向教民出了一百七十吊钱作为赔偿。传教士于是又派人证明这五人没有罪。

但传教士说，另外七人却“有罪”。该县令于是请当地乡绅出面调处。传教士要求罚这个村子九百吊钱，县令急于了结此事，除如数筹钱外，又命令给教民加摆十桌酒席，于是此事方告終了。

很好，两位传教士的鲜血，为更多的传教士讨来了一个在山东传教的特权基地。从此，他们可以给地方官员带来前所未有的羞辱，可以绕开地方乡绅向百姓们直接指手划脚。但他们忘了：中国的百姓可以一时屈服，但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却决不会轻易地接受失败。

但更高兴的似乎还不是德国人。其他西方列强对巨野教案的结局更为兴奋。过去，大英帝国有在中国最大的势力范围，这一次，给德国“瓜分”了一大块。但其驻京公使窦纳乐爵士还是为德国人喝彩：“这对我们自己人民的安全将产生最好的效果，指望中国政府在保护传教士和制止排外运动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看来无望，除非像德国人那样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仿佛是一个预言，或者说，巨野教案及其后果，简直就是义和团运动并导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一次预演。

但义和团到底在哪儿呢？

【注 释】

- ① 关于巨野事件，薛田资本人有回忆录，《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上有“巨野教案调查”，另外，各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著、文章都有记录和论说。本章的描述据周锡瑞（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P. 139。
- ② 《起源》P. 140。
- ③ 本节所征引的史料和对事件的描述，均据周锡瑞《起源》、薛田资《韩理神甫的一生》和《山东近代史资料》，但观点有所不同。
- ④ 本节事件之描述除特殊注明者外，均据《起源》。
- ⑤ 郎格《帝国主义外交》P. 459。
- ⑥ 《北华捷报》卷五十六，P. 755（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五日）。
- ⑦ 同上，卷五十八，P. 1091（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八日）。
- ⑧ 薛田资《韩理神甫的一生》P. 131。



## 第四章 雾锁梨园<sup>①</sup>

### 1. 走进梨园屯

一八九七年春季的一天，一个叫赵三多的梅花拳师，率领一帮弟子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似乎正是薄暮时分，赵三多还没到村口，便隐隐约约看到，至少有半个村子的百姓跪在一座贞节牌坊下，黑压压的，有股悲怆的气氛。“赵三多的双膀一动，手中的大旗在风中呼呼作响，说道：‘老少爷们儿请起，我赵三多来也！’后代的说书先生们眼神好，记性差：赵三多来到梨园屯的具体日期忘了，但一百年前发生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其实，赵三多是哆里哆嗦来到梨园屯的。他不愿意淌这趟混水。但架不住人家的吹捧和死磨硬泡，说不得，只好走一趟，来“为朋友两肋插刀”。他知道，他要插手的是一个数十年未了的教案。他不知道，正因为他插手了这一教案，搭上了老命，却名垂青史。

梨园屯所在的冠县，位于济南正西。县志记载，冠县土壤贫瘠，人民生活困窘，人均只有两担粮食，数千年间也没培养出几个秀才。

贫穷少文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人呢？愚直的性格，尚勇的豪气，一旦迷信，坚定不移地相信各种邪说，永远不会动摇。主修县志者为人们丧失曾经有过的纯朴民风而扼腕：“唉，这里的人哪，多喜酒食交欢，借党报仇。”<sup>②</sup>

不错，这就是义和团兴起前的冠县，一个盗匪的天然避难所。那些盗贼劫匪装备良好，竟敢在光天化日行凶抢劫。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有个村庄有七人被杀。有盗贼甚至攻打镇子的商店。由于风险太大，商人不敢经商，市场萧条。那些强盗或骑马，或步行，强行抢掠财物，有恃无恐。“各衙门均有盗贼耳目，一旦要采取镇压行动，他们便去通风报信。”而且，不仅衙门的某些下层官员同情盗匪，老百姓也支持他们。就像传说中的“梁山好汉”，他们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绑架阔人，一般农民不会受到骚扰。相反，如果盗匪回老家分赃，许多农民亦能从中获利。这是真事：一个盗匪叫常五贵，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曾聚众几十人四出抢掠，有了钱便返回家乡，开锣唱戏。县府兵力薄弱，对他无可奈何。但有一天，他要从一名过路官员的丫环手上取下手镯，一时难以捋落，便挥手一刀把手剁了下来。官方忍无可忍，调来全部兵力，这才抓住他。<sup>③</sup>

没什么变革。大清朝所有的洋务啦，改革啦，开放啦，对这里的人来说，不啻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它以守旧而闻名，以不变为骄傲，以与世隔绝而自豪，以没能给冲进

变革潮流之中而感到无限幸运。不要说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代，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冠县仍盛行缠足，仍于新学堂与现代科学没有丝毫热情，识文断字者只占百分之十，当地方官员要把一座寺庙改成新学堂时，举县民众，要和那官员拼命。<sup>①</sup>

传教士们是顽强的。越是难以传教的地方，他们越是要让上帝的光芒照耀到那里。当然，为了保卫上帝，教会备有大炮和枪支弹药，许多教堂建设得有些像堡垒。

最先得到堡垒护卫的竟是“反清复明”的白莲教徒。到本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位农民能回忆起传教士发展教徒的情况：“早在光绪年间，白莲教在这一带活动。县官派兵捕拿他们。法国的梁神父告诉大家：‘我是传教士，谁愿加入天主教会，请举手。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几名白莲教徒举手加入了天主教会。这样，官兵就没敢逮捕他们。”<sup>②</sup>一份地方官员的奏折说：传教士在这块保守落后的土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冠县有二十四个村子，至少有十一个村建有教堂。

梨园屯教会也是这么发展的。一名曾参加反清起义的村民被捕，村中一位教民说服这名村民的家属：“你去找天主教神父，加入教会，求神父帮忙把人救出来。”村民家属照着做了，果然获得成功。村民纷纷仿效，到赵三多带着义和拳来揍他们时，梨园屯约有二十户加入了天主教会，大多是王姓人家。<sup>③</sup>

就这样，我们开始走进了历史上的梨园屯。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约有三百户人家，在当年，相当于今天的镇，每月，逢五逢十都有集市。该镇姓氏主要有三，阎姓人家

占百分之四十，王姓占百分之二十，高姓占百分之十。

放眼看去，梨园屯与别的村没多大区别：村民，一律的土墙茅屋，作物，不外是小麦高粱。但土壤肥沃，年年丰收，亩产小麦可达五百斤，是梨园屯可以骄傲的幸运。

然而，如果你走到一个叫干集的地方，一定会大吃一惊。那儿居然有一座书院，有读书声从里面传出，听声音，不过二十名左右的学生，但对这个文化落后的地区来说，已足感安慰。我们从县志上已经知道，数千年来，整个冠县也没出过几个秀才；而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却可以推算出，梨园屯一个村就至少有贡生、文生、武生及监生六名。不要小看这些还不是秀才的生员，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当会记得，这些科举制度的后备力量，在中国农村，横行乡里，无人敢惹。它被称为士绅阶层，其势力影响决不在县衙之下。如果我们再多瞥一眼，发现四野的农夫们挑着粮食到这里缴纳赋税，而一间房屋的外墙上，赫然挂着士绅领导的地方民兵招牌，心里便会叫一声：错不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不起眼的地方，竟是梨园屯周围百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很好，我们就要接近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了。从干集书院往北，朝着梨园屯中央走，看到了吧：有一排坍塌的低矮房屋，像是废墟，如果没人指点，你怎么也不会猜到，这里是玉皇庙旧址。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就从这堆碎砖烂瓦开始，但却不会在这里结束。

## 2. 玉皇与耶稣的搏斗

许多事情，开头一样，结尾一样，逻辑不一样。这故事的开头是：这堆碎砖烂瓦引起了长达数年的民教相争的教案。这故事的结尾是：刀光剑影，人头落地，社会动荡。一种逻辑是：这堆碎砖烂瓦里，包裹着中国百姓信奉的身份最高的神——玉皇大帝，为保卫它而斗争，是正义的行动。另一种逻辑是：价值判断不等于事实判断。

事实是，玉皇庙建于一八六一年，很快在一次起义中被毁。村里的绅士们和执著于传统文化的人们，似乎并没准备让它重新开出道德教化的鲜花。

时值一八六九年，村里已经有教民，是少数，受着乡绅们的蔑视。传教士要在梨园屯建一所教堂，请教民帮忙购地。当时，玉皇庙所在地块有四十一亩九分一厘，原归一些教民和不信教的村民共同所有。有头有脸有权的绅士们商量了一下，似乎只想到了欺负人和占便宜。在他们请来的一些更有头脸的人的公证下，三十八亩好地划给了信仰“华教”的村民，而信仰上帝的教民仅仅分得剩下的堆着碎砖烂瓦的三亩九分一厘寺庙房宅地。协议书上，双方签字画押，公证人签字画押，村里的士绅们也签字画押——如此郑重，当是怕吃了大亏的教民反悔吧——那协议书，因此而成为无可争议的法律文本。

但协议刚刚签订，绅士们就要撕毁协议。教民准备把那堆碎砖烂瓦清理掉，建一座教堂。绅士们大怒，坚决不

准，说要维护“华教”。但协议中并没有在这块废墟上必须盖什么、不准盖什么的规定。

绅士势大，官司打到冠县衙门。县令韩光鼎心向绅士，却不得不承认教民有理。他的判决是：这块地基是属于教民的，但只能算是借的；一旦购买到新地基、建好教堂，让教民退还地基。如此糊涂官，判成糊涂案，给一个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开了个头。

传教士不愿离开梨园屯中心地区修建教堂，要求执行协定。

一八八七年，一名传教士带来砖瓦，清理旧有建筑废墟，在其已经购买的地基上开始修建教堂。

刚刚开工没几天，两名士绅便带领一伙村民，赶走教民，并用传教士带来的砖瓦原料，重新修建玉皇庙。

县令再次干涉。时任县令者为汉军旗进士出身的何士箴，据说精力充沛，信奉儒学，作风保守，非常适合管理这种文化落后地区。他后来最后一次离职时，冠县人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sup>⑦</sup>

何士箴亲自到达梨园屯，查明教民的建堂工作确实遭到破坏。于是，带头拆堂修庙的士绅受到惩罚；新庙被拆，财产重归教民。

一八八八年，何士箴任期结束，民教双方仍未达成一个新的协定。继任县令无力解决此案，何士箴奉命重返冠县。他请冠县一位年长士绅居中调解，达成一项协议：教民同意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建庙；士绅们答应另购地基修建教堂。何士箴和新任县令命令他们每人出白银一百两，资助新教堂。

这样，从县令老爷和梨园屯村民的角度看，案子算是解决了。

但是，传教士拒绝接受裁决，说：教民已将庙基转让给传教士，只有传教士而不是中国教徒，才有资格签订一项权威性的协定。

何士箴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这是村中信教与不信教的中国人两派之间的争端。既然村中教民已非常满意，他将不与外国神父见面。

一八九一年，忽然发生了长江教案。其时，光绪执政。小皇帝年轻性急。每天报到中央的奏折，大半是教案。在他看来，什么庙基问题呀，水井问题呀，教与非教的吵嘴打架呀，简直是岂有此理。成天把这种芝麻绿豆弄到中央来开会解决，烦透了。他颁布旨令：各地方官员，限期处理所有教案，不准拖延。

转年二月，法国驻北京公使针对梨园屯教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教案的背后有外交，地方官员无力抗拒了。接到“再审梨园屯教案”旨意后，东昌知府立即照办。裁决的结果，一个跟斗翻回来：庙基还归教民。

绅士们咽不下这口气，决定硬顶。他们请来了一个道士，叫魏合意。魏道士让地方团练把枪械移存玉皇庙：一旦教民抢庙，立刻开火。

地方政府大急，这一次，道台、知府、知州、县令，四级官员连翩而至梨园屯，在庙基所在地召开士绅会议，向他们晓以利害。是的，必须维持和平，要把稳定放在首位，否则，谁也甭想活。大局为重。没什么道理可讲。解散庙中团练。拆除玉皇庙。庙基归还教民。

教民再次取得了胜利。

到此为止，士绅一直是抗教的领导者。

到此为止，士绅再也没力气抗下去了。

他们一共是“六绅士”，连续数年，为了一座庙而斗争，输了赢，赢了输。表面上看，赢时，因有官员撑腰，输时，因官员顶不住中央压力，但实际上，无论输赢，都须有大把的银子往“上面”扔。在此期间，有三人曾被监禁六个月。为支付诉讼开支，另外三人不得不变卖家产。

六绅士由是被称为“六大冤”。

“六大冤”偃旗息鼓后，另有八位村民想给他们鼓劲，拍着胸膛说：“甭泄气，官司接着打，以后，我们八个和你们一起干下去！”这八人因为能把胸膛拍得“咚咚”地山响，很有讼棍的样子，被称为“八大讼”。

“八大讼”根本没“讼”过一次。他们的胸脯拍完了，“六大冤”反过来鼓励他们：“我们不去了。这次有洋人撑腰，要去你们去吧。”八人一见他们这些有身份的人都不敢去，只好作罢。

但事情并没有完。此后几年，争抢玉皇庙的神圣使命落在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他们被称为“十八魁”，其首领叫阎书勤（三十三岁），是一帮练拳的人，其拳名“红拳”，练拳的目的是为了给地主士绅看家护院。

教民重得庙基，开始修建教堂，绅士退居幕后，红拳大打出手。据载，教民躲在教堂里，以石头和枪炮进行抵抗。这更加激怒了村民，他们猛攻教堂，打伤了几名教民。一些人逃到村外。但只要村民开始修玉皇庙，教民就来反攻。如此僵局，持续数年。无论村民建庙，教民建堂，一



方兴建，一方干扰，你来我往，谁也建不成。这场庙堂之争历经“八起八落”，相持二十八年之久。后人所记得的都是毁灭的壮举，无一建设的功劳。一九八二年四月，八十二岁的梨园屯老人马老英回忆说：“教民拆了庙盖教堂，‘十八魁’闻风而起，在这一日拉鞭为记，鞭声一响，村民带锨、铲等去拆堂，后编成一戏，是《鞭花记》。”<sup>⑧</sup>

但如此消耗之战再也打不下去了。村民后来编了歌谣：“六大冤，八大讼，十八魁，都不中。”像是惋惜，又似讽刺。

就在这时，一位有名的梅花拳大师赵三多被梨园屯请来了。

### 3. 两肋插刀赵三多

正是春天，一八九七年四月，最好的农事季节。但梨园屯的人们无心稼穡。“十八魁”又一次被教民打败了。但没人知道他们去请赵三多了。教民们又一次重新开始为修建梨园屯教堂添砖加瓦买木料。忽然有一天，大约是四月二十一日，他们发现，正对着这饱经磨难、数十年未能成形的教堂，出现了一座高大的擂台。他们听到满村的人都在奔走相告：“赵大师来啦！赵大师来啦！”

八十三年后，一九八〇年七月，在史学家的口述调查中，赵三多的同乡，八十三岁的赵同山回忆说：

那时俺村没有乡团，有梅花拳、红拳，两家不是一码

事，至今合不到一块。红拳是玩架子，梅花拳比红拳玩的武器多，有十八般武艺。梅花拳和别人打，先倒下，别人一上，用腿一蹬，把对方打倒。

赵三多不是秀才，他家里很穷，是个武的。赵三多的徒弟多少说不清，那时南边、东边都有红旗来，有好几千人。事过去后还有人找他，因为接到通知早晚不一，所以来人有先后。来参加的都是庄稼人，拿着红缨枪、大刀。<sup>⑨</sup>

八十三年前的事情，由八十三岁的人回忆，可见那事情也是听说的。但就是这段回忆，再加以史料佐证，使后人对赵三多这个人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赵三多所在的沙柳寨村，距梨园屯有几十里的路程，虽不遥远，却属直隶境内。他又名赵洛珠，传授梅花拳。

梅花拳的历史可追溯到康熙年。有一天，来了个河南华县人，叫杨炳，自称是武举人，考试成绩还是个“第三名”，曾经在京城禁军服役。河北是武术故乡。但见来人的拳术果然耍起来有两下子，便留下了他。从此，他便在此地传拳。这拳，便是梅花拳。

到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当地最著名的梅花拳首领是赵三多。他自称是梅花拳八代门徒中的第五代，教出过两千名徒子徒孙。在一个偏僻的乡村，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的徒子徒孙中，许多人是各县衙门班房的皂役。一个人在地方政府中有这样的权势班底，就等于崇高的威望。

据考证，赵三多出生于一八四一年，当“十八魁”投奔他时，他约有五十六岁。但关于他的财产却是笔糊涂帐。

有人说他有四百亩土地。也有人说顶多只有十亩。但他的祖父倒真的是一位生员。对眼下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慷慨义气、喜欢打抱不平的好名声。

可以肯定，正是这名声，使“十八魁”才去投靠他。

但是，赵三多最初不接受他们。他不赞成鲁莽行为。他不愿意自己的家庭和名誉受到损害。哦，你们应该理解这个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当然要担心这个啦。

不知他的徒弟对他施加了怎样的影响，赵三多终于同意作“十八魁”的师傅。这有点不寻常。“十八魁”学的是红拳。对门派森严的武术界来说，改换门庭就是欺师灭祖。

赵三多就这样来到了梨园屯。他不愿意闹事。可他怎能让别人说他行侠仗义的好名声不过是个门面呢？不要提出什么反洋教的口号——他说——不就几个洋教徒嘛，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他搭起了擂台——举行梅花拳春天亮拳比赛，原来不过是想敲山镇虎。他并不怕教徒。但他怕官场。一旦官场追究下来，他可以说：这是一次例行的春天亮拳，不过是把地点变了一下。

有多少历史事件是按照当事人的意图乖乖发生的？几天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

起初，教民们还躲在正在兴建的教堂中。但几天后，四月二十七日，有两千人攻打并占据了这块争论已久的地方。

教民们进行了反抗。许多人受伤，一人重伤。教堂被毁，教民的家被洗劫，所有教民及眷属都逃跑了。

在赵三多的协助下，梨园屯村民再次夺回了他们的玉皇大帝。

地方当局很高兴。秋天的时候，在没有传教士和教民

在场的情况下，当局签署了一项新协定。官方将给教民另置地基，并提供修建教堂的砖瓦木料，旧地基归还村民。为了怕传教士再翻旧帐，官方专致洋人一封信函，说地基并没判给村民，而是划归官府，将用作全村村民的义学。

这当然是骗洋鬼子。事实上，它用来重建了寺庙，玉皇大帝坐进了庙堂。寺庙竣工时，梨园屯举行了盛大典礼。

盛极而衰，时势莫测。就在这时，巨野教案发生了。我们已经知道那后果：中央政府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民教冲突。因此，当传教士再次提出解决梨园屯教案时，官方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建的寺庙被拆毁，玉皇大帝给扔了出来，庙基再次回到教民手中。

至此，梨园屯教案彻底解决。但事情还没完。

#### 4. 知县知府双探案

一八九八年初，梨园屯教案解决后，冠县县令何士箴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叫曹倜，捐过贡生，在省城候补。由于旷日持久的梨园屯教案，这一地区最让官员们头痛。没人愿冒仕途被毁的危险到冠县作官。

曹倜是个有理想的人，决心让这危险的冠县成为他事业的阶梯。接任后，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即前往梨园屯的干集，随行者只有一名书吏和两名差役。

他闻得出，空气中有一种肃杀的气氛，紧张而刺激。梨园屯教案是解决了。但梨园屯却成了干柴烈火。他得到消息，在梨园屯一带，“成百上千的同情者一直都在唆使当地

的谋反者，并到处宣扬要举行一次总起义，所有的教民将格杀勿论。”

曹侗的上司，东昌知府的票呈也证实：“本年正月初，谣传要来洋兵。梅拳再次团聚。以致远近惊惶，民教震恐。”

曹侗的轿子终于颠到了梨园屯的干集。干集届时正逢集场，但到集上的却并非赶集人。他迈出轿子，立刻便“处处可见拳民，短衣带刀，填塞街巷，其混乱状，触目皆然”。他意识到，拳民不彻底解散，便永远不会消除动乱的根源。

梨园屯的大多数教民都已逃离此地。但组织动乱的首领人物是谁呢？前任地方官全被罢免。新来乍到，他两眼一摸黑。

他估计要打持久战。他更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这肯定不容易。于是，他派人回县里搬来了铺盖。他住进了干集书院。

他放出风去：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此地的问题。他发出邀请：请当地人派代表次日与他会面。但是没有一人前来。

曹侗不着急。清晨醒来，发现书院中已经来了学生。如此形势大乱，有钱人的家长还把孩子送到学校。看来，人心可恃。于是，曹侗亲自召集学生考课，以茶点相待，并亲为阅卷，优者给予奖励。他希望能从孩子口中探到点什么。可他们说“不知道”。

一连呆了十天，曹侗承认，他仍不了解拳民的内情。他确实有点着急了。他想到了收买。一个穷人叫高老六，县长把他招了来，每天给钱五千，让他探视拳民的活动情况。

通过高老六，曹侗了解到，赵三多是拳民的主要首领。他还了解到，赵三多与当地一位团防首领杨昌浚来往密切。于是，曹侗召见杨昌浚，并威胁他，如不将赵三多带来，就把他本人抓起来。但杨昌浚无法说服赵三多来投诚。

赵三多的拒绝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现在是几省都悬赏缉拿的人，他怀疑曹侗对他的赦免在冠县以外的其他地区是否有效。

擒龙先擒首。连续二十多天的侦察、恫吓、利诱，别说龙首，连个龙尾巴也没见着。

曹侗终于忍耐不住了，打道回县。他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月后，一八九八年二月，知府洪用舟亲自出马，负责解散拳民工作。县令的工作并非毫无成就。洪用舟继续顺藤摸瓜，终于摸到实相。

洪用舟的一个重大收获是，他终于认识到：在赵三多与下层活动分子“十八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政治差别。赵三多与“十八魁”的首领阎书勤甚至并不属于同一门道。赵三多的梅花拳以集市亮拳比武著称，而阎书勤的红拳则专门为富裕人家保镖护院。赵三多从未热心接收过“十八魁”作徒弟。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洪用舟从这“拳”与“拳”的差别中，忽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

二月二十八日，洪用舟宣称：阎书勤是头年春天杀害教民的凶手。并亲率一伙兵勇，到梨园屯捕拿阎书勤。

洪用舟在上报的奏折中说：他杀死一名拳民，打伤了阎书勤，阎书勤身负重伤，奄奄一息，被同伙救走。官兵

占领了梨园屯。他发现，“惟该处与直境毗连，犬牙相错。地方拳民团众势颇固结，未便操之过分，激生他变”。

是的。他的这步棋不过是敲山震虎。赵三多仍然是局势发展的关键所在。洪用舟最终同当地团防首领商定，以完全保证赵三多的安全，要他去干集与知府会谈。否则，赵三多将失去一个被赦免的机会。

义和团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就这样来到了眼前。

## 5. 义和拳

此时，梅花拳内部发生了内哄。原因是来了一位叫姚文起的老拳师。

姚文起也是直隶人，四处流浪为生，有陶工的技术，在梨园屯西南的留善固镇传授过拳术，一年前移居沙柳寨。他在梅花拳门中比赵三多高一代，赵三多称之为师，但他的影响却赶不上他的“学生”。

问题在于姚文起的性格：赵三多虽有侠的名声，但仅仅是名声而已；姚文起却有更多的霸气，而且霸形于色。赵三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官；姚文起却什么都不怕。当此动乱之秋，赵三多的策略是“勉从虎穴寻安身”，而姚文起却大呼：“怕什么，就跟那狗娘养的官兵干一场！”

梅花拳的师傅们开始担心，“别的拳师曾劝赵三多不要听姚师傅的话，‘他野心很大，别闹出乱子来，我们的祖师自清初授业至今，已有十六七代了，文的看书，给人治病，

武的练拳，强壮身体，从没有过叛乱的事’。”

有一段时间。赵三多还听这些劝告，但是当冲突激化后，他发现干与不干都不能得到解脱。

就在这时，知府洪用舟的最后通牒来了。正在走投无路的赵三多决定赴约。梅花拳门内部一片死寂。谁知道那当官的大人先生玩的什么诡计。一旦不是赦免而是诱捕，那么，赵三多头上的谋反罪名就是整个梅花拳门的罪名。得想个办法。你赵三多愿意去死，谁也拦不住，但不能连累了整个拳门。

于是，梅花拳的其他首领们开了一个会，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赵三多可以独立行动，但从现在开始，不准使用梅花拳的名义。愿意跟着赵三多走的拳民可以走，但从此也不再是梅花拳的人！

那些头领是这样对赵三多说的：

你用梅花拳的名义组织革命，将来皂白不分，一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牵连到我们身上，玉石不分，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全不同意。<sup>⑧</sup>

决议宣布，拳民大哗，刹时间，梅花拳众立成两派。赵三多的死党们义愤填膺，另外的拳民却心中窃喜——从此，就是赵三多给杀了头，也和我们毫无关系了。

赵三多知道，他实际上等于被逐出了梅花拳门。看着剑拔弩张就要动粗的两派，他居中一站，说道：“好吧，我从此不再用梅花拳这个名称。”

他望着站在自己一边的拳众死党，对这些哥们儿的义气大为感动，不禁长叹一声，道：“我们不再是梅花拳的人，但梅花拳创始至今，拳旨中的那个‘义’却是我们的根本。



我看就叫‘义和拳’吧。”

赵三多的死党们好像默想了一下，忽然叫一声“好”，有惊天撼地的声音从一个个大汉的胸腔里喷吼出来：“义和拳！义和拳！”

应该暂停一下故事的叙述。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是本章的重点。现在，我们终于听到有“义和”二字响在了我们耳边。是的，“义和团”的“义和”就是这样诞生的——当我们为“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寻找“祖先”时，不能漠视它的这一出身。它不是起源于爱国主义，倒是起源于一个武术团体的分裂解体。它没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相反，有一种被逐出拳门、无处栖身的无奈。

长期以来，西方习惯地将“义和”译为“正义与和谐”。但显然，义和拳使用这一名称时，“义”是关键。它指的是传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珍重的义气，是忠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等涵意的总代表。“和”的意思是“和谐”或“团结”，与同音异义词“合”意相近。一位传教士把“义和拳”译成“联合起来的拳民”，英国公使窦纳乐正确地描述道：“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但是，当他这样描述时，他指的不是赵三多的“义和拳”，而是还没有进入我们视野的“义和团”。

但无论如何，“义和团”三字中，有两个字有了出处。一面“义和拳”旗横空出世，朝着知府设下的官场陷阱飘扬而去。

## 6. 干集谈判

关于赵三多与知府洪用舟在梨园屯干集的谈判，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一种把赵三多描绘为一个英雄，仿佛“关云长单刀赴会”。一九八〇年七月，赵三多的第三代孙，七十一岁的赵子立在他的家乡对调查者说：

事大了，威县、冠县、大名、邱县官员都来调解，给赵三多进一面匾，上写“直良可风”四个字，是叫他别闹事。赵老祝（赵三多）不要，说家里只一间小屋，没地方挂，我不要，就扔在干集的街上。<sup>⑩</sup>

但历史学家考证出的赵三多却没这么大义凛然。史料载：知府“传到拳首赵三多，切切开导，晓以利害。即将梅拳解散。并令毋再传单聚会，自投法网”。

关于知府洪用舟如何向赵三多“晓以利害”，冠县曹佃县长给我们留下一段大致可信的记载（译文）：

你家道殷实，有儿有孙的，你何不图个自保身家，却纵使你的徒弟们滋事？而且，杀人放火，另有其人（指“十八魁”），你又何必给他人当傀儡呢？

于是赵三多承认：在梨园屯教案中，他确实误收徒众，使一些不规矩的人混进了他的组织，但是，现在教民污辱

他为“罪魁”，他不得不纠集徒众以自保。

当山东官员答应提供保护时，赵三多问：他本人的家乡并非山东，而是直隶，山东官员的保证难道在直隶也能有效？

为解除赵三多的疑虑，洪用舟知府会同临清知州和冠县、威县、曲周三县县令答应，只要赵三多解散拳民，山东、直隶官员都保证他的安全。

为了表明诚意，知府亲至河北省沙柳寨，在赵三多的家门上高悬一块“稟生”匾牌。作为回报，赵三多召集他的徒众于干集书院前的十字路口会聚，公开命令他们解散。

义和拳刚刚出现不到一个月，便在他的创始人的手上解体。事情真有这样简单？

## 7. 一个口号的诞生

没这么简单。赵三多的义和拳解体了，但姚文起的义和拳不愿解体。赵三多的包袱太重了：多年来积累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财富，一个儿孙满堂的家庭，从来都避之惟恐不及的谋反名声，以及那块虽说不能当饭吃却能光宗耀祖的稟生牌匾。姚文起有什么：满手老茧，两袖清风，没什么可守的，没什么可恋的，倒是伸出手去，可能捞到点什么。

秋收之后，流言广传：山东官员计划扩大搜捕。十月，梨园屯两名“十八魁”成员被捕。一队士兵越过山东边界，进入直隶，搜查村子时，拿走了赵三多家乡沙柳寨村的一

些牛肉。义和拳民愤怒了，姚文起决定再“干一场”。

但要挑头闹事，姚文起威望不够。他要求赵三多帮助。赵三多说他“不干了”。于是，十月二十五日夜，姚文起勾结梨园屯的“十八魁”（他们本是赵三多的弟子），绑架了赵三多和他的全家，并胁迫他率众进攻。

真奇怪。搜捕他们的是官兵，他们的进攻目标是教民。以后的几天，聚集起几百拳民。沙柳寨拳民首先出击，二十六日攻打梨园屯西北一个村的教民，并毁坏两户教民房屋。其后几天，更多的拳民向南运动。经过红桃园时，毁坏了一座教堂和几间房屋，然后继续向南，进入山东边界和直隶境内。

这时，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出现了：义和拳民高高地举起了一面新的旗帜，旗上写着口号，一名法国传教士将口号译为“从清灭洋”。一位美国人译为“举清灭洋”。实际上它是“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我们的收获不小：在出现了“义和”二字之后，义和团运动的第二个典型特征，他们的最典型最普遍使用的口号，在义和拳的组织中诞生了。然而，这个口号的产婆是“义和拳”，不是“义和团”。这其中大有分别。

当时的场景肯定很可笑。并没有招惹义和拳的传教士和教民们在前面逃跑，后面追着的是要帮助政府“灭洋”的义和拳民，而他们决意支持的清朝政府官兵却在他们背后追着、赶着杀他们。

显然，清廷把拳民们的好心全都当作了驴肝肺，不肯接受这种“支持”。他们一边追剿着好像赤胆忠心保大清的

拳民，一边又弄来了赵三多，要他招降义和拳。据直隶政府禀报：

“那天，冠县、丘县和威县三县县令，会同高级官员代表，前往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向拳民极力劝谕。赵三多向着姚文起和拳众们当场叩头，请求他们解散。该拳民等深知悔悟，即于十七八日纷纷解散回家。”

天有不测风云。拳民回家时，再经他们抢掠过的红桃园，发现避难的教民又回来了。于是，姚文起决定“顺道”再“干一场”。

十一月二日夜，部分义和拳民重聚。第二天清晨，大约有七八十名拳民攻打了红桃园的教民，焚毁教堂和七间房屋，杀死二三名教民。然后，他们沿着教民集中的村庄向威县县城北部移动。但是那里的法国传教士已经有了准备，在四个大村中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民团，人数多达四百七十七人。义和拳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柿子要找软的捏。于是绕道而行，转攻第三村。最后，又是手无寸铁的教民家被劫掠烧毁。

十一月四日，清廷兵勇闻讯，开始攻打一路烧杀抢劫的拳民，打死四人，捕获包括姚文起在内的十九人。第二天，姚文起被斩首，头颅就悬挂在红桃园示众。

一八九八年的骚乱终于结束了。

两年后，一九〇〇年，当义和团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席卷北中国时，梨园屯教案后还活着的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和“十八魁”的头目阎书勤，又出来活动了。但他们始

终没有联合起来，都仅仅在自己的家乡附近各自率众行事。这表明，赵三多始终与他那些胡来乱搞的同伙保持着警惕的距离。

一九〇〇年秋，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阎书勤被捕，解到临清处决。赵三多并未搭救。

一九〇二年夏，一生谨慎，行事决不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赵三多，忽然一反常态，参与了一次反政府斗争，导致毁灭。他是被同事出卖而被捕的，最终饿死狱中，头颅被斩下，悬挂在大清的旗杆上。这样，不自觉地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贡献出“义和”二字和“扶清灭洋”口号的早期拳民领袖赵三多，结束了他波折起伏的一生。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一位传教士报道说，他在拳民最早出现、但现今戒备森严的村庄梨园屯，受到了“诚挚的欢迎”。

这就是说，尽管这一地区生产出了“义和拳”的旗帜和“扶清灭洋”的口号，但它却不是义和团运动起源的地方。

不错，“义和”二字和“扶清灭洋”的口号被后来的义和团运动采用了，但是，名称的采用并不意味着组织的传播，更不意味着运动的兴起。

它离我们要寻找的目标大大接近了。但它还缺乏几个最关键的特征：

——它叫“义和拳”，而并不是“义和团”。

——它被清政府追杀着，而不是像义和团那样，成为有中央政策支持团体。

——最重要的是（你肯定已经发现），它没有任何迷信

内容：没有刀枪不入的仪式，没有降神附体，没有画符念咒。而没有这些作为整个运动之“力量”的迷信仪式，它怎么能算是义和团？

### 【注 释】

① 梨园屯教案更是义和团研究的重点篇章，有多种史料和论著。本章之史事征引，除特殊注明者外，均据周锡瑞（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P. 154—191。但本章观点，由本书作者负责。

② 《冠县志》（一九三四年版，下同）P. 126—133。

③ 《冠县志》P. 1577。

④ 《冠县志》P. 151、1454—1456。

⑤ 《山东便览·赵三多》P. 11—12。

⑥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P. 254—257。

⑦ 《冠县志》P. 723—724。

⑧ 关于上述“六大冤、八大讼、十八魁”的事迹，均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⑨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⑩ 同上。

⑪ 同上。

## 第五章 森罗殿战斗

### 1. 神拳出世

一八九〇年，大约在春节前夕，黄河岸边的长清县大李庄来了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他的本名无从查考<sup>①</sup>，只知道他叫朱红灯。据多方考证，朱红灯是泗水人，家里穷，出生刚两年便随家逃荒在平。现在，他又到了大李庄，投奔亲舅舅。他是孤身一人来的，来时，身无长物。本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历史学家两次来到大李庄，试图发现朱红灯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大李庄的李连武老人回忆说：

朱红灯小名叫小朱子，是个老实孩子。他来这庄时大约三十二三岁。他来到这庄学神拳学得很好。到了西乡后神拳里的人给他起了个名字“朱红灯”——朱红灯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脸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这庄学神



拳有四五年工夫。他为人很好，常常给人家治病、治疮的。给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钱。朱红灯在这庄上是晚上学神拳，白天帮人家干活。帮人家干活时人家管他饭吃。他很会联系和组织群众，这庄上的人都很喜欢他。<sup>②</sup>

看来，这个将要惊天动地的汉子，阶级成分是雇农。而另外两个重要的信息是：他学了一种叫做“神拳”的武术，并且“很会联系和组织群众”。

朱红灯的神拳授业师傅是村庄西南云禅寺一个和尚，法号已不可考。

他在大李庄生活了九年，一八九九年初，忽然离开，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平。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家，他栖身在共练神拳的朋友家里。他的表面工作是“在各庄之间流动”，教授神拳。

谁也没看出他是个有理想的人。那理想可能并不崇高，例如，像县太爷一样能坐轿子，被人抬着，四周有人伺候。但一旦时机来临，这样的理想已经足够危险。

这时，他认识了一个叫心诚的和尚。后者改变了他后来的道路。

心诚俗名杨照顾，也许是杨顺天，甚至可能是周震甲，这没关系，心诚这个法号比他别的任何名字都更有名。小时候，他有一个多病的身子，父母把他交给一个寺里的和尚照看。在那里他也学得一手好神拳，身强力壮，有个绰号叫“鹅”。朱红灯认识他时，心诚和尚已是在平县北部的神拳大师。

已经无从考证：所谓“刀枪不入”的仪式是否与神拳

生而俱来。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心诚和尚对神拳提倡刀枪不入起了重大作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才有人注意到这一仪式的重要性，并回溯它的源流：

朱红灯的好朋友是个姓杨的和尚，擅长拳法。但又像宗教，说只要练了他教的拳术，就能以肉躯抵抗枪炮，被诱者全都认为他是神仙。

还有另一说：

拳民首领有红灯、心诚二人。闻村店老人言：心诚是法号，原名周震甲，西寺僧人。二人本领，心诚独强。该僧幼习少林拳技，刀法花枪，无不精熟，每与拳民赛武，十多人不能近之，尝自夸“浑身气功，能拒枪炮，金刚附体，外洋无敌。”<sup>③</sup>

能够刀枪不入的神拳就这样在一个和尚的手里诞生了。他可能并不认为这是吹牛。在今天这个科技昌盛的时代，所谓气功被吹得比神拳还神。但朱红灯却是有心人。他似乎觉得，一种能够刀枪不入的神拳，会像迷药一样迷惑住信奉它的人，使那些无知无识的群氓，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助他干成一件大事情。

可能，这个念头便是他放弃一切，一意“周游各庄，教授神拳”的起点。这很有点像当年的洪秀全，一个破落的山村塾师，走在广州的马路边上，忽然拾到一本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于是听到了上帝的启示，从此

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自创“拜上帝会”的洪秀全，掀起一场几乎葬送清朝的运动。

朱红灯利用刀枪不入的神话，又会折腾起怎样的大风大浪呢？

## 2. 庙会上的骗术

一木不成林。朱红灯的理想要靠迷信神拳的人们来实现。天从人愿。到一八九九年，神拳得以迅速传播的所有条件都成熟了。

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北方农村自有的，那就是庙会。

那时，北方的村庄几乎村村有庙，大多供奉着土地神或关公，当然，一位怀抱男童的菩萨也常常向那些乞求生子的人们微笑。村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收敛修建这些庙宇的捐款。人们愿意拿出钱来贡献给这些神仙。他们所有难以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它们身上。干旱时，他们向神仙祈雨。雨太多了，他们认为神仙能给他们抱来一轮太阳。病了，神仙给他们治。死了，神仙领他们去天堂。

庙会便因那些人们永难实现的愿望和从不兑现诺言的神祇而诞生。它是村社最重要的活动，庙宇就是活动中心。它一般被称为“迎神赛会”。一个最大的项目是演戏，名义上为庙神而演：把庙神请出庙宇，坐在观众的前排，有时，有钱的士绅还给这些神仙搭顶帐篷，或遮一柄阳伞。但这只是必有的仪式。庙会活动把农民从单调乏味的农活中解

脱出来。亲戚们趁此团聚，小贩搭起货篷卖吃卖喝，赌徒有了聚赌的地点，不守礼法的儿女有了偷情的时机。

但农民的文化认同正存在于他们观看的戏剧中。瞧，那些泥塑的神灵就坐在他们身边，成为观众的一部分。戏中人物并非那么虚无飘渺，他们常常来自历史，但对农民来说这没什么区别，无论有无神性，只要喜欢，他们就是人民的神仙。中国农民的宗教观没有太遥远的来源，它们就来自眼前活生生地上演着的戏剧形象。中国农民的宗教，从来都与村社民间文化难解难分。

听，锣鼓响了，农民心目中喜爱的神仙们粉墨登场。你会说这没什么新鲜的，不过是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中的人物。但你发现了吗：北方农民所喜爱的戏剧多是军事题材，所喜爱的大部分神仙都是军事人物。这个地区习武成风，有此偏好理所当然。《封神演义》中，下凡辅佐周朝的姜子牙在鲁北齐国受封，《水浒传》里，英雄好汉们也是在鲁西扎下营盘。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希望，不断重复的台词、抽象夸张的动作，像血液一样，在这些农民观众的身上循环流淌。它一旦外化为舞台外的现实行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会像舞台上已经人戏的演员一样，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那无所不能的神祇吗？

仿佛是对这荒诞疑问的回答，鲁西南一位德国传教士描述过这样一种叫做“神魔附体”的仪式：

正月里，村子挑选四名青年男子，把他们带到庙里或其他合适的地方，在那里背诵顺口溜，请求“猴王”孙悟空露面，展示其武艺。那顺口溜道：

一匹马，两匹马，  
孙猴王，来玩耍。  
一条龙，两条龙，  
猴王下凡逞英雄。

这样念叨着，这四人脸朝下躺着，直到被猴王附体——他们变成了猴王，并具有猴王的本领——为止。接着，降神附体的人被唤醒，拿一把剑四处挥舞，在桌子、凳子跳上跳下。最后，主持仪式的人将点着的香灭掉，被神附体的人力竭倒地。

再看一份官方材料，描述的是治病仪式。但描述者太清醒，拆穿了骗术：

其向系给人治病，有香头、马匹名目。香头不过随同帮忙，马匹即许给祖师当徒弟，所习之事系烧香上表，低头弯腰，将两手摇摆，随势倒地，声言祖师附体，即须脱卸衣服，光赤上身，第一要用铡刀，一手将刀柄执住，刀刃放在肚脐，一手用刀背狠力向下砸，只须刀柄执牢，不致伤损；又扎针，或从左腮颊穿入，右腮颊出来，或从右腮颊穿入，左腮颊出来，均系假装骗人，并非真砍真扎；又妄打鞭，凡是妖魔皆畏鞭声；又妄记些偏方，可以治病。如治疯病，剪一纸人，用病人头发穿一线扎在纸人身上，用火烧化，称是送邪；画符一纸，贴在病人家门外，称系能使邪祟不敢再来。此事不过骗钱。

既然这些骗钱术都大有人信，那么，朱红灯的传播神拳——可给人治病，并能使人神魔附体，而且不要一分钱，在庙会上当能大行其道。

老天爷也对神拳的迅速传播帮了一个天大的忙。

一八九八年八月至九月，黄河发大水。在平县城西北部地势略高，未遭水浸，但以东地区，整个秋天一直泡在水里。大部分村庄秋粮颗粒无收，土地过于潮湿，冬麦无法下种。所有受灾地区，都成为神拳播种神话的土壤。一九六六年，历史学家对这一地区的口述调查证实：“这里有场子。神拳在来水之前就有，但只是学，来水以后就闹起来了。”高唐县九十三岁的陈廷献说：“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黄河开口子，闹大水，水刚下去，这里就兴起神拳了，各庄都设场子。”

天助神拳。大涝之后竟是大旱。农民向他们敬爱的神祇乞求来太阳，它热辣辣地照耀着，把大地烤得滚烫。一个叫明恩溥的传教士看到了比大涝年景更大的危险：

旱情十分严重且波及地区广泛，这是自一八七八年大饥荒以来第一次听说冬小麦没有在华北任何地区播种……土地光秃秃的，无法播种。在这时候，懒散的和不安分的人们准备铤而走险了。

检讨历史，不断轮回的农民运动有什么必要的诞生条件吗？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这就是那条件。这时，只要有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振臂一呼，天下大乱的局势便在政府眼前。现在，似乎又到了动乱的前夜。历史学家指出：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为首的神拳，正是伴随着大涝与大旱，像野火一样在山东大地上蔓延开来了。

朱红灯开始在每一个村庄设“场”。

不能漠视这个“场”字。它指的是“拳场”，一个练习神拳的地方。但一切动乱都发源于这个“场”。它是神拳拳民最基层的组织单位，是在不久的将来蔓延华北、天津、北京的义和团“拳坛”的前身。此时此刻，山东农村只有“场”没有“坛”，但“坛”的一切仪式都已在“场”中预演。

“场”无所不在。在村庄的空地上，在庙宇里，在绅士们的大宅院中。通常每村设一“场”，若是碰巧本村没设场子，不要紧，你只要想学神拳，哪一个拳场都欢迎你。

每个拳场有首领主副二人：大师兄和二师兄。师兄全部出自同一师傅。但师傅与徒弟之间却没有很强烈的关系纽带。原因很简单：神拳太容易学习，学成之后就都能被神仙附体。既然已经都是神仙了，那师傅和徒弟还有什么区别——谁服谁呀！

这真好玩儿。庄里的年轻人听见别庄有练神拳的就跑去看热闹。看了，便被影响，常常拉着一个或更多身怀武艺的师傅到自己村里帮助设立拳场。一位前拳民这样回忆建立拳场的情况：

我和谢殿元、谢元修、谢恩俭、谢德常一块参加神拳。那时，谢德元在外面扛活回来。说：“玩神拳净好事。”我

说净好事，咱就干吧。我们就干了。干了三四个月左右，人就多了。那时我才十八岁。<sup>①</sup>

看来，加入神拳组织的都是年轻人。后来的史料也证实：他们大约二十岁左右，口述调查资料称他们是“孩子，有的只有十二三岁，不过最常见的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平县甚至有个“娃娃队”。当然，全部为男性，有纪律，禁止与女人同床，甚至多看两眼也不行。妇女有“阴气”，会冲了拳民躲枪避炮的能力。至于后来有了“红灯照”，那是运动爆发以后的事情。

现在，庙会中增加了一项内容：神拳拳民到庙会去演拳。神拳的创造性就在于：在庙会戏曲中的诸神，不断地添加进神拳降神附体的仪式里，直到神拳中的神祇无所不包，你再也分不清它是戏剧、杂耍，或者它真是什么拳术。

基督教或天主教也常利用集市和庙会来吸引观众，劝人人教。庙会是神拳和这些外来的洋教较量“神力”的地方。冀州的一位传教士曾纪录一八九九年七月在当地的一次庙会上，义和拳赶走布道的基督徒们，然后占据戏台，连续三天向“十分拥挤的人群”宣传“神拳比洋教更神”。

庙会常常吸引很多路途遥远的人前来参加，神拳则通过他们，把他们的“神道”散布到更远的地方。如果受到影响的人是生活在它村的姻亲，那么，神拳的传播便有了缘分：

高唐女人姓吴，来大刘生嫁给刘维领。他兄弟常来探



亲，宣称义和拳能治病、行好、练拳看家，庄上人遂信义和拳。马昭林设场子。<sup>⑤</sup>

神拳的组织是“场”。从所有现象来看，各个拳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组织联系。但领袖人物是存在的。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被所有拳场承认身怀绝技。这不奇怪。所谓农民运动，开始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没有等级与权威，表现出朴素的平等主义。而一旦成了气候，那结果，你肯定知道——无非是另一个皇帝或者“山大王”。

### 3. 杠子李庄的战斗<sup>⑥</sup>

一八九九年秋，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神拳终于形成了气候，被历史推上前台。

事件的起因微不足道。山东省平原县城正南约十公里的地方，有个村庄叫杠子李。实际上，杠子李庄是两个相连的村，分成前杠子李和后杠子李，隔开两村的是一片不能耕种的盐碱地。

前杠子李庄有四十户人家，神拳首领李长水生在此村。该村又有西李、杨家和东李之分。李长水是西李人。

东李有一个天主教徒，叫李金榜。跟李长水一样，李金榜也有七八十亩地，雇佣着一个长工，经营着一个酒店。

二李之间如何结下深仇大恨，历史学家认为是个谜。但看来是“道不同”。李金榜是个天主教徒，这使得他陷入孤立：他跟村里其他人“不能同井饮水”。多年来，李金榜忍

了：不让喝水，他喝酒。但忍到一八九九年，对方不允许他这样忍下去了。练了神拳，有了神通，李长水如虎添翼。他决定拔掉这个眼中钉。

九月十七日，李长水招来一帮子神拳拳民，洗劫了李金榜的家。洗劫，这是什么意思？语焉不详。在我们的史书中，遇到杀传教士和教民的时候，他们总是该杀的。确有该杀理由时，史书详尽记载，反之，便只有一个抽象的词儿。李金榜的全家被洗劫了。那意思是说他被杀了？全家都被杀了？他的财富被抢了？全家的财富都抢光了？细节和过程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从此，李金榜这个名字再也没在史书中露过面。

当时，平原县的县官叫蒋楷。有了命案，他派衙役去抓捕案犯。但神拳拳民有诸神附体，觉得再也不必害怕什么官府。他们可能耍了几套神拳，不知是让关云长还是张飞“附神”在身，总之，“差役被拳民们吓跑了”。

县官的属下只有差役，没有士兵。蒋楷给巡抚（省长）打了求援报告。但毓贤巡抚认为他“小题大作”，置之不理。

五天后，有一支骑兵路过平原县，蒋楷请他们停留了一下。派一个叫陈德和的人领着骑兵进了村，逮捕了六人。

李长水逃了。从他家和其他神拳拳民家里搜查出洗劫的财物，归还教民。

蒋楷县长发布了一个“严厉而公正”的告示，禁止拳民设立拳场，期望乱子就此平息。然后，骑兵们拿着赏钱回省城了。

如果没有神拳，这事情就完了。李长水人还在，心不

死。他逃到茌平，请求朱红灯援助。朱红灯似乎觉得：时机到了。他进行了精心策划，决定举事。

一种被称为“揭帖”也叫做“按揭”的东西诞生了。它其实就是“小字报”，或长或短，一种宣传品，是聚首举事的通知，或者斗争口号，贴在电杆上，村舍墙上，好像古代的“飞鸽传书”。此时，揭帖的水平不高，因为尚少文化人的加入。但以后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是怎样在揭帖中会聚张扬。

这确是一种创造。朱红灯随着李长水来到平原县，只带着他手下的十个人。但到达时发现，几百名神拳拳民已经驻扎在杠子李庄周围的田野里。揭帖发挥了作用。

神拳拳民强迫教民供应吃喝，并抓住两个教民作为释放六个被捕拳民的人质。朱红灯提出要求，把衙役陈德和交给神拳处置。神拳组织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公开挑战。

蒋楷县长率领几十个兵勇来了。一帮子乌合之众而已。擒贼先擒王。把他们的头头抓了，事情便完了。轿子抬着，官服穿着，县长大人在兵勇的护卫下，前来抓捕朱红灯。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接待”。

朱红灯出现了。真像戏台上的演员：身着红袍，头戴红帽，迈着台步。数百名神拳拳民簇拥着他，有各种色彩的旗帜在头顶飘扬。还有人记得：有两面旗上写着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的名字，还有两面各书着“天下义和拳”和“兴清灭洋”。显然，梨园屯的义和拳称号和口号被神拳借用了。但朱红灯的义和拳决不是赵三多的义和拳，它是神拳。

瞧，上法了。神拳拳民队伍里有一些和尚和道士，带

领着拳民们向东南方向鞠躬，然后各自选中自己要附体的神祇，耍出戏台上的动作。蒋楷和他带来的兵勇们都惊呆了。有几个兵勇冲了过来，但显然很害怕这些神仙。一个神拳拳民张开大口，摆出捋髯的动作，挺着一根红缨枪，冲着一个兵勇哇哇吼叫。看来，他是长坂坡前吓退曹操十万兵的张飞张翼德。那个兵勇真给吓坏了，听得他的吼叫，掉头就逃。神拳大显神通，战斗颇为顺手。最后，两个勾着脸谱的神拳拳民，举着钢刀，摇着台步，上前砍倒了县令的旗手，并把官兵的旗子缴获了。根据当地传说：蒋楷吓得脸色苍白，转头问他的属下陈德和：“你，你说，骑马和乘轿哪个更快？”

陈德和说：“骑马快。”

蒋楷急忙道：“那，那就快备马！”

陈德和于是把县长放到一匹马上。蒋楷逃走了。

这是神拳第一次胜利，也是它的最后胜利。它被大书特书在“义和团运动史”上。

朱红灯和他的神拳占领了杠子李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似乎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们洗劫了所有的教民家庭。神拳是神仙。神仙也要吃饭。“他们抢东西吃是因为他们没东西可吃。”

蒋楷县长再次向上司求援。他相信，只有军事援助才能平息动乱。但他吃不准，那位坐镇济南的巡抚毓贤，是否会像过去一样，对他的求援置之不理。

## 4. 毓贤的心事

在义和团运动史上，山东巡抚毓贤是争议最大的官员。赞之者称其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清朝大吏，贬之者称其为“清季酷吏，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

读过《老残游记》的人对毓贤当不会陌生。小说中那个愚昧无知、行事刻毒、头脑顽固的“清官”玉贤，正是历史上的毓贤。

他是个“能吏”。起初，毓贤署理山东曹州。曹州多盗，毓贤说：“这没什么难办的！”办法是：命令木工制造四个大木笼，高及人肩，抓住偷东西的人，就把他装进笼子里，用木枷套锁住脖子。木笼底部放着砖头，人踏其上，砖头却一块一块地抽出去。身体不好的小偷，半天时间便气息奄奄，就是身体强壮的，支撑一日一夜，亦必死无疑。但无论活的还是死的，都陈列在知府衙门口，是毓贤治盗的成就，也是杀鸡给猴看的展览。展期只一日，第二天，又会有新人入笼。

史料载<sup>①</sup>，一天，一位外省文人过境曹州府。刚到边界地带，便见人们奔走相告，个个嚷着：“快走呀，去看毓屠户捕盗。”那文人随而观之，到一旅馆，见十多个卫兵已搜查完毕，抓到了十几个面黄肌瘦的人，捆着、牵着，过去了。他听到旁边有人叹息：“唉，这十几个人哪，过不了今天夜里，都得进鬼门关啦！”那文人听之骇然。心想，给强盗定罪，权在省抚，不在州县，往返也得数日，谁有那么

大本事，一昼夜就能杀掉这么多人？而且，其间或有冤屈者，上诉了，另地另堂审讯，更要延搁时日。然而，他听众人都这样说，便决定去瞅个究竟。

到了知府衙门，就见毓贤大人高坐堂皇，把人带上来，略问姓名履历，便厉声喝道：“站！”站者，立人木笼之简称也。

但听说只有四个大笼子，有人满之患。那文人想，其余的人殆可得候补资格，苟延残喘啦。不料，他发现二门内还排列着六只木笼，适符全数。于是十人之性，一日之间全部断送。

那文人不忍再视，当即阑珊归寓。

第二天，他又去观看，只见累累尸体好像死猫死犬一般，被横拖倒曳而出。听旁边的人说，就要投入深谷。但尚有一两个人还在木笼中呻吟，旁观众人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家伙，真好身手也！”

文人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按照法律，州县衙门治盗，必须详禀上级官员，得到批复后，才能决定如何处置。就是在严打期间，有‘就地正法、便宜行事’的朝旨，那说的也是巡抚衙门，府、县是不能擅自主张的。我真不明白，这个叫毓贤的怎么就有这么大的特权？”

他的朋友说：“这就是毓屠户的创造了。什么叫‘正法’？斩绞之刑，才叫做‘正法’，必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毓贤只是让人站在笼子里面，并不是判人死刑，这当然可以不必请命啦。至于你‘站’死了，这叫做‘格杀勿论’。去年，此地有强盗劫抢了官府饷银数万两，朝廷震怒，特谕州、县治盗，‘格杀勿论’。而毓贤呢，却讨到了更大的

特权。他以严酷著称，简授曹州时，陛见太后，自请便宜行事，务使盗风尽绝。所以，他设了这个‘站笼’的刑罚，乃奉朝旨特许。这也符合咱祖先的礼法呀，如《周礼》上就说：‘刑乱，国用重典’。”

那文人骇然道：“就算是这样，所捕之人是否真盗，难道可以不审问吗？把路过此地的途人，抓起来就弄进笼子里，这也太耸人听闻了吧！”

朋友说：“呀，这就不是我敢知道的道理啦，请你去问毓贤大人吧。”

又过一天，这位文人到一富人家做客，正遇到毓贤也在那里，便问及治盗之事。毓贤岸然道：“我到任刚刚两月，在我的笼子里站过的强盗，已经有三百七十多人啦。可是，盗风仍未绝迹，这山东人真是强悍呀！”

后来听说，毓贤又杀了一千多“强盗”，于是暴民骤起，互相呼唤着，要围署戕官。幸亏毓贤跑得快，才逃得一死。但毓贤以能尽法惩治，蒙太后特达之知，不逾三年，荐升巡抚。

这正是平原县长蒋楷的不解处：山东既然多盗，毓贤又好杀无厌，为什么神拳闹事，一样的劫掠杀人，比一般的强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三番五次请求派兵清剿，毓贤却置之不理呢？在蒋楷看来，神拳初起，设场练拳，初不甚盛，且畏官府，不敢公然有所作为。正是毓贤的客观放纵，使神拳的领导人认为，仇杀教士教民是官府默许的正当行为，于是踪迹渐肆，徒党渐众，终至于难以收拾。

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不解处。忽然发现一则史料，是前任巡抚李秉衡卸任前对毓贤说的一段话：“我就要去了，今

后的山东巡抚便是你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我未竟的事业。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想和西方决裂开衅，这也是颇具苦心呀！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希望你好自为之，我已经把你密保于上矣。”于是李秉衡去职，毓贤成了山东巡抚，一循秉衡旧志，一意仇洋，就好像萧规曹随，一点儿不走样。

从这样的史料出发，毓贤是一个坚定的仇洋爱国志士，并有他后来的那句名言为证：“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为鉴帅（李秉衡），其一即我是也！”

然而，再有理想的官员，也得秉承朝廷的谕旨行事，否则，他连一天的官也当不下去，因此，毓贤的行为当有另外的解说。对此，《一士随笔》是这样批评的：

毓贤官居山东曹州知府时，大著酷吏之名。然而，他勤政务，励操守，也确实有了居官的声誉，于是李秉衡才大力推荐他，使他成了封疆大吏。但后来他在山西屠杀外侨，惨无人理。不过，毓贤的仇外，实在是秉承朝旨，所谓愤怒外国洋教士欺侮中国，不过是他的说法罢了。他其实就是这样成了一个杀人屠夫的。他干的事情，荒谬绝伦，但他的用心却不无可以理解的地方。从根本上说，是不学无术害了他呀！

这一段话，多言毓贤后来巡抚山西的事情，但“秉承朝旨”四字，却是他行事的根本。在他巡抚山东期间，我们其实找不到他慷慨激昂反对洋教、支持神拳的事迹，有的，只是像蒋楷县长感觉到的：对镇压神拳的动乱没什么



劲头，对反对洋教也没什么公开的说法。据说，他曾微服私访，到神拳展艺的庙会上观看过神拳的“神通”。他留下了什么印象？由是便觉得神拳可恃，是把洋鬼子赶出中国的伟大力量吗？我们实在没有切实的证据。

是的，这就是神拳起事时的山东巡抚毓贤：他并没有自作主张，他并不敢让山东被神拳搞乱，他就是真的恨洋人，没有朝廷旨意，也不敢公开亮出反洋的旗帜。但他确实感到了点什么来自中央政府的隐隐然“王顾左右而言它”的东西：

——十月九日，朱红灯亮出旗帜，仇教反洋，平原县长蒋楷擅作主张，借兵“剿拳”，大败而归。十一月三日，朝廷竟然下旨申斥：“以山东平原民教构仇，知县纵兵扰民，办理乖谬，命毓贤查办。”

——十一月十一日，因神拳大闹平原县，杀害教民，已有蔓延之势，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照会外交部（总署），要求速平山东神拳动乱。对这一照会，毓贤没听到朝廷有什么回答。相反，两天后，他听到已被罢官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被任命为巡阅中国长江水师的钦差大臣！

喔，不得了，不得了！他知道，中央政府内部“出了问题”。如此不明不白却又好像十分明白的谕旨，你要地方官员怎么办？

只有“似办非办”。

当中国官员遇到棘手的事情时，这四个字常常是他们的灵丹妙药。朱红灯的神拳已经掀起了动乱，如果乱子闹得再大起来，中央要打他的屁股，因此，必须办。但办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县长蒋楷借兵剿拳，被传旨申斥。自

己也去剿拳，弄不好，不也一样挨板子！是的，要办，但自己不能去办。要别人去办，办好了，成绩是自己的，办坏了，板子不会打到自己的屁股上！就是这个主意。于是，毓贤一声令下，唤来省城的带兵营官袁世敦，让他率兵开往杠子李庄，但要“相机行事，不可孟浪”。他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 5. 义和团的诞生

袁世敦是袁世凯的兄长。在义和团运动史上，他被称为镇压朱红灯神拳的凶手。但检索史料，他并没有“孟浪行事”。

十月十五日，袁世敦的部队经过急行军到达平原县。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立即拘留陈德和”。这是朱红灯所要求的。满足了对方这个要求，应该就有了和平解决事端的希望。然后，袁世敦翻阅了当地有关各种教案档案，找到一些在平原县长期供职的官吏，进行细致协商。最后一致通过一个决议：谈判解决朱红灯拳案。

他发现朱红灯的派头很大。他派去的是县里的一名干部，叫卢昌诒。朱红灯似乎认为与这样一个低级官员谈判，有失他的身份。他只派出一个中间人，去与官府周旋。官府先派人进入杠子李庄，贴出《禁拳令》，但立刻被撕掉了。再派了一个探子去侦察，又被朱红灯捉住，关押起来。

十七日，谈判的时间到了。根据安排，卢昌诒赶到官军和朱红灯的队伍之间的村庄，会晤那个中间人。然而，当

他最后见到中间人的时候，发现朱红灯和拳民们已经离开杠子李庄。他继续前进到村里，发现那里曾经有过森严的防卫，一尊洋式大炮还支架在村口，一堆灰烬尚有余热。但朱红灯们已不见踪影。

看来，没人渴望战斗。此前，杠子李庄的绅士们请求朱红灯离开，以免整个村庄生灵涂炭。朱红灯看到官军势大，心里明白所谓神拳的法力不过是唬人的玩意儿，落得给个人情。

袁世敦看到这结局，觉得很好很好。他释放了平原县令捕获的、朱红灯要求释放的六个神拳拳民，尽管他们都承认参加过抢劫教民的活动。

他进行了这么多妥协努力，觉得朱红灯应该给个面子啦。

他错了。朱红灯已经有了新的理想追求和新的战斗部署。

朱红灯和他的拳民们并没有走远。离开杠子李庄后，他们径直向西北方向挺进，走到马夹河东岸，在森罗殿停下来。

森罗殿是一座气象庄严的神殿，座落于马夹河坝，高出周围地面五米多。站在庙顶，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平原县城墙。朱红灯看中了这座神殿。那宏伟的建筑规模，使他想到所谓皇宫也不过如此吧。当然，也可能是神殿的战略价值吸引了他。他要在这里摆开他的战场，成为他发展的基地。

现在，已经有一千五百名神拳拳民簇拥在他的周围了。一千五百人集结在森罗殿上，他一声令下，伴着震天价的

一声“是”，无不凛遵，这使他有些飘飘然。他觉得他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和自己的队伍了，使之与自己心中的理想相符。

袁世敦得到信息，朱红灯根本没有解散神拳，相反在森罗殿扩大了队伍，扎下了营盘。而且，竟有一千五百人之众！就凭这人数，就是动乱扰民的根源。于是，他先派出平原县官吏，去劝说拳民解散。毫无结果。历史学家分析：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敢到达森罗殿。

没办法。袁世敦只好带领二十名骑兵和一队步兵，约有四百人，出发了。一名探报先行，去告诉朱红灯：袁世敦正接近森罗殿。他希望朱红灯被吓跑。

但结果却是战斗——对袁世敦和朱红灯来说，那都是最后的战斗。

谁先开火的？无从查考。实际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敦看到了一面新的旗帜，上面书写着：义和团！

义和团！千呼万唤的名字，现在终于出现了。不是“梅花拳”，不是“义和拳”，也不是“神拳”。确确实实的是：“义和团”！

这是义和团三字在义和团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亮相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史家认为：正是森罗殿战斗标志着“义和团”一词的首次出现。但确也有似乎不同的证据：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口述调查中，平原县的多数被调查者说“拳民们”还是自称“义和拳”而不是“义和团”。他们认为——哦，那个清朝的官员叫什么——袁世敦肯定是看走了眼。只有一个被调查者明确地说，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就被称作“义和团”。也许，更重要的证据是当时一个

生员的请愿书，其父在战斗中被杀。他把战斗称为官军和“团民”之间的战斗。而就在森罗殿战斗之后，教民们开始收到“绿林义和团”的威胁性传单。

问题是：朱红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队伍改称为义和团。

他是这样想的吗：“神拳”使自己的组织很像被官府禁止的习武秘密宗教，而“义和团”就不一样了，它看上去与官府禁止的绝然不同。它更像正统的乡村自卫组织，是“扶清灭洋”的正式的队伍。

他是这样感觉的吗：有一千五百人簇拥在身边，很有点浩浩荡荡的样子。这是一个军团，不再是神拳的几个毫无关联的“拳场”。“团”，这多有气派，做一个军团的头头多有派头！

仿佛要证实他内心的想法，出现在官兵面前的朱红灯也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他出场的时候，被人用精制的轿子抬着。是红色的轿子，上面写着“义和团”。他似乎走出了轿子，亮了相。让当官的人们瞅瞅，他，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在不再普通。以前，认识他的人说他是一个麻脸矮子，或者无能之辈。而从这一次亮相后，后来的回忆者对他有了截然不同的描述。

“朱红灯是个官人。”一个被调查者这样回忆。难道他穿上了官服吗？

“朱红灯是一个种地的文秀才。”另一个目击森罗殿战斗的人说。这形象也和他的本相大不相同。看来也是衣服起了作用。

总之，在森罗殿战斗中，许多目睹到朱红灯面貌的人，都留下了一种印象：他全身穿红，很像一个“大人物”！

他真的是以大人物自居的。在进攻教民家庭之前，朱红灯开始以官文形式发布公告，例如：“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九月初七前来此地。不遵旨者一律砍头。”看来，他不仅认为自己的官很大很大，而且简直就是皇帝，他说出的话叫做“旨”，别人听到他的话必须“遵旨”。

而且，已经有知识分子开始为他“述旨”了，否则，下面的“口信”，凭他肚子里那点墨水，写不出来。当袁世敦的军队朝着森罗殿开进时，朱红灯派人迎了上去，并带上这样的“口信”：“我去杠子李庄，为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

无怪乎袁世敦把这个“口信”看作是朱红灯下达的“战书”。

总之，义和团的正式称谓，伴随着朱红灯的新形象一同诞生了。

那个和它很相似的“义和拳”并不是“义和团”之父。那个与它名异实归的“神拳”才是“义和团”的母胎。历史总是这样七弯八拐、扭扭曲曲，与教科书上指给我们的康庄大道大异其径。

它还会再扭曲下去。

## 6. 红灯灭了

森罗殿战斗是朱红灯的义和团与官军的第一次战斗，也是最后一次战斗。战斗的过程很像义和团运动蔓延后的所有战斗的首次预演。

他们的武器只有大刀、长矛、原始猎枪，还有两门老式土炮。

他们怀着刀枪不入的信念冲锋陷阵。信念破裂时，死亡来临。

官军只带来单发步枪，一次射击后来不及再装弹，神魔附体的义和团员便攻了过来。袁世敦的士兵有三人被砍死，十人受伤，还有人在仓皇撤退中落马。

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官兵喘了口气，重整人马，开始反击。根据官方记载，义和团方面死亡二十人。剩下的一千几百人立刻作鸟兽散。

朱红灯跑了，跑时，还是坐着轿子。这场景与我们今后要遇到的场面也很相似：在所有义和团参加的战斗中，主要领导人没一个死在战场上。

失魂落魄，朱红灯坐在轿子里，朝家乡茌平的方向逃跑。义和团员们多数都往家跑。既然没有一个刀枪不入的身体，干嘛还等着挨枪子儿。朱红灯的周围还有一些拳民，但已经屈指可数了。

快到家了。跑到茌平和长清边界附近的鄂城，却碰到了心诚和尚。这个据说法力最为高强的和尚没有参加森罗殿战斗。与和尚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神拳头领于清水。朱红灯似乎定住了神儿。他在鄂城停留下来。可能讨论了一下今后怎么办。看来没什么办法。他们停止了活动。

渐渐地，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他们似乎刚刚发现：官府根本没来追捕他们！

忽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先后围剿过他们的两个官员——蒋楷和袁世敦都被朝廷罢了官！

变天了！太阳出来了！谁有这么大本事，能够扭转乾坤？

啊，是毓贤大人。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是：毓贤大人的一句话，就把狗日的蒋楷和袁世敦给罢了！这毓大人肯定不仅仅是咱山东的巡抚，还是朝廷的丞相。只有丞相才有这么大的权力呀！从此，毓贤在朱红灯的义和团那里，有了一个另外的称呼：毓中丞。

阴差阳错。一切都是误解。森罗殿战斗后有个朝廷御史上了一道弹章，说山东的民教冲突处理不善，弄得刀兵相见，必须追查责任。毓贤早有准备，立刻把蒋楷和袁世敦卖了出去，说他早向他们反复指出，办事时要分清谁是土匪，谁是良民，而他们未能执行他的“不可孟浪行事”的指示。于是，森罗殿战斗后仅仅过了一个月，十一月二十日，朝廷下了罢官的谕旨：

以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

但仅过一天，二十一日，朝廷的第二道谕旨又到了山东：

以山东各属，时有匪徒藉仇教为名，聚众煽惑，屡酿巨案，命巡抚毓贤体察情形，密饬地方文武，加意抚绥弹压。

从来最容易被捕风捉影的消息所操纵的平民百姓，哪



里懂得高层政治内幕。他们不会明白蒋楷和袁世敦是如何成了毓贤的代罪羔羊，也不会听到朝廷对毓贤巡抚的“密饬”。朱红灯们看到，竟是毓贤大人给他们报了蒋楷和袁世敦的一箭之仇，不被谣言冲昏了头脑才怪。他们觉得，既有“毓中丞”的支持，他们可以放手干下去了。

可能，不少史料中记载的那面“毓”字黄旗，就是朱红灯们在这时张扬开来的。他们的义和团旗为红色，“毓”字旗竟为黄色——皇室独有的色彩，看来，竟是把毓贤奉为他们的皇帝了。

这一次，有两面旗帜导引着，一面义和团旗，一面“毓”字旗，朱红灯们真的大干起来。但已经不再是战斗，而是一律的抢劫和杀人。

像以往一样，许多史家仔细寻找传教士和教民们该杀的原因，这一次，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史家把义和团连续一个多月的行动列出了统计表，发现，被杀被抢的，都是无辜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不，还有许多平民！

——最早遭到抢劫、烧毁的，是此前他们的偷生地鄂城。所有的教民都被杀。杀人过程中，也杀死了一名不是教徒的看门人。据说：他是义和团暴力活动中第一个遇难的平民。

——接着，义和团南进长清，西进茌平南部，抓住并杀死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义和团运动中第一个天主教死难者。

——之后，他们西进博平，在那里对教徒进行偷窃、敲诈、绑架和纵火。四个村庄的二十二名教徒被抢劫。

——又过几天，路过茌平城北的张庄，烧毁了大半

村庄，打死两个、打伤三个教徒。有人看到，焚烧张庄时，他们扛着大旗，身穿绸缎，像是演戏一样。

在义和团对一些村庄烧杀抢掠的过程中，一些有教堂的村庄不得不进行自卫。一份资料说：“我们立即进入帐篷，美国国旗迎风招展，在我们周围聚集了一支很强的教民力量作警卫。我们借来土枪。购买了很多炸药，准备应付突然而至的紧急情况。”武城、鄂城和平阴的天主教传教团都用现代化的连发步枪武装起来。

这似乎是义和团抢劫烧杀平民及其村庄的开始。义和团说自己造反是为了反洋教。但洋教武装起来后，他们似乎觉得不值得舍命反洋，于是转向平民。

有一个数字可以证实：在教民武装起来以前，义和团牵涉平民百姓的案子每十天不足一起。之后，进攻一般百姓的暴力活动剧增，平民案子平均每天就一起多。

有人辩护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义和团不得不掠及平民，他们的队伍太大了，没吃少穿的，你不让他们掳掠又能怎么办呢？”

真是这样吗？再看一位历史学家统计的数字：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朱红灯的义和团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这是因为缺吃少穿，还是人的恶劣的贪婪本性忽然复活了？

要证实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朱红灯们的最后日子。他们决定分赃。看来是抢够了，或者，抢不下去了。各村都有了自己的武装。抢东西的目的是为了回家过好日子，他们可不愿意战死他乡。

这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发生的事情，在博平县华岩寺的一个宰猪场里。那天有集，义和团民们抢劫了附

近的小张庄。然后，他们就到了那家宰猪场，忽然“因分赃问题陷入一片争吵之中”。看来，朱红灯、心诚和尚和于清水三位义和团首领都参加了争吵，并且“闹崩了”。

“吵了多半晌儿，就干起来了。朱红灯在扭打中头部受伤。一些神拳还要杀他。吓得他就钻到轿子里去了。”

有几则史料说，那次争吵发生在朱红灯手下的“左哨”和“右哨”之间。“右哨”负责保卫朱红灯，但却比“左哨”人少。

然后，这位创立了神拳、创造了刀枪不入的神话，并给义和团以名副其实起源的朱红灯，一个人“独自南行”。在一片农作物的掩护下，他脱下了他的义和团“官服”，还化了妆。现在，他不再希望任何人认识他。

但仅仅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五里庄，当朱红灯穿着农装、挎着粪筐，试图穿过田野逃跑的时候，一个义和团员认出了他。义和团的首领被义和团员抓了起来，交给了官府。

又三天，心诚和尚在睡觉时被抓。

于清水手下仍有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但他也犯了错误。他从几个富裕的非教民那儿抢劫了钱、棉、牲畜和大车，那些被抢的人中有两个是士绅。义和团员似乎更听绅士的话，转而反对于清水，把他交给了官府。

至此，三个主要的山东义和团首领全部被捕。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被押往省城济南，当日即被处死。

【注 释】

- ① 也有史家考证说，他的名字曾经叫朱逢明。
- ②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P. 135—136。转引自（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P. 154—191。以下所征引史料，除特别注明外，均转引自此书，兹不再逐一注明转引处。
- ③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P. 191—192。
- ④ 陆景琪《山东、茌平、平原一带义和团调查记》，P. 4。
- ⑤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P. 93。
- ⑥ 以下所述主体事件，据如下三种史料综述：①《山东义和团案卷》中平原县令蒋楷的禀报和山东巡抚毓贤的批复；②《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③《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原稿》。
- ⑦ 本节巡抚毓贤的事迹，见许指严《十叶野闻》。

## 第六章 验 神

### 1. 袁世凯抚鲁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朝政府发出一道十分简短的谕令：“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这一天，是朝廷将山东平原县长蒋楷和营官袁世敦革职的第十五天，正值朱红灯的义和团大肆烧杀抢掠最为猖狂的时期。西方各国向清政府纷纷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保护正在中国传教和开展慈善事业的传教士及其中国教民。

到山东之前，袁世凯被朝廷招到北京。他被赏赐“在西苑门骑马”。为此，他感到脸上很有光彩。但那代价是：他得带着他那七千名小站士兵，离开天津到山东去。那里发生了动乱，需要他去处理一下，就是说：去玩儿命。

众所周知，这是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我们从史书上看到，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因此才被慈禧太后升了官。实际上，政变发生后，袁世凯根本没离开过天津小站，在

那里，他继续操练他的新军，没得到任何可能升官的暗示。

现在，他的好运气似乎到了。山东巡抚，封疆大吏，一个很风光的官衔。但在“巡抚”前面，有个“署”字，那意思是“暂时代理”。毓贤并没有被免职，袁世凯咬到嘴的是块随时可能被拿走的肥肉。

七千兵马，一色的西洋装备，洋枪、洋炮、洋教练，浩浩荡荡，一路向北，直指山东。在以荣禄为首脑的北洋五军中，袁世凯创立和指挥的这支武卫右军，人数最少，武器最精，战斗力最强。以这样的武装去平息朱红灯的义和团动乱，举手之劳而已。

但袁世凯坐着轿子，却好像正坐在火炉上，心中翻滚着阵阵烦恼。袁世凯的幕僚们这样记载他此时面临的局势：“扑朔迷离，无所适从。”

按照他从政的经验，山东正在动乱，朝廷调兵赴鲁，明摆着是个“剿”字。但他得到的一系列内部信息，使他无法作如是想。

首先便是中央对毓贤的态度。山东大乱，巡抚首责。朝廷似乎也有处分毓贤的意思。此前一个月，十一月二十八日，朱红灯最猖狂的时候，朝廷确有批评毓贤的谕旨：山东大乱，“纯系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措辞不可谓不严厉。然而，这是在美国公使康格代表西方各国，第五次正式照会，要求速平山东拳乱，撤换巡抚毓贤以后，中国政府的最后表态。结果是：“命毓贤来京陛见”，而一个外省官员的所谓“陛见”，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实在是“皇上召见、

官员述职”。因此，袁世凯听到的消息是：毓贤不仅不会被撤职，而且还会提升！对官场信息的判断，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可是错不得。

更让人迷惑的是，朝廷给袁世凯下达的一系列指示。信息不明，袁世凯让他的队伍慢慢行进，以得到明确的政策。他做对了。就在这期间，朝廷发给他数道谕旨。但他看得胆战心惊。

第一道谕旨：“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持平，怎样才算持平？带着七千人马，难道要他对双方进行“公平的”、“平均的”镇压？

第二道谕旨：“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这就是说，你袁世凯的心中始终要存着一个“抚”字，但也要威胁一下义和团，让他们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遇到中国人和洋教徒发生了案子，要具体分析一下再办。如果办不好，义和团们铤而走险，那就是你的大罪了！

第三道谕旨：“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什么程度的“祸”叫做“巨祸”。朱红灯们正在杀人放火，这算不算“巨祸”？

更重要的是他的兄长袁世敦带给他的“榜样”。不过执行了平息动乱的指示，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果然平息了。但结果是什么？撤职！前车之鉴呀！何况是兄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得到的教训。

忽然，特派北京的探子飞马来报。是毓贤到北京后的信息。“一到，就去拜访了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军机大臣

刚毅，说，义和团是得到神的帮助的。那些当政人物相信了毓贤的说法。听说，太后对这样的说法也很有兴趣。毓贤晋见太后时，太后赏给毓贤一个‘福’字。就为这件事情，美国公使康格向朝廷提出了抗议！”

惊人的信息！中央政府的内外政策将要发生根本变化的征兆！想到自己直到现在还在为是否镇压义和团而左右摇摆，犹疑不定，袁世凯肯定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忽然觉得，朝廷把他派到风雨飘摇的山东，简直就是对他的试探。不错，他已经是官秩二品的大员，但那是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赏给他的，现在看来，那简直就是他背着的一口黑锅。一旦再次失足，那口政治黑锅会毫不留情地扣在他头上，直到把他压死。

不能犹豫了。这义和团是剿不得的。不仅不能剿，看能不能想个办法，重用他们个把人，以为今后的邀功筹码。至于自己的兄长袁世敦，顾不得了。朝廷要自己把他驱逐回老家去。本来还想搞个折衷，把自己的兄长再次起用起来。但现在，唉，算啦，做个样子，就把他送走吧，“以息人言”——人言可畏呀！

就这样，袁世凯磨磨蹭蹭到了山东的时候，已经决定“善待义和团”。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将在一年后终结。



## 2. 炮打神仙<sup>①</sup>

终于到了济南，袁世凯坐镇省衙，已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机大臣荣禄劝说慈禧否决了废立决策，改立大阿哥，是为“己亥建储”。这一天，山东平原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已因分赃不均被同伙出卖，并被官府处死，使袁世凯为此事少伤了许多脑筋。这一天，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济南西南毛家铺被拳民杀害，英国政府的抗议书雪片般飞到中国政府——想想巨野教案的后果——而政府又扭头把“妥善处理”的旨令发给袁世凯。但袁世凯却张罗着，到哪里去请个义和团的大法师来：他要见识一下“降神附体”神功。

说来也是宿命。袁世凯文化程度不高，连个秀才也没混上过，全凭战场上拼命和为国家练兵的勤勉，才混到今天的地步。因此，他相信命运，相信符咒之说，对听说的义和团能避枪炮的神功笃信甚深。但袁世凯的另一面是：他又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没见过的事情一定要弄个明白。

袁世凯的小站军中，有个提督叫程文炳，也深信“降神附体”神功。见袁世凯有意延请符咒法师，立刻推荐了一个。

袁世凯问：“灵吗？”

程文炳为自己留了点余地：“有点灵，试验过，但是小小的一个试验，我看也就像个‘儿戏’吧，恐怕以临大敌

的时候就不管用了。”

他越这么说，袁世凯请之益坚：“好。就是他。快把他请来表演一下。如确有灵验，我一定重用他。”

法师来了，手执拂尘，长髯飘飘，果然仙风道骨的样子。

袁世凯请其上坐，询之：“大师一旦上法，果能不避枪弹？”

法师说：“自然。”

袁世凯道：“听说，那些义和团也是能上法的，何以不灵？”

法师喟然长叹：“神仙附体，谈何容易。功夫不到，自然不灵。”

袁世凯一听，更加深信不疑，便要法师当场试验。众人到了校场，程文柄早有准备。手枪摆在台上，程文柄先执。法师离开数丈，程文柄开枪射击。轰然一声，法师不闪不避，丝毫无损。众将大惊。袁世凯要众将皆试。于是纷纷开枪，“皆无伤，军中惊以为神。”

袁世凯大喜，待为上宾，问授自何人，法师以某仙佛对，并言同道数十人，散布各处，将广收门徒，准备荡灭洋人。

袁世凯道：“我中华有此神人神技，何愁洋人不灭！”

当场决定：遍延宾客，同观神技，如果始终无误，拟据实奏闻朝廷，必可恩赏官职。法师一听，亦喜跃欢腾。

于是，袁世凯普召大小文武各官，观看法师神术，据说，那一日“到者百有五十余人”。

来客中有不信神术的人，请法师立下手状，并有公证

人，“假设身死勿论”。于是程文柄找来一人，是法师的家乡，令之作保。

遂命三十人，持后膛枪向之开放。轰然一声响过，法师岸然而立，轻掸尘灰，如若无物。

诸客皆惊，叹为神仙。袁世凯喜极，忽然手痒，唤一声：“取我的洋枪来！”是一柄德国教官送他的手枪，袁世凯极为珍视。

程文柄的脸色立刻变了，趋前说道：“大师，不敢偏劳。”

袁世凯大声道：“怕什么？三十杆枪，大师尚且不惧，我这一把手枪还能伤他么？”

说着，对准法师，一枪射去，法师摇晃了一下，倒卧于地。

诸客愕然，问这是为什么。袁世凯哈哈大笑，说：“此诈耳，决无妨。”

唤来身边的人，去瞧瞧法师耍什么把戏呢。那人走向法师倒卧处，看了一眼，回来向袁世凯报告：“大师的眼睛没闭，脸上还有笑容。”

袁世凯又笑，说：“怎么样？大师开玩笑哩！”远远地喊道：“大师，请起吧！”

没动静。过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袁世凯有些不满，再呼人视之，又返报说：“口角流血啦！”

袁世凯趋步上前，命解衣验之，发现法师的胸腹处有一个洞。法师已经死啦。

所有的人都大哗。袁世凯默默无语，忽然把眼睛盯向程文柄。程文柄羞惧无地。酒宴早早地罢了。袁世凯拿出五百两银子，给了法师的那位老乡，让他为法师买口棺材，

并恤其家属。然后，他退入抚衙，整整一天没有露面。

### 3. 释疑<sup>②</sup>

深夜，袁世凯的幕僚张人骏走进袁府。白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嚷嚷得满城风雨。张人骏的家人劝说他：“这个时候你去见大帅，不是明摆着找不痛快吗？”

张人骏说：“人不能有所蔽。有所蔽则能见秋毫，不见舆薪。现在，正是我给大帅去蔽的机会到了。”

应该说说所谓幕僚是什么人。那是一批怀才而未能跻入官场的人，于是做了给当官的出主意的人。他们有点像今天的高级秘书，许多人成为当官的离不开的左右手。幕僚的生活是一种“神仙、老虎、狗”的生涯。他闲散如神仙，对主人是条狗，但对主人以外的人，就是老虎了。然而，主人特别的幕僚，即所谓“名幕”的地位却十分显赫。他们也称“幕友”，是“师大老爷”，在衙门里面自成天地，长官有事，常常移樽就教。

对袁世凯，张人骏就是这样的一位“幕友”。

史料载：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团的最后定议，实决于名幕张人骏之言。盖因为袁世凯害怕有违西太后的意思，在开始的时候有重用义和团神技的意思。后神技伎俩戳穿，袁世凯仍迟回审顾，未能即决。张人骏动以利害，始悟。非张人骏言语定计，袁世凯就危险了。

那天晚上，张人骏是这样说服袁世凯的：

张人骏：“今天的事情以后，大帅对义和团的神技定是

洞若观火了？”

袁世凯：“程文柄可恶，险些误我！”

张人骏：“然而大帅对义和团之余孽，或抚或剿，仍无定论。”

袁世凯：“人骏兄呀，你知道，这个决定十分难做。朝廷的意思模棱莫测，偶一不慎，后果不堪啊！”

张人骏：“那大帅是准备抚拳啦？”

袁世凯：“看来朝廷有这个意思。君不见我兄长的下场吗？”

张人骏：“大帅觉得朝廷的这个意思能长久吗？”

袁世凯：“我也觉得奇怪。朝廷的旨意，大逆常理。哪有国家不希望稳定的。”

张人骏：“是这样呀！朝廷无论怎样做，最后总是对的。可大帅您却一点也错不得呀！”

袁世凯（悚然色变）：“你说的是呀！可这样的时候，如何能够辨别（对错）呢？”

张人骏：“我请问大帅，您说心里话，像义和团这样的妖妄之徒，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成就过大事？”

袁世凯（沉吟良久）：“无有啊！”

张人骏：“您说得对。如果您觉得这样的民众能成事，您当然应该善待他们。如果您觉得这帮子人一定会失败，就应该早拿主意，早定大计，不能被他们牵连而毁掉了您自己的前途呀！”

袁世凯：“然则倘若朝廷怪罪下来，却又如何？”

张人骏：“谋定以后，行且坚毅。这是大帅您一贯的作风。至于如何行动方为上策，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古人明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袁世凯（再次沉吟良久，忽然深深一揖）：“听君一席话，解我心中疑。我明白该怎么做啦！”

#### 4. 义和团没了<sup>③</sup>

第二天，袁世凯把程文柄找来，要他再去请几位义和团的大师兄来。程文柄吓坏了，说：“大帅，昨天的事情是我一时糊涂呀！”袁世凯说：“我自然明白，不罪你。不过，这一次，我希望使用的枪弹都是真的。”

此时的山东义和团，朱红灯已死，群龙无首，已经又倒退到村自为战的形势。几个义和团首领，拿着袁世凯给他们的请柬，雄纠纠、气昂昂的来了。他们的“法术”已经连续骗过许多人，许多官。骗术骗过一千遍便成了真的。现在，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义和团确有神功，可以消灭洋人。

上法了：一个个装神弄鬼，口吐白沫。有一个“大师兄”还站在袁世凯的旁边，给他讲解，觉得骗过这个袁大头没什么问题。

突然，袁世凯问他：“你的人真能刀枪不入吗？”

大师兄一愣：“当然。神功附体后，就什么也打不死啦。”

袁世凯指着正在表演的团民道：“他们已经神功附体了吗？”

大师兄说：“是的。”

袁世凯猝然下令：“开枪！”

一枪一个，两枪两个，没有一个不入枪弹的。袁世凯

忽地站起，骂道：“骗子！妖妄之徒！乌合之众！剿杀他们！一个不留！”

这是袁世凯精心安排的一场残酷的“戏”。校场的一侧，有到山东查办卜克斯被杀案的英国公使。袁世凯的这出“戏”是专门演给他们看的。

昨天夜里，张人骏的一席话点开了他的心窍。他忽然发现，自己全错了，错得厉害。教民之争，哪里有什么是非！就是真的有是非，他，一个政府的官员，能以是非决定自己的命运吗？是的，政治没有是非，只有利害，政治家自己的利害。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前，他过去的考虑——抚拳而拒洋——可能还是对的。但就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前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了！这意味着什么？看三年前巨野教案后果就清楚了：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巡抚李秉衡被撤职。今天，英国的传教士被杀了。英国，是比德国更横的国家！只要他们对这桩教案的处理不满，就是他袁世凯的末日！是的，他错了。他不该在这么紧要的关头，还考虑什么抚拳还是剿拳。没什么选择，只有一个“剿”字！剿，则英国人满意。英国人满意，不出兵占我国土，取我权益，则所失者少（不就少了一些义和团的性命嘛，算得了什么！），所得者大，于是便是朝廷的满意。朝廷满意，袁世凯便是大大的功臣。

这当然是一局赌博——政治赌博。由于袁世凯的坚定剿杀义和团，好家伙！山东的巷尾街头，贴满了诟骂袁世凯的口号标语；京都朝廷，弹劾袁世凯的奏章如云如潮。但袁世凯是坚定的，“谋定以后，行以坚毅”，这确是他的座右铭。挨几句骂，算得了什么。他是要笑到最后的人。他

赌的是：由于他的表现，洋鬼子会帮他的忙，而朝廷会奖赏他的功劳。

袁世凯“三局两胜”。

英国人对袁世凯处理卜克斯被杀案极为满意。这不好。朝廷还以为他袁世凯拿了英国人的什么好处哩！这是输局。

但英国人因此教案，因袁世凯的妥善处理，认为，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官员处理教案，而朝廷又有剿灭义和团的决心，那么，中外关系便不会破裂。于是联络美法德意公使，一致要求朝廷速下剿灭义和团的上谕。五国逼宫，朝廷难抗。二月十九日，谕旨下：“严行禁止义和拳会，倘仍执迷不悟，即行从严承办。”这是袁世凯的大赢。他在山东的剿拳做法符合朝廷决策。

半个多月后，朝廷再次宣谕：“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不必再提心吊胆地“代理”省长了。这又是大赢。

是的，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不过三个月，山东的局势发生了彻底逆转。从此，在整个山东，正式的有组织的义和团活动突然告终。

义和团，在它的诞生地被消灭了。刀枪不入的仪式失灵了。在这神拳仪式的诞生地，从此再没人相信自己创造的神话。

事情就是这样：由于袁世凯的镇压，山东省的义和团销声匿迹了，神魔附体的仪式也成了过眼云烟。今后，复活的义和团不再是这一个义和团，复活的神魔附体仪式也不再是创造者的专利。

但没什么东西会真正死亡。死人总是抓住活人。



【注 释】

① 本节袁世凯与义和团关系方面的史事，据两种史料综合描述：①吴永《庚子西狩丛谈》；②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② 同上。

③ 同上。

## 第七章 复活

### 1. 火与火的嫁接

又是大旱。一九〇〇年，新世纪开始的头一年，太阳把华北大地烤得热浪滚滚。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检索不断轮回的农民运动，天灾，总是农民们揭杆而起的前兆。天灾生产灾民，灾民培育乱民，乱民多起来，所谓动乱便有了社会基础。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走投无路了，于是从他们的苦恼中，从他们的颓丧中，从他们的贫困中，从他们的焦灼中，从他们的绝望中，从他们的怨气中，从他们的愚昧中，从他们的黑暗中，起来反抗。那将是一个社会最阴惨的日子。

天灾与人祸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吗？表面上看，是的。

袁世凯把七千人的现代化部队带到了山东。军队的威慑有力，但天气也帮了袁世凯的大忙：直鲁交界的地方，四月初下了一场透雨。大旱得甘霖，山东的农民们——义和

团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地里的庄稼可比逃荒和闹事重要多了。农民们想都不想，本能地转过身，朝着家乡急急奔去：他们回家播种春作物。山东稳定了。

直隶（河北）没这么运气。赤日炎炎，滴水不见，一直持续到动乱的前夜。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老天爷。到一九〇〇年五月，直隶大地已经出现了义和团，眼看就要蔓延全省。但康格还是希望老天怜见（山东不就做到了嘛）——来一场大雨，让即将到来的这场血光之灾消于无形：

该省目前的情况为这样一场运动（比如义和团）提供了方便。人们穷困潦倒，到昨天为止（五月七日）近一年滴雨未落，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和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sup>①</sup>

英国公使窦纳乐和美国公使的心情一样：

我确信，几天大雨就能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它能够恢复平静，这比中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效。<sup>②</sup>

直隶省会保定的传教士们也在祈祷一场上天的雨水：

啊，上帝将送来雨水，那将使事情态在一段时间内平

静下来。<sup>③</sup>

可有人比较过早灾和水灾对中国农民的不同意味吗？

水灾来了，大堤决口了。那确是灾难。然而，人们能够加固堤坝，采取修补措施。大水后，能留下肥沃的沉积物，新插种的庄稼会更加茁壮生长。

旱灾不同：它无法预料，不可补救，难以忍受。太阳就吊在你的头顶上，熄不灭，赶不走。你只好走进神庙，祈雨等待。但不能等得太久。那令人焦虑不安。于是，一个个善良而愚昧的大脑开始问这是为什么？科学的解说保存在那些并不靠天吃饭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大脑里，农民们听不到。他们听到的只有同样愚昧的义和团带来的现成答案：传教士和他们的教民们触犯了神灵！

直隶义和团是自己的土产，还是从山东引进的特产？为辨明这一问题，义和团运动研究史家生产出上千篇论文，莫衷一是。但还是听听义和团员自己是怎么说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河北（直隶）景县第三公社十里铺，八十三岁的农民曹也安是这样回忆的：

山东义和拳在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就有了。俺这里是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春天，我十五岁，还在景州上学，从山东来的师傅，一个姓张，一个姓王。

那年黄姑庄唱大戏，看戏的人很多。外国神父要停住戏，讲讲天主教的好处，借此传教。

张老师用麻匹挎着一块大石头，约有四十斤重，上面放着水碗一个，碗中插刀一把，这时观众都围起来看，没

有听神父讲的了。神父就跑来赶张师傅走，说他是邪术。

张师傅对神父说，不用撵，只要你们给我拔下这把刀来，我自己就走。神父拔也没有拔下来，后来接上绳子，也没拉下来，这样张师傅也没走。

从那，大伙都看着张师傅有真本事，都学起义和拳来了。<sup>④</sup>

那么，这些山东来的义和团成员，给正在旱灾中挣扎的河北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答案呢？一九〇〇年初，一位传教士记录了下列义和团的揭帖，它曾被“张贴在华北的城镇和乡村”：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sup>⑤</sup>

也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河北阜城县城关公社肖村八十五岁的史张氏说：“那年讨饭的唱门，我还记得二句：‘义和团为了王，今年棒子（玉米）长得强’。”

当然，不能说天灾与人祸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地大，年年有灾，今年南涝北旱，明年南旱北涝。倘若天灾必然导致人祸，便国无宁日了。

但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不愿发生动乱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把消弭动乱的希望寄托在一场偶然的大雨上。不幸的是，天违人愿。于是，另一个偶然性发生了作用：袁

世凯镇压了山东义和团，有漏网者逃到了直隶，并把义和团的一切，播种在已被太阳烤焦的这片热土上。这片热土和山东大地紧紧相连，有同样的文化的根，有同样的对上帝的愤怒，也有同样的官场和绅士阶层。由于持续的旱灾，地火本已在地下运行，而义和团又带来了新火种。现在，似乎就等待一个持镐的人，在烧焦的大地上破土，来一次火与火的嫁接。

应该认识一下这些引火嫁接的持镐人。

在封建王朝的起点处：地火是农民的苦难，火种是秦皇的暴政，持镐人的名字叫陈胜、吴广。到封建王朝的中段：地火是农民的苦难，火种是连绵的战争，持镐人的名字叫黄巢。而现在，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夜，地火是一次旱灾、一些民教冲突，新火种是从山东被赶到直隶的所余不多的义和团员和他们的仪式与口号，而那持镐人的名字叫“中央政府”。

于是，义和团运动之火，成了天火与地火的嫁接之火。它由是成为数千年封建史上一次最为独特的农民运动。

## 2. 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二日，清朝中央政府就反教骚乱问题发布了一项重要诏令：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

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sup>⑥</sup>

诏令各省督抚，公平处理教案，“以服众心”，“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它包括下述重要指令：

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sup>⑦</sup>

不必太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不必太熟悉一个专制政府的“专制”意味着什么，只要有一点常识，便一定能懂得，清朝政府的这一举动展示出一个根本变化。

禁止私人结社。这是大清的法律。集会结社就是营私谋反。这是那法律的逻辑。这是一个刚强的逻辑。只要是专制社会，这逻辑就决不会动摇。天地会，一个清朝初年诞生的“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早已成了强弩之末，到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不过发现了一张关于它的传单，政府立刻郑重发布谕令，悬赏捉拿任何一个好像是天地会组织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一个革命党组织，更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如果那组织仅仅是反洋教的，例如，义和团运动之前，有一个叫大刀会的，是否也要取缔呢？当然。只要是结社组织，一律取缔，所有的组织成员，格杀勿论。

现在，面对义和团这样一个闹出更大乱子的团体，中

中央政府却通过谕令告诉他们：你们是合法组织！尽管，这样明确的涵意，政府并未直接出口，而要仔细体会。这究竟是为什么？

谕令的日期暴露了一切。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世纪第一年的第一个月份，北京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

按照原计划，朝廷的废立运动——废掉光绪皇帝，重新扶上一个新皇帝——在本月付诸实施。由于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和干涉，废立未能成为事实，仅仅诞生了一个接班人——载漪十六岁的儿子溥儀成为大阿哥。但西方列强对慈禧的这一重大妥协仍不买帐：各国公使拒绝参加庆贺太子的活动。皇亲国戚们的排外情绪由此高昂起来。一个仇外的政治派别在宫廷里占据了统治地位。

毓贤也在本月走进紫禁城。他的山东巡抚官职是在西方列强的强烈要求下被政府拿掉的。《清史稿·毓贤本传》载：毓贤“至则谒端王载漪，盛言拳民得神助。”简约的记载给后世的文学家以无穷想象：为了让载漪等皇亲国戚相信义和团神功，他生吞了两条活鱼，说“义和团的神功比这强多了！”于是，有义和团民被秘密招进了紫禁城。他们表演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神魔附体，以及肯定会让王公们赞叹不已的刀枪不入的神功。结果是——我们以后就会看到——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对外政策。

现在，我们且慢夸大朝廷对义和团的容忍程度。在著名的“一月十一日诏旨”颁布后不到两个星期，朝廷又诏谕“严厉查禁义和拳”。这种对义和团组织“否定——肯定



——再否定——再肯定”的过程，还将持续下去，直到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完全失控——为止。

一个犹豫不决的政策，正在导致一个政府走向坟墓。

### 3. 打架与打仗的区别

一九〇〇年五月，直隶总督裕禄向政府汇报他统辖地区的义和团情况：

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所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拜师传徒，立场设坛，聚而演习。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sup>⑧</sup>

没什么新鲜信息，只有“设坛”二字引人注目。这是山东义和团组织所没有的。山东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是在“场”上，到了河北却在“坛”前。

这很容易解释。多数山东义和团民已被袁世凯消灭或者解散，少数越过山东边境的团民忽然听说家乡普降甘霖，纷纷回家种田去了。只留下一些和尚或道士。他们是云游四方的人。他们没有家室，不必种田，却又最熟悉义和团的魔法术。他们本来便生活在神秘的宗教中。是他们改“场”为“坛”，给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染上更加神秘的色彩。从此，我们再见义和团的仪式，将很少在村庄的打

麦场上，而在无处不在的寺庙或道观里，多了招人灵魂的幡旗，多了蛊惑人心的钟磬，并有香炉的陪伴，炉内冒出袅袅香烟。

当直隶总督裕禄注意到这些细节时，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已经升级。

暴力的起因还是很小很小的事件，小得让你感到可笑。

直隶首府保定附近，有个叫大张庄的村子，一个叫张洛弟的村民，请附近蒋庄一个有补锅手艺的村民为他补一口锅。后者是个基督教徒。锅补好了，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基督徒前去索要，两人吵骂起来，并砸碎了已经修好的锅。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口破锅最多导致一场私人间的吵闹，不会弄得整个大清朝也像这口破锅一样被砸碎。

张洛弟是个义和团员。争吵中，基督教徒和义和团员互相侮辱对方是“邪教”。

第二天，基督教徒带着三十个有同样信仰的同伙，向张洛弟索要加倍补偿：摆五桌酒席、修教堂、付一百吊大钱，并要张全家入教。冲突于是升级，从口角升级为拳脚。冲突中，张家有一人被杀，三人受伤。

张氏已是有组织的人。组织就是力量。他立刻向组织进行了汇报，联络大帮义和团员，并亲自率领团众攻打蒋庄。四月二十一日，他们烧毁了蒋庄教堂和十个教民的房子。但蒋庄的教民装备精良，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二十个拳民被打死。

打架就这样变成了打仗。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位于保

定和北京之间的义和团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教民都成了被消灭的目标。其中，一个月后发生的高洛村事件性质严重。

大约三十年前，高洛村有六名秘密会社成员。村长阎洛福做了奸细，把他们报告给当局。但这些人并没有被捕。他们请求传教士保护，加入了教会，变成了教民。

教会如此势大，入教村民增多。渐渐地，高洛村分成南北两部分，教民们集中在村南。双方各生活在自己的天地，倒也相安无事。

到了一八九九年，村长阎洛福觉得，他已经有能力和那些他“瞅着就生气”的教民大干一场了。第一，他的儿子考上了生员；第二，当地地保和庙首都成了他的亲戚。

一天，阎洛福们要听戏，指挥村民把戏台扎在村南中心十字路口，正好面对着一个教民家门。这当然是挑衅。村北自有神庙，唱戏，从来都在神庙前。

唱戏那天，人们搭起帐篷，从村庙里请出众神，并把神像摆放在教民家门口的台阶上。这就不仅是挑衅，而且是公然的侮辱。众所周知，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

教民辱骂神像，踢翻了神台。

村民大打出手，洗劫了教堂。

官司打起来，保定的天主教主教出面了。最后，官府对“罪魁祸首”阎洛福作出判决：罚银二百五十两，宴请教民和他们的神父，并叩头认错。

据说，阎洛福为此流泪了。他说：“罚钱，我不怕，开几桌酒席，也没什么。向他们磕头——嘿！你们不如打死我吧！”

但最终他不得不委屈求全，并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

子。

很快便是一九〇〇年的春天，邻县来了义和团。阎洛福派人邀请来两名拳师，在村北的庙里设立了拳坛。

拳坛前的香炉冒了十天神烟，阎洛福派去学拳的村民便已能神魔附体。看来，神拳可以速成。又以大价钱请来义和团的师傅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教民得到信息，请求官府保护。五月十二日，县令带了四个衙役前来调查，马上被义和团包围起来，过一会儿，走了。

当晚，义和团烧毁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家，像割草一样杀死约三十户教民全家，并把他们的尸体扔到井里。

人命关天。杀死三十户教民全家！无论对官府还是对义和团，这不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教案。

被称为“义和团运动转折点”的涑水之战，就这样爆发了。

#### 4. 涑水之战

在义和团运动史上，阎洛福被称为“杰出的领袖”。他率领义和团洗劫了高洛村教民，该村于是成了义和团的“啸聚之区”。杀人偿命的恐惧使他们除了铤而走险别无选择。洗劫来的教民财富足以使流浪四方难有温饱的流民招之即来，把自己的身份上升为“义和团”。据粗略统计，高洛村教案发生后，阎洛福召唤来“万余名”义和团。但他并不想让自己的村庄再次成为屠场。

他把战场摆在涑水城北三十里处的石亭镇，那附近有个叫两狼沟的地方，据说地势险要，是伏击官府派来的官军的理想地点。他似乎没对义和团的神魔附体神功抱太大希望，准备了土炮和抬枪。每尊土炮有一百多斤，一米多高，炮口有饭碗粗，能打铁砂子。抬枪有一间房长，枪口有茶碗粗，一人抬着，一人放，能打一里多地。然后，他大动脑筋，从《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中，尽量想出些战略战术。

他多虑了。直隶省保定城中，能够用来维持秩序的军人，不过二百名！根本无力保护传教团。不得已，还是抽出了二十人，组成一支马队，由分统杨福同率领着，朝高洛村开来。

这支二十人的马队，就是史书上说的前来残酷镇压一万多名义和团的“刽子手”。

那天是五月二十一日，高洛村教案后第九天。杨福同率领马队朝高洛村方向奔去。走到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义和团开始对官军进行伏击战。

战斗情节耳熟能详：先是“列队应战”，交锋不久，便且战且退，“用诱敌计诱令追袭”。杨福同不知是计，亲率马队向前穷追，一直“追过村落深处”。马队一进入埋伏圈后，埋伏在两狼沟内的义和团众突然从四面腾起，刀光映日，杀声震天，顷刻之间将马队围住。

杨福同这时才知中计，大惊失色，急忙纵骑突围，无奈两狼沟一带沟道纵横，马队无法施其技。

杨福同情急，连忙喝令开枪扫射。义和团好勇敢啊，冒死冲入马队，持械猛扑，连连向杨福同刺去，顿时将他刺

得“体无完肤”。最后，一义和团员纵身向前，持长矛刺中杨福同咽喉，使他坠马丧命。其随从二人，也被击毙。

杨福同“全军覆没，兵多带伤而逃”。

这次一万多义和团对二十名官兵的战斗，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被骄傲地书写为“涑水大捷”。

## 5. 百姓放火，中央点灯

朝廷命官被戕，朝廷态度如何？

涑水之战转天，五月二十二日，一道圣旨发到直隶，特谕总督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明拿办”，然而，“倘或任意株连，波及无辜，即从严惩办。”看到这样的谕旨，只有傻子才会去拿办“拳匪”。杨福同算是白死了。

又过三天，二十五日，裕禄再次接到圣谕：“以查办拳匪，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命裕禄相机操纵，勿稍大意。”这分寸只有神仙才拿捏得恰到好处。裕禄不是神仙。他决定即不“迁就”，也不“操切”，来个“无为而治”。

一周后，六月三日，朝旨再颁。这次，是“谕荣禄”——荣禄掌管兵权——等于向国家军队宣谕：“拳民（从这一天起，‘匪’字消失）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另谕裕禄，通饬地方各州县谆切劝导，不可操切，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

这些指示不是别的，而是圣旨。什么是圣旨？当代影视中铺天盖地而来的清宫戏，那一声声被编排、被表演、被夸张得十分可笑的“圣旨下！”，已经使人们感到那“圣旨”像狗屁一样不值得重视。但在当年，在下达圣旨的人们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圣旨就是“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中的内容便是“国家政策”或者“政府决策”。

那决策再明确不过。昨天，义和团们还是“拳匪”，今天就变成了“拳民”，变成了“朝廷赤子”。按照这决策，政府官员，国家军队，该怎样对待义和团？

那政策再明确不过。不许轻伤人命，不可操切行事，不能波及无辜，不得孟浪行动。按照这政策，政府官员，国家军队，该怎样对待义和团？

只有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我们很快就会遇到他——那种纯粹的军人，那种一看到国家动乱便痛心疾首，将恢复稳定当做自己使命的人，才会认真对待那中央文件中“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这句话。他是瞎子吗？他没看到中央文件所指引的大方向吗？你什么错误都能犯，就是不能犯方向路线的错误。那是大错误。那将要了你的命！

清朝的官员不是瞎子，他们是政客。清朝的军队不是瞎子，他们是傀儡。义和团不是瞎子，他们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是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义和团民们，朝廷赤子们，按照中央确定的路线，前进吧！

整个华北大地都沸腾了。正被大旱逼迫得走投无路的穷棒子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津、京之间，并一直向北、向北，向着鼓舞他们前进的北京方向挺进。

有更多的人加入了义和团。现在，成为义和团员不再是一种罪行，而是一种光荣。加入吧，你将变得神力无穷，从此，任何洋鬼子和他们的走狗都不敢再欺负你了！加入吧，你不会再挨饿了，你将要吃到吃的东西，你不会再衣不蔽体了，你将有新衣服穿。那些我们过去痛恨的教民和他们的主子会把这一切贡献给我们。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能遇到的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全部杀死，他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能遇到的外国人——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工程师、教师、医生等等——只要能够碰到，全部杀死，他们的财物同样被洗劫一空。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的电线杆全部拔掉。因为它们姓“洋”。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的铁路全部拆毁。因为它们姓“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洋事物的命，绝对无罪，造洋鬼子的反，绝对有理。

义和团运动——这时，才能真正称为一场运动——终于开始了。一心报仇，揭竿而起，像是龙的牙齿，像是可怕的种子播种在烧焦的、赤地千里的大地，终于结出了革命性的果实，并将在不远的将来，在北京城下的田野收割。



**【注 释】**

- ① 《美国外交文书》，P. 122。转引自（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P. 326。以下所征引史料，除特别注明外，均转引自此书，兹不再逐一注明转引处。
- ② 《英国外交文书·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关于中国暴乱的通讯，P. 105。
- ③ 《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P. 9。
- ④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一九八八年版，P. 393。
- ⑤ 《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P. 9—10。
-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 56。
- ⑦ 同上。
- ⑧ 同上，P. 90。

## 第八章 神仙会

### 1. 紫禁城之谜

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开始了。到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也就是政府宣布义和团为“朝廷赤子”的那一天，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的数万义和团占领了涿州城。疆域失守，涿州长官自杀未遂，被义和团囚禁。守城士兵几乎没什么抵抗行动，听任义和团把自己的大旗飘扬在城门上空。旗帜上，“扶清灭洋”四字更加醒目。战争考验尚未到来，降神附体神功愈加传神，现在几乎人人神功盖世。揭帖，义和团的宣传品，由于知识分子的润色，把对大清朝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所有这些信息，都向着紫禁城飞去，等待着中央政府对义和团的最后裁判。众所周知，涿州，位于北京西南方，是“京师门户”，如今是电影城。

整个西方世界都震撼了。幸亏还有电报。各国驻华公使馆的电报间里整天嘀嘀哒哒，把他们的恐惧、不解、期

待和幻想传向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的事变霸占了西方报刊所有的头条新闻。这是他们的报应。长期以来，只要发生教案，他们便逼迫中国政府做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但现在，一个巨大的震撼整个北中国的教案发生了。这个教案摧枯拉朽，是百万民众的怒吼，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抗议，是要把西方所有的人和事物赶出中国的全面“灭洋”，是对整个西方说“不”！它超出了教案的范畴，成了民众的暴动，成了整个北中国的反洋运动。他们不解：一个开放了六十年的国家怎么还会对西方的新生事物如此敌视。他们恐惧：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不可理喻，等理性回到民众之中，常常是血流成河之后——不是他们的血，就是民众的血！他们期待：这已经开始但尚未成为政府决策的运动能够及时中止。

传教士们，来华工作的工程师们，开办慈善事业的西方慈善家们，还有已经成了中国朝廷官员的洋大人们，纷纷跑进驻华大使馆。那是他们的祖国在中国的飞地，是受国际公法保护的地方，是他们唯一的安全地带。但真的安全吗？公使大人们对此毫无把握。在愤怒的毫无理性的民众面前，国际公法难道不是一张废纸吗？请求中国政府保护，这好吗？不错，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不是民众的头羊，义和团的口号还不是朝廷的口号，但谁能说的清楚：也许就在明天，政府会把那口号接过来，让全面的“反洋”成为国家决策！不行，不能依靠中国政府的保护。恐怖的羊群怎能请狼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希望是存在的。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这场因教案引起的运动会导致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全面抗衡。中国很

大，但很弱。不过四年前，一个小小的日本便把她打得一败涂地。中国的决策者，除非发疯，会发动一场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的战争！然而，谁能保证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只有一个人，就是大清朝的实际主宰慈禧太后。那就尽快行动，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扼杀在这个老女人的头脑里。现在还不晚，那个疯狂的念头如果存在，也还仅仅是一张草图，一个雏形，尽管这已经很是可怕。可以肯定，正是这样考虑着，西方公使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

首先是请清朝政府发布“剿办义和团”的上谕。反对动乱，希求稳定，不是你大清朝的国策吗？不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吗？此前，你也发表了一系列同样的上谕。这一次，谣传太多，说你大清朝中央政府是支持义和团的。当然，我们西方政府不相信。请证实这一点。请再发上谕。请把上谕公开刊登在中外的报刊上，让它成为稳定人心的政策保障！就这一件事情，各国公使一个接一个地到总署（外交部）去请办，但一次一次地被回绝。最后，各国的公使集体行动了，你大清朝政府如不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就呆在你外交部不走了。终于，外交部妥协了——不，那是慈禧太后的妥协：禁止义和团活动的上谕再次颁布，并公开发表在北京的《京报》上。

然后，各国公使连翩而至，要求慈禧太后亲自接见他们，听听他们代表本国政府的陈述。但“不准”。再次请求。还是“不准”。慈禧本来是最愿意搞外事活动的。把她丰富多彩的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总使她有一种特殊的满足感。但现在，她不愿意露面。即使在公使夫人们面前也不行。载漪的儿子成为大阿哥的时候，她可是请你们公使和夫人们

来着，可你们不来。你们大伤老太后的面子。现在，你们要我给你们面子啦。晚啦！无论各国公使怎样请求，他们要见太后的申请始终没有得到批复。

危险的信号。重大危险的到来，常常不在公开的上谕中，而在那些似乎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信息中隐含。公使们发现：禁止义和团的上谕虽然发表了，但义和团的发展势头却是愈演愈烈，好像扑不灭的野火，烧到了北京城下。再往前一步，北京便是义和团的总巢！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他们，没有一个外兵守卫着，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允许他们派兵进京，保卫使馆安全。起初，也是“不允”。那成什么样子啦！许多不平等条约规定，允许你们在一些开放的港口驻兵，这已经不成体统了。再把洋兵开进北京，开进我中国的中枢之地——不行，绝对不行！对此，各国公使连续召开会议，也作出了强硬的决定：如果不允我们派兵保卫自己的使馆，就等于各国与大清朝公开决裂！慈禧太后大怒：“怎么？我还没跟他们撕破脸，他们就要决裂啦！”但她考虑了一下，说：“那好吧。就让他们派些兵来，但每个国家，不准超过五十人！”于是，五月三十一日，英美法俄日意，六个国家驻扎在中国沿海的水兵三百多人进入北京使馆。但再请派更多的兵进京的任何请求，一律不再允许！

紫禁城于是被信息的迷雾包围了。慈禧，她正在做一个接一个自相矛盾的决策。她把义和团称为“朝廷赤子”，但又发布“禁止义和团”的上谕，却又并不认真执行。她不愿意看到北京有外国的军队，却又同意外兵入京，虽然那兵并不多。她究竟要置这场义和团运动于何地？当此

动乱之秋，她要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好像一艘庞大的破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按照舵手的号令，水手们正奋力划荡桨板。忽然，号令乱了。水手们不知道，他们是按照惯性划下去，还是停住桨板。他们去请示舵手，发现他正在休息。大雾正笼罩海面。正是最需要舵手的时候。

根据史料的记载，最先着急的是端王载漪。事态正按照他希望的样子发展着。那些混蛋的西洋鬼子，居然不赞成他的儿子人承大统。现在，有了义和团来教训他们！老佛爷似乎也不反对。但现在是怎么啦？难道老佛爷改主意啦？五月三十一日，听到洋兵进城的消息，他大大咧咧吼了一句：“几百个洋鬼子，怕他什么！”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他心里是焦急的。他急匆匆地跑进颐和园，要面见太后，但被李莲英拦住了。

李莲英说：“端王爷，这会儿，你还不打扰老佛爷的好。”

载漪说：“为啥？事情急着呢！”

李莲英说：“你急着，可老佛爷烦着，你说，我该怎么办？”

载漪说：“老佛爷烦什么？”

李莲英说：“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提醒你一条：就是见到了老佛爷，你也少提义和团的神功。”

载漪说：“哎，这是怎么啦？义和团的神功是真的，老佛爷也看到啦！”

李莲英说：“当然，我也看到了。可你还是别提！”

载漪于是嘟嘟囔囔地走了。他不明白，太后究竟吃了

什么药，脑袋中在动什么念头？

## 2. 国家命运一念间

深宫闭锁。

连续好几天啦，慈禧在给自己提出一个必须回答却很难有个满意答案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她需要她的臣子来回答一下，然后她给个决定就是了。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她必须首先自己的心里有个准谱。

一个领袖和下属的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他提出一个聪明的问题，他不要一个愚蠢的回答；如果他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他要一个聪明的回答。

慈禧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义和团是爱国的吗？如果下属回答说：是的。那么她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回答。

领袖总是提出价值性问题，这是他展现形象的需要。下属必须回应事实性答案，这是他善为人臣的法宝。慈禧提出了价值性问题，她需要事实性的回答。

义和团是爱国的吗？这是一个价值性问题。

但要一个事实性的回答就难了。她要的是“爱国”这一价值判断在可能发生的与整个西方列强的对垒中意味着什么？因此，那问题的实质是：义和团有这样的实力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她将下定决心。洋人欺负她太久了。老祖宗留下的基业，给他们东啃一块，西咬一块，撕扯得成了拼盘。什么英国势力范围，法国势力范围，德国势力范围，俄国势力范围……我大清皇皇国土，要你来划

什么范围！如果民心可恃，民力可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么，就能把这些“范围”都收回来，那时，她慈禧的脸面会如何呢？哦，人民群众真能成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吗？过去，这可是她连想也不敢想的，而今，竟看到这历史似乎正在被创造着！大清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什么时候听到过人民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都是“反清复明”！而今，这个满族统治的国家在她的领导下，竟能让汉族人的人心如此倾向于她，如此倾向于大清朝！这是她不曾想到过的皇皇政绩。这样的人心，这样的民心，这样充沛的情感，她怎么能忍心伤害！慈禧是一个刚强的女人。甚至可以说，她不像一个女人。当她的性格展现出女人一面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那肯定是别有用心。一个国家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她怎么不会想到借此大火，烧烧她心中郁积多年的鸟气！如果义和团有这样的实力，她，一个比男人还刚强的女统治者，一定会下定决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呢？啊，那可不得了！没那实力，喊什么爱国！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这一回，非同小可。一旦开战，不是同一个国家的战争，而是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打得赢吗？义和团的神功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哦，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确很神通，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过去的六十年间怎么未见显灵。难道真是该她慈禧太后时来运转，天上的神仙都来赞助她？根据大量的史料证实，慈禧确实是迷信的，但还决不会迷信到真的相信会有天兵天将下凡来帮她打天下的地步。因此，她犹豫了。她在最近的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颁发了一系列前后矛盾的



谕旨，正是她内心冲突的显现。如果打不赢，干脆就别打。与其当上一个“战败国”而丧权辱国，不如现在就假装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好着哩！这很好办。把义和团宣抚一下，解散回家算了。如果不想散，那就以兵戎相威胁。他们毕竟是爱大清国的，我可不忍心用枪炮对付他们。但如果还不散呢？对不起——这可不是我愿意干的——只好镇压了！如果她听到后代的史学家说什么“此时的义和团之力量，已是清朝不可抗衡的了”，肯定会笑掉大牙。我国家的正规军难道连内部的动乱都管不了？笑话！后来她也曾多次说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义和团，她“一纸严诏即可消弭！”

怎么办？谁能帮她下这个决心？她真的为难了。

这就是人治的专制国家的最大悲剧。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只有一个人拍板说了算！在这个我们后代的人们看来好像笑话一样的问题——义和团的神通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军队吗？——当此迫在眉睫的局势下，竟然无法有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一个国家的最后命运，就在一个人的一念之间！

但这确实不仅仅是那一个时代的悲剧！

该决定了。不能犹豫了。否则就晚了。

慈禧终于决定：特派军机大臣赵叔翹前往涿州，“宣抚义和团”。

这是慈禧的最后的慎重。庚子国变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 3. 出使涿州城<sup>①</sup>

一九〇〇年六月五日，军机大臣赵叔翘奉旨出京，朝着义和团聚集地涿州进发。与他同行的有顺天府尹何乃莹。他们公开的使命是“宣抚拳勇”，但他们心中清楚，此一去也，肩负着天大的责任。

初夏的北方，正是花红叶绿的季节。但他们感到有火辣辣的热浪扑面而来。路上到处都是行人：逃难的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加入义和团组织。但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未来的不妙的后果。

赵叔翘知道自己真正的使命。慈禧太后等待着他的报告：义和团真的可用吗？具体说：他们的刀枪不入和鬼神附体神功，真的那么灵验，可以抵挡西洋的枪炮？如果是肯定的，就让义和团进入北京。如果是否定的，就解散他们。

行前，朝廷中持有不同意见的大臣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赵叔翘身上。赵叔翘字展如。载漪与刚毅，一个未来的太上皇，一个汲引他进入中央的前辈大臣，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义和团招进北京：“展如，成败在你一举！”但那些有过外事经验的大臣，尤其是外交部的成员，给他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建议：“义和团成不了事！展如，凭你的学识，看穿义和团的把戏毫无困难。一旦导拳匪入京，这天大的后果你可怎样担待？忠言逆耳，展如，小心哪！”长期以来一言不发的军机处领袖荣禄居然也找到了他。当然，

他不会像前两种人那样明确的表态，但这更加让赵叔翘感到惊心动魄。“展如，你这一次到涿州，是目前局势的一大转折点。你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禀太后！”

想什么？还用得着想吗？赵叔翘，目前军机处最有学问的大臣之一，对义和团装神弄鬼那一套，根本用不着想，其实也用不着行路百里，到涿州去亲眼观看。那一套玩意儿如果管用，又何必等到今天？后世的历史学家尽管对赵叔翘后来所应担负的责任有重大分歧，但，“赵叔翘本来应该是个明白人”，这判断，却没有任何分歧。

但他还是得去。慈禧为了证实一个“玩意儿”是否有用，居然派出一位军机大臣，可见她的极端重视。

真难呀！他看到了他此一去严重后果，但直到上路，他也没下定一个决心：该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肯定这样想过：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啦。他这个给人治与专制的官场造成的无法摆脱的性格弱点，后来终于要了他的命！

六月七日，赵叔翘抵达涿州城。

涿州县城位于北京西南一百四十里，是芦保铁路线上的商业重镇，素有“京师门户”和“咽喉要地”之称。

赵叔翘到达涿州的前一个月，五月二十五日，涿州、房山地区数千义和团，已经聚集在涑水陈家庄和石亭镇附近“亮队操演”，做好了占领涿州的准备。

五月二十七日，义和团声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遂一举占据。当时进据义和团约有万余人。史料载：义和团占据涿州之后，即在“四门上下高树旗帜”，旗上大书“兴清灭洋”，“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团众在城内到处“竖立义和团旗帜。与民杂处”。并

组织“抽丁守城”。对城门“把守甚严。居民出入皆须搜查”。

涿州政权就这样瘫痪了。“城门启闭，概由拳匪”。“办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内文武具文而已”。知府龚荫培，自知难逃失守之责，丧魂落魄，一筹莫展。“知不能敌，遂绝食以待自毙”。

此后，义和团烧铁路火车，“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蜂起应之，约四万人众”。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壮大，声势浩然。

涿州义和团首领恭恭敬敬地把赵叔翘一行迎进县衙，如今，那已是义和团的办公地点。从民间走到官场，义和团变化的首先是他们的服装。

赵叔翘细细地打量着义和团们。他听说过，在山东，义和团最初出现时只不过是身着普通的农民服装。而现在，他们穿的是特制的“义和团制服”，甚至可以说，有好几种制服。几乎全是红色的，看在眼里，红彤彤一片。

他们头上扎着一条红巾，里面藏着义和团请神的符咒，据说，你想请哪一位附体，便写在符咒上，念叨几遍，那神仙就附上了你的身体，而你就有了那神仙的一切神通。胸部以下，每一个义和团员都扎着一个红兜肚，腿上扎着红腿带，手腕也被红巾裹着，腕内藏有同样的白纸符咒。这就是义和团的“红团”，是义和团最普遍的装束。

但也有“黄团”，装束是一样的，只是全部改成黄色。其地位如何，缺乏考证。

那些身上有红披挂，而头上戴着黑头巾的，名曰黑团。赵叔翘发现，见到黑团的人，红黄两团的义和团员都极尽

恭维之态。为赵叔翘指点讲解的人说：“嘿，黑团！此最厉害！”但到底如何厉害，赵叔翘始终没能弄明白。

只有一点他是明白了：义和团也有了等级制度。那是一种对官场的幼稚而粗略的模仿。那也许是义和团的真正的斗争目的。

当赵叔翘得知所谓的义和团都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时候，他忽然觉得，那刚刚被他所不屑的义和团的斗争目标，已是极可赞美的了。

他们多数是农民。但当政府把“朝廷赤子”的美誉颁发给义和团时，很多下层市民也进入了义和团的行列。这些人包括：小贩、车夫、轿夫、衙役、橡皮匠、磨刀匠、铁匠、理发匠和泥瓦匠等各行业的手艺人。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来自城市底层，包括乞丐、游勇、盐贩、罪犯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们加入义和团，“这成为他们吃饭不花钱的一条途径。”

在路上的时候，每路过一个城镇，义和团们就下榻于庙宇或空客栈，有时也在富人家落脚。在北京南边，运河上的大批船工和纤夫因新式铁路而失业，他们也纷纷加入义和团。

虽然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赵叔翘通过分析义和团的人员成分得出不可更移的印象：所谓义和团不过是“乌合之众”。

终于可以观看义和团的神魔附体和刀枪不入神功了。这是赵叔翘最感兴趣的考察题目。

#### 4. 魔术表演<sup>②</sup>

当年，赵叔翘观看义和团神功的地点已不可考，总之是在涿州城内一个有“坛”的地方。那是一个专门表演仪式的场所。一个人要变成神仙并不容易，何况是涿州的整个义和团都要变成神仙。可以预计，义和团为给赵叔翘留下深刻印象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赵叔翘肯定注意到了：构成义和团礼仪显著特点的降神附体基本保持不变，但那神秘的色彩更加强化。

一个叫作“大师兄”的义和团师傅，率领一队团员步入坛前。那里正冒着袅袅的香烟。除了那位大师兄，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赵叔翘听到他们在坛前嘟嘟囔囔，据说，那是在表明诚意，发誓吃素，尤其是不近女色。此外，还有“不准抢掠，不爱财”。如果听懂了他们的话，赵叔翘肯定会想：那么，他们身上崭新的义和团制服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时，所有的义和团徒弟们都朝坛口走来，个个跪在地上，烧香起誓，师傅开始发给他们纸符。接着，扎上带来的头巾，师傅在他们的头上背诵咒语。赵叔翘被告之，这称为“上法”。

忽然，其中的一个义和团倒在地上，是一种卧姿，好像死去了，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起来了，开始向着东南方向叩头。然后，他大瞪起眼睛，好像要把眼珠瞪出来，同时，嘴里向外大口地吹气，这样一来，浑身的力气

便逐渐地上升，集中在胸膛里了。忽然，他好像疯了，脸红红的，眼睛也红了，向前直视，口喷白沫，并伴随着嘻嘻的叫声，拳头飞起来，脚也四下乱踢。不知怎地，他的手中有了一把刀，他开始执刀乱舞。渐渐地，舞者法尽力完，这叫做“卸法”——他一下便委顿不堪了，瘫软在地上，好像大病了一场。于是表演完毕。

赵叔翘被告之：这个义和团员是个新手，所以仅仅一刻时间法力便泄。若是老师，功行甚深，可以上法竟日。就是说，他这样一整天地舞刀弄棒，仍然是魔法在身。

开始表演“神魔附体”神功了。但赵叔翘无论怎样用力理解，也看不出它与戏台上的演出有什么区别，除了更加拙劣。

声势是有的。义和团们忽然蜂拥而至，人数大约有三四千，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到了赵叔翘面前，立刻停住脚步，按照戏剧中排列的秩序站好，一一自己唱名通报。

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

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

一个接一个按照次序报名，如舞台演戏状。李拐仙做出一种瘸子势，何仙姑虽由男人扮演，但扭捏如妇人态，确实有些表演的功底。

史料记载：所谓神魔附体，无非就是这样的表演，有的师兄在公开场合走路都模仿戏剧台步，互相对话也“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有人干脆“小结束，戴英雄帽，如戏台所扮黄天霸者”。赵叔翘真是大开眼界，他看到的是实际的表演。

或许，真的有人能被神魔附体，而不全是表演。有一则材料说，年轻人在神魔附体时倒在地上，然后突然跃起，勇猛战斗，“似醉似梦”，附体的神与被附的人浑然难分。被附者口中念诵这个神的名字。接着，师傅拍拍一个年轻人的背或头，叫出他的真名。“则豁然醒，立若木鸡，拳法亦尽忘，与战斗时判若两人”。

科学家考察说：这是一种催眠暗示。但要它发生作用，必须是无知无识没受过教育的年轻农民。只有“愚钝及无知幼孩始能学，稍有知识，则神不附体矣”。显然，这种神拳形式不适合于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

那么，多少天能学会降神附体呢？义和团拳师们强调，他们的魔术简单易学，不过，所需时间则其说不一。一位义和团拳师许诺说：如果由他来教导，一天之内保你成为神仙。但另一位则说他吹牛，他的经验是需要七至八天。但更严厉一点的师傅则声称，“需要一百零三天”，但这要“比金钟罩容易得多”。

表演开始渐入佳境。赵叔翘忽然感到，四周的义和团们，高高地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并在它的指引下，向拳坛靠拢。可能，有数万人之多，其声势，足以摄人胆魄。锣声，鼓声，还有各种民间音乐都奏响了，当这些声音渐低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沙哑但传之极远的快板声，声声入耳：

今年是咱光绪二十六年，  
五禅老祖下了老虎高山，  
第八封仙衣的叫罗盘。



来到涿州地，就把场子安。  
老的学艺三天整，少的学艺就在眼前。  
学会了艺，避枪炮，不怕刀剃斧砍。  
黎民们：起来吧！来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来吧！杀洋人，保住咱大清江山。

群情沸腾。好像广场一样的拳坛忽然被咒语声淹没了。那是万众齐声的咒语，比较刚刚响过的快板书，格律要整齐得多，显然经过知识分子的加工。那是一道在义和团运动中极为著名的咒语。几乎是神魔附体咒语的集成：

天灵灵，地灵灵，  
奉请祖师来显灵。  
一请唐僧猪八戒，  
二请沙僧孙悟空，  
三请二郎来显圣，  
四请马超黄汉升，  
五请济颠我佛祖，  
六请江湖柳树精，  
七请飞标黄三太，  
八请前朝冷于冰，  
九请华佗来治病，  
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  
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每一声咒语响亮时，代表那咒语的神仙人物便站了出来，用戏剧舞台上的姿势亮相。当然，在上面的咒语中，可有更多的神仙的加入，可以无限地唱下去。玉皇大帝、如来佛、姜太公、诸葛亮、关羽、周仓等等，也同样是义和团可用咒语招来的保护神。只有一个似乎是传统戏剧中不见经传的，它的名字叫“封炮王”。据考证，“封炮王”是义和团首领造神的结果。因为义和团最怕的是洋人的大炮，而传统的神仙似乎没有专门封洋人炮口的，因此需要创造一个神仙，封住洋人大炮使之不响。除此以外，义和团的神仙再无创造。他们可分为三类：一、道教神；二、佛教神；三、小说戏曲中的人而神者，或武艺高强者。

真的，涿州城内这场规模宏大的请神表演，究竟给赵叔翘大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呢？他从来没有说过。

但表演结束后，确实有人问过赵叔翘对此有什么印象。并说：“这回，一定能把洋人赶走了，是不是，赵大人？”

赵叔翘是陕西人。他沉吟了一下，说：“从前在陕西的乡下，曾见人练习，好像与此相同。”

## 5. 信息要命

根据史料记载，义和团的神功表演之后，赵叔翘与义和团头目有一次会谈。他严肃地开导义和团，为国家的大局，回家种田吧。他应该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即使义和团的反洋斗争确实毫无私心，但流血的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

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如果朝廷把这些迷信的普通中国农民当做神功盖世的军人来使用，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铺平这条斗争的悲壮道路。

义和团如何回答赵叔翘的开导，没有史料上的依据。此前，武卫前军的提督聂士成曾奉朝廷谕旨，在黄村地区有过剿杀义和团的行动。因此，义和团要求赵叔翘上诉朝廷，“杀聂士成，以平义和团之愤。”这是不是义和团答应解散的交换条件呢？无从查考。但赵叔翘一口回绝。要杀朝廷的命官，岂是你们这些平民可以决定的！

看来，会谈的结果并不愉快。但赵叔翘似乎也下了一个决心：将真实情况——所谓义和团神功不过是唬人的玩意儿——报告给慈禧。至于朝廷如何定夺，反正我赵叔翘可以脱了这天大的干系了！

但就在这时，另一位军机大臣刚毅也奉旨到了涿州。

历史到了这里，忽然变得模糊起来。一则史料载（译文）：

义和团的事情呀，在刚毅和赵叔翘奉太后的旨意去查验其神功的时候，是中国当此动乱之时的一个祸福转折关键。当时，如果真的能把义和团的真情实状，剴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义和团不足以依靠，那么，朝廷下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此后的国家大祸。过此以后，乌台蚁附，群势已成，虽然要禁遏义和团，也就不可能了。这后来酿成如此大祸，刚毅和赵叔翘二人，实在不能不负其全责。后来太后说赵叔翘“死有余辜”，确实是情真罪当。

刚毅的为人，愚陋刚愎，也许他真的相信义和团的神

功是可以依靠来灭洋的，可能吧。可赵叔翘呢，他起家科第，扬历京外，开藩陈皋，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待躬廉正，这种儿戏一般的不过鬼混的义和团能否成事，他一眼就能看个明白，决不至于不能鉴别。但他害怕刚毅的势力，不敢和刚毅的观点不一致，终至后来与刚毅同为“祸首”，惨遭极刑，而且身陷大戮，死负恶名，未免太可惜啦。<sup>③</sup>

那么，刚毅究竟是如何说服赵叔翘改变了他的看法的呢？

根本没什么说服的过程。刚毅一到涿州，听说赵叔翘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慈禧，说了一句：“展如，不可铸成大错呀！”刚毅的话外之音是：你如果说了真实情况，得罪了我和载漪，你今后的前途也就完蛋啦！

就因为这一句话，赵叔翘犹豫了。仅仅过了一天，六月九日，他便回到了北京，但刚毅却仍然留在涿州。另据史料载（译文）：

当义和团在涿州时，太后命刚毅、赵叔翘去验其真实。赵与何乃莹同行。

何字松生，是刑部的老司员，特别干练，很有卓识。二人回京后，均力言义和团不可依靠。何于是为赵叔翘拟了一封奏折，准备把他们看到、想到的关于义和团的事情，细致地、真实地、恳切地向太后汇报。

赵叔翘审阅了这道奏折。看了三遍。好像是碍于端王载漪和刚毅的权势，踌躇很久，不敢奏达太后。最后他对

何说：不要上折了吧，上折太着痕迹啦，不如面见太后，口头汇报为妥。<sup>①</sup>

那天汇报之后，赵叔翘走出紫禁城，满脸的欣慰之色。他对她的一位僚友说：“我幸不辱使命，对太后尽情倾吐，应说尽说，抚心自问，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无罪啦。”

让我们提前透露：几个月后，中国战败，八国联军要中国政府惩治“祸首”，赵叔翘被作为重点“战犯”赐死，其所得罪名，正是向慈禧的汇报，导致了庚子国变中“引导义和团进京”的重大事件。那么，他究竟向慈禧汇报了什么？

他至死也不会想到，揭发了他向慈禧的汇报内容的正是慈禧本人。慈禧后来说：

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赵叔翘和刚毅）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赵叔翘）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他还是式样照前，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sup>②</sup>

原来如此。赵叔翘的死罪，不过是在汇报的时候没有正式的书面奏折，并因是刚毅的死党，便“稍有瞻顾”而已。他并没有说义和团可以依赖，但也没说义和团不可以依赖。他什么都没说，他仅仅“表演”了他看到的事实。他后来的死确实是冤枉的。但他实在不是死在向慈禧汇报以后，而是死在他与刚毅结为朝中死党之时。这是后话。

总之，无论是赵叔翘的汇报有意误导慈禧，还是慈禧没“看懂”赵叔翘“表演的语言”而产生了误读，正因为他的汇报，慈禧下了利用义和团反洋的决心。

六月十日，赵叔翘回到北京向慈禧汇报后的第二天，慈禧宣布了一项重大的任命：“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极端仇外的未来的太上皇，掌握了大清朝今后的外交。这重大的任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慈禧要向西方列强宣战的决心。

紫禁城的大门对义和团彻底敞开了。

## 6. 义和团进京

在涿州，刚毅带领着义和团，浩浩荡荡地朝北京进发。有了中央政府首脑的领导，义和团的宣传水平更高了。进入北京之前，一张流传更广、拳术更神、面面俱到的“义和团揭帖”诞生了，它一路朝着北京张贴下去，好像是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人城证明：

义和团，神助拳，灭绝洋教安中原。

天主教，妄信天，不信佛神忘祖先。  
无夫妇，忘耻廉，妻女常伴教主眠。  
礼拜日，男女欢，只为一招练一番。  
人伦乱，忘体面，天主堂里乱行奸。  
生子女，育孙男，怀了私孕感谢天。  
如不信，大众观，圣子串种眼珠蓝。  
晴天里，把眼挖，丑事不可见祖先。  
口喊天主挖心肝，问问后辈安不安？  
奉了教，起祸端，为了欺民又压宫。  
讲长短，是非颠，良民敢怒不敢言！  
拆庙宇，扒庵观，扒毁佛祖众神仙。  
千神恼，万神烦，惹得神上把脸翻。  
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  
诵诀咒，念真言，中华弟子设教坛。  
焚黄表，敬香烟，恭请神仙到凡间。  
神出洞，仙下山，仗着凡体把道传。  
枪打不晕，刀不沾，大炮不过冒空烟。  
大伙心齐把拳玩，练成铜头铁背坚。  
十八般武艺都学会，要除奸种不费难。  
非学教，不安然，凡体即可练成仙。  
天主教，不必欢，你看神上法无边。  
英吉利，美利坚，法俄德奥俱胆寒。  
手挽手，联中原，神拳传众遍人间。  
扒铁道，劈电杆，然后再烧大轮船。  
鬼子逃，洋奴敛，中华一统好河山，  
五谷丰登太平年。

在北京城边，徐桐，大清朝廷最有学问的大学士，带领他的弟子们迎接这些伟大的神功盖世的义和团。一副横批为“书赠义和团”的巨型对联，张贴在城门两侧<sup>⑥</sup>：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义和团，“朝廷赤子”，终于进入北京城。

### 【注 释】

- ① 本节所征引的史事，许多史料都有记载，此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 ② 本节中关于义和团的“神功”表演，综述自《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丛刊·义和团》中的史料，兹不逐一注明。
- ③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 ④ 同上。
- ⑤ 同上。
- ⑥ 罗惇彞《拳变余闻》。



## 第九章 宣 战

### 1. 战与和

北京乱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经受过更多的动乱，我们都  
知道那是何等景象。在一九〇〇年春天的北京，那景象更  
为惨烈。

新任外交部长载漪在家中设起义和团拳坛。有人在他  
家看到：有义和团百余人在他家中，一半是农民，另一半  
是载漪的家人。那义和团的头子姓温，已经给载漪升了官，  
成了统带。坛前景象奇特：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  
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眼前有什么便抓起什么，乱  
跳乱舞，口出怪声，如疯如狂。载漪拜倒在坛前，对来人  
说：“此神力也，当入宫，把义和团的神奇之术告诉太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几乎一日之间，京师重地，遍  
地拳坛。数万义和团，随便在北京城内划出一块地界，用

栅木围起，焚燃香炉，便是一个拳坛了。但到了北京，究竟还有多少人虔诚地练拳呢？

在所有的北京街道上，到处有持械寻仇、沿途喊杀的人群。自由了！没人管了！官兵任其猖獗，城门任其出入，禁城地面，肆行无忌。

六月十日，义和团进京的第一天，京津之间的电线便被偷没了，电线杆全部砍断了。此事引起的后果，我们过一会儿就能体会到。

六月十一日，日本大使馆的书记杉山彬走到永定门外，听得一声大喊：“东洋鬼子！”没等他回过神来，已被乱刀乱枪乱砍乱戳，当场死去，尸体被剖。这是义和团运动中第一个死难的北京使馆人员。

六月十二日，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地在北京烧杀焚掠，走在路上，总能看到，不远处有冲天的火光。

六月十三日，义和团焚烧了姚家井和跑马厅一带的全部教民房屋，三百多名中国天主教徒死在刀下。

六月十四日，北京与天津的义和团共同行动，将津京之间的铁路几乎全部毁坏，从这一天起，两地交通中断。同时，两地义和团开始烧杀抢掠，北京的大火逐渐逼近使馆区，义和团被保卫使馆的洋兵击退。于是，义和团掉过头来朝皇城冲去，准备焚烧西什库教堂，这一次，是朝廷愤怒了，派兵把义和团赶了出去。

六月十五日，义和团焚烧了北京宣武门大教堂。而天津战绩最佳，到这一天，天津的全部教堂都被烧光了。

就在这时，慈禧决定：召开义和团运动以来的第一次政府首脑扩大会议，王大臣六部九卿悉数出席。清朝政府

向西洋各国宣战前，共召开过四次这样的御前会议，此为第一次。

这天是六月十六日。按照慈禧的预先设想，此次政府首脑扩大会议的主题是：商阻洋兵进京事。

此前半个月的五月三十一日，朝廷同意西方各国派兵三百，进入北京，护卫使馆。但这是义和团进京之前的事情。当二十万义和团潮涌京师，要杀尽一切洋人的时候，由三百洋兵护卫使馆就显得太少了。毕竟尚未宣战。中国与西洋各国在外交上，毕竟还是友好国家。各国公使向中国朝廷请求：允许他们再次派兵入京，被断然拒绝。

六月九日，京津电线断绝的前一天，北京公使发电报给天津的各国提督，请他们派兵进京。各提督集会，决定立即增援北京使馆。

六月十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二千人，自天津向北京挺进，六月十二日在京津之间的廊坊地区，被中国军队和义和团拦截。

此时，中外尚未宣战，但已是战云密布。

印象中，慈禧太后总是一副卖国求荣的嘴脸。但那是战败后的嘴脸，战前的慈禧，是一个主张搞强硬政策的铁女人。此前一年，一八九九年一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外交部，拒绝这一要求。十月，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放弃了对三门湾的要求。这大大鼓舞了慈禧。她觉得西方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他们强硬一些，他们又能怎么样？！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她训令各省当局，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中国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

“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一天，她接见了河南巡抚裕长，对他说：“你回去的时候，路过保定，传我的谕旨，让直隶总督裕禄，往后办理外洋交涉事件，一定要据理辩论，不可稍涉迁就，使那些洋人得寸进尺！这很重要。”

义和团运动爆发期间，她以更为明确的语言宣称：

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到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说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然而，一时之间，同时向所有的西方强国宣战，毕竟非同小可。此时的大清朝仍然有两种选择：平息义和团运动，和平解决争端；或者，凭恃义和团神功和洋人训练出来的中国军队，向西方列强宣战。

国之大小，莫过于此。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亦在于此。

大清朝的皇亲国戚们、军机大臣们、六部九卿们，在六月十六日午刻忽然接到了通知：齐集仪鸾殿东室开会。

还是那个熟悉的会场，中间摆着一张金碧辉煌的龙椅，铺着绸缎，是为御座。但慈禧和光绪却并非端坐椅上。椅前有一张金床，母子二人是倚在床上召见臣工的。毕竟是女皇的布置：殿东头堆积着盆花，御座金床被鲜花簇拥着，内府花匠，安顿妥帖，名曰花山。香风馥郁，流溢满殿，臣工入朝，惊心眩目。据说，有一次，张之洞晋见时，只见鲜花满室，不见慈颜圣君，一时不知所措。这时，身旁有人抻了抻他的衣角，低声说：“那没有花的地方就是了。”这才找准了方向，从容下跪。时人有诗道：

金床玉案列中间，粉草琼枝左右环。  
五色祥云香缭绕，昆山王母坐花山。

但今天，没有人还有赏花的闲情。这个国家的命运，就要在这间小小的仪鸾殿中决定。参加会议的这一百多位大臣，将因此而负有天大的责任。殿中的地方，大部分给了花盆，小部分跪满了大臣，后至者，只好跪在门槛外边。

军机大臣们在荣禄的带领下，跪在御案旁边，自南而北，仿佛雁行。其余诸臣都面南而跪，好像蜂窝。几乎都来了。只有军机大臣刚毅仍在涿州未归。

没什么帝党或者后党的分别。有历史学家所给出的这一派别判断肯定不确。自戊戌政变后，朝中大臣只服从一个领袖，那就是慈禧。派别确实存在，但那是由于义和团在北京的动乱和八国联军挺进北京的局势创造出来的。

一些新的人物将在这次会议上出现，让我们首先预告他们所属的派别：

宣战派：我们已经熟悉了他们，以端王载漪为首，多为皇亲国戚，少数军机大臣。

主和派：以总署（外交部）官员为主，包括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公法的官员，部分尚书（部长），人数很多，但较之宣战派，权势微弱。

一声不吭派：以领军机大臣荣禄为首。权高位重，并深得慈禧倚重。他们倘若发言，将会决定天平的倾向。

毫无疑问，会议开得及时。混乱的局面该是澄清的时候了。不少与会者都记录了会议情况，虽略有出入，但大致相同。在这不祥的会场，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没有迷惑于政府会议的庄严，人人都知道这里马上要开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辩论。

真奇怪。根据记载，这次会议，竟是自戊戌政变发生后一言不发的光绪皇帝先声夺人。看来，事关重大，国家的倾覆眼看就在眼前，自己个人的荣辱退居其后了。

光绪皇帝“色甚厉”，首先对大臣们重言诘责：“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你们为什么不进行弹压！”

可能谁也没想到皇帝会首先发言，个个把目光偷偷朝着慈禧看。皇帝言罢，竟是无人敢应。

这时，正跪在翰林院庶吉士恽毓鼎旁边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偷偷地对他说：“刚才，我正好在提督董福祥的家里，董福祥说，他可以把义和团拳匪驱逐出北京城外。”恽毓鼎一听，便怂恿他把这话告诉皇上。于是，刘永亨壮了壮胆子，跪着前进了几步，奏道：“臣刚才见到了董福祥，我想请旨，让他驱逐义和团乱民。”

话音刚落，忽然听到一声怒喝，是端王载漪，伸出他

斗大的拳头，大拇指向上翘着，厉声道：“好！你这话是失掉人心第一等方法！”

刘永亨吓了一跳，再也不敢把他的话说完。

所有的眼睛都望着太后，但太后沉默不语，在幽暗微明的大殿内，望上去，像一座快要倒塌的墓碑。

忽然，太常卿袁昶在大殿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

上谕让他进来。于是袁昶进殿，奏道：“所谓义和团拳民实在是乱民啊，万万不可以依靠他们，就算他们真的有什么邪术，自古至今，断然没有依靠邪术而成就大事的啊！因此，与列强的战争万万打不得呀！倘若纵容乱民冒险一战，大祸必至，不可收拾，以后内讧外患，相随之至，这个国家还是个国家吗！”一边如此慷慨陈词，一边流着眼泪，声音很大，记录者说：大殿上的瓦片都颤动了。

慈禧太后突然发言：“即使义和团的法术不足以依靠，难道民心也不足以依靠吗？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依靠的只有民心啦！如果我们再把民心失掉了，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来立国？”

停顿了一下，太后又说：“今日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将何以处之？你们在这方面有何见识？各持所见，从速奏来。”

群臣纷纷奏对。有的说，把义和团剿灭了，洋兵自退；有的说，应该把义和团编成军队，他们有神功，自可以打退洋兵；有的说，还是应该先保护住使馆，看看情况再说。一时之间，莫衷一是。

吏部侍郎（副部长）许景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

中国和西方各有外交关系已经数十年啦。民教相仇之事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赔偿他们点东西罢了。只有攻杀外国驻中国的公使，这可是中外皆无成案的呀！现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有义和团拳民日日窥伺，已经到了朝不谋夕的地步。倘若使馆遭到不测，那结果，唉，不知我大清国的宗社生灵，以后会置之何地？”

于是话题又转向如何对待义和团。

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说：“拳民不可依靠。”

但另一位正在张亨嘉后边的侍郎长萃却大声说：“义和团是义民，臣刚从通州来，通州倘若没有义和团，就守不住啦。”

于是载漪等纷纷附和，说“人心不可失”。

这时，光绪皇帝忽然驳斥道：“当此动乱之际，人心何足依靠，只不过更加添乱罢了！你们都喜欢谈论打仗的事情，可我大清自从朝鲜之役（指甲午中日之战），创巨痛深，那打仗的效果如何，你们不是有目共睹的吗！何况，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多的西方强国，其强大，十倍于日本，他们如果合而谋我，我们拿什么抵抗他们？”

载漪顶撞皇帝，大声道：“当年，董福祥在宁夏剿灭叛回，神功无比，用以御夷，肯定无敌。”

光绪皇帝道：“董福祥骄纵难用。西方器利而兵精，不是我们中国的回回可以比的。”

会议开得乱起来。恽毓鼎等主和派终于发现慈禧太后是袒护义和团的。倘若太后仍持此见，今日之议将等于没开。于是跪趋而前，道：“臣等尚有言奏。”

刘亨嘉力言义和团当剿，不过，只要杀几十个人就可



以了，然后“大事即定”。

这时，一个矮子，叫朱祖谋的，也是个侍读学士，忽然问道：“皇太后相信义和团可以战胜西洋人，臣不知道，将依靠何人来办成这样的大事？”

太后道：“我恃董福祥。”

朱祖谋有点失了分寸，竟然顶撞道：“董福祥第一个不可依靠。”

太后大怒，脸上立刻变了颜色，厉声道：“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朱祖谋道：“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太后怒道：“你说董福祥不足依靠，那么，你保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来！”

仓促之间，朱祖谋不知如何对答。恽毓鼎应声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而有胆识，可调进北京，镇压义和团乱民。”

光禄卿曾广汉奏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以。”

慈禧见议不出个所以然，觉得这会议开得很没意思，猝然宣布散会。群臣纷纷起立。慈禧也站了起来。她要看看那个敢顶撞她的朱祖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直到他迈出了门槛，“犹怒目送之”。<sup>①</sup>

这就是大清朝的第一次政府首脑扩大会议，唯一的成果是：派吏部侍郎许景澄前往杨村，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八国联军不要到北京来。但消息不知是谁透露给了义和团。许景澄走在半道上，遭到义和团的劫杀，幸亏跑得快，方免一死。而八国派出的两千洋兵，因人数太少，受到义和团和官兵的拦阻，行进到落垓地区，无功而返。

## 2. 脸皮问题

当天晚上，北京城内处处火光冲天。在这个文化鼎盛的都城，义和团有了新的进步：更多的神仙被他们创造出来。其中的一个叫洪钧老祖，据说只在夜里出现，是驾着火光自天而降的。一般是降临到庙宇中，身边俱是神女，舞蹈着，召唤着更多的神仙下凡。这些神仙不仅能让枪炮里面的子弹和炮弹根本不能点燃，而且，他们伸手向空中一指，就有大火燃烧，腾腾烈焰，直窜敌营。当然，这些神仙更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仗着这些神仙的支持，把北京人害苦了。北京人只要碰到义和团，便被命令向东南方向叩头。没有敢不遵命者。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真是大显神通。

尽量躲避着义和团们，并有重兵开道，军机大臣荣禄坐在轿子里快地朝家中而去。长期以来，这位政府首脑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在将近半年的御前会议记录中，找不到他的名字。当此动乱之秋，人人都想沽名钓誉，发疯似地挤向讲坛，或提出建议，或慷慨陈词，或互相指责攻击。但荣禄大人一次也没有登上过讲坛。他一次又一次地请假，说他嗓音微弱，不宜发言。但在实际上，他的谦让别有用心。他在计算力的平行四边形。天平总会摆动。决定性的发言要拖到最后关头。要先搞清楚鹿死谁手。别轻举妄动。别过早暴露自己的立场。别捆住自己的手脚！眼下局势还不明朗——是前进还是后退：等着顺风再去弄潮，暂时先把船停靠在安全的港湾。

但今天晚上，我们的荣禄大人就要弄潮了。否则，我们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第一次御前会议没什么结果。反对宣战的人太多。事关国运。看来太后也不会轻下决断。这时，命运的天平上缺少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而这个砝码要由荣禄加上去。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兴衰，真让人感到一股宿命的味道。怎么会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就在这犹豫难决的重大决策期间，就在这扑朔迷离的夜晚，一只命运的手臂，把国家的命运交给最不该交的人！局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人人感觉到山雨欲来，但总算还没有造成国破家亡的后果。就是朝廷中的主战派，包括慈禧本人，仍然觉得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的人数不够众多，不够果敢，不够大胆，还不敢与西方列强一决雌雄，甚至有人开始议论退却与和解。载漪等人好容易搞起来的阴谋，面临流产的危险。在这当口，命运——最有才气的诗人——在颤颤悠悠的天平上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敢情该由荣禄来点燃地雷！

说来真巧。就在这天晚上，荣禄“收到”了一封“洋人照会”。据说，那照会是一个负责压运粮食的粮道罗嘉杰弄到手的。那照会的内容共有四条：

一、由西方各国指明一地，让中国皇帝居住；二、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收管各省钱粮；三、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掌管天下兵权；四、西方各国勒令：圣母皇太后归政下台。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学家至今为这份“洋人照

会”的来源与真伪争论不休。它太重要了。庚子国变的突然转折，就在这份照会上。

一则重要的史料是太常卿袁昶提供的。这位反对与西方列强贸然开战的大臣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译文）：

和战未决的时候，粮道罗嘉杰给荣禄相国送来一封信，说洋人要挟我大清，共有四条。（日记中自注：荣禄相国曾将此“照会”出示，其中的一条是要太后归政，不知确否？各国公使决没有这样的说法，难道是西方的各水师提督给北洋的照会吗？那么，为什么北洋不把它呈给朝廷，而由一个粮道罗嘉杰这样草率地交给政府首脑荣禄呢？这个人真是祸首呀！）这当然大触太后之怒。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启秀正在力主与洋人开战，见此照会，天平立刻就倾斜了。推断一下，这大祸的起源，粮道罗嘉杰密密禀报给荣禄的这四条照会，是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本书作者注：指此后召开的三次御前会议）太后被激怒的原因，也是众多的王公贝勒的感情被激化的原因——战争就这样骤然爆发了。然而，罗嘉杰所说的照会，既不是各国提督照会给裕禄（直隶总督），也不是天津各领事馆传播出来的，而且，李鸿章、刘坤一等先后来过电报，奏道：各国的外交部决没有这样的说法。相反，各国外交部都已经声明：“此次向中国调兵，系为保护各国使馆人员，帮助中国政府剿灭乱民，决不干预中国的国家政治家法。”当时，战事未开，西方用什么来要挟朝廷？由此可知，罗嘉杰提供的所谓照会，妄诞不经，荒唐无据，轻率密禀，实为祸

魁。我一定要请旨，把他革职拿问，讯明惩罚。<sup>②</sup>

袁昶熟悉外事，对中国政府的官场程序更是一清二楚。因此，他正确地分析出：所谓“洋人照会”，纯系伪造。然而，他再也想象不到：此一关系国运的伪照会，究是何人伪造？

是端王载漪伪造的。这不是冤枉他。因为后来，荣禄在朝廷已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即将攻破北京城的时候，突然“查明”了这一事实。

载漪为什么要伪造“洋人照会”？很简单。他要激怒慈禧，以售其奸。

对权势的倾注，会使许多人失去平衡，载漪也是其中之一。贪得无厌，穷凶极恶地不断要求升腾，不断地渴求扩大权力范围，再也做不到太太平平、恬然自得地过日子。掌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有多带劲儿：可以自行裁夺，发号施令——征集军队，发布文告，不管那些犹豫迟疑的同僚，作出大胆的决定，控驭全国，在世界命运大赌台上决一胜负。自从他的儿子成了大阿哥，自从他从荣禄的手里接过了虎神营，尝过处理军国重事的滋味，他那不安生的追求刺激的心智便觉得什么都不值一提。谁一旦大赌过一场，便不能满足于小打小闹。野心勃勃的载漪神经质地、狂热地左顾右盼，一心寻找适当的任务：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把洋人从中国赶出去，以便他的儿子早日登龙！但他看出来：如不能迅速而坚决地行动，他的愿望有永远拖延下去的危险。

问题是：荣禄大人看不出这是载漪的拙劣的伪造吗？一

个太常卿袁昶都能看出这其中“有鬼”，以荣禄的精明竟会识别不出？这决不符合“外交照会”运转程序的“照会”是怎样到达荣禄的手中的？他为什么如此着急，在“收到”它的当天夜里就立刻禀呈太后？而在形势不利于载漪的时候，又忽然“查明”它是载漪的杰作？

全都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事情过去了多少年，荣禄在庚子国变中所起的作用和形象仍然笼罩着神秘的阴影。历史似乎永远无法识破这个捉摸不透的人，永远无法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意念。

无法识别便不再识别。荣禄在庚子国变中所扮演的这个秘密的“突然出手”的角色，在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浮泛的著述中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多数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他确实都未登场。他的工作更为艰巨，在幕后进行。他是导演。他不表演。他指挥表演。他派戏。他帮助演员排练。然后，在不再需要这些演员，并需要这些演员成为他的掩体的时候，便无情地出卖他们。

这样一个角色的确难以发现。但并非没有独具慧目的历史学家。有一个人通过深入分析，感觉到了荣禄的积极存在。此人即庄练先生——台湾的历史学家。他公开地、恰如其分地把荣禄称为庚子国变中的“阴谋魁首”。

如果荣禄大人不暴露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政客。这决定了 he 必然有一个悲惨的毛病：太热爱权力。因此，当权势渐渐离他远去的时候，他必得再把它赌回来。

自从载漪成了未来的太上皇，他，荣禄，政府的首脑，

眼瞅着自己的权柄一天天被削弱了。他看到，慈禧太后对他的态度也大不如前，似乎觉得，没有你这个荣禄大人在前面执鞭提蹬，她的马儿一样跑得好。虎神营给了载漪。这没什么，是他荣禄用它来换载漪的交情的。但外交部（总署）也给了载漪，这可不是他荣禄情愿的。很快，紫禁城的五门提督官职，都给载漪的哥们儿拿走了。如今是载漪掌管着紫禁城的钥匙。再这样下去，他拱手交出全部军权的时候就要到了。这一切，都是慈禧对他的信任度减弱的结果。

这可不好。这很危险。这简直是要荣禄的命嘛！历来只有政变，只有风云变幻，才使荣禄青云直上。所以他若无其事，矜持自重，不动声色；他慢慢地、深深地呼吸，仿佛摔跤运动员面临着搏斗，等待着他出手的时刻。

机会终于来了。他“收到”了那封“洋人照会”。他一眼就看出了那是伪造的照会。但他更看出了那照会的利用价值。是的，罗嘉杰是他荣禄的人，这样重要的信息是他荣禄派人打探来的。他荣禄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漫不经心，可是太后啊，你瞧，我的这颗心不是永远都在你这一边吗？

他想到过他这样做的后果吗？应该想到。但在他的心中，一个国家的沉浮远没有他自己的沉浮来得重要。这是政客的悲剧：他在政治阴谋中可以显露非凡的智慧，但却永远缺少一种品质，一种关键性的最崇高最纯洁的品质——为了国家的命运暂时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

好啦，不必再说下去啦。这是大清朝的宿命：当它需要一个能够决定命运的大臣，有一种决定命运的品质的时候，它发现，它得不到。命运不再保佑它。它被这个神秘

的偶然因素用力一推。它看到了前面的万丈深渊。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凝聚已久的乌云终于迸发出雷电。看到“洋人照会”的慈禧立刻召开了第二次政府首脑扩大会议，是为第二次御前会议。

群臣是被“急诏入见”的，地点不变，仍然是在仪鸾殿。除了载漪和荣禄，没人知道会议的主题。而慈禧撕掉了一切掩饰，会议开始，立刻宣谕：刚才，我得到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就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反正不过是灭亡，一战而亡，不是强于等死吗？！

朝中大臣，过去很少看到太后如此激动，却又不解：她说“洋人照会”四条，为什么只念了三条？但在领袖如此意志、如此情景面前，朝廷大臣除了赞成，还会有另外的选择吗？

所有的大臣呼啦啦全部跪倒在地，齐声高呼：“臣等愿效死力。”

甚至有人哭出了声。

太后也忽然泣下：“我本不要他们的命，此前还允许洋兵入城，保护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他们。他们竟这样报我！”声音猛然高昂起来：“如此，拼死一战，强于受他们的欺侮！”

这时，徐桐迟到。他家居东交民巷公使馆附近，义和团已经包围了使馆，他刚刚逃出来。太后一见，贺其平安。载漪的兄弟载澜乘机奏闻太后：“臣适才发现，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大帝降临。请太后奖励拳民之神功。”



慈禧大喜，道：“当年，则天武后当国之时，玉皇大帝也曾降临，与今日之事一样。既有神明护佑，我大清不难灭尽洋人。”

群情激昂，声言决战之声，震撼殿宇。

太后于是高声宣谕：“今日之事，你们各位大臣都听到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群臣再次叩首，同声宣誓：“臣等同心报国！”<sup>③</sup>

《剑桥晚清中国史》在归纳这次御前会议的结果时说：

中国在过去的冲突中甚至无法打败一个西方国家，而现在根本不可能顶住西方列强的联合远征队。但是，当事件成为一个有关慈禧太后名誉的问题，实际方面的考虑已经降居其次。

当天，义和团烧毁了京师最繁华的地带：前门。大火冲天，延烧一日，据说是义和团烧大栅栏外国药店引起，遂致延烧甚广。前门一带，银行商店，俱成焦土。一位已退休在家的官员在日记中写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他似乎已经预见到大清朝最后的噩运。

然而，这一天，清政府并未发出《宣战诏》。

它还在等什么？

### 3. 颐和园内鬼见愁

慈禧在等待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明：义和团神功确实能把洋鬼子打败。

在她的内心，向洋人宣战已成定局。但义和团似乎尚未证明他们在洋人面前战无不胜的能力。长期以来，她关注着义和团的所有信息。朝廷士大夫们纷纷向她献策，都认为义和团“奇货可居”，是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杀手锏。高居领袖位置的人似乎永远难以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当领袖已经流露出一种确定的倾向时，下属的进言便多是谄媚逢迎了。慈禧正是走进了这样的心理误区。御前会议上的逆耳忠言，她再也听不进去。士大夫们的谄谀干进，她觉得正确无比。

一个叫曾廉的知府和一个叫王文龙的编修，向太后贡献了三条计策：“义和团的神功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可以攻占东交民巷，杀尽外国大使，这是上策。以义和团的力量，废除洋人过去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命令洋人今后按照我们说的办，这是中策。下策嘛，当然是先战后和，这就没什么意思了。”对这样的疯话，慈禧认为，“还是中策最为有力。”

御史徐道昆上奏：“朝廷担忧洋人进攻，又会先占天津大沽炮台，挟我就范。有了义和团这就不用担心啦。洪钧老祖已经在北京发出神谕，命令五条巨龙封锁大沽口。倘敌舰胆敢进攻，五条巨龙会口吐光芒，光亮闪处，立消敌

舰于无形。”义和团有如此神功，慈禧大感欣慰。

长期以来，史学界几乎一致的说法是：慈禧对义和团仅仅是利用而已。这结论似乎有失偏颇。实际上，慈禧敢于同列强宣战，与她深信义和团“法术可恃”密切相关。

这当然是一时的迷狂。但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倘若其一时的迷狂恰恰发生在最不该迷狂的时候，国家的恶运便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西方人的仇恨非自今日始。多数情况下，慈禧并不糊涂，至少懂得不能把鸡蛋往石头上碰。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首先需要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自强——以经济建设为纲，增强国力。二十年前，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西方，向慈禧辞行，二人有一段对话<sup>①</sup>：

曾纪泽：“我们中国的大臣也罢，人民也罢，都恨洋人，这是不用说的。但最根本的事情，是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发愤自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决不是烧毁一座鬼子的教堂，杀几个西洋人，就算作是报了仇，雪了恨的。”

慈禧：“可不是吗！我们和洋人的这种仇恨是一天也不能忘记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我们自己慢慢地自强起来。你刚才的话，说得很明白，决不是杀一个外国人烧一间外国房子就算报了仇的。”

当年明白如此，今日却痰迷心窍走火入魔，原因何在？

很简单。当年，慈禧能忍耐的是“公仇”，是国家的仇恨，那时，她的理性在指导着她的行为。而今天，她不能忍受的是“私愤”，是她个人与洋人的仇恨，这时，她的理

性忽然泯灭，她的冷静忽然消失，她被感情主宰了。“公仇”能忍，“私愤”不能忍——晚清中国史上一次接一次的中外战争，我们是否都能看到这样的特征呢？

那一时的迷狂就是这样产生的。慈禧本来就是个迷信的人，但在过去，那迷信不过用于宫廷的占卜，用于对自己个人命运的抉择，而今天，迷信却用于对国家命运的定夺，用于制定国策，其危险可想而知。

应该说，慈禧的这种迷狂，她的大臣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是个深居简出的人，最多的时候，不过在颐和园内那艘永不航行的石舫前郁郁徘徊，幻想着它总有一天乘风破浪，成为驱赶帝国主义的战船。是大臣们报给她的一系列有关义和团的信息，使她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幻想，而是马上就可以实现的现实。

义和团一心灭洋并且可能战无不胜的信息显然鼓舞了她。

义和团最讨厌的洋货，如洋灯、洋瓷杯，只要看见，就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他们进入北京后，每天闲游市中，只要见到有销售洋货的，看见有穿着紧衣窄袖的人，甚至看见有模仿洋式的物品，或者虽然是中国的东西，但上面却有洋字——所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人，都一律毁之杀之。见洋字而不怒者，只有洋钱。香烟是西洋来的，眼镜是西洋来的，洋伞、洋袜，也是西洋来的，只要看见有人使用，东西毁灭，人抓起来，“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义和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有一个人，“带有洋书两箱”，也被义和团众用刀砍死。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一家八口人，一律被砍死刀下”。对

慈禧来说，当她听到看到这样的对西洋生活方式的破坏，内心生发出的是喜悦，还是对愚昧行为的不解？显然是前者。不破不立。她要让自己统治下的意识形态一统江山，破坏得过头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不错，对革命运动的领袖来说，杀个把人，甚至血流成河，他都不在乎，他从中看到的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张扬。义和团的揭帖每天都送到慈禧的面前，她看到，义和团所声称的是，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都不饶放”。至于铁路、火车、电线、机器，更是他们首先攻击的对象。她欣慰地看到，在这个大清国，这么多年来，只有义和团最坚决地表示了与“洋”决绝的行动。它体现在中华民族在修辞学方面的爱好——为“洋名称”改名：“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成“鬼钞”，“洋炮”改称“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东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泐”，其意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穉”，其意为“服清”也。这在今天看来可笑而不合时宜的行动，在当年是革命的行动，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又一次接一次地重演。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破坏，还不能让人放心。在革命的破坏之后，慈禧还期待着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看来义和团也可以毫无困难地送给她。例如“战胜外国侵略者”。即使在颐和园中，她也能听到义和团们如此鼓舞人心的“诗歌”：

兵法易，助学拳，要挨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斯势萧然。  
一概鬼子今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瞧，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呀！当然，义和团曾经拒杀官兵，但他们并非真要反叛朝廷。慈禧更加欣慰地看到，义和团根本不是有意和她的朝廷过不去，简直就是在帮助她清理朝廷里面的蛀虫，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多么地令人感动呀：

是一班脏与污，竟把清朝弄坏，  
不料城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材，  
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  
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  
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

而且，这次民众的暴动，竟然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义和团根本不需要大清的江山。有一次，载漪带来的一帮义和团为她进行降神附体的表演，其中一个义和团员扮演的是慈禧最喜欢的《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她听到关云长愤慨地说道：“那洋人欺压我大清太甚！”听到这里，慈禧简直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看到了义和团的旗帜，上面写的是“奉旨义和团”，已经是向朝廷挂号后的正式组织。他们是那样的大公无私，一心一意地就想干一点有利于大清江山社稷的事情，干完了，他们就会老实实在地回老家去继续种田：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  
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

史载：“慈禧太后见义和团如此奋勇，甚为惊异。”虽然义和团在北京搞得太闹了，太吵了——“太后现移居宁寿宫，因外面喧嚣之声时达西苑，不能安睡也。”——但她的心中却对义和团充满了由衷的期待。

这天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她“第三次召见王大臣等，议和战”，仍然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但她已经不在乎朝廷大臣们怎么议、怎么说了。她的心中已经有了定盘的星，只等待义和团把他们的神通证明一下，便可以无恃无恐地向西方列强宣战了！

真是天遂人愿。义和团居然把他们可以打败帝国主义的证明送来了。

是直隶总督裕禄送来的。今天，六月十九日，正在朝廷为战为和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裕禄送来了《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况折》，其中转述了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的一份《照会》。这份重要的《照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原文，只有裕禄在奏折中的转述（译文）：

奴才于本月二十一日（公历六月十八日）接到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各国现驻大沽口外水师提督、统领等，托由该总领事转致公文一件。因为时刻促迫，来不及译成华文，其要意，乃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我们于明日早晨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他们收管，逾此时刻，不

愿善交，那么，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就会以力占据。<sup>⑤</sup>

在这份告急奏折中，裕禄还特别指明，杜士兰奏折“注明是二十日发出的，但二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照会内容说，今日（十八日）早两点钟把照会交给我们，但照会到达时，已逾时刻。这是他们的狡诈呀！”

据军机处档案载，裕禄此折以“六百里加急”到达北京，“呈上慈目”。我们已经知道，在此之前，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慈禧已经连续三次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战守事宜。但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未最后确定下来。照会的到来，更坚定了慈禧与列强决裂的决心。因此，当天，朝廷给西方驻京使馆的照会说：

中国与各国向来友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使馆弁兵等妥为约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sup>⑥</sup>

同日，清廷以八百里特快公文寄谕直隶总督裕禄，称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sup>⑦</sup>

然而，一次次的御前会议上，主和派以为“万无一国尽敌诸国之理”，不能说毫无道理，就是慈禧，虽然迷信义和团神功，也不能不考虑对列强交兵的后果。因此，在接到杜士兰的蛮横无理的照会之后，慈禧仍未立即宣战，而是对前方的情形拭目以待，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因此，她



在寄给直隶总督裕禄的上谕中，居然一口气提出了五个问题。上谕<sup>⑥</sup>说：“裕禄于二十一日（六月十七日）后并无续报”，那么——

“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这是关注北京的大门是否已经被西方列强攻占，对此问题回答的“是”或“否”，是朝廷敢不敢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关键。

“连日洋兵作何情状？”——这是在询问敌方的情势。

“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这是在询问天津的义和团力量有多大。

“能否节节接应？”——这是在询问，如果大沽口有了危险，我们的队伍能否接应上去，使西方占领大沽的企图破产。

“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还是询问天津义和团的力量。

一道短短的上谕，连珠炮一样提出五个问题，可见慈禧的关切。尤其是义和团能否与洋兵交战，最为慈禧所关注。但她自己似乎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义和团的神通是可以依靠的。裕禄在他的奏折中，向朝廷请示“出奇制胜”之策，慈禧居然给出了一个主意（译文）：

天津事机紧迫，但我听说，五台山南山极乐寺有个普济和尚，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这个和尚现在就在天津。让裕禄传我的旨意，谕令该和尚联合义和团民，设法堵击侵略者。<sup>⑦</sup>

这决非传闻，是慈禧郑重其事托付“军机大臣启秀办

理”的一件大事情！

真是国家的宿命。简直是要什么来什么！第二天，慈禧就接到了裕禄的《接仗获胜折》！

此折从天津以“六百里加紧的公文呈递”，描绘了一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百战百胜图：

八国联军的兵舰果然向大沽口开战了，但“战斗中，罗荣光（大沽口炮台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天黑远望不真，未知沉否？”而实际上，战斗不过进行了几个小时，大沽口已被联军攻陷。裕禄的这一虚假的战报，在他，可能只是邀功请赏的一纸文书，但它却把已经中风迷狂的慈禧，拖上了向列强宣战的战车。

在这份伪造的胜利捷报中，裕禄还汇报了“义和团攻打紫竹林战役”。紫竹林是各国在天津的领事馆所在地，攻打中，“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时，将洋兵击回”，洋房也焚毁不少。“我军会合团民与之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午后愈形穷蹙，纷纷窜匿。”而实际上，无论当时还是以后，义和团试图占领领事馆的战斗从来没有一次获胜！

裕禄的这份《接仗获胜折》，有许多夸大虚饰之词。他是大清朝的前敌主帅，他的奏报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最后决策。他说，义和团“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协力，奋往无前”！

毫无疑问，慈禧等待的正是这样的信息，而裕禄以他伪造的天才，恰恰送来了这样的信息！

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高压，使这个国家的所有臣民已经习惯于说假话，说空话，在所有的宣传媒介中都报喜不

报忧，总是“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在平时，这假、大、空可能确有愚民的功效，但在关键时刻，例如在战争中，它所愚弄的一定是生产愚昧假药的自己！

慈禧大喜过望。她的侥幸取胜心理被满足了。她立刻发布了对裕禄等进行嘉奖的诏书（译文）：

我中华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竟致决裂，恃其坚船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复经我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敌炮相搏，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击坏兵舰二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气亦扬。所有帮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亦执干戈以卫国家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sup>⑩</sup>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份嘉奖诏书中所用的语言，与就要颁布的向西方各国的宣战诏书毫无二致。

完了。慈禧，已经无可救药地陶醉于她那危险的对胜利的激情。这丧失理智的激情，仿佛火星溅入了火药库，一举毁灭了一切争取和平解决事端的希望。

六月十九日，就在接到裕禄《接战获胜折》的当日，慈禧召开了第四次，也就是宣战前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其实，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没什么可商量的。慈禧已经决定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

但还是有一段插曲。太后决定宣战的懿旨一出，光绪

皇帝流出了眼泪。当时，慈禧正命令外交部的许景澄，“往告各国使臣，限他们在二十四时内离开北京，派兵护行。”光绪忽然走下了龙座，到许景澄面前，拉住了他的手，说：“慢点，慢点，更妥商量。”然后，君臣二人“对泣”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朕一人死不足惜，可为什么要连累天下的生灵呀！”

慈禧一见，怒道：“皇帝放手！你不要误事！”

但皇帝这非同寻常的举止，显然感动也振奋了主和大臣们的心。侍郎联元说道：“法兰西是传教国，这次挑衅，说起来是从法国开始的，就是打仗，我们也只能同法国一个国家打，断然没有同时与八个国家结怨的道理！一定要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宣战，我们的国家就危险啦！”说着，眼泪也流下来。

载漪大怒，道：“联元通敌，杀了联元，夷兵自退。”

慈禧“立召左右斩之”。最后竟然是载漪的哥们儿庄亲王载勋把联元救了，因为联元是载勋的女婿。

但军机大臣王文韶忽然发言了。王文韶外号为“玻璃球”，是根老油条，很长时间以来，任凭整个国家在危难中左右摇摆，从来也没参与过一次意见。但现在，宣战在即，一念之仁，他忽然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他说：“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少兵单，众寡强弱之势，一目了然，一旦开衅，我们可怎样善后呀，愿太后三思而后行！”

慈禧大怒，忽地站起来，一手“击案”，一手指着王文韶“骂之”：“你这种屁话，我平常听得多啦，用得着你说吗？你要有本事，去，让那些洋兵别到北京来！要是做

不到，我就杀了你！”

王文韶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发言了。

决定大清国命运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sup>①</sup>慈禧命令军机处立刻“拟宣战诏”，准备“明日颁布”。然后，她打道颐和园，去干她宣战前的最后一件事情。

颐和园内耸然立起了一座十丈高台。那是一座特殊的义和团拳坛，是一座象征性的拳坛，表示着中央政府对义和团的最终认同。它如此高大坚固，显示着慈禧再也不可更改的决心。高台四周，旌旗林立，香烟燎绕，一派肃杀景象。高台之上，集中了义和团中的几乎所有神仙，个个都有神人附体，舞蹈着，高唱着新编的更加蛊惑人心的歌谣，听着，必会产生无往不胜的信念。慈禧亲自给这拳坛命名“鬼见愁”。<sup>②</sup>

所有的太监、后妃、宫女们都换上了义和团的服装。颐和园内，人人红装素裹，个个飒爽英姿，每人一柄战刀，或者，一把红缨枪，老太后带领着他们，朝着拳坛跪倒，向义和团的神仙们祷告着他们由衷的愿望：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清朝中央政府终于画完了与义和团合体灭洋的最后一笔。

#### 4. 宣战诏

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六月二十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慈禧太后率领着由义和团排列护卫的队伍，从颐和园出发，

朝紫禁城开去。临行前，老太后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召开了誓师大会。首先亲赏“鬼见愁”拳坛上的义和团首领两千两白银，并册封其为亲王。这是大清朝第一次把皇室亲王的爵位封赏给一个平民百姓，也是最后一次，连名字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来。封赏之后，慈禧发表了最高指示（译文）：

洋人命运该绝，就好像鱼在釜中。四十年多年啦，我忍辱含垢，卧薪尝胆，要把西方列强赶出中国，就好像古代的越王勾践之心，未尝一日忘记我中华的耻辱。从前，我对待洋人，不可谓不宽大。从前我不是请公使夫人们经常到西苑游玩吗？现在，我们全国军民一心，敌忾同仇，一定能战胜西方列强，一定能！这是毫无疑义的！<sup>⑧</sup>

君臣民众，振臂高呼，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口号响彻云霄。然后，老太后举起一把剑，朝前一指，队伍出发了。她到一个正式的场所，到金銮宝殿之上，去宣布已经拟罢的宣战诏书。

从颐和园到紫禁城，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这是一段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路程，是稳定的希望渐渐消失于无形的路程，是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由于私愤而将国家命运孤注一掷的路程，是通往坟墓的路程。在这决定命运的路程中，慈禧太后，就不会有丝毫的理性思维在她的头脑中暂时地停驻吗？难道她再也不考虑她的国家和她的人民，一心只想着复仇，想着自己的面子，想着哪怕血流成河，也要把自己的面子挣回来？在她执政的四十年中，不能说她

没有高明地解决过一项又一项难题，渡过一次又一次难关，变乱为治，并曾经创造了大清朝的中兴局面，而今天，她真的要亲手葬送自己手创的事业，再次变治为乱？

——快马接连送来了两道电奏，一道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的，“请先定内乱，再消外辱。”另一道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长江巡阅使李秉衡的联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各国使馆，致电各国道歉，明谕保护洋商教士，并请美国从中调解。”这几乎表明了所有封疆大吏明智的政治态度。

——慈禧看罢，冷笑一声，立刻让军机大臣宣谕懿旨：“通谕各省督抚，中外衅端已成，勿迟疑观望，应联络一气，共挽危局。”

绝不是说慈禧太后那曾经钻石般明彻敏锐的心智已经衰退。绝不是。但当事情有关她的面子时，她的心智确实丧失了分寸感。这似乎是必然的。多年来，多少次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却不可思议地办成了嘛！她曾经在大赌博中——例如一次又一次的宫廷政变——大赢特赢，简直闻所未闻，超越了赌博的一切规则；一个习惯于如此巨额赌注的心灵，怎么能不产生新的要以更加不可思议来超越不可思议的愿望呢！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来最疯狂的事情，在慈禧那里却没有丝毫的内心慌乱。由于曾经获得过空前的胜利而对自己的能力失去现实的分寸感——那权力意志和疯狂冲动的结合，确是专制王国中最壮丽的自然景观，好像晴天骤起风暴，蔚为壮观。这当然是冒险，但独特的事业从来就是从冒险中得来。

——外交部官员又送来了各国大使馆的照会，“请中国

政府允许八国联军的统帅西摩率领军队进入北京。”还有已经集结在大沽口的各国提督向各省督抚的宣言保证书，“各国联军仅对拳匪及阻止联军进京救援公使者作战。”

——胡扯！你们已经把军舰开到了大沽口（此时慈禧仍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失陷），还说是“救援”，不说是“侵略”吗？！谕令荣禄：“通知各国大使，愿意出京，可听其便。”什么，大使们说，他们不敢走出使馆，“请允许我们的军队进京，保护我们离开”？嘿嘿，不行！“若留京不去，那是他们自己讨死，不要说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也！”

一下子可以向西方列强以如此口气说话，这感觉真好！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过去，只有在内政问题上有这样的感觉，例如头上没有皇冠时，说一句话，那皇冠就乖乖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头上。现在，终于对西方列强都有这样的感觉啦！让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既然内政的成就可以日新月异，那么，外交上的态度也应该壮志凌云。既然战胜过命运，为什么不对命运发出更加大胆的挑战！那些就知道与西方讲和的大臣们，太近视，太肤浅，考虑的仅仅是当代的事情、眼前的现实，而老太后可没这么没志气。“我是中国的伊丽莎白！”她多次这样想，这样说。一个普通人的理想和一个女皇的理想，其距离会有多远？慈禧经常考虑是她——一个女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传奇！普通人会这样考虑问题吗？

上午九时，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信息：董福祥的甘军中，一个满洲兵名叫安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上，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此时，慈禧所率领的义和团队伍刚刚到达紫禁城，立刻升殿，细听汇报。宣战之前，发生这样一



件大事情，为战前的气氛凭添了一缕血光。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这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到了。上午十时，碧空如洗，本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但即将到来的战争酷热却使本已喧嚣不堪的城市喘不过气来。紫禁城内，异乎寻常的骚动初露苗头：官员们在角落里窃窃私语，金殿内外，人数空前，神秘而紧张的幽灵在会场上游荡，因为消息已经传出，说是今天肯定要宣战。所有的人全都惊惶地察看同事的脸色。每一个人都迟疑着，战栗着，仿佛城市上空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窒闷，会场上笼罩着不祥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消息已经传入紫禁城，会议开始前，它当然成为首先议论的话题。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庆亲王。杀人者安海认为，在举国上下对洋人的一派喊杀声中，他杀死了一个外国的大官，肯定会得到“不次之赏”。而庆亲王是主持外事的，他要得赏，当然要找庆王。他没有料到，正因为庆王懂得外事，所以才一听就急了。

“混蛋！那外国公使能杀吗？讨赏？你讨死吧！”

安海讨个没趣，便去找载漪了。载漪一听却“大乐”，亲自代安海找庆王讨赏来了。

庆王说：“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杀死外国驻华公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吗？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这次杀的却是由国际公法保护的使臣！杀人家的使臣，简直就等于向人家的国家宣战呀！糟啦，这必动各国之怒呀！”然后，他讲了咸丰十年的那件事情：本来正在谈判期间，可我们把人家的英国议和使臣给抓了，还

给弄死了，其后果是，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端王，殷鉴不远，殷鉴不远哪！”

其时，军机大臣刚毅在旁，说道：“杀一两个洋鬼子，算甚么大事！不日即将各使馆扫灭净尽。现杀死一个公使，什么要紧？！”

庆王见这些国务大臣根本不懂国际公法，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懂，便说：“那只好奏闻太后了。”

慈禧太后在路上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此事。她已经在想着更大的事情，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史料记载，这一天，会议一开始，她便一副庄严的样子，登上了大殿。每一个人都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她的身边有一个侍从，双手颤巍巍地捧着一个黄匣子，好像那里面不是一卷纸，而是一座山。根本不用猜想，那里面装着的，是即将发布的宣战诏书！会前的闲聊和窃窃私语顿时停止，人人都恐惧地斜眼溜着那只黄匣子和那张万分熟悉的脸。而她，慈禧太后，这男人堆中的唯一的女人，为了给这最后的会议增加更大的压力，慢慢地、冷冷地扫视全场，从左扫到右，从右扫到左，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把整个会场上呆愣愣、活似中了邪的官员们打量了一遍。这是必要的。这会场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动摇分子，包括就在她身边的光绪皇帝，他们还想求和。不行。今天，决不再允许他们把一个“和”字说出口！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一天的情景，认为慈禧太后人为造成的紧张空气确实惊心动魄。她有这样的才能，能使恐怖变本加厉地恐怖，能使人人都强烈地感受到她沉默不语时所造成的铅一般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压力。她做到了。

她肯定能做到。在这个专制帝国，在宫廷里，同志间推心置腹、随便交换意见的气氛压根儿没有过。人人都明白今天要干什么。人人都明白向列强宣战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意味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那么，可以争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如果它意味着最高权力的脸皮问题，那么，别说了吧，顺着她的意思干吧！专制帝国的臣僚们最大的恐惧是：突然离开最高权力！因为，这将意味着你过去什么都有，而从此你将什么都没有！快，转弯要快！快适应新的风向。义和团已经开始抄家了。抄所有敢于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大臣的家！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默许，这如何能够做到。此前的御前会议上，他们还有一部分人，敢于献身于自己的信仰，热情澎湃，勇猛地投入言词和见解的战斗，如今人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观点。没办法。刽子手已经闯入自己的生活，左右开弓，把人攫去，咔嚓一声，脑袋掉了。既然断头台已经像鬼影似地监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那么，还是沉默为妙。先躲在别人的后面。要做个手势，也得先左顾右盼一下。恐惧仿佛愁云惨雾，在他们的脸上打上了灰色的烙印。

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还是成为这次重要会议的话头。谁有这么大的胆量，敢于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这样的话题？是慈禧太后本人。

她问：“那个德国鬼子，谁杀的？”

庆亲王答道：“一个叫安海的。”

她问：“安海是谁的人？”

庆亲王答道：“是董福祥的人。”

她问：“董福祥来了吗？”

忽听大殿之外，仿佛响起一声霹雳：“奴才董福祥叩见老佛爷！”然后，一个全身披着战甲的汉子，昂首踏入大殿，到达慈禧眼前，忽然跪倒，听得噗嗤一声，仿佛摔了一个跟斗。

慈禧的一双老眼忽然闪亮了。这一刹那间，人人都明白了：这是宣战之前，慈禧亲自导演的一出戏。此前的御前会议上，当有人提出，向西方各国宣战，太后将所恃何人时，慈禧应声答道：“我恃董福祥！”从此，董福祥这个名字便在所有的大臣心中扎下了根。没人不知道这个人。但此前，人人都没拿他当回事。或者说，人人都觉得他不是个东西！他本是甘肃的回回，二十年前，回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但清廷的大军一到，他立刻叛变了自己的信仰，摇身一变，成了清朝的走狗。他组成了一支甘军，反戈一击，把自己的同胞杀得血流成河，为清朝政府平定回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得到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从此成为统领回民军队的领袖，而他的军队——甘军，也成为大清国武卫军的一支，成为国家的柱石。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军官，这样一条走狗，是没有自己的信仰的，主人的召唤就是他的一切。此前数天，他以为主人的意图是剿杀义和团，曾经自告奋勇，说他有能力把义和团赶出北京去。而现在，他揣摩主人的意图是杀洋人，因此不等主人召唤，他便已经动手了。

慈禧问：“董福祥，听说那洋人是你的手下杀的？”

董福祥答：“是。洋人都该杀！”

慈禧说：“洋人很厉害的，这朝上的许多人都怕，你不怕吗？”

董福祥“咚”的一声，把拳头捶在胸膛上，吼出了被记载在《清史稿》上的那句名言：“奴才无它能，唯能杀洋人而已！”

慈禧忽地站起，说道：“董福祥，你果然是我可以依靠的。但愿人人都像你一样。你认为我们应该先干什么？”

董福祥：“奴才以为，先攻使馆，是为上策。”

慈禧立刻宣谕：“你就去干吧！”

然后，慈禧的目光扫射全场，大声说道：“今天这次会议，我没有更多的话说。该说的过去全说了。衅非自我开。他们逼到了我头上。我不得不如此。好，宣旨吧！”

早就准备好的黄匣子打开了。《宣战谕》响彻紫禁城（译文）：

我大清朝已经经历了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列祖列宗没有不以怀柔政策对待他们的。自从道光、咸丰年间开始，我清朝俯准你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开辟市场，你们还乞求在我国传教，朝廷以为，你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因此，勉强答应了你们的请求。开始的时候，你们还在我们中国划定的圈子里，规规矩矩的，遵守我们的约束。没料到，三十年来，你们凭恃我国仁厚，竟然越来越放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每当朝廷稍加迁就你们，你们就愈加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从小处说，你们欺压平民，往大处讲，你们侮辱神圣。我国人民，都是朝廷赤子，面对你们的欺压，怨气难平，仇恨在心，人人都想报仇雪恨，这就是我们的勇敢而且忠诚的义和团焚烧教堂、屠杀教民的

原因呀！但尽管如此，我国政府仍然没有向你们翻脸，此前我们一直保护你们，那是恐怕伤害到我国人民呀！所以，此前，我们一再降旨申禁义和团，保卫外国的驻华使馆，对被害教民们加以体恤。就在前几天，我国政府还颁布了无论义和团民还是教民都是我大清赤子的谕旨，这都是为了人民和教徒之间解释宿嫌呀！我大清朝政府以怀柔政策来对待你们这些外国人，所做所为，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仁至义尽呀！

可是，你们这些外国人根本不知道感激我们，反而更加放肆要挟。最近，还向我国政府索要大沽炮台，说什么要归你们这些外国人看管，如此放肆猖獗，震撼畿辅。在平时，我们和你们，好像邻居一样互相往来，我们对你们可是从来没有失礼的时候。你们自称是文明教化的国家，竟然如此无理横行，以为凭借你们兵坚器利，就敢于这样自取决裂吗？我，大清朝的皇帝，临御将三十年，对待百姓就好像对待子孙，百姓也爱戴我这个皇帝就好像爱戴天帝一样。况且，我国人民的圣母皇太后，她老人家中兴宇宙，恩德无所不至，那恩德呀，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肌髓里，成为我们的祖宗所凭依，天神所感恪的呀，真是世世代代所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呀！

我，大清朝的皇帝，现在痛哭流涕，在列祖列宗的灵前祷告，慷慨陈词，以誓天下：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挾伐，一决雌雄！连日来，召见大小臣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无论在首都北京，还是在山东等省，我国的义和团民，在一天之内，根本没人呼唤而集中起来的，一下子就达到数十万人，甚至于身高不足五尺的儿童，也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你们所依靠的，不过是诈谋而已，而我们所依靠的却是天理，你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凶悍的力量，而我们所依靠的乃是我们人民的心。我们中华民族，忠信就是我们的甲冑，礼义就是我们的战船，人人敢死，不怕死！我们的土地是多么广道，有二十多个省份，我们的人民是多么众多，多至四百余兆。如此土地，如此人民，要灭掉你们的凶焰，张扬我中华之威，有什么困难的！

现在，战争爆发了！我国人民呀，你们要同仇敌忾，陷阵冲锋！如果你们有人仗义捐资，助益购餉，朝廷一定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勳。但如果有人苟且偷生，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朝廷也一定即刻严诛，决不宽贷！

你们，普天之下的官官民民呀，一定要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呀！我，大清朝的皇帝，对你们怀有深深的期望啊。钦此！<sup>⑩</sup>

北京人民看到，与《宣战谕》一同颁布并张贴在大街小巷上的，还有一道《悬赏令》（译文）：

自今日起，杀一男性外国人，赏银五十两；杀一女性外国人，赏银四十两；杀一外国儿童，赏银二十两。<sup>⑪</sup>

说到做到。一个大使馆里的洋人，不知道中国已向他们宣战，竟然走出了使馆。董福祥的士兵抓住了他，把刀横在他的脖子上。那洋人不懂华语，“口中啞啞吸吸，不知所说何语？”士兵砍了他一刀，未死，带至庄亲王的府邸，将他正式处以死刑，以为“其余之洋人鉴之”。

第二天，北京人民发现，那个被杀死的洋人给展览了出来。洋人没有辫子，便把割下来的头颅装在一个笼子里，高高地悬挂在东安门的正梁上。人们发现，那洋人的面目狰狞可怕。北京人奔走相告，全都跑来围观，视为国家的盛事。

战争终于开始了。

### 【注 释】

- ① 首次御前会议，综合如下史料：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罗惇焜《庚子国变记》、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 ②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P. 340。
- ③ 二次御前会议，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 ④ 下面这段对话转译自（台湾）庄练《晚清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P. 1。
-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 147。
- ⑥ 同上，P. 152。
- ⑦ 同上，P. 153。
- ⑧ 同上。
- ⑨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 ⑩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 162。
- ⑪ 第四次御前会议，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罗惇焜《庚子国变记》、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等。
- ⑫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 ⑬ 同上。
- ⑭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 ⑮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 第十章 战争（上）

### 1. 廊坊战斗<sup>①</sup>

一九〇〇年六月九日晚，夜色笼罩天津城。法国领事馆内，西方各国驻津领事，与海军军官们一起，召开了紧急会议。

此时，距中国政府向西方宣战还有十天。义和团已经进入北京，驻京使馆已经告急，各国派兵护卫使馆的请求被中国政府批准，三百名联军已经进入北京，但要求增兵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驻北京公使们只得向天津方面告急，请求联络各国在华海军舰队，迅速向北京派遣护卫使馆的第二梯队。紧急会议就在如此局势下召开。

战争尚未开始，各国意见分歧。英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美国的统领们一致同意，尽快尽早，修复通往北京的铁路，立即派兵进京。但俄国人和法国人提出异议：津、京之间，多处铁路已被拆毁，部队行进将如蜗牛爬行，而

且，只能派出一支不足两千人的部队，就算真能进入北京，要对付数十万义和团（此时他们还不相信中国军队会向各国作战），岂非以卵击石！

但北京使馆发来的紧急电报就放在会议桌上，那急促而惊恐的字眼，震撼着每一个西方领事的心：“形势极为严重，除非立即设法向北京进军，否则就来不及了！”<sup>②</sup>

俄、法领事再次扫了一眼那电文，叹了一口气，表示：尽管他们觉得无济于事，但如果会议决定派出赴京远征军，他们两国将不惮前驱。

决定了。尽管并不具备向北京输送救援部队的条件，但还是决定了。领事会议通过决议：明天早晨，救援军出发，请直隶总督裕禄提供火车膳宿条件。战争并未开始，此行纯为救援，这要求似乎是正当的。

没有史料表明，裕禄是否为这支救援部队提供了膳宿条件，但第二天清晨，在天津火车站，三列火车确实准备就绪：

第一列火车：八节客车，三节敞篷车，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

第二列火车：十一节客车，十一节敞篷车，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三节满载着补给品的车厢。

第三列火车：三节客车，八节敞篷车，五节满载着枕木的货车。

转天（十一日）又发出了第四列火车，其组成与第三列火车相似，只是敞篷车直接挂在机车后面，它们被改装成铁甲火车，还架上了机关枪。

救援联军的组成人员是：九百一十五名英国人；四百

五十名德国人；三百名俄国人；一百五十八名法国人；一百名美国人；五十二名日本人；四十名意大利人；二十五名奥地利人。这就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一批部队，共二千零四十人，最高统帅为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西摩爵士。

救援军的任务是：修复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到北京救援使馆人员。

六月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火车发出了震耳的长鸣，黑烟滚滚，朝北京驶去。<sup>③</sup>

当天下午一时，火车到达离天津三十英里的杨村。到此为止，铁路干线状态良好，没有义和团活动的迹象。联军发现，杨村附近，大清国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指挥的中国皇家军队已经扎营，四门火炮架设在战略要地，控制着车站月台和铁路，没有表现敌对行动。火车停车加水后继续前进。整个铁路沿线有中国士兵守卫。

情况瞬息万变。联军行进到杨村铁桥三英里处，麻烦来了。铁路受到严重破坏：铁轨被掀翻，枕木被烧毁，桥梁歪歪斜斜。西摩决定：停止前进，修复铁路，今夜在此宿营。

六月十一日中午，铁路勉强修好。火车可以继续向下一个车站——廊坊进发了<sup>④</sup>。当晚，联军司令部驻扎在廊坊。

但第二天清晨，联军士兵睁开眼睛，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前进。铁路被完全拆毁了。有破坏的地方肯定有义和团。虽然还没有撞上，但联军在二十四小时内仅仅前进了三英里。直到十三日，没能离开廊坊地区。

探哨发现，联军前方两英里处，发现大量义和团。同时，北京信差到了，报告说，虽然尚未宣战，但清帝国军队已经准备行动，以抗击外国军队进城。日本使馆秘书杉山彬先生在去车站途中被杀害。大使馆人员已经准备自卫。

看来，必须加快修复铁路的进度。但就在这时，战斗开始了。

六月十四日，大约上午十点钟，一些联军士兵正在铁路上干活，其他人正在休息或洗衣服，廊坊义和团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进攻。被庄严载入史册的廊坊战斗打响了。

这是一次偷袭战。义和团隐蔽着，慢慢地接近联军列车，直到约距二百码的地方，忽然吼声震天，义和团亮出了战斗的旗帜，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只见一片红彤彤的旗，红彤彤的人群，像红色的巨浪，排山倒海般朝联军扑压上来。义和团的目的很明确：夺取并摧毁铁甲列车。

不及防范的联军士兵就地卧倒，持枪射击，火网交织着，笼罩住勇敢的义和团员们。但，义和团在进攻前举行了降神附体仪式，认为自己刀枪不入。密集的火网中，他们毫不隐蔽，“仍以惊人的勇敢向前冲锋，完全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毫不顾及自己生命地挥动着刀剑”。就这样，义和团向前冲锋了一百二十码。但到达最后六十码前时，联军的一挺马克沁机枪喷出了火焰，它的威力是可怕的，数以千计的子弹呼啸着，钻入义和团员们坚实的肌肉中。

联军士兵发现，那些未死的义和团员们忽然愣呆呆站住了，过一会儿，忽然恐惧地大叫着，掉头逃跑。联军的士兵们猜想：“这些义和团先前的勇敢，无疑或多或少地来自他们自认为刀枪不入的信念，但当后面的队列踏在前面

队列的尸体和倒下的伤员之上时，他们的勇气丧失了，扔下了长柄叉、大刀和火绳枪，为了宝贵的生命逃走了。”

为了证实他们的猜想，战斗结束后，联军士兵检查了死亡的义和团员的尸体。“这些中国人被小型穿孔弹击中后的生命力是令人感兴趣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了一个或两个弹头之后仍继续冲向机关枪，经检查，不少尸体上都有四个或五个以上伤口。他们中的一些较勇敢者的尸体离联军阵地仅四十码，战场周围挤满了一百五十个倒下的死人，成了他们冲向我们的速射枪鲁莽行为的牺牲者。”

廊坊战役的第一次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联军无一伤亡。

但联军在搜索周围村庄时，却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太分散了。一个意大利士兵掉了队，被义和团包围后杀死。最后点名时，发现还少了五个人：一个下级军官和四名陆战队士兵。后来找到了，已经全变成了烂肉和骨头。他们不仅被杀死，尸体也被肢解。

当天下午，联军在廊坊地区的落堡车站集中。这时，义和团，估计有两千人，发动了廊坊战役的第二次进攻。

结果是同样的：义和团被击退，留下了五六十具尸体，联军无任何伤亡。<sup>⑤</sup>

不过，联军发现，尽管在与义和团的战斗中他们大出风头，但实际上，他们所处地位已如瓮中之鳖。前方，铁轨被拆掉，并搬运到数英里之外。后面，他们修复的铁路又被全部拆毁，通往天津的交通已经断绝。从北京来的信息是：义和团正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清朝政府已经准备向西方宣战。而从天津来的信息更糟糕：整个天津城区已处于义和团的控制之下，教堂几乎全部被烧毁，并逼近天

津领事馆地区，呈现出包围态势。更要命的是：这支救援军已经无法保持通畅联络，缺少弹药，缺少补给，水井被下了毒，简直是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呆下去也不得！大批清帝国士兵已经驻扎在杨村附近，堵住了他们后撤的道路——联军司令官认为——他们已经修复的铁路又被破坏，完全可能是那些表面上派来保护铁路的士兵们干的，破坏铁路的活动现已肯定是受命进行，是中国官员指使的。<sup>⑥</sup>

他们猜对了。这一天，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阻洋兵进京事”。并发出谕令：“命裕禄，如洋兵来京，即力为阻拦，如不肯从，即相机从事。”

于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被调回天津，董福祥的甘军也从北京向廊坊地区星夜驰骋，准备将赴京的西方联军歼灭于廊坊地区。

同时，天津塘沽的大沽口防务变得尤其重要起来。

西摩联军即使能够进京，也不过是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大沽口一旦失守，天津和北京的门户就大开了。到那时，西方军队将源源而来，战争局势将大大逆转。

大沽口，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这个地点，这个时间，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

## 2. 血染大沽

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准备登陆的

八国联军舰队司令官，在英国军舰“露西亚”号甲板上，召集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记录内容如下：

自从动乱开始以来，联军各国已经派遣分队登陆，以保护其侨民及外交使团，对付通称义和团的叛乱，并未受到阻挡。

起初，清朝当局似乎还了解到他们的义务，并做出明显的努力，企图恢复秩序，但是，现在，他们调集军队到铁路线上，并且在白河口布雷，明显地表现了对外国人的敌人的同情，此种行动表明清政府已忘记其对外国人的庄严协定。

由于联军各国司令官有必要和登陆的分队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决定通过协商或武力暂时占领大沽炮台，规定将炮台交付联军的最后期限为十七日上午二时整，并将此项决定通知驻津总督与炮台司令官。<sup>⑦</sup>

中国大沽口炮台司令官是罗荣光。他的官衔是天津镇总兵。此前，他本已受命担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尚未走马上任。这一迟到的上任，给予他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这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典型的中国军人，荣登史书，成为民族英雄。

“露西亚”号战舰会议之后，军舰上放下了小船，朝大沽口炮台驶去。在一位翻译陪同下，联军舰队军官拜访了罗荣光将军。根据一份简约的记录，罗荣光拒绝了联军提出的一切要求。<sup>⑧</sup>

舰队军官：“罗将军，您了解当前的局势吗？”

罗荣光：“当然了解——你们的军舰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舰队军官：“我们希望您通知你们的总督大人，明天凌晨二时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我们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罗荣光：“这是不可能的！”

舰队军官：“我们希望这有可能——你们撤出炮台的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届时，联军将进攻。”

罗荣光：“悉听尊便！”

谈判就此破裂。

但根据另一份记录，当联军舰队军官要求罗荣光交出炮台时，罗荣光向正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进行了请示。他立刻接到了裕禄的明确命令：“进行战斗。消灭一切洋鬼子！”于是，罗荣光便把这命令“通知了当时在场的高级军官、德国“依尔底斯”号的兰孜上校”。同时，数千名从山海关调来的中国士兵进入大沽口炮台，并立刻布置水雷，以阻断河口。联军就此提出了抗议，但毫无结果。<sup>④</sup>

两份记录，开头一样，结尾一样，过程不一样。这无关紧要。联军准备进攻，中国准备迎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必须战斗。大沽口位于天津东南，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北京通向海洋的东大门，更是天津的海防前哨，华北及畿辅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军舰就三次入侵大沽口。

此时此刻，大沽口驻守清军有两千多人。它有四座炮台，南、北岸各两座。南岸的主炮台，亦称南炮台，安设



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在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北岸的主炮台，也叫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在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守卫大沽海口的，还有向外国新购置的三千吨位的“海容”号巡洋舰和“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鱼雷艇。<sup>⑩</sup>

谈判破裂后的当天下午，联军各舰队司令齐集俄国炮舰“保布”号，召集了一次联席会议，开始制定严密的进攻炮台计划。<sup>⑪</sup>

下午三点，各舰先遣队开始外围登陆，以便在海上进攻时从陆上配合，强攻炮台。先遣队由英、德、俄、日四国士兵组成，俄国人和德国人在河的南岸，而英国人和日本人则在北岸登陆。他们发现，在大沽口炮台的码头上，停有四艘清军的德国造鱼雷驱逐舰。

联军先遣炮舰逆流而上。大沽炮台派出了平底船，在河口沙洲上分散布雷。当三百六十吨的双桨鱼雷驱逐舰“怀特因”号越过沙洲时，一颗水雷碰到了它，遗憾的是，它没有爆炸。

天黑了。除俄国“高丽芝”号和美国“莫诺卡西”号炮舰外，上游各舰都采取了移动泊位的预防性措施。据分析，俄国炮舰没有移动，是因为该舰司令认为毋须移动。而美国炮舰未曾移动，是因为美国根本不准备参加战斗。该舰司令卜鲁斯接到了来自美国华盛顿的指示：他不能向一个和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发起任何战争。

但战争一旦来临，炮弹却不长眼睛。

关于大沽口战斗，究竟是谁打响的“第一枪（炮）”，中

外的记录截然相反。中方的记录是：联军舰队没等到其最后通牒时间——凌晨两点，便猝然向大沽炮台开炮！而西方的记录是：零点五十分，从罗荣光的阵地南炮台放了第一炮，于是战斗就开始了。

唯一没有争议的是：战斗打响前，罗荣光指挥大沽炮队，将炮口瞄准了敌方所有军舰。于是，提前进行了泊位移动的军舰避开了第一批炮火，而未曾移位的俄国“高丽芝”号和美国“莫诺卡西”号炮舰，承受了中国炮位的全部火力。

俄国“高丽芝”号首先被重创起火，螺旋桨被炸，十六人当场被炸死，其中有四名军官，四十五人受伤。

美国“莫诺卡西”号指挥官威斯站在舰桥上，安慰并鼓励聚在甲板上的妇女和儿童。这是一道奇特的战争景观。战舰上为什么会有妇女和儿童呢？难道该舰是到中国内海来观光旅游的？炮弹嘶嘶作响，爆炸声震耳欲聋，但还是掩不住妇女和儿童恐惧的叫声。指挥官威斯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我们没有参战，我们的军舰处在绝对安全的位置！”这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寻找到“莫诺卡西”号船头，轰的一声，爆炸了。

根据记录，中国大沽口炮兵阵地与西方联合舰队的海上炮战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

炮火中，联军舰队移到河流转弯处。此时，各舰所处位置虽然不同，但距大沽口炮台的曲线射程，基本在四百码到二点五英里之间。那里被认为是射击炮台的最佳位置。

奇怪的是，根据敌方记载，中国的四艘德国造鱼雷驱逐舰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交织的炮火中，英国的

“牙鳕”号和“名誉”号战舰各拖一条载着十人的小船驶向大沽码头。四艘中国鱼雷驱逐舰束手就擒，船员仅进行了一些无力的抵抗，放了几枪，就跑上码头，逃命去了。而中国的海军旗舰——二级巡洋舰“海容”号，从始至终，没有显示任何参加战斗的迹象，它竟被联军“拘留”了。

但大沽炮台的中国守军，在提督罗荣光的指挥下，英勇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他们的战绩是：

——“依尔底斯”号中八发炮弹，其指挥官兰孜失去一条腿，一位军官和六个士兵死亡、九人负伤；

——“力勇”号被击中一次并起火，一人死亡、四十六人负伤；

——“机略克”号被击中四次，其中一次在水线以下，不得不抢滩，八人死亡，其中两个是军官，四十六人负伤；

——“高丽芝”号中五发炮弹，其中一颗使其着火，五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

——“保布”号上有一人负伤。

黎明前，在舰队炮火掩护下，联军强攻部队开始进行登陆战。先导部队是二百名俄国和奥地利人，中军为三百名英国和意大利人，另外三百名日本人为预备队。起初，联军部队以平行纵队推进，但大沽炮台发出的准确而强烈的炮火打散了他们。入侵者不得不采用了散兵阵容。

破晓了。东方地平线，太阳没露头，但已把血一样的腥红酒在辽阔的海面上。西北炮台的大炮首先沉寂了。但南、北炮台仍然顽强地坚守着。

俄军先导部队被炮台的强大火力所拦截，进展缓慢。英国和意大利并肩作战的中军首先接近了大沽炮台。后卫的

日本人更是进展神速，他们追上来，加入了前面两个作战团队。

太近了。大沽炮台的远程大炮失去了威力。但守军勇敢而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始终保持着密集连续射击。于是，敌军的步枪插上了刺刀。白刃战开始了。

日军的指挥官名叫服部，是一个小个子上校。他冲在整个联军主攻部队的最前面，第一个进入大沽炮台通道。他率领着日本士兵呐喊着扑向炮台，在距离炮位数码的地方，一颗子弹射中他，立刻倒地死亡。几乎在他倒地的同时，另一个日本人，名叫白石的中尉，立刻接替了指挥，冲了上去。

大沽口西北炮台终于失守了！

一个日本水兵抢先爬上旗杆顶，准备升起太阳旗。忽然，一颗子弹将其击落。他当场死亡。结果，英国国旗首先在大沽口升起。但后来在对战事进行总结时，各国联军一致同意：是日本人首先攻入了大沽口炮台。

西北炮台掉转了炮口，向中国守军仍然坚守着的北炮台和南炮台轰击。英国人和意大利人顶着炮火向北进攻。很快，又是英国国旗被首先升起。

现在，北炮台也掉转了炮口。只剩下南炮台了。它在四面八方交织而来的炮火下震颤着，仍然顽强据守。但它再也守不住了。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早晨六时三十分，天津的前沿阵地，北京的大门，大沽口炮台，落入了八国联军手中。一个英国人掏出怀表，计算了一下从进攻到占领的时间：五小时四十五分钟。

但据一位西方战地记者的报道，联军如此顺利地占领大沽口，是件十分偶然的事情。他说：

不知怎样的，塘沽陷落的那一天，联军向大沽炮台一个一个的攻击，发炮。很神秘的，一个法国炮弹，恰好落在中方的大火药库，于是爆发起来，他们的炮兵，遂散乱起来，于是日本人便占据了 this 炮台，以便攻击对面的炮台，俄顷中国军，遂开始败北了。如果没有这个偶然，则大沽口外的所有外国舰队，是不免完了的。而联军的军力之登岸，是成为问题或不可能，而战事将变成另一局面。<sup>⑫</sup>

太阳升起，阳光照射大地，一片寂静，呈现出一幅死亡、毁灭的画面。血色中，八国联军各国的旗帜在各个炮台上空升起。官兵们脱帽致哀：那天夜里，联军六十六人战死，其中有六名军官，负伤者一百七十人。

而中国的数千名大沽炮台守军全部阵亡。只有罗荣光在炮台失陷后退至天津。在天津城陷落的前三天，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他吞下毒药，壮烈殉国。而在大沽口失陷后，映入联军将士眼帘的是：“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发现断手、断脚、断头的英勇捍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可以说是“积尸如山，流血成渠”。但没有人向他们致哀！

血染的阵地上，八国联军一致同意在中国国土上发布以下告示：

联军各国在华水师提督及高级海军军官们通告中国各总督以及沿海沿江各省各城当局，联军之意，只是对义和团和那些阻碍我们进军北京营救我们同胞的人们使用武力，其各周知。

一小时后，七时三十分，德国海军少将打电报给本国海军部：

联军今日上午占领大沽炮台。夜半零点五十分开始炮击，约于早晨六点三十分结束，详情后报……

情势更紧张，整个中国北方都在战乱中。与天津的联系中断。昨夜听见天津有激烈的炮火声。联军将固守大沽炮台及塘沽，并于兵力充足时前去解救天津围困。香港来兵可望于明日到达，从威海卫来的三百士兵可望后日到达，估计天津周围战斗仍在继续，我们在天津的防守部队需要三千人左右。

但，现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三十分，我们已七天未得西摩总司令及赴京卫队消息……

### 3. 苦难的历程<sup>⑬</sup>

十七日，当大沽口炮台被八国联军攻陷时，英国海军总司令西摩率领的两千名赴京援军正在廊坊地区进退失据。当日，西摩致电海军部：“我们前面的铁路遭到极大破坏，不可能乘火车继续前进，因此决定返回杨村，打算在

该处乘船前往北京。”但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第二天，西摩联军正准备撤往杨村，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扑压过来。

是军队——不再仅仅是义和团，这一次，是董福祥从北京开来的正规军。

时间在十八日下午三时，联军中的德国人在杨村缴获了一些运送铁路物资的清帝国船只，已经开到廊坊的火车正在向杨村撤退。车队刚刚运行，数万义和团和约六千名清军扑了上来。史书上记载的“廊坊大捷”之战打响了。

但这次“大捷”并没有消灭掉西摩联军。因为胜利——粉碎了西摩联军进军北京的计划——过去，我们从未对这场中方兵力远远大于西摩联军的战斗做出应有的检讨。因此，我们不妨听听敌人的看法：

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将损失更大。”

“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很明显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因此火力太高而未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到下午五时，竟然不是两千名西摩联军，而是数万义和团和中国军队“纷乱地退却了”。

这场被称为“廊坊大捷”、也是整个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捷”、至今仍然每年在享受着纪念的重大胜利，其双方

的死亡人数是：

中方：阵亡约五百人。

联军：阵亡六人。

当天，西摩联军乘火车撤到杨村，前方铁路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决定放弃铁路上的火车，走水路，沿白河左岸行军，撤回天津。德国士兵缴获的四艘木船，只用来运送伤员和给养。

十九日下午三时，联军开拔。他们侵入中国后的一段最苦难的历程开始了。

河水太浅，木船太小，为使木船能够浮起来，联军放弃了所有的重炮，只保留了轻型野战炮和马克沁式速射机关枪。

联军士兵虽然多是舰队水兵，但驾驶中国式木船看来很不熟练。而且，他们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运动战。

这是一次奇怪的运动战。毫无疑问，此时的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运用此种战术，也确实把联军折腾得很狼狈，但其成效是否大大地打了折扣呢？

璧阁衔《在华一月记》写道：

沿河岸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这些处阵地，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比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三磅、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制



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我们的左翼也常遭到清军骑兵与马拉炮队（十二磅炮与十五磅炮）的骚扰……他们经常从铁路路基处向我们开炮。……我们不能不用一支海军陆战队的加强分队来保护我们的侧翼。这支海军陆战队因之常常处于火力圈内，损失惨重。

这样，在联军撤退的头三天内，以伤亡九十人的代价，退至天津西郊。二十一日，联军进行了夜行军，下午四时，到达西沽，隔河相望，对面竟是一座中国皇家军火库！

这一天，是清政府下诏与各国宣战的日子。很难想象，在北京的大门口，在那个存放着战争最为紧要的武器和战略物资的军火库，竟然只有一些义和团在守卫着！

西摩联军已被一路之上的运动战消耗得疲惫不堪。但他们仅出动了一百多人，便越过河流，占领了军火库。几乎没发生战斗。随之大部队也趟过河流。

已经丢盔弃甲，甚至可以说是瓮中之鳖的西摩联军，就这样忽然有了喘息之机。

西沽军火库周围，地势广阔，军火库内，各种新式大炮和枪枝弹药一应俱全，还有十五吨大米，甚至有医疗用品。

于是，西摩联军加固了防线。军火库中最安全的地方被打扫干净并改成战地医院，随军的二百三十名伤病员得到初步救护。口径四英寸大炮、一磅火炮，以及大清朝原装进口的德国克虏伯炮，架在了早以备好的炮台工事上。等到大清朝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闻讯，派出七个营的兵力把军火库包围起来的时候，由众多的大炮所保卫的军火库，已

经固若金汤。

战斗再次开始了。这一次，是聂士成军对西摩联军的攻坚战。在连续三天的猛烈进攻中，西摩联军的伤亡人数又增加了一百四十人，但联军阵地坚如磐石，始终未被攻克。

攻防拉锯战斗就这样持续进行着。这里，距天津城区仅有几英里，但，聂士成军攻不进来，西摩联军也杀不出去。

西摩派出的所有信使，不是被杀，就是逃回来。确有一个信使成功地到达了天津。但他被捕了，被绑在树上。夜晚，联军向天空放射出彩色危急求救信号弹。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出发前还在大沽口外军舰上的八国联军，是否已经占领了大沽炮台，并已进入天津城——他们是否能飞速赶来，解救他们逃出虎口呢？

这天，是六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向各国宣战后的第三天。

#### 4. 津门登陆

真奇怪。十七日凌晨便攻克大沽炮台的八国联军，似乎并不急于前往天津、北京救援，此后四天，他们滞留在大沽口和塘沽车站，一直在做着善后工作——派士兵带领俘虏清除尸体，并把尸体投入河中；但潮水又把发臭的尸体推回来，于是又打捞上来，埋掉；还有就是销毁军火，加强炮台防御。直到二十一日，得知中国方面向各国宣战的

消息，联军大部才开始离开大沽口，到达塘沽车站，开始向天津方向进军。<sup>④</sup>

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六月二十日宣战后，中国方面和八国联军方面各自的军事实力、战略任务。<sup>⑤</sup>

中国方面的任务是：

一、为保卫首都，拦阻已向北京进发的两千名西摩联军，这一目标应该说已经达到；但还要阻止其撤回天津租界，这一任务正在进行中。

二、为守住北京大门，要在塘沽车站和天津车站（老龙口）之间严密布防，切断塘沽与天津租界间的敌军交通线，阻止大沽联军支援租界，这一战略目标刚刚开始执行。

三、围攻天津租界。

针锋相对，联军的任务正好相反：

一、西摩联军要突破重围，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安全撤回天津租界。

二、大沽联军要打通塘沽至天津城的交通线，守住天津火车站，以便后续援军从海上源源而来，而到达天津后，其最首要的任务是——

三、解除中国军队对租界的包围。

那么，双方的军事力量如何呢？

中国方面：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七营、淮军练军三营，共计清军正规军万人左右，尤其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武器装备由德国引进，士兵由德国教练训练，应该说，是一流的陆军劲旅。另外，在天津，此时集结义和团足有三万人，并仍然源源不断地增加着，配合清军作战。

联军方面：坚守在白河（今海河）左岸老龙头车站

（今天津车站一带）的俄国军队一千七百人；驻扎在白河右岸租界内的联军三百人。共两千人。

仅以正规军计，中国军队的数量是联军的四五倍；若加上义和团，则超过数十倍。而且，不仅兵力，武器装备上，中方也明显占有优势。

是这样的力量对比！真不幸，一周后，到六月二十七日（宣战后第六天），联军的三项战略任务悉数完成，而中方的三项战略目标却如水中捞月！

在此期间，义和团所起的作用容当后叙。仅从聂士成的正规军来看，不能说他们作战不勇敢。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斯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描述道：

中国人毫不吝嗇弹药，时刻都在摧毁租界、我们在车站旁仓促修筑的脆弱工事以及战壕、内堡和街垒。中国炮兵熟悉地形，善于打炮。他们不是把炮弹发射到租界的各个地方，而是选好某一个点，对着这个方向发几炮。如果他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出现黑烟、着火和楼房倒塌，那么，他们就对准那个地点再发射两三炮，然后再选择新的方位。中国人用的是普通的弧形榴弹，它能摧毁砖石墙，它的碎片能破坏一切碰到的东西。中国人还使用普通火药的爆破榴弹，它会炸开建筑物，引起火灾。

如此凶猛的火力，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什么竟未能完成作战任务？一个原因是：中方的作战技术及军事指挥能力远远不及对方。甚至可以说，以多出对方三倍（不算义和团）的军事实力，竟然顾此失彼，使要进攻的三大战略

目标，尽皆半途而废。

最初，中国军队首先要拿下的目标是租界地。三万义和团和聂士成武卫前军七营六千人，大半兵力投入对租界的进攻。此时，租界守军不过三百人！而且，所谓租界区，不过教堂和领事馆，除了楼房，无险可守。

此时，距宣战还有四天，六月十七日，中国军队就开始进攻租界，到二十三日，整整一周时间，几乎天天就是放炮，真正的进攻屈指可数，毫无成效。

就这样，到二十一日止，租界守军伤亡二百人，困兽之斗，难乎为继。租界指挥官长叹一声，他发出了“准备撤出天津”的命令。

千钧一发之际，六月二十二日，从廊坊撤退的西摩联军占领了西沽武库。聂士成的七营武卫前军竟然全数调出，前去围攻西摩联军。租界于是得以喘息。

第二天，二十三日，大沽联军到达，租界之围解困，中方进攻前功尽弃！

租界之战虽失利，但如能拿下老龙头车站，则大沽联军被拦截在天津城之外，仍是战略上的重大的胜利。然而，如此战略重役，也是打打停停，浅尝辄止。从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敌军仅死伤一百一十人，车站始终在敌方手中。

或许，中方的算盘是：阻截大沽联军在塘沽和天津之间，使之不能进入天津城！那么，老龙头火车站是否能够拿下无关宏旨。但事情并非如此。

从大沽口到天津租界，仅仅八十里，由于中方的阻截，联军竟走行了三天，付出了二百二十四人的伤亡代价，这

是反侵略的重大胜利。问题是，这种小胜改变不了中方战略失败的事实。

大沽方面派出的援军，总数不过两千人，战线拉锯八十里，沿途，村村有拳民，处处有清军，兵力超出敌军何止数倍，且敌明我暗，无论如何是稳操胜券的战斗。然而，敌军竟行行复行行，一再突破中方阻截，终于到达天津，不仅解了租界之围，而且救出西摩联军，双方力量对比立刻改观，使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战争，迅速转入第二阶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几个镜头就清楚了<sup>⑥</sup>：

——六月二十日，中国方面包围租界区的第三天，一位叫窝茨的传教士竟然带领三名哥萨克士兵，从租界骑马跑出天津，直达大沽口，向联军告急。这说明，中方对一个小小的租界的围攻，漏洞百出。

——大沽联军向天津进发时，火车前进速度缓慢，“因为发现好多枕木都在铁轨的夹片下被烧毁了，但奇怪的是桥梁都没有遭到破坏”。这是为什么呢？中方的目的不就是阻挡联军吗？却为什么不炸桥梁？老实说，没有一个现代军人能解释这样的问题。

——前进中，经常“发现远处有一股敌人，部队一面前进，一面向他们打去炮弹”，“敌人队伍中，有炮兵和骑兵，但没有怎么抵抗就逃窜了”。实际上，沿途八十里，联军根本没碰到任何像样的阻击战！中方军队这是运用的什么战术？或者竟然是怕死？！

——到达天津城区附近时，“遭到中国人猛烈射击。但很快就完了。后来通过几个村庄，很少遇到抵抗”。于是，

“沿着白河的河岸前进，从一处浮桥进入租界地。就这样，没遇到什么困难，顺利地完成了解除天津围困的任务”！

再看中国军队围攻西摩联军之战：

二十二日，武卫军七个营共六千人（不算数万义和团和淮军练军）包围了西沽武库。伤兵占百分之四十的西摩联军，有战斗力的士兵不过一千多人。当日，双方决战，使敌军又伤亡一百四十人！但战斗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请看联军随军记者的逐日记录：

——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平静的两天，虽然担忧中国人可能进行一次攻击，但它一直没出现，二十四日几乎没放一枪，也没看到中国人。天气酷热，而且大风刮得整天沙土飞扬，但是感谢上帝……

——六月二十五日，又安稳地经过一夜休息之后……七点钟过后不久，发现两千名中国人沿铁路前进，但并非是试图攻击炮台，相反，他们似乎是在进行有秩序的撤退。

——七点四十分，我们看到了前来增援的军队。这一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武库炮台的每个人心中都充溢着欢乐，自己眼看就要得救了。九点三十分，两支军队会合了。狂热的欢呼声充斥在援救者和被解救者之间。

——增援联队由俄国军官西林斯基中校指挥，总数不超过一千五百人！

——二十六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联合军队带着伤员向天津进发了，并于中午前抵达天津租界。

这究竟是怎样的战斗呢？

从六月十日到二十六日，整整半个月的时间，西摩所率领的两千名八国联军，经过中方数次围剿，其损失是：

死亡——英国人二十七名，美国人四名，法国人一名，德国人十二名，意大利人五名，日本人二名，奥地利人一名，俄国人十名。

负伤——英国人九十七名，美国人二十五名，法国人十名，德国人六名，意大利人三名，日本人三名，奥地利人一名，俄国人二十七名。

总计六十二人死亡，二百三十八人负伤。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天津门户战，其第一阶段，以中方战略全盘皆输、联军意图全面实现而告结束。

六月二十七日，各国联军司令各向本国海军部发出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

天津获得增援。西摩总司令所率联军顺利进入租界。天津车站仍在我手。

已从大沽登陆天津的部队为：英军五百人；德军一千三百四十人；美军三百三十五人；俄国陆战队二百五十五人，陆军及骑兵三千五百人；日本陆战队六百零二人，陆军及骑兵三千一百五十人；奥军二十六人；意军一百三十八人；法军八百三十人。

至此，八国联军共达一万零六百七十六人，并从该日始，以堪与津门清军抗衡的战斗力的战斗力，由全面防守转入重点进攻。

此时，首都北京，激战正酣。



## 【注 释】

- ① 关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史料，散见于许多史料专辑和专著中，如张超著《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日）佐原笃介等辑《八国联军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马东玉、邸富生编著《八国联军侵华》（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俄）杨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等等。本书所使用的八国联军侵华史料，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参考或转引自《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版，以下仅注原文出处及著者。
- ② （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译。
- ③ 同上。
- ④ 同上。
- ⑤ 廊坊战斗过程之描述，均据（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刘燕武译。
- ⑥ 同上。
- ⑦ （英）派伦《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许逸凡译。
- ⑧ （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译。
- ⑨ （英）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许逸凡译。
- ⑩ 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P. 583。
- ⑪ 以下大沽口战斗的描述，除特别注明者外，据如下史料综合而成，它们是：（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刘燕武译；（英）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许逸凡译。
- ⑫ （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P. 675。
- ⑬ 本节关于“廊坊大捷”和“西摩联军被困”的描述，均据如下史料：（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英）派伦《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许逸凡译。
- ⑭ （英）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许逸凡译。
- ⑮ 敌我双方在天津保卫战前的战略实力分析，据林华国著《义和团史事考》第四章（四）：清军和义和团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

三年十二月版。

⑩ 同“注 11”。

## 第十一章 北京战非战

### 1. 不可思议的“战争”

庚子国变的史册，难得翻开其中最感人的一页——北京使馆之战。

战争已经爆发，敌我剑拔弩张，为了消灭敌人，采取最血腥最狂热的形式毫不足怪。然而，两国（不止两国）交兵，先攻使馆，仍属骇人听闻。按照国际公法与惯例，使馆之安全，由驻在国负责。如今，驻在国不仅不再保护各国在本国的公使，而且要屠杀他们——尽管在战争期间，毫无疑问，这是疯狂的违例。

这疯狂的提案，炮轰使馆——要把使馆变成一片废墟的提案，在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前的一天——六月二十日——便已执行。谁也不敢反对。朝廷大内，理智已荡然无存，断头台恶狠狠地威胁着每一个人。谁要是胆敢说出“国际公法”或者“国际惯例”，哪怕是窃窃私语，就是

“卖国”，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恐怖手段先震慑了自己人，一致赞成那野蛮的决议案，并责成董福祥去执行。人人知道，炮弹不长眼睛，要毁灭西方在中国的使馆区，肯定也会毁灭紧挨使馆区的翰林院等首都文化艺术遗迹。这对于国家简直是一种自杀性的行径。然而，洋人血污的、被铡得稀巴烂的头颅，就挂在旗竿上。并且，为了激励民气，干这件事，需要一个无比忠诚的、心狠手辣的、可靠的、真正的灭洋派，他不怕流血，能采取断然措施，有六亲不认的铁腕，能让大炮像缝纫机那样忙碌。在当时的大清朝，只有未来的太上皇载漪有此性格。仿佛渴得要死的人伸手去拿毒酒，宁愿任用虽不聪明然而可靠的大臣，不愿要不忠实然而能力无限的大臣——慈禧把外交部部长的头衔，给了载漪！

那天正是六月二十日，载漪当上了外交部长！使馆仿佛已经听到了炮声，陡然一惊。朝廷放出了嗜血的狗，恐怖就在眼前。

直到今天，清政府炮轰使馆的意图，仍使我们中国的史学家们琢磨不定。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向外国发泄愤怒。这是必然的。帝国主义太欺负我大清国了！

——解除外国对北京的威胁。这就有点弯弯绕。围攻使馆，同解除外国对北京的威胁有什么关系呢？只有一种解释：攻下使馆，把各国大使捕获为人质，然后，八国联军投鼠忌器，还不乖乖地给我滚回老家去！

——毁灭掉朝廷支持义和团的证据。这就更加费解。朝廷支持义和团的证据在公开发布的宣战诏书上，你就是把

大使馆连人带房都炸得灰飞烟灭，那证据也还在呀！哦，明白了，要想得远一点。一旦战争失败，朝廷会毁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一切证据（后来也果然这样做了），但如果留下驻京公使们的嘴，那可不好！因此，不如现在就灭了他们。他们死了，还能说话吗？

总之，使馆之战就这样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总共围攻了五十多天。于是留下了一个至今也没争论清楚的最大的战争之谜：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所谓发生在北京的战争，就这围攻使馆和围攻西什库教堂两项——这很难说是战争，说是屠杀还差不多——然而无论是攻使馆还是打教堂，竟然全都没有得手！这简直不可思议！

那么，是使馆和教堂的武装力量过于强大吗？

使馆区：一支四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卫队，四百七十五名平民（包括十二名外交使节），二千三百名中国教民。

西什库教堂：四十名士兵，三千二百名逃难的中国教民，三十三名传教士。

对方的全部武装力量不过近五百名士兵，而且很少重武器。

至于中方在北京的武装力量还用再说吗？国防正规军的武卫五军有两个军在北京，还有力量更为强大的卫戍部队——神机营和虎神营，义和团也多被武装起来，有二十多万人！

如此庞大的军力，要拿下一个小小的使馆区和一个好像瓮中之鳖的教堂，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

结果却是：中方竟然在六十多天里攻而不克，战而不胜——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那就让我们看看，这教堂和使馆之战，究竟是怎样的战斗。

## 2. 北堂之战<sup>①</sup>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两个月的一天，腥风血雨尚在弥漫之时，法国随军记者贝野罗蒂，乘一艘法国军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在北京展开了一系列的采访活动，写成报道，在法国《费加罗报》上陆续发表。他的报道充满惊异和嘲讽，是痛定思痛的反思。其中，有关北堂之战和使馆之战的追访性报道，展现出人类战争史上最可怕的情景。

北堂，就是北京西什库教堂。它位于西安门内北侧约二百米处，是天主教设在北直隶教区的总堂。据说，当它最初建设的时候，设计为北京最为高大的建筑。等到中央政府忽然发现，这一建筑高度将使紫禁城内皇室生活几无秘密可保的时候，建筑合同已经签订。为把这一建筑高度降低下来，中央政府不得不掏出了原先建筑费的三倍，方才对合同进行了修改。

当其时，北堂主教是法国传教士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他于一八六二年来到中国，到一九〇〇年时，已在中国呆了将近四十年。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给予他帝王的恩宠。他虽然不过是一位传教士，却由皇帝亲

颁谕旨，获清廷二品顶戴，得到了相当于中国总督的荣衔。看他留下的照片，樊国梁身材高大，面容慈祥，但目光炯炯，似有坚决的志向。而在法国记者贝野罗蒂看来，他很像一位中世纪的主教，高兴地跟随着十字军，到别国的领土上去进行伟大的圣战。他十分看重中国皇帝对他的器重。自从有了总督的荣誉称号，他穿上了中国式长衫，留了辫子。只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他才再次穿起传教士的衣服，拿一把剪刀，“喀嚓”一下子，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长辫子剪断了。

樊国梁是警觉的。作为中国通，早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他便看到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命运。五月十九日，中国政府向西方宣战前的一个月，他便给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写了一封信：

公使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是十分熟悉情况的，而不是在信口开河。宗教迫害只是烟幕，主要目的是消灭外国人，这是义和团明确提出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义和团的同盟军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居住在北堂这里的我们的日期也已定了下来……公使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责任请您派四十或五十名水兵到我们这里来，至少到北堂来，以便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产。<sup>②</sup>

樊国梁的面子不小。此时，北京驻华使馆区内，只有获中国政府准许进入的近五百名水兵，但公使们还是把由法国海军中尉保尔·亨利指挥的三十名法国海军士兵，和

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指挥的十名意大利海军士兵调往北堂。如果没有这四十名士兵，北堂的命运将大大的不同。

实际上，北京之战正是从北堂之战开始的。中国政府宣战前六天，围攻使馆前五天，六月十五日，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便向北堂发动了攻击。到八月十六日，这场进攻达六十二天之久，是北京之战中时间最长的战斗。

不能说义和团进攻北堂的战斗是野蛮的，至少开始时不是。义和团是先礼而后兵的。有两份义和团攻打北堂前的“劝降书”留了下来。那是义和团用弓箭射入包围圈中的。

其一：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百两。指天为誓，厥不失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其二：

你们天主、耶苏（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教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之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看来，先礼后兵，进攻北堂，义和团确实是准备卖大力气的。许多史料也赫然记载：进攻时，义和团火攻、炮轰、枪击，麻雀战、地道战、运动战，无所不用其极，好像也真的很卖力气，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史书上说的：义和团真的很勇敢。

然而，说归说，结果在那儿明摆着：所有进攻，俱是无功！

在法国记者贝野罗蒂的笔下，驻守北堂的四十名士兵，在一个很年轻的军官指挥下，与数万围攻的义和团进行着战斗。当然，几名西方传教士的手中也有枪，并按照指挥官的命令，朝着教堂外放枪。一个中国教民，也拿着一杆老得可怜的步枪参战。

一颗炮弹飞进教堂，恰好落在一个意大利军官所带领的十个士兵之间，硝烟散尽时，六个士兵死了。

数千名中国教民害怕了。他们错杂地躲避在教堂里，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皈依过基督教。然而，恐怖的信息传来了：教堂之外，已经有一万五千名教民被义和团焚烧，没有被烧死的，也被一刀一刀地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扔进臭水沟里。这命在须臾的惨烈景象，虽然仅是传闻，已足以让他们除了战斗，不再有其他的选择。于是，“那些可怜的中国基督新旧教徒，也高扬起英雄主义的旗帜了”。

有一个故事：在义和团的围困中，竟有十个副主教，冒着枪弹，与一个海军士官和四个水兵一起，偷偷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中国军队的大炮。传教士们的化学知识也派上了用场，他们爬墙溜进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来药硝。

制造了战斗的火药。

整整六十二天，北堂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混乱中生活着，在枪弹下生活着。教堂建筑是坚固的。但所有的大理石钟楼，都给炮弹洞穿，碎块坠落下来，砸在头上。白天，枪弹横飞，好像在院中飞舞。夜间，炮弹如霞，轰然响在堂院中，好像烟花。这时，义和团的大喇叭出声了，铜锣也敲响了，“杀！”“烧！”的呼喊声震撼着教堂，好像一场接一场大规模的狩猎。

这六十二天，正是七八月间的酷暑天气。北堂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却在火中活着。放火的人，在教堂的门窗上，屋顶上，用喷水筒喷着火和油，并投掷着火箭。于是，在火的包围中，在酷热的天气里，他们却要永远地奔跑，手中扬着一块湿布，奔跑着，去扑灭火焰。因为不能睡觉，他们的精神是萎靡的；因为缺少食品，他们的脚下是无力的。但他们必须不停地奔跑。

跑！六十二天里，成了一门严酷的功课。一个女传教士，头戴一顶白帽子，负责引导恐怖得要死的妇女和孩子们，跑到一个地方，再跑到另一个地方，去躲避炮弹。那顶白帽子，总是低低的，迅速地穿过院子。有成千的妇女，抱着，背着她们的孩子，如潮如水，或进或退，永远随着那戴白帽子的保护者。

跑动中，不断有人倒卧在血泊中。

后来，饥饿成了比死亡还要痛苦的事情。女人们用树叶或树根煮汤喝。她们要节省下不多的粮食，“给水兵们吃，他们抵抗作战，比我们更需要”。

有一天，樊国梁主教看见一个刚生产后的妇女，她跪

在他脚下恳求道：“主教！主教！请给我一把米吧。我得有点奶。否则，我的孩子要饿死啦！”

在教堂里，每时每刻都能听见二三百个啾啾呀呀的要吃要喝的孩子们的哭声。在樊国梁主教的心中，那就好像是一群要去致祭的羊群的叫声。但孩子们的呼声渐次减少，因为每天至少要埋掉十几个。

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了野狗。被打死的义和团员的尸体，堆积在教堂的四周，充满瘴疔之气，把许多野狗从远处引来，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噬人的脏腑。教堂内的士兵，开始登上高处，射击那些狗，然后用钩儿吊起来。那便成了病人和产妇们吃的腌肉。

当六十二天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朝着教堂内的人们走来的时候，狂喜欲哭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们，正用最后的一把树叶，烧着他们最后的一顿饭。

这时，樊国梁说：“好像上帝计算过他要给我们的米粒。”

在这六十二天中，他们想到过派人出去求救。但一切交通都已断绝。有时，在晚上，派遣一个中国基督教徒偷渡出教堂，然后，眼巴巴等待他的回报。但天亮的时候，就看见他的头被砍掉了，正吊在外面的城墙上，脑汁正从已破的头颅中流出，旁边还有一把铲子，上面缠着他的肠子。

这时，惩罚性的炮弹会再次如雨般落下。义和团的大炮并不那么现代化，从炮膛里飞出的，常常是很少的炮弹，很多的石块、砖头、铁铲和锅片。但它们一样可以伤人，或者，打死人。

地雷似乎是义和团更厉害的武器。它们到处爆炸，硝

烟起处，墙倒了，人给埋在下面。有一次，地雷在育婴堂爆炸，埋没了五十个小孩子。

没有医生。只有尽力敷治受伤者。施治者面对着被轰出一个大洞的胸膛，束手无策。

指挥北堂保卫战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最后也死了。在西方记者的笔下，他成为一个英雄的神话。

每当义和团炸开一个新的洞门，便看到奥利维利迎面站在那里，指挥着越来越少的士兵进行阻击。他似乎永远站立在要隘！在他的口令下，西方海军士兵弹无虚发。义和团每炸开一个洞门，并试图冲进来，便会留下一堆尸体，然后，活着的便跑掉了。于是教堂内的传教士、中国教民，赶快找些砖、石、木头，将那洞重新堵起来，等待义和团的下一场地雷战。

奥利维利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死去的。据樊国梁说，他每天早晨都祈祷，领圣礼，并总是笑着说：“要好好的准备。”然后，便去指挥战斗了。

最后一战似乎不是义和团打的。慈禧逃跑前，董福祥的军队向使馆和北堂发动了一场最激烈的进攻。有两颗炮弹在奥利维利身边爆炸。但据说，他仍然“长久的站着，去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打仗完了之后，他徐徐的往城洞中下来，于是在两个教士的臂中死了”。

所有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他们“在被围困中唯一的一次痛哭”。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法国记者贝野罗蒂见到了樊国梁主教。他的北堂保住了，但只剩下破壁残垣。而北堂之外，整个直隶省，他四十年的工作毁于一旦：他的五万名

中国基督教信徒全被杀戮，所有的教堂、医院和学校，悉数被毁。他指着北堂上的无数弹痕，仰望着唯一兀立空中的那个十字架，对贝野罗蒂说：

凡是他们毁坏了的教堂，我都要重造起来，更高更大！我要使基督教在中国进一步发达。他们或者仍旧要毁灭我的教堂，有谁知道？那末，我再造一次，我们可以晓得，我与他们，谁会先放手……

义和团在北京唯一的战绩，是使二百年前死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又死了一次。康熙皇帝为西方传教士建造的庄严的墓地，被义和团捣毁。那些两个世纪前的传教者的尸体，被义和团挖出来，捣碎了，然后投到烈火中。

### 3. 使馆之战<sup>③</sup>

北京最激烈的战场还在使馆区。

让我们先审视一下当年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它东起哈德门（崇文门），西至正阳门（前门），南到内城墙，北邻东长安街。使馆区内，除各国驻华公使馆，还有海关、邮局、银行、俱乐部，一些朝廷大臣的官宅、民房和店铺，也杂列其间。

使馆区内有一条御河，以之为界，分为东、西两区。

在东小区内，东北角是奥匈帝国使馆，东部是意大利使馆，继续西行，便看到了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等

国使馆和肃王府。

在西小区内，最西端是荷兰使馆，东边是华俄道胜银行和美国使馆，转向北边，依次排列着俄国使馆、英国使馆和清政府的翰林院。

使馆之战在宣战前一日开始。

使馆区内有一支四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卫队，四百六十三名平民、十二名外交使节，二千三百名逃入使馆区的中国教民。

中国方面投入使馆之战的，有卫戍部队的神机营、虎神营、董福祥的甘军和数万名义和团。双方力量之悬殊自不待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斗根本用不着狠打，简直就可以瓮中捉鳖。但五十六天的使馆之战，中方的大炮把那个“瓮”几乎炸烂了，“鳖”也炸死了许多，但却始终未能攻入使馆。使馆之战竟以中方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法国记者贝野罗蒂的笔下，中方对使馆的进攻极为猛烈。他在战后发现，使馆区的一切都颓坍了，只有法国公使馆门口的两只石狮子还蹲在门口，似乎永远也炸不烂。公使馆内所有的墙壁，都被炮弹穿了许多孔，好像一面的筛子。地面上，经过地雷的轰炸和大炮的扫荡，已经没有了青草，没有了开花的树木，只在灰色的地面上，勉强支撑着几棵孤零零地无叶的树，吊着被机枪打碎的枝干，在悲哀的低空下哀鸣。

这景象正是使馆之战的写真。

遍地都是被炸死的西方士兵、传教士或中国教民的尸体，但在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密集的炮火下，根本来不及收

殒。尤其在开始的时候，使馆中的人数减少得很快。但后来他们有了秩序。他们已经认识到：除了战斗以自保，别无选择。他们筑起了战壕，到处设置防线，把机枪架在屋顶上。

战斗由西方海军军官们轮番指挥。开始的时候，是法国海军的一位中尉、副舰长赫把。但一颗子弹正打中他的前额。于是又产生了另外的指挥官。

他们无处可逃。使馆区正位于北京市的中央地带，像一座监狱，整个宏大的北京城都是它的典狱长。

在酷热的夏天，这座监狱在炮火轰击下，热得像蒸笼。但他们必须战斗。有时口渴到极点，仍是要打仗；有时炮火扬起的烟尘弄瞎了眼睛，仍是要打仗；脚下尽是死尸，在太阳的烘烤下，冒出股股瘴气，但仍是要打仗。

于是产生了一些美丽的传说。不要以为在帝国主义那里就没有美丽的英雄传奇。他们一样有。在法国记者贝野罗蒂笔下，有一个美丽而年轻的奥地利女人，她始终在炮火硝烟中陪伴着这些战斗的西方士兵，“我们是应该给她最美之十字架的。”她孤零零地在士兵之间穿梭往返，几乎没有语言。但她的存在就是鼓励和鞭策。她使残酷的战场似乎有了一丝亮色，一点希望，有时，还能带来一点快愉。他们还能需要什么呢？她看护伤兵，煮饭，在她纤弱的双肩上架一根绳子，拉着车，运载沙石，以作防堵之用。甚至，她还爬上屋顶，侦察“动静”。

但使馆防区还是一尺一尺地失掉地盘。他们经常退后，建筑新的防线。而所谓防线，不过是很少的墙和很少的砖组成的隔断。那都是夜间匆忙建成的，不像样子。然而，就

是这样的防线，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竟然没有突破！

显然，法国记者贝野罗蒂也在探询这不多的西方士兵居然能够守住防线的原由。他的结论是西方士兵的勇敢。战后的一个雨天，他和当时战斗的一位士兵在残墙边散步，这位士兵指指点点地说：“就在那墙下，我们支持了许多日！瞧，还有那堵墙，在那儿，我们抵抗了一礼拜。”

但这真的是终极原因吗？

使馆区的最后防线，是中心公园的一个“坟场”。战死的西方士兵或中国教民，只要来得及，便拖到这个“坟场”中掩埋。这时，有一个白胡须的传教士，在坟墓前为死者祈祷。四面炮弹呼呼地响着，摧残着树枝，他仍是祈祷着。但终于有一天，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传教士的身体被炸开了，他的头落到了公园的溪水中，飘荡而去。

他们终于认识到：这“坟场”已经成为“必保的防线”。这防线一旦被突破，他们除了自杀，就是当俘虏。在他们的想象中，当俘虏的后果是：在义和团胜利的笑声中，经受可怖的磨难、可怕的刑罚。那酷刑他们看到过：先把他们的肚肠拖出来，然后砍头，挂在一根木棍上，到街上去游行。

平时，他们感到最恐怖的是义和团的呐喊。那常常是在夜间，骤然间，喇叭响起来，四面全是铜锣声，同时，呐喊声扑天盖地，滚滚而来。“要听过中国人呐喊的，才能想象那种声音！”

他们常常感到防不胜防。隔壁的房子忽然开了洞，无声无响，好像在恶梦中，他们发现伸出来一条两三丈长的木杆，上面点着火油。原来这就是“火攻”。一天晚上，公



使馆的马路被焚烧了。

他们不敢睡觉。晚上，他们常常听到地下有声音。后来知道，那是义和团在挖地道，准备在使馆区下面埋地雷。

他们吓坏了。只好也去掘地，希望建立抵抗地雷的东西，以防地下的危险。但在一天正午，忽然两声爆炸，灰尘扬起，公使馆崩毁的一部分，覆盖在指挥军队抵抗的一个海军少校身上。

也有停战的时候。有好几次，他们发现炮声息了，从望远镜中发现，一个中国人摇着一面旗子，在使馆区残破的墙面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的命令。那是圣旨，是停止攻击外国人的命令。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感到安全多了。

这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往往偷偷走出使馆一段路，去观察动静。他们经常发现：北京城内到处起火，中国人自己正在互相杀戮着。

但忽然炮声又响了。停战结束了。他们记不清这样的打打停停有几次。他们盼望着立刻结束这苦难的日子。

他们等待着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来解救他们。但得到的消息始终是个无望的希望。密探总是说：“快来了，他们已经到了某地。”“他们已经在前进了！”然而，在被攻打的五十六天时间里，八国联军始终没有出现。

日用品缺乏了。一切都要节省，尤其是炮弹。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捉到义和团员的时候，他们用枪柄打破其脑袋，以之代替枪决。他们要节省子弹。

终于有一天，他们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不间断的炮声，他们想象着：这不是义和团和中国军队的炮声，这炮声在紫禁城之外，八国联军正在包围着、进攻着北京城！

一场五十六天以来最猛烈的进攻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董福祥的正规军忽然向使馆区发动了拼命的攻击。那一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最后一天，在使馆坟场指挥防御战的奥地利军官拉卜鲁斯被一颗飞弹打死了。

但忽然之间，使馆区外，一个人也没有了，显得特别空洞，特别沉静。

然后，伴着枪声炮声，传来了欢呼声。八国联军进入了北京城。

#### 4. 中国农民皇帝梦

现在，该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分析一下北京之战了。

如果你经常阅读史料——不是专著，而是未经后人雕琢的对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人笔下，对中外战争的描述，常常是中国人打得勇敢、机智、顽强，如果失败，则肯定是客观原因。而在西方人——包括西方的记者或士兵——的笔下，往往竭力称颂“敌人”的勇敢、机智、顽强，当然并不忘记谴责“敌人”的野蛮。面对这样的史料，我们后世的对历史进行重述的历史学家或作家，便会原汁原味地“拿来”，说：“瞧，敌人都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历史，包括教科书，常常在此处失真。对北京的北堂和使馆之战，亦当作如是观。

这场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战斗”，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证明中方，包括义和团，是机智、勇敢和顽强的。结果明

摆着：如此力量悬殊，中方没有达到目的。至于西方记者或士兵“称颂”中方的语言，我们应该做这样的理解：他们是在进行“反证”。“敌人”很勇敢，“我们”却胜利了，这不是证明“我们”更加勇敢吗？！

这是写作方法的不同，并非历史的真实。

据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录”：进攻北堂和使馆区的主力都是义和团，每次进攻都有数千人，甚至数万人。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已经被朝廷武装了起来，手中持有比对方更有优势的武器。他们究竟是怎样进行战斗的，使他们的一次次进攻宣告失败？

还是看看别的似乎与北京之战并不相关的史料。一则义和团流入城市后的史料分析说：

近观各州县之义和团民，粗食布衣，尚有朴实耐劳之气象。京城内各坛之团民，立坛愈多，勒财之法愈奇。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要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怕遇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

这就是说，义和团进京之后，爱国主义的理想没树立的有多高，相反，勒财分肥成了他们的最高信仰。北京大火起处，义和团战功卓著的地方，几乎全是北京的银行区、商业区，似乎便是明证。怀有如此理想的人，会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战斗吗？老实说，无论如何考证，史学家在北京的几十万义和团中，没发现一个英勇作战或献身的典型。

另一份义和团员自己的口述史料，说得更详细了：

光绪二十五年春后，王庆一开始在他家练义和拳，当时有十几个人。第二年春，又在俺村教了十几个徒弟，青包头，三角旗。官兵来围王庆一的家，王庆一跑到北京去了。没有逮住他，就把他叔王十抓去了，先解到景州，后解到故城把他砍了。

王庆一到了北京，因为他武术好，端王府把他封了官。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王庆一从北京带着三百多人回来，这时他自己在本地区还有几百徒弟，多是景州人。回来后就领人去故城，要故城县官给他叔披麻戴孝。

后来，县官花了很多钱，把他叔的尸首用好棺材送回来，这才了事。

就在这一年，枣强县县官把王请进城里，住了两三个月，在城南门插着两杆大旗，上面写着：“直隶保定枣强县五祖神团”。县官管着他和义和团吃饭。

后来，王庆一又领义和团去北京和洋人打仗，分前后二队，前队到了琉璃厂，王庆一还没走到，北京光绪皇帝早跑了，义和团就回来了。王庆一回来后，不久就去德州和他的徒弟开起庆和栈房多年，后来病死。

一个义和团员，在北京被封了官，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老家报复仇人。至于北京的战斗，根本没参加。而不当义和团以后，立刻有能力和钱财到德州开起“栈房”，做开买卖。这说明了什么呢？

还有许多史料，证明着战争期间的北京，许多农民做起了皇帝梦。他们把一堆女人弄到自己身边，封她们为皇

后、妃子，自己竟当起皇上来。如此荒唐事件，发生多起，以至于不得不抓起他们，砍头示众。有史家证明，这决不是义和团干的：根据朝廷的说法，干这种事情的人，是要反清复明的白莲教徒。然而，据审讯实录，上面并没有一个所谓白莲教的字眼！

那是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义和团开始猛攻使馆区的第二十五天，左营都司曾崇荫带着一帮士兵和义和团员，来到永定门内佑圣寺和永定门外高家园一带，拿获一批所谓正在“演习邪教、聚众起事”之徒，为首的叫张廷锡。在他所住的地方，起获了如下物品<sup>④</sup>：

切刀三把。道书六本、蓝谱红单一纸。锡茶罐一对。月牙斧一把。腰刀一把。大杆子二根。杆子鞭一根。念珠大小二十四挂。洋靴掖三个。无鞘小刀一百三十六把。带鞘小刀二百二十五把。刀鞘一堆。纸一捆。瓷佛一尊。洋铁小刀五把。铁流星一副。铁棍一根。铁尺一根。扎枪一杆。全神太平小黄旗一面。

同时被抓获的有八十多人。下面便是部分审讯记录（译文）：

张廷锡供：

我是直隶束鹿县人，二十三岁。来北京以后，先在珠宝市炉房做买卖。今年四月间，我因贫困，结识了一个叫高鉴的人，他叫我到他家养病，还给我修理出一间空房住着。后来一个叫王子峰的给我治病，他叫我入圣贤道，练

习气法，病就可以痊愈了。我就跟他学习。高鉴又召集男女多人入道。到六月十六日（宣战前五天），来了两位妇女，一个叫刘大姐，一个叫刘二姐，也住在这里学道。我就对她们说：神仙向我传来旨意，以后我会得到天下。我就让刘大姐做正宫娘娘，刘二姐当西宫娘娘。然后就和她们俩成奸了。结果到了七月九号晚上，就给官兵查获。随同我们一块干的，还有宫里面的多名太监。你们起获的这些刀械等物，是我们预备起事用的。还有一个叫关姐的，我封她为东宫娘娘。但她逃往何处，我不知道。

高鉴供：

我是大兴县人，五十九岁，住在永定门外高家园，种菜园度日。这个叫张廷锡的，有一天同我商量，要在我家设立圣贤教。我就帮着他劝人入会学道。张廷锡说，他有天子之分。他把刘大姐、刘二姐奸占了。所有学道之人，都在我家居住。

刘大姐供：

我是宛平县已故刘文成的女儿，二十岁。跟着我母亲在永定门内大街路西佑圣寺后身居住。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的亲伯刘文泉来到我家，说，永定门外高家园，有个姓高的，立了个圣贤道，叫我姐妹二人入教学道。我们就答应了，开始时，时常到高家去学道。到今年六月（义和团进京后），我们就在他家住着。那个张廷锡，说他的道行很深，还说神仙已经给他发了谕旨，日后他能得到天下。在六月十六号（宣战前四日）那天，张廷锡喝醉了，就和我

成奸，还封我为正宫娘娘。

刘二姐供：

我是宛平县已故刘文成的女儿，十七岁。（后所供与刘大姐相同）。也是在六月十六号，张廷锡对我和姐姐行奸，封我为西宫娘娘。

康俊先供：

我是固安县人，二十六岁。因病净身，充当太监，原在紫禁城内殿当差，今年四月逃走。五月间，我的一个旧相识叫郑善荣的，把我引到高家园高姓家，跟这个张廷锡学圣贤道，就在他那里住着。张廷锡说，他有天下之分，以后登上皇位，会派当官。今蒙询问，这张廷锡演习邪教，叫我们随同他起事。所供是实。

王四姐供：

我是直隶沧州王长永的女儿，十五岁。六月二十日（攻打使馆当日，宣战前一日），我父亲带我到永定门高家园高姓家学道，我和一个姓庞的同屋住着。不料被官兵将我拿获。

王徐氏供：

我是宛平县人王广义的老婆，二十五岁，在永定门内居住。七月五日，刘大姐、刘二姐把我带到高家院内，有张廷锡传圣贤道，传人吸气学道。我也曾经学过。

刘文泉供：

我是宛平县人，六十六岁，在永定门内佑圣寺后身地方居住。我去年就跟这张廷锡学圣贤道。后来我又把我亲侄女刘大姐、刘二姐带到他那里学道。

刘国祥供：

我是宛平县人，十五岁，跟我亲兄在永定门内马道地方居住。原来我母亲带着我和胞姐分居。后被我胞伯将我母亲等引入圣贤道学教，我也跟着学习。

刘国珍供：

我是宛平县人，十三岁，在永定门内马道地方居住，锯碗为生。我母亲原带同我大姐、我二姐，分居在永定门佑圣寺后身居住。后来我听说，我亲伯刘文泉要引我母亲和我胞姊入圣贤道学教，我没敢理论，随也在高姓家住着。这张廷锡，在高家自称道深，并说佛祖说了，他日后有天子之分，遂将我胞姊全行奸污，封为正宫、西宫。

审讯记录很长，有许多的重复处。但事件却很简单：一个农民来到北京，看到自己的政治地位骤然提高了，于是就想当皇帝，而且说干就干，先封了皇后，又准备了起事的物品，觉得那皇皇宝座就在眼前了。至于他本人是不是义和团，无论是招供者还是审讯者都没说。审讯后所上的奏折说他们是“邪匪”（译文）：

窃查现（七月十四日，这一天，八国联军占领了天



津) 军务吃紧, 京城内外地方, 恐怕会有行踪诡秘、谋为不轨之徒, 应该严密搜查……

而这一批邪匪, 勾引太监多人, 甘心谋叛, 实属罪大恶极。幸亏皇太后、皇上福庇, 没等到他们酿成巨患, 就把他们拿获, 这真是万幸。

现相应请旨, 将张廷锡等男妇老幼共八十多人, 应如何治罪之处, 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裁施行。

当日“圣旨”下: 将首犯张廷锡凌迟处死, 其他的男女各犯, 只要是成年人, 全部处死, 就是没成年的小孩子, 也给关进了刑部大牢。然而, 疑问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究竟是不是义和团呢? 对此, 我们只能猜测了。当天, 朝廷还下达了这样一份谕旨(译文):

义和团民为国宣力, 人数既众, 良莠不齐, 甚且有意寻仇, 肆行无忌。本月竟有伪义和团, 冲进副都统庆恒的家中, 把他一家全部戕杀。经王大臣查明, 已将该伪义和团正法五人。然而, 还是有人不罢休, 竟然还是抓了庆恒, 并把他凌虐至死。这简直目无法纪。

现谕该王大臣, 确切查明, 务将真正的义和团, 让他们恪守戒规, 义以和众。如有匪徒假托义和团之名, 寻衅焚杀, 著照土匪之例, 即行惩办。

经过这样一次淘汰后, 义和团里真心向善的人, 应该更加爱惜声名, 同心同德, 抵抗侵略; 这样, 那些假义和团, 就无处可逃了。从此泾渭分明, 这恐怕也是义和团的愿望吧。

钦此。

这样的谕旨意味着什么，熟悉大清朝政治运作的人们，当不难得出结论。

好啦。让我们姑且认定：义和团是有理想的，是有战斗力的，只是他们的理想和战斗力，有许多都用错了地方。而事实明摆着：义和团干别的事情的本事，比他们攻打使馆的本事高多了！

然而，就算义和团没本事，大清国还有军队。八国联军正在向北京进发，而北京城内还有至少两个军的部队。他们要拿下一个使馆区，一所教堂，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但这样一问，我们就问到慈禧太后那里了。

整个北京战争期间，老太后究竟是怎么想的？

## 5. 老太后的心事

屈指算来，北京围攻使馆，自六月二十日始，至八月十四日结束，共五十四天，其中有四次停攻。毕生研究庚子国变史的专家学者，无不重视这一几乎延续了整个战争期间而又莫名其妙的事件，尤其是停攻使馆的原因。这是有理由的。北京是本次反侵略战争的大本营，首善之区，决策之地。其对使馆的打打停停，是整个战争期间中方最高决策的逻辑折射。

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成果是：对使馆的数次停战，是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的

必然结果，而对使馆的进攻，又是清政府妄图假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义和团的阴谋。今天看来，这一结论有进行检讨的必要。

根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进攻与停攻使馆的日程可排列如下：

第一期进攻：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共五天。二十一日宣战，此前一天便开始了对使馆的进攻，显然是要来个下马威。

第一期停攻：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共四天。这次停攻，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即，载漪暴露了其弑帝阴谋<sup>⑤</sup>，慈禧感到了对自己独裁政权的威胁，并开始怀疑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否出了问题。

第二期进攻：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六日，共十九天。这次再攻使馆，其由头是西摩所率领的八国联军在廊坊受阻，退回天津边缘，又遭聂士成的武卫军痛击，伤亡达三百多人。信息传至北京，慈禧大受鼓舞，她再次产生了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斗志。

第二期停攻：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共十一天。这次停止攻击，显而易见，原因是天津失守了<sup>⑥</sup>。此时，西方各国守卫使馆的士兵，伤亡已达一百五十多人，占其卫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天津——北京门户的失守，显然吓坏了慈禧，她急急忙忙开始研究如何能够与西方讲和的事情了。

第三期进攻：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日，共五天。这时，慈禧本已气馁，但忽然好像来了救星，把她这个本已瘪了的气球又给吹圆了。李秉衡——前任山东巡抚，现任

长江巡阅使，二十年前，曾经领导福建军民打败过法国侵略军——来到北京，自告奋勇，愿为前敌，率领义和团截住八国联军，与其决一死战<sup>⑦</sup>。慈禧大为振奋，于是围攻使馆之战再起。

第三期停攻：八月三日至四日，仅两天。这次停攻，直接原因不明。此前一日，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护送使馆人员到天津，允许各国大使通电本国政府，并命令各督抚保护各地洋商教士教民。可能，这次停攻，是要向各国表示朝廷对李鸿章建议的重视和采纳。

第四期进攻：八月五日至十三日，共九天。此前一天，四日，八国联军（实为七国联军）开始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李秉衡率义和团在北京誓师，决与联军死战。这次进攻使馆，显然是与敌决战的一部分。

最后的停攻：八月十四日。原因很简单，八国联军已经打入北京，使馆解围。

毫无疑问，在对使馆五十多天的打打停停中，上述事实是真实的和显而易见的，当然值得重视。历史从来都是根据真实而显而易见的事实写成的。然而，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必是贫乏的事实。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真理。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那些同样真实却不贫乏，又能深刻洞悉决策者内心世界的事实又在哪里呢？

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的当天，慈禧带着光绪皇帝和不多的几个大臣仓皇出逃，并在路上进行了一次次的反思。这些反思，被许多史家认为是虚伪的。这不错。一个力图保住自己性命的最高决策者，其反思，是竭力为自己的错误及愚蠢进行辩护的。但对历史人物来说，这样

的辩护又是难得的，它们是其内心世界的展现。历史学的伟大就在于：它不仅能从真实中得到真理，而且从半真半假甚至是伪造的史料中，经过去伪存真的分析，同样能得到真理，甚至是更重要的真理。

后来的慈禧，确实反思过她利用义和团进行反帝斗争的虚妄：

当大乱子起来的时候，人人都说那些土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走谁是匪，谁不是匪了，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

载滢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还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

都担着很大的危险。<sup>⑧</sup>

慈禧对她当时心态的描画基本是真实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帝王古训，时刻在心。只是有时昏了头，便只想到其载舟的功效，忘了其可能覆舟的危险。这时，水不再是水，而变成下山的老虎，其势不可阻挡。义和团进京前，她还不相信这样的危险，认为对义和团的负面效应，不值得惊怪，所谓“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就是她极为自信的表现。

但她终于发现，义和团搞破坏的本事比他们打仗的本事大多了。她是哪一天发现这一“真理”的，很难考证确实。但她身边有个小太监，总想在太后面前讨好，每当听到枪声，便向太后道喜，说：“又杀了一个洋鬼子！”太后起初还很高兴，但很快就听烦了，说：“这几天，光听枪炮的声音，足教杀尽洋人多次了，然而总没有那一回事！”许多事情，开始的时候感觉很好，但很快就后悔不迭。进攻使馆的事情就是如此。

关于义和团究竟已经闹成了什么样子，慈禧也提供了一条很有趣的史料：

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

我问：“怎样查验？”

他们说：如系二毛子，只须当额上拍了一下，便有十字纹发现。

这些宫监、妇女们，了不得的惶恐，哭哭啼啼，求我作主。

但我也不犯不着向拳匪去讲人情；我想阻止他们又不对，万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台。

因此，我教他们尽管拍去，果然拍出十字来，也是命数，这何须怕得。如若胡乱枉屈人，那神佛也有公道，难道就听凭教下徒弟们冤杀无辜不成？

后来出去查验，也是模糊了事，并没有查出什么人。

他们心中明白，得了面子，也就算大家对付过去，还了我的面子。

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sup>④</sup>

看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滋味，自己也很难忍受。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慈禧是在什么时候“幡然醒悟”，从过去的相信义和团神术变为不得不忍受义和团的动乱的？这个时间表极为重要。它将解释同一事件发生过程的不同认知逻辑。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虽然“仓皇出逃”，但并没有忘记及时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放一把火，悉数销毁。因此，进攻使馆期间的所有上谕、慈禧与地方大臣们的通信，在紫禁城的档案库中忽然全没了。但她似乎忘记了，紫禁城内的“证据”可以销毁，她已经寄出的电报、上谕却还在别人的手里。

有两份慈禧亲自秘密发出的电谕居然就这样保留了下来。一份是发给李鸿章的。此时的李鸿章，大清朝最熟悉外交事务的大臣，早已被她赶到了南方，担任了两广总督。但战事一起，她便连发上谕，希望李鸿章回到北京，以他的经验来与洋鬼子进行外交周旋。但李鸿章的要求是先停

战。否则，他来了也没用。可能，李鸿章给慈禧的奏折中，话里话外的，指责慈禧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的邪术，所以才把局面弄得如此不可收拾。于是，六月二十六日，才有了慈禧给李鸿章如下的密电（译文）：

我真是没办法：这次义和团的起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到处蔓延，已是无处没有义和团啦。他们的人数之多，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如剿杀义和团，一下子就会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呀！因此，我只能因势利导，先使用他们，慢慢地，再试图挽救大局。你在奏折中说这是相信了义和团的邪术，企图靠这邪术来保卫国家，看起来，你似乎并没体谅朝廷在这种局势下的万不得已的苦衷呀！<sup>⑩</sup>

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二十六日，不过是她气势汹汹地与各国宣战的第五天。就算是脑筋急转弯，这弯子转得也太快了。只有一种解释：从董福祥军和义和团对使馆的联合进攻而毫无战果中，她看到了国家军队和义和团的“不可恃”；从端王载漪欲进宫杀光绪皇帝（二十五日）的极端举动中，使她感到了“阴谋”。而历史也分明记载着，正是在她给李鸿章发出密谕的同日，她谕令停攻使馆，荣禄把写有“停战”、“保护使馆”的牌子立于使馆附近的北御河桥上。

过了三天，二十九日，慈禧又给各驻外使节发出电谕，说：



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sup>⑩</sup>

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已经知道：辩护归辩护，此后的慈禧，并没有让自己的军队和义和团停止进攻使馆。对一个国家的领袖来说，她的错误不在于嗜血如命，而在她宣战时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论。她已经明白她干了蠢事——仅仅是为了激励民众，便创造了一套血腥的套话。而当民众被这些疯狂的、刺激的言论所陶醉、所蒙蔽、所迷惑，相信必须采取最“断然的措施”，并且当真要求采取这样的措施，领袖却忽然没有勇气进行到底了。这时候，她该怎么办呢？她必须杀人，以免民众谴责她那些关于杀人的言论言不由衷。她的行动不得不紧紧地追赶她已经说出的疯狂的言论。这时，不是别的，不是理性，而是政治惯性、政治的引力定律在起作用了：一宗死刑引起了另一宗，玩弄血腥的言词变成了胡乱的大批杀人。绝不是需要，甚至也不是激情，更不是坚定，而恰恰是没有勇气违抗民意的政治家的不坚定甚至懦弱，说到头，正是懦弱，使他们残杀了成千上万条生命。说来遗憾，庚子国变的历史虽然往往被描叙成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历史，却并不仅仅是英勇卓绝的历史，同时也是当政者懦怯的历史，是领袖们的懦弱并不得不盲目膜拜他们自己吼出的口号的历史！

对慈禧来说，看到自己错了（她几乎在事变刚刚开始

便后悔不迭)，却不得不一错到底，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权力！事情涉及到权力，她决不会不战而降：权力她是死抱住不放的。不，她不想下台。她为了皇权在握，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牺牲了政治良心，不能不拼命反抗。因此，宣战以来，她恰似一个游泳能手，忽而侧泳，忽而仰泳，始终坚持着，不让自己在政治的漩涡中下沉。

至于说，慈禧是因为反对改革开放才与西方各国断然开战，这更是无稽之谈。

应该把那些当代的影视文学甚至某些历史教科书所给予我们的“保守”、“落后”等慈禧太后的形象从脑海中断然抹去。如果把中国近代化的前六十年（一八四〇——一九〇〇）分为两个阶段，那么，前一个三十年是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与西方世界“刺刀见红”的三十年，而后一个三十年是开放与改革最红火的三十年，而那正好是慈禧太后执政的三十年，它被史家称为“同光中兴”。正是在这后三十年中，大清国引进了来自西方的除政治体制以外的一切新生事物。而引进这一切新生事物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竟是反对改革和开放的——这自相矛盾的逻辑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吗？

不，慈禧不保守，也不落后，她只是“不得已”。开放的大门是被炮舰打开的，但毕竟也是开放；改革的步伐是被开放的形势催动的，但毕竟也是改革。用改革、开放与保守、落后的两极对立来定位慈禧的政治形象，是西方的话语，而后世的晚清史学，大多是对西方话语的阐释。

遗憾的是，西方人从不懂得尊重中国当权者自己的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西方世界再次使用了他们自以为准

确的话语——“这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胜利”——并立刻选择了他们要支持的人：光绪皇帝。这正是慈禧太后最愤怒的事情。

这才是慈禧虽然认了错，但还是要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真正原因。她不够强大。她的国家不够强大。甚至，义和团——她终于看出来——也靠不住了。这都不错。但愤怒使人智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她还是要将斗争进行到底！

因此，使馆之战打打停停，但战争仍在继续。

## 【注 释】

- ① 本节史料，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征引于法国随军记者贝野罗蒂的《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P. 659、P. 692、P. 700—702、P. 704。
- ② 转引自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P. 14—15。
- ③ 关于使馆之战，史料颇多。被困在使馆中的亦有西方记者，如莫理逊，他也确实写了“血淋淋的”长篇报道，激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仇恨，但却有失公正。本节的描述，综述了中方的一些史料和法国记者贝野罗蒂在战争结束后根据追访所撰写的《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P. 683—685。
- ④ 此案据《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九〇年八月版，P. 650—671。
- ⑤ 关于这一阴谋的详细描写，请见作者的另一部历史报告《流放紫禁城》第二章。
- ⑥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

⑦ 详见本书第十三章。

⑧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⑨ 同上。

⑩ 译自《光绪东华录》P. 4522—4524。

⑪ 同上，P. 4522。

## 第十二章 战争（中）

### 1. 最后的神话

义和团的法术突然失灵了。

今天的人们，可以对此哈哈大笑。所谓法术者，本来就是荒诞的无稽之谈。

但当时的人们可不那么看。朝廷所以敢于向西方列强宣战，正因为有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抵挡甚至战胜帝国主义。考虑到即使在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坚定地相信那装神弄鬼的所谓“气功法术”，那么，一百年前的人们相信义和团确有法术便不那么奇怪了。

但现在，一九〇〇年七月，正当大沽口失陷，西方联军源源开进北京的门户——天津的时候，正当反侵略战争最需要义和团的法术的时候，你忽然发现，那义和团的法术根本就是唬小孩子的玩意儿，那么，你对这场战争的胜利还会抱有任何幻想吗？

在中国，总是在幻想破灭的时候，理性之光方才渐渐地升腾。

首先是“刀枪不入”之术的失灵。其证明是：在与西方侵略军的冲突中，义和团伤亡大增。既然“刀枪不入”，又何能负伤？义和团的首领说：那不是负伤，“负伤者只不过是疲劳而已”。但是如果伤势严重，则一律归过于违犯了义和团的纪律。例如，“如果你偷了东西，那法术必然失灵”。

义和团员良莠不齐，都是农民，不可能无私，杀人劫财，坐地分赃，自是常事。“看见店铺招牌晶莹闪亮，不知是铜，都说：‘金的，金的！’立刻砸下来，勒抢而去。看见牛膝，以为是人参，抢过来就大肆嚼啖。”这都是史料的记载。

于是“刀枪不入”失灵便有了说法：义和团员“一中枪炮则死，死必抢回”。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只要看到携有他物，就说这是“爱财致死，万不能活矣”。

最初，欺骗是有效的。当时有西方记者报道：“许多义和团员深深相信枪弹不伤的胡说，在战斗中，竟冲头阵。西方联军用洋枪扫射，如风驱草，冲在前面的义和团员一片一片地倒下死去。但后面的人仍不畏死，接着冲，不一会儿就都中弹而倒。西方人皆深悯其愚。”这样的记载，被后来的许多史家和文学家津津乐道，视为义和团“勇敢”的证明。

用迷信来维持另一种迷信是不会长久的。渐渐地，义和团员也对“贪财即死”的说法发生了怀疑。他们问：“老

师和师兄抢劫最多，何以不死？”

这是用鲜血换来的疑问。义和团中，作战最勇敢的是青少年，牺牲也最多。他们“年长者约十七八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作战中，被西方联军打死的，都是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呀！”

青少年单纯，对老师的迷信教导很少怀疑。因此，“义和团与洋人作战，伤毙者以青少年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最少。”

其奥妙何在？那些年老的义和团头领解释说：“青少年法力小，所以伤亡多。中年人法力不一，所以有的伤，有的不伤。至于我们这些老师和师兄嘛，年纪大，神术灵，枪弹炮弹打过来，顺着我们的衣服就消失了，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受伤。”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史料载：“打仗的时候，都是使用青少年打前阵，中年人在队伍中间，那些老师呀、师兄呀排在最后，说是‘督战’，一见前面的队伍倒下来，那些年老的立刻就跑回去了！”

对比一下更容易明白。清军将领罗荣光为保卫大沽口，慷慨就死。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为保卫天津，肠胃洞流，七伤殉难。而义和团虽然伤亡惨重，其首领张德成却直到天津沦陷前才为流弹打伤胳膊，而且同另一个首领曹福田一样，天津城破后，他们都藏起来了。

张德成，许多义和团研究史家称其为“具有巨大影响的义和团首领”，静海县赵张村人，自幼在白沟镇操船为业，常由清河赴天津，与沿岸各村镇之水手、脚行、渔户颇多往来。一八九九年冬天，有义和团开始在独流镇设坛，使

张德成有机会和他们经常接触。一九〇〇年春，张德成返回家乡，在赵张村组织义和团。五六月间，以“刀枪不入”为号召，先后建立了北、中、南三个大坛口。其中北坛成立最早，命名为“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入坛者达千余人。张德成成为坛主，统辖独流镇所有义和团组织。六月下旬，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坛”七千余人开赴天津。

有一个俄国的新闻记者记录了张德成的一篇演说，在这篇可以说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篇义和团首领的演说里，张德成宣告：“皇上和西太后，还有我们的大首领端王爷在庇护我们。但要是朝廷不再帮我们，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你们就得明白，我们就推翻朝廷，拯救中华黎民，免遭洋鬼子蹂躏。”还有一份张德成的揭帖留了下来：“君非桀纣兮，奈佐非人，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和约各洋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显然不是张德成的手笔。

但如此气壮如牛的张德成却“有意避战”。

在天津，总督裕禄每天都督促张德成出战，每次，张德成都说“时候不到”。最后，实在说不过去了，“不得已，只好出战。但他只是率领他的义和团走出东门，然后绕了一圈，又从北门回来了，始终不敢越过城东南一步。”

不能说他一次也没出战。六月八日，有雨，义和团参战了。官军以三门大炮相助。到了租界区，“洋人出来了，只有三个人，举着枪，瞄准了义和团。义和团的队伍立刻反奔，一边跑一边互相说着：‘下雨啦，咱们可以回家种地啦，何必吃这样的苦呀！’第二天，义和团便有一大半人逃跑了。”



此时，进攻天津的八国联军已经增援到一万多人。但在数万义和团和数千清军面前，仍处劣势。然而，被史家称为保卫天津主力的义和团却屡战屡败，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义和团的解释是：“每次战斗，总是看见洋人的队伍中，有赤身裸体的妇女站立阵前，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法术让这些洋女人给破坏了。”

这是民间文化中所谓妇女“不洁”论调的翻版。义和团围困租界久攻不下的时候，同样归罪于女人。同北京一样，天津战斗开始时，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包括许多妇女，逃到教堂避难。义和团用爆破、火攻和其他能够采用的方法攻打了一段时间，仍不能拿下教堂，他们把自己的失败也解释成里面的女人玷污了他们的法力：“教堂中有秽物镇压，使我们不能前进。教堂里面的女人赤身裸体，还从墙头上挥动‘秽物’，于是神灵怕脏，就离开了义和团的身体。”

以毒攻毒的义和团新组织——红灯照——就这样诞生了。

义和团民们说，“要打败洋鬼子，必须等待红灯照来了以后才能行”。因为，“红灯照也都是妇女，所以就不怕洋鬼子们的脏东西啦”！

关于红灯照，可靠的史料极难找到。后世的影视文学极尽渲染，说它是战斗中的决定性力量。但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在战斗中见到这支“红色娘子军”。

她们不出战，却能杀洋鬼子，真神！怎么做到的？从义和团发布的公文告示中，可以找到答案。

义和团命令：

凡是铺户居民中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七日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

这是要干什么？听听义和团的歌谣就明白了：

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  
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

这就是红灯照！除此以外，都是传说：

听说，义和团弄来一些十八岁左右的大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持红巾并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他们说，这些大闺女上法以后，用扇子一扇，便能腾空驾云。或者扇子一扇，洋人大炮里炮弹就哑巴了。或者一扇，大海中的轮船就能爆炸燃烧。或者一扇，那些坚固的城楼石室立刻起火自焚。还真见到过有这种穿衣持扇的女人，但那些所谓的法术却从来没见过。

此后越传越神，终于出现了一位红灯照领袖——黄莲圣母。

据说，黄莲圣母是船工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妓女。她的父亲因触犯了外国人而入狱，由是“仇恨在心要发芽”，庚子年间，便跟着义和团到天津打洋鬼子了。

但她显然不仅是个妓女，还是个巫女。无论影视文学

家怎样喜欢她，也不能推翻历史学家的考证。

在文学家那里，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被说成神通广大，“能治枪伤，应手即愈”。但史家说，“她用以治伤的药只是香灰。因此如治疗无效，就只好怪‘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她有一条手巾，里面包着许多小螺钉，经常拿出来给别人看，说，“这是我用法术从洋人大炮上盗来的！”见她并没有接近洋人大炮却手中有大炮的螺钉，“于是皆惊为神”。实际上，那些螺钉是从铁铺里弄来的。

迷信和谣言携手，义和团的“神通”更神了。

有一个谣言说，义和团的大师兄已经遣派红灯照飞往西方各国，阻挡各国军队，然后再打跑在中国的鬼子。

另一个谣言说，红灯照能在水上飞行，有了这种本领，“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过去被鬼子们霸占的中国土地，还能让鬼子赔偿我们中国两亿巨款，甚至可以把外国的首都都给它放一把火烧了！”

如此神通，自然导致天津城内“家家悬红灯，迎仙姑”。

该怎样看待这些历史的传说呢？只有史家有推测的特权。

红灯照是真的存在的。她们是国家混乱带来的结果：动乱使一些年轻妇女有了逃脱儒教纲常伦理约束的机会。能够同男人一样到外面的世界参加神秘的运动，这使她们感到激动不已。

红灯照在战斗中不是没有作用的。但她们最大的作用是“作了些护理伤员和缝洗衣服的辅助工作”。

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后期，所有的神话都破产了。一条

史料记载：

天津的义和团民，听说清朝的军队不再信任他们，要杀他们，各个都惶恐惧怕起来，有在路边墙角哭泣；有的对别人诉说，说自己参加义和团是受了别人的骗；有的看到有逃难的船经过这里，便上船哭泣，请求携带他回到家乡去。有的把义和团的标志，如红头巾、红带子，偷偷地丢到河中，然后便溜走了……风声远播，天津的各村各镇，都偃旗息鼓了。只剩下天津城内的一些义和团，还说是要跟随着清军出战，然而也已经所剩无几啦！

黄莲圣母，红灯照的首领，在天津城破后，被八国联军中的某一国所俘虏。听说被带到国外去了。究竟是又操持起她的老本行——妓女的营生，还是深入敌后继续战斗，两种传说都有。但显然前一种传说更现实些。<sup>①</sup>

张德成，天津义和团的大首领，天津城破后好久才被抓住。他被他领导下的义和团员出卖，被曾经支持义和团运动的乡绅砍了头。

直到今天还被我们的文学艺术所津津乐道的义和团神话，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尽头。

## 2. 最后的英雄

不能说庚子国变中的天津保卫战没有英雄传奇。

英雄传奇是历史的精神后方。它把自己没有深受其害

的一切都看得很轻巧。它对无数条人命，对盲目的自我牺牲，甚至对英勇牺牲的勇敢者的疯狂，对他们的无畏的忠诚，概莫能外。传奇，只有黑白两色，只承认忠心的战友和背弃英雄的叛徒。历史上的聂士成就是这样被看待的。

在天津八里台地区，有一座小桥，木制的，很短小，跨在一条壕沟似的小河上，却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聂公桥。这是聂士成留下的唯一遗产。天津保卫战中，所有战斗者和逃跑者的名字，几乎都被历史淡漠了，只有聂士成的名字留了下来，那原因决不仅仅是：他死了。

天津保卫战中有两处激烈的战场，一处是老龙头车站，由提督宋庆和马玉昆指挥的清朝军队试图把它从西方联军的手中夺回来，以扼住敌人增援的咽喉要道。战斗打得很残酷，这一战略意图却并未完成。最后，宋庆和马玉昆护卫着直隶总督裕禄逃跑了。另一处就是八里台地区，它是清军的西部战场，武卫前军的提督聂士成守卫着它。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聂士成似乎都可以不死。他是统帅。他完全可以像宋庆和马玉昆一样，战败而苟活。

于是有一个传说，聂士成是自杀。

那天是七月九日。根据八国联军的战场记录，凌晨三点钟，西方各部队在德租界的梁园门集合，并立刻向八里台地区进攻。“清军在八里台附近进行顽强的抵抗，战斗在仅五米左右宽的河两岸展开。我军向桥上强攻，清军举着大刀长枪在桥上迎战我军。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将清军击退，我军占领了八里台。清军统帅聂士成战死。战斗持续进行着，到七点半时，日军的太阳旗首先插在西机器局的烟囱上。”

但传说的历史却没有这样简单。

聂士成当年的士兵苏锡麟于一九六三年回忆说：

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我由人推荐加入了新军。入伍不久就把我派到队上去当骑兵教练。当时的新军共分五军，即武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前军总统是聂士成，后军总统是董福祥，左军总统是宋庆，右军总统是袁世凯，中军总统由军机大臣荣禄自兼。我入伍的部队属于武卫前军。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国联军在天津开战，直隶提督军门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担任作战任务。因在市内作战骑兵使用不上，我们就驻扎在西头武库了（后为北洋大学旧址）。步兵就开往前方参战。这时天津的战事是，武卫左军由马玉昆统带担任，东路作战，即东车站方面；聂军门统带步兵在八里台一带为西路。这时的东路战线已攻占了东车站，正向现在的解放桥方向进攻，直逼紫竹林。而聂军门的西路军也已逼近紫竹林。联军方面因见形势恶化，且援军未到，已经挂了白旗，意在要求停战。这时聂军门召集全军讲话，军门说：现在，敌人已经挂了白旗了，我向总督裕禄说，现在应该通过外交调停，不能再打了。如果再打下去，敌人的援军一到就不好办了。早用外交议和，免得老百姓受苦。可是总督不听，总督只知听端王的话，听义和团的话，我们当军人的服从命令是天职……言外不尽伤感。过了几天，敌人的援军到了，大沽炮台已告失守，而市内的东路军因自己援军不济又失去了东车站，情势日渐紧张。<sup>②</sup>

这简单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聂士成和总督裕禄以及北京朝廷的观点都是不同的。实际上，还应该加上一点：聂士成曾经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

清军将领中，聂士成是少有的几个有坚定信仰的军队统帅之一。他在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中成长，屡建战功，被委以重任。中日甲午战争中，他的部队是唯一在战斗中打过胜仗的。他是儒将，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他的头脑中有世界大势，知道目前的中国还无力与西方列强抗衡，而军队应以保证国内的稳定并逐渐走向自强为目标。但他是军人，又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切，都成为他的悲剧的根源。

庚子年初，他坚定地服从朝廷对义和团动乱进行镇压的谕令。其他的军队将领都窥知朝廷的真正意图：对义和团假镇压，真支持。只有他，认为动员装神弄鬼的义和团来与西方抗衡，是不智之举。

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他从来不信。但为使别人也不受欺骗，他做过实验。他让义和团的大师兄表演所谓的“不受枪炮之术”，一枪打去，大师兄果然无恙。但他把枪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那是支前膛枪，但义和团在灌药、装弹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入枪弹，后灌火药，所以发火后，火药在前，枪弹为火药带出，根本不能伤人。

聂士成或许还不能懂得科学救国的道理，但如此装神弄鬼决不能救国，对此他心如明镜。因此，对义和团的镇压他是自觉的，坚决的。他由是与义和团结了怨。当朝廷起用义和团的谕令下达后，义和团的中央领导人载漪，第

一个就想到了“杀聂士成”，以鼓舞义和团的士气。只是因为“军队需人”，才允许聂士成“戴罪立功”。

为此，聂士成向他的顶头上司、军机大臣荣禄申诉。但荣禄可不想担这样的“罪责”。他把聂士成骂了一顿。在他眼里，失败者不值一滴泪水。

聂士成便是带着这样的“罪名”投入与八国联军的残酷战斗的。也可以说，投入战斗前，他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载，这一天发生了三件大事：①上谕，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催促其乘坐俄国军舰北上。这条圣旨似乎显示了朝廷试图以外交方式解决庚子国变的意图。②在北京的董福祥军继续猛攻使馆。有消息说：这同样是为了挟使馆人员为人质，以作为外交解决争端的一张王牌。③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阵亡。

那天，凌晨三时刚过，聂士成便接到了联军出动的消息。据他的士兵回忆，他走出了行营，在夜色中徘徊良久。正是盛夏，晚风从成行的榆树上吹下，月影乍明。被联军的炸弹轰毁的道路，在月光下显得阴森骇人。今天的行人已经想不起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带的战争，但这种流过那么多血的地方仍会让人不寒而栗。人们仿佛预感到黑暗中有无数陷阱，各种无可名状的黑影也好像都是可疑的，树与树间的那些望不透的方洞都好像是一个个的墓穴。这地方，白天，丑陋；傍晚，悲凉；夜间，阴惨。

这就是八里台，它在天津城区的西面，夏天，将近黄昏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这里那里，有一些老婆子，带



着被雨水浸得发霉的凳子，坐在榆树下面，向人乞讨。此外，这个区域的外貌，与其说是古老，不如说是过时，而且已经开始有改变面貌的趋势了。自从李鸿章在这里创建了西机器局，它每天都失去旧有的一小部分，增添一点新东西。过去，它是一片乱葬岗，但今天，已经有不少新建筑出现在这郊区的旁边。于是便有了铁路。而一条铁路，无论我们把它摆在都市边缘的哪一处，都等于一个郊区的死亡和一个城区的兴起。在那些吞炭吐火的文明怪马——火车的喘息中，旧屋轰然倒下，新屋拔地而起，这里的大地震荡了，开放了。于是，古老的小街被动摇了，长途公共马车、出租马车、市区公共马车，每天要在这些小街上猛烈奔驰三四次，并且到了一定时期，把房屋都挤到左右两旁；同样，车辆交驰也一定会扩展街道。新生命的征候是明显的。在这村气十足的旧城郊区里，在这些最荒野的角落里，石块路面出现了，即使是在还没有人走的地方，人行道也开始蜿蜒伸展。有一天早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人们在这地方忽然看到了烟囱在冒烟；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文明已经来到了这里。

在天津已经驻扎很久的聂士成，那天是否在惋惜这新生文明的即将毁灭呢？凌晨三时，在即将被轰毁的道路旁边，在肯定会出现的黎明前，身边倚着战马，手中拿着望远镜，在忧郁地想着心事——这样子描写聂士成有什么必要呢？那几乎是多事。史界的著作，已经写尽了这个人。他的荣辱，还是让那些历史学家去聚讼，我只是因为出生在这里，在乡亲们的口口相传中，作为事后的见证人，原野的一个过客，一个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索的人，也

许只是一个认表面现象为实际情况的人。对于那些被史家搞得似乎上纲又上纲的、神秘无比的事物，我不想参加讨论。我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和战略上的才能，因此连一家之言也谈不上。但在我看来，这个在凌晨三时徘徊在战场边缘的将领，受到了一连串偶然事故的支配，这几乎是宿命。而谈到宿命，当神秘的命运被历史控诉了的时候，我只是和人民一样，提出我的批判。人民是天真率直的批判者。

五点钟的时候，敌军的炮火开始轰鸣。仿佛是忽然一下，炮弹铺天盖地压了过来。聂士成说：“弟兄们，开始了。”

武卫前军的将士们知道，自己离死已经不远。那天的天气一直是阴的，正在那个时候，天边的云忽然开朗，朝霞的红光血淋淋的，从榆树叶间透过来。聂士成肯定会想：真怪，甲午战争那年，陆战前的天气也是这样的。

聂士成上了马。他的副官说：“请求增援吧？”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牺牲吧。”说着，骑着马，进入了他的指挥阵地。

寥寥几个人，围着一面旗，几匹马，这就标志着一个指挥部了。

聂士成骑在马上，心旌摇荡，而神色自若。他的卫兵回忆，他在八里台这个阵地指挥部外的大榆树下，站了好几个小时，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姿势。那榆树据说至今还在那地方，只是它已经被后来建设起来的天津师范大学的围墙包围起来了。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在一九六六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热心破“四旧”的造反派们锯断，运走了。提供这一说法的人坚持认为，那人是偷走了那棵榆树，在晚上，运到他的家乡，为他即将死去的爷爷当棺

材用。

聂士成立在那里，冷峻而英勇。炮弹雨点般落下来。副官指着一颗正在爆炸的炮弹向他请示：“聂军门，快走吧！”

聂士成说：“向我看齐！”说着，驰马向前。

有那样的将军，也就必然有那样的士兵。在八国联军的战事回忆录中，提到义和团，满纸的怜悯，而提到聂士成和他的士兵，满篇的钦敬。

那已经不是混战，而是一阵黑旋风，一股怒火，是灵魂和勇气的一种触目惊心的奋厉，是一阵剑光与闪电交驰的风暴。八里台被占领，被夺回，再被占领，再被夺回。那一群群乱人乱马，扭作一团，谁也不肯放手。阵地犹在，聂士成的人马半数死在阵地上。

武卫前军的几个方阵，有如水中的岩石，屹立在炮火的乱流中，一直坚持了整整半天。直到中午，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而死神也同时来了。在那双重的暗影下，他们不屈不挠，任凭敌人包围。每个联队，各自孤立，与被击溃的大军完全失去了联络。

就在这时，一匹快马穿过战火，飞驰而来。

“聂军门！拳匪把您的家抄了！”聂士成在马上晃了一晃，他的卫兵赶紧扶住他。所有的后果他都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料到义和团会在民族战争的关键时刻公报私仇。不错，他聂士成是在朝廷谕令“镇压拳匪”的时候，对义和团大加杀戮。但那是朝廷的谕旨，他必须执行。而当朝廷的《宣战谕》下，他便与义和团共同对外了。他向义和团发枪发炮，是为了抗击侵略，他们怎么能在这时候去屠戮他的家人呢？<sup>③</sup>

“聂军门，回家去吧！也许还来得及！”

聂士成摇了摇头。紧勒马嚼，准备冲锋。他的士兵苏锡麟回忆：

聂军门感到势难挽回，且为大将者应以身殉国，于是换上紫纱袍、黄马褂，冠带整齐，骑马亲赴前线督战。这时有一个步兵管带叫宋占标，跟随军门多年，见军门冠带整齐亲到前线，他已明白了军门的心意，当即奔至军门马前，拽住马嚼环哭劝：“军门！你不能去呀！”

当时，军门也感动了，说：“你是小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因哭劝不成，于是随在军门马后一同奔赴前方。结果聂军门殉国，宋占标也阵亡了。<sup>①</sup>

实际上，时至下午，在八里台高地的坡下，只剩下一个方阵了。阴惨的阵地堆满了尸体。敌军的炮队不断轰击着，但那最后的一个方阵仍在战斗。每受一次轰击，那方阵便缩小一圈，但是仍旧还击。他们用步枪对抗大炮，四面的人墙不停地缩短。等到那队壮士只剩下寥寥数十人，军旗成了一块破布，子弹已射完，步枪成了拨火棍，尸堆比活人队伍还大的时候，战胜者面对着那些坚贞卓绝、毅然就死的人们，也不免如见神明，骇然起敬。

敌军的炮队一时间寂静无声，停了射击。那只是一瞬间的喘息。战士们感到四周有无数幢幢鬼物，洋人的形象，炮身的黑影，从车轮和炮架中窥见的天色；英雄们在战场远处的烟尘中，隐隐望见死神，其大无比，向着他们逼近，并且注视着他们。他们在苍茫的暮色中，可以听见敌人炮

弹上膛的声音，那些燃着的引火绳好像是黑暗中的猛虎的眼睛，在他们的头上，绕成一个圈。

忽然，炮队的火杆一齐靠近了炮身，这时候，有一个敌军将领心有所感吧，向被铁桶般围住的清军方阵喊道：“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士兵苏锡麟回忆：

当时在八里台与我们对抗的敌军是德国兵，德军的前方指挥是库恩。此人在武卫前军当过骑兵教练，他认识聂军门，聂军门殉国那天穿的衣服特别显眼，库恩一见聂军门亲自出马，如果不把军门打死，这场战争就不易结束，于是他指挥士兵集中火力把军门打死了。军门殉国，战事也就停止了。<sup>⑤</sup>

但口口相传的回忆没有这样简单。后来在聂士成殉国的阵地上，修起了一座“聂公桥”，人们前来瞻仰的时候，常有一位老人，说是当年聂士成的卫兵，充当着义务讲解。他所讲的故事，各个时代的版本不尽相同。政治气候风调雨顺的时候，他有一种讲法；气候恶劣的时候，他有另外一种讲法；而在他本人也被揪斗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骂为“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走狗”的时候，他一言不发。直到他临死前的那一年，他才讲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原来，当那位德国将军库恩劝说聂士成投降时，聂士成不是说的“我决不投降”，而是骂了一个“屌”字。

在战火弥漫的战场，面对曾经共事的敌军将领，聂士成说：“屌！”

似乎应当解释一下这个“屌”字。这是个脏字，虽然不少中国人常说，但显然并不被提倡。任何一部《学生词典》里都没有这个字，它只在大型的《辞海》里偷偷地隐藏着，以证明它的存在。

一个问题是：聂士成是否说过这个字，并在说了那个字后从容就死？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他为求死而出此语言，我们不能把这看作他的过失。

书面的历史不承认聂士成说过这个字。但他的那位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坚持自己回忆的真实性。

“聂军门当然是那样骂的！”他说，“他还能怎样骂呢？！”

想想也对。面对即将轰击过来的炮弹霹雳，也必须有一个势如霹雳的字去回击。那才是胜利。以蔑视来回答惨祸，以无畏来回答命运，以最鄙俗的字和最光辉的死揉合起来，做成一个最堂皇的结局，以嬉笑怒骂来收拾战场，用句不能出口的俚语来总结历史，随后丧失生命而保全气节，流血之后还能使人四处听到他的笑声，这是多么宏壮！

但毫无疑问，聂士成骂出的这个字有一种崩裂的声音。是满腔轻蔑突破胸膛时的崩裂；是痛心太甚所引起的爆炸。聂士成，那封建的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深深感到那溃败是荒谬。他的满腔激愤正不得发泄，别人却来开他的玩笑，要他逃生！又怎样能够不顿足骂出那样一个字呢？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找到的不是一个字，而是一柄剑。

德国人库恩，那个曾在聂士成军中担任教练的军人，他听到了那个字，于是下令：“放！”

炮火大作。炮口中喷出开花弹，声如奔雷，浓烟遍野，

将战场弥漫如雾，缭绕空中，等到烟散以后，什么全没有了。武卫前军最后的残余被歼灭殆尽。

这时，库恩走向前去，望着血肉模糊的聂士成，忽然大吼：“拿一条红毛毯来！”

他接过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士兵朝天开枪，向着聂士成的遗体致哀。

此时，战鼓无声，理性争鸣。此时，聂士成和库恩，他们不再是敌人，而是两个在特定条件下背道而驰的人。库恩是具有理性传统的德国人，他深深地懂得，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突然强盛。那是一种倏忽即逝的虚荣，有如狂风掀起的白浪。战争是什么？是一种丰功伟绩吗？不，是一种赌博。庚子年的中西之战是什么？是一场西方赢了，中国输了的赌博。

民族的荣誉并不在于残酷的武功。

中国决不是区区剑匣所能屈服的。

聂士成死后，天津的战事结束了。

## 【注 释】

① 见罗惇焘《拳变余闻》。

② 苏锡麟《庚子随军抗敌记》，见《京津蒙难记》P. 4—6。

③ 关于义和团在民族存亡之际“窝里反”的事迹，史料多有记载，现所参照的史料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一日战方酣，拳匪拥入其家，执其母妻以去。”

④ 苏锡麟《庚子随军抗敌记》，见《京津蒙难记》P. 4—6。

⑤ 苏锡麟《庚子随军抗敌记》，见《京津蒙难记》P. 4—6。

## 第十三章 太原屠城

### 1. 为什么是山西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聂士成在天津抵抗侵略军并壮烈殉国的同一天，山西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传教士们的大屠杀。

有一个错觉：战争开始后，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了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只要有洋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民愤怒的吼声。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我们只要尊重历史，就只好说：并非如此。

检索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这场本应举国一致、共抗强敌的战争中，没有同仇敌忾，没有共御外侮，没有上下一心，没有一致对外。这莫可名状的“战争”景观，将成为永远难解的战争之谜。

整个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竟然一派升平景象。即使是中国的北



方，多数地区，也是满目的和平。例如山东，义和团的发祥地，战争期间，不仅几乎没有义和团，而且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事。<sup>①</sup>

真正发生战争的地方，几乎只在京津之间！

其他地区，即使有过与洋人的对抗，亦已不再是战争，而是屠杀：义和团和军队对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残酷屠杀。

但即使这种屠杀，也只有两个省份最烈：山西与内蒙。

山西屠杀了一百三十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内蒙屠杀了四十名新教徒和九名天主教徒。这意味着，在整个庚子国变中，死在山西和内蒙的外国人，占外国人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因很简单。有义和团的地方，才有对洋教徒和一切洋人的屠杀。而一个地方所以有义和团，首先因为有一个纵恿义和团存在的地方官。这个看上去似乎很简单的结论，实在是义和团诞生的根源。

山西屠杀洋人最烈，因为山西有义和团。

山西有义和团，因为山西的巡抚是毓贤。

毓贤巡抚山东的时候，山东诞生了义和团。毓贤离开山东以后，山东的义和团消失了。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山西开始有了义和团。山西有了义和团，山西的洋人便遭了殃。山西的义和团后来流窜到内蒙，内蒙的洋人同样也遭到了屠戮。这简单的因果链条，本来拴不住复杂的历史现象。但历史中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最复杂的事情往往是最简单的事情。

那就让我们对山西进行一次案例研究。

有一则史料说：六月二十四日，宣战后第三日，山西

巡抚毓贤上了一道封奏，说的是山西教会的事情。此前十天，尚未宣战，慈禧曾发给各地方一道密谕，命令：但遇洋人即杀之，勿使漏网！然而，毫无动静，一查，发现陕西署抚端方、河南巡抚裕长，及蒙古各处，拿到手里的谕旨，文字中的所有“杀”字都被改成了“保”字。据说，这件事情把军机处吓坏了，认为朝廷之内必有汉奸。但没人敢把此事奏闻太后。现在，毓贤的奏折又来了。太后亲自在上面批示（译文）：

我命令：凡是洋人，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心。

荣禄看到了慈禧的批示，力谏道：“杀戮妇孺，恐怕不足以扬国威？恐怕为全球所笑。而且，这 and 老佛爷您平日慈悲为怀的名声有损呀。”

慈禧大笑道：“你说的不错。但洋人要我归政，我不过以此还他。自从道光以来，洋人在我国欺虐吾民，反客为主。现在教他们看看！究竟谁是真主人！”

于是，带着慈禧批示的谕令，快马驰向山西。庚子国变史上的一场血腥屠杀开始了。

## 2. 请神<sup>②</sup>

山西本来没有义和团。自从毓贤来到山西，山西就有了义和团。山西义和团的出现、发展和壮大，简直就是一

年前的山东义和团在山西的复制。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不再详尽描述其过程，而采用一位山西传教士的调查报告。

这位传教士名爱德华兹，英国人，是位医生，在山西一边行医一边传教，达二十年之久，山西大灾的时候，他便参加赈灾活动，救助过许多中国人。幸运的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他正在英国休假。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后，他立刻返回山西故地，在太原住了四个月，对山西义和团的兴起，大规模屠杀传教士和外侨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sup>③</sup>

关于山西是如何诞生义和团的，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说：

山西的百姓一直以驯良著称，（我）在他们中间进行传教工作达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严重骚乱。因此，需要说明老百姓欣然参加义和团事业的原因。

首先，必须记住，自从一八七七——一八七九年发生了大旱灾以来，成千上万的山东人被洪水赶出了家园，流入了山西。他们非常贫困，他们来到的山西又长期干旱，并由此引起了粮价飞涨，使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毓贤的义和团首领都是山东人，他们首先去找他们的同乡，在他们中间找到了许多自愿参加的会员。但是，由于义和团把持续干旱的原因归结到传教士身上的宣传，山西的老百姓很快被感染了。许多人都记得二十多年前蹂躏该省的可怕的旱灾所造成的悲惨景象，愿意不惜一切来防止灾祸的重演。

当地一些聪明的教徒看到对他们的敌意在增加，因为他们不愿赞助地方演戏，演戏总是和崇拜偶像的节日有关，

他们也常常不参加。外国人（在他们看来，演戏是毫无意义的和荒唐的）很难想象地方戏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每年在演戏上要花费多么巨额的金钱。在遭到旱灾的时候，更频繁地进行演戏，希望引起众神的注意，使他们降下急需的雨。

显然，官员们认为，拒绝付演戏钱是引起他们不信教的邻居厌恶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一九〇一年传教士返回山西省时，负责处理事务的官员们所提出的建议中就有一条：“山西残杀了如此众多的教民，其罪行当然是巨大的。但是，这是由于老百姓认为演戏是非常重要的，而教民不为演戏助款。短时间内不再演戏固然好，也不应该要求教徒向崇拜偶像的活动捐款，但教民们如果想去戏院，就应该助款。”当地官员还进一步请求传教士要说服教民，为了将来不再发生麻烦的事情，要付这种钱。对于这样的要求当然只有一种肯定的回答。但同时应向中国官员解释清楚，到戏院看戏不但不会得到耶稣教会的赞许，而且任何成员经常出没于剧场，就会照例受到惩戒。

山西的老百姓无疑相信义和团在他们中间大肆散布的各种荒唐故事，不少人感到恐怖，并变得疯狂起来。那些有关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的古老的寓言故事，被义和团剪头去尾地进行粗略的演绎，甚至画成漫画，到处张贴，对教会进行人身攻击，这样就取得了老百姓的信赖。还进一步传说教会雇佣人（特别是乞丐）在村里的井中放毒，用红色在房屋的大门上涂标记，涂上标记的房子的居民肯定生病，还可能死，一本在该省广泛流行的下流的排外小册子中说，在沿海截获的外国船上发现了大量的人血、人眼、妇

女的奶头！书中还扬言，如果有人得到了这本小册子，抄写一本送与自己的朋友，他自己可以保证无灾无祸；如果抄写十本散发，全家得保平安；如果散发出一百本，他的全村就安全无恙。

这些说法传播的恐怖如此之大，以致许多与教会没有关系的人被杀害。由于长期干旱使许多老百姓颠沛流离，他们责怪外国人，一见外国人就杀。对于单独进行旅游的外国人来说，危险就更大。如果他们停在村子的井边喝点水，他们马上就会被抓走，搜查所带的行李，看是否有往井里投毒的毒药。几个月来，许多村子的水井日夜有人守卫，甚至在太原府工作的人，三个月来也不能从城里的井中汲水喝，或者用一下普通的汲水器，只能让自己的仆人从城外专门的井中打水度日。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毓贤选择了培植义和团精神的最好土壤。因此，义和团运动就像野火一样在山西扩展开了。奉公守法的山西老百姓一下子变得对外国的一切极端仇视。因为必须记住，这场运动开始时是排外，然后由于排外而反教徒。

毓贤就任山西巡抚是在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九日。一周之后，义和团的揭帖便在许多城镇张贴和出售。此后不久，毓贤从山东带来的义和团首领分散到山西中部的许多城镇开始发展组织，教练拳术。五月中旬，他们做好了准备工作之后，开始行动，袭击了洪洞县范村一个中国教徒老苏的家。他们把他打成重伤，抢了他的家，劫走了银子和其他贵重物品。并将他们不想要的物品送给围观的群众，同时将剩下的东西砸得粉碎。然后，他们又进入邻近的一个

县，在距平阳府城不到七英里的一座庙里住了几天，有好几个传教士住在平阳府。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其他暴行。地方官员和义和团勾结在了一起，在平阳府的传教士决定向太原府英国浸礼会的法辛牧师汇报情况，请他决定是否应将此汇报给负责洋务的道台。于是一份准确而详细的报告迅速写成并送了出去。法辛牧师知道巡抚的排外倾向，不清楚道台的态度，他认为最好是将这份简明的情况报告交给道台，不做任何评论或提出要求。他这样做了。道台的答复非常令人满意，他和藩台、臬台三人联衔的答复中命令对罪犯进行审讯，对教民加以保护。但洪洞县令亲自向巡抚报告说他的司法权遭到了破坏。在此期间，法辛牧师也搞到了一份巡抚答复的抄件，其态度极其暧昧。

五月底，山西和沿海地区的通信联系中断，所收到的传教士们的许多最后的信件注明日期是五月十三日。教会的信使在送最后一批信件时，在保定府山南五十英里的定州被义和团抓住。他们打开邮包，毁坏了信件，要杀这个信使。但是由于旁观的群众苦苦哀求，说他只是受雇于外国人，他才免于死。

与此同时，在北京、天津的附近地区，事态正在迅速发展……六月二十日，德国驻北京公使被杀，使馆被围。

英国获悉消息后，对山西传教士的安全十分忧虑。六月十二日向太原府的传教士发了封电报说：“我们为你们的安全担忧。”

六月二十二日，英国收到了注明日期二十日的回电：“安全。充满希望。”

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六月二十五日，山西电报局贴出了一份告示——显然是清政府在六月二十一日发布的（宣战）上谕……<sup>④</sup>

爱德华兹对山西义和团兴起的远因，其调查是准确的。但毓贤与朝廷大臣的关系他并不知道。实际上，毓贤所以鼓动山西闹义和团，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他是秉承极端仇外的端王意旨。

毓贤被罢山东巡抚后，立刻入京，一头扎进端王的怀抱。军机大臣刚毅对他尤其赞庇，说，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爱国主义者，此人就是毓贤。而大太监李莲英也对慈禧说，“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于是毓贤气焰嚣张，公开扬言：在义和团的问题上，“朝议太无主张。”并指斥满朝文武都是卖国主义者！

每当国家动乱之秋，慷慨激昂的爱国宣教者，从来都被视为“自己人”。毓贤，以他全面反洋的爱国主义宣传，终于再次得到朝廷赏识。他虽在山东巡抚任上被罢免，但没过多久，他便到山西再任巡抚去了。

有一则史料说，毓贤拜命之日，义和团额手相庆，都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可以到山西去闹一闹了！”毓贤上任之日，带领着几十名护卫军，都是义和团的首领。这样，山西才开始有了义和团的踪迹。

从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得知，毓贤上任伊始，山西平阳府教堂便被义和团焚毁。知府、县令赶紧向毓贤汇报，但在汇报材料上称义和团为“团匪”。毓贤大怒，痛斥下属无知，甚至要向朝廷汇报。从此，山西各府郡县官，一

律跟风，不敢说义和团一个不字。

有一封毓贤给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的密函留了下来，信中说：“这外边的事情嘛，你们就交给我毓贤作主好了。山西的洋教，一定会净绝根株。然后，我们再干其他的事情。我毓贤一定为你们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

就因为这封信，毓贤被称为水晶般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但历史将会证明，有时候，一个身居高位者的信仰和理想主义，比最庸俗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和最疯狂的恐怖主义者，将会带来更多的灾难，造成更多的流血。这种具有真诚的信仰、真诚得如痴如醉的人物出于最高尚的意图，一心改造世界，完善社会。但往往正是这样的人物，一手促成了他们自己也觉得可憎可厌的屠杀和苦难。历史学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样的矛盾景象：这种人怀着一种迷信的、忘我的爱，忠于朝廷。同时，殃及万民。

接到毓贤的密信后，载漪、刚毅叹为义士，隐然倚若长城。而毓贤果然不负厚望，在山西大干了一场。

他命令太原的铸造工人精制钢刀数百柄，分别赐给义和团员的子弟，刀环上都刻有“毓”字，呼唤一些孩子们到官署来，站好队，像皇帝晓谕大臣一样，谆谆地教诲他们：“你们要仇杀洋教，要所有的人都一条心，千万不要辜负我的教诲呀！”

忽然，一个儿童团员嚷道：“我要钱！”又一个窜出了队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也嚷着：“我饿了！”周围官员面上大惊，心里窃笑，一齐把眼光扫向毓贤：如此胡闹，看你怎么办？



毓贤不惊不躁，呼唤下人“给他们拿吃的”，并且，“赏钱！”

他对周围的官员说：“这些儿童团，都还天真未凿。但我们要培养他们具有忠勇之气。这要慢慢来，现在不宜拿礼节上的事情来要求他们呀。”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却没有想到。

他赏赐了儿童团，把这些手里拿着糕饼、兜里揣着银钱的孩子送出署衙，忽然发现，那队伍大大地扩充了。那是山西的无业游民们，他们拍着巴掌，跟在儿童团的后面，一个个艳羨垂涎。灾荒和动乱时代，就是挑担负贩者，终日劳作，也难获一饱，于是都弃担而起，四处宣扬：“为什么不参加义和团呢？走啊，去参加呀！参加了义和团可以马上富贵啦！”

于是抚署门前，愈集愈众，人们纷纷要求加入义和团，实际上是纷纷来要饭吃。终于应接不暇，毓贤也觉得烦死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义和团自称神仙，但却是要吃饭花钱的神仙。毓贤的如意算盘是，花几个小钱，做一个样子，就能把山西的义和团组织成伟大的反帝大军。但他忽然发现，那“几个小钱”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而且，要他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组织义和团，不啻是抽他的血，割他的肉。于是，他命令各州各县分给义和团钱米，至于他自己，“不复直接供应矣”。拿别人的钱，吸别人的血，割别人的肉，自己不疼。

然而，抽谁的血谁叫，割谁的肉谁疼。州官县令虽敢怒不敢言，但想方设法应付义和团的办法总是有的。终至

于“毅然不与”，导致义和团没打洋人，先围府署，纵团滋扰，汹汹不休，最后要杀人放火。

如此引火烧身，不是办法。毓贤苦思冥想，忽生一计。

一天，毓贤请义和团大师兄来到抚衙，据说绿舆朱盖，尊若贵宾。那大师兄亦居之不却，入署后，与毓贤大人分庭抗礼。

茶过一巡，毓贤忽然离开宝坐，向义和团大师兄长揖就教：“义和团者，乃杀洋教而救黎民也。未救民而先扰官，必非长久之计。总要有个长治久安的办法呀！”

此时，朝廷还没有向各国宣战，义和团也还是非法组织。但毓贤的举动却使山西的义和团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位大师兄于是说：“那好吧，我看这么办：以后我们专门进攻有洋人的地方。得到洋教士的家产和教堂财产后，拿出十分之三赏给立下首功的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各兄弟，剩下的十分之四嘛，那就是由我掌握的公款了。这个办法实行以后，您所谓的奖励义和团，也就是许以我们‘便宜行事’就行了。但您要通令各地方官，我们的行动，不许加以干预。这样一来，我们的款项充足，此所谓‘取鬼子不义之财，供同胞倡义之费’，一举两得。从此，我们就用不着麻烦您来抚恤我们义和团啦！”

毓贤一听，大喜，称赞说：“这个办法有理。果然天诞奇才，安内攘外，保佑大清，此国家之福也！”

很快便是六月。义和团在直隶起事，并向北京进发。最初，总署（外交部）未能领会中央精神，也无从得知宫廷内部的政治阴谋，仍然按照国际法惯例，请求朝廷保护各国使馆，保护教士教民，以免召来外国干涉。对此，中央

模棱两可，而总署主外交，不得不次次请旨，要求保护教民。于是朝廷同意向各省发出廷寄。

在清朝，中央各部给地方发出的指示，称为廷寄。

廷寄到了山西，毓贤看后，立刻掷之于地。他说：“这肯定是汉奸做的事情！老佛爷肯定不同意这样做。而且端王、刚毅先前也不同意和鬼子讲和。他们怎么会这样的先后矛盾呢？！”

果然，第二天，载漪和刚毅的密函便到了山西，要求毓贤不必理睬总署的廷寄，“你的任务是庇护义和团，痛除洋贼！”

毓贤为自己的政治判断洋洋得意，对家人说：“怎么样？还是我对！他妈的，我差点让那些汉奸误了我的前途！”遂命官兵和义和团大焚教堂，杀教士。史载，太原此举为全国各省首倡。

毓贤的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数次疯狂跳跃，有如杂技演员，这回是最大胆的一次，但也将是最后一次翻跟斗。

太原屠城终于开始了。

### 3. 骗鬼<sup>⑤</sup>

那天是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国是阴历六月初一，朝廷发布《宣战谕》的第七天。在山西太原城东南角，靠近北门的地方，有一座天主教堂。那是一座大教堂，里面大约可以容纳一千人。在传教士的眼里，这儿是训练教徒的温床。教堂附近，还有一所孤儿院，一所女子教会学校。当

时，住在教堂里的外国人，有两位主教，七位修女，还有几位牧师和杂役。

女子教会学校正在放暑假。家住太原城的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十一个家在外地、或无处可归的女学生留在学校。

那天早晨，似乎没什么异常情况。身兼医生的传教士洛维特的诊所，来了三十多名病人，请他看病。但到下午的时候，洛维特医生和另一位传教士听说：邮局门口昨天贴出了上谕。他们便去观看。他们发现，那“上谕”上面没有盖官印，认为不一定是真的，决定不理睬它。

他们错了。大约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教堂和传教士医院的门口、大街上，已经遍布骚乱的人群。传教士们走上街头，同骚乱的人们讲道理，希望他们走开。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投过来的石头。他们只好退回去。但大门外，人越聚越多，而随着人数的增多，他们的胆量也越来越大。

终于传来了呐喊声：“烧！”“杀！”

呐喊声中，医院的接待室被点了一把火，燃烧起来。

大难临头，传教士们首先互相通告：处境危险，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然后，派了一个人，求见道台（副省长），请求帮助。但没有见到。

天渐渐黑了。教堂内的多数中国帮工和仆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在暮色的掩护下，从后门逃走了。剩下的人中，有那十一位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她们的中国小学教师，一位妇女，三个仆人，一位药房助理。他们同传教士们一起，聚集在洛维特医生的诊所的院子里。

义和团的进攻开始了。传教士们受到攻击，被迫退到厨房和储藏室。中国的女学生们吓得哭叫起来。女子教会

学校的负责人库姆斯小姐尽力安慰她们，她说：暴徒们不会伤害你们，因为暴徒只是想杀外国人。

子夜时分，传教士们决定撤离。男人们武装起来，全力保护妇女和儿童。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们，背起了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也有人背起了一位生病的教会女学生。

教会医院门前正燃烧着大火。但传教士们顾不得了。他们冲过大火，便和街道上的义和团相遇了。砖块飞砸过来，棍棒追打过来。昏暗和混乱中，传教士和那些中国教会女学生四散而逃。一部分传教士逃到一位叫法辛的牧师家里，发现他们身边只剩下五个人，其中只有三个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

第二天，他们听到了令人悲哀的消息。女子教会学校的负责人库姆斯小姐，在抢救她的两位学生时丧命了。

那两个中国女孩子，一个叫傅琼，一个叫艾桃，到教会女子学校上学的时间不长。她们过去在家中被迫裹脚，进入教会学校后，正在放脚过程中，很痛苦，走起路来不大方便。在昨晚的混乱中，她们落到了后面。

这时，库姆斯小姐已经安全通过门前的大火，却发现她的两位学生不见了。于是，库姆斯又返回了院中。她先找到了傅琼，将她背到街上。然后，她再次返回，找到艾桃。这个女孩子个儿大，很重，库姆斯竭力背起她，结果两人都摔倒了。

义和团们，也许还有不是义和团的群众围了上来。他们开始用砖头打她们。库姆斯用身体掩护着小艾桃，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不要怕，我们很快就会到达一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sup>⑥</sup>

就在这时，艾桃被抓走了，库姆斯小姐也被抓回来，被扔进火堆里。

后来在接受调查时，有不少人证实：库姆斯小姐两次想从火堆里爬出来，但每次都又被推了进去。

有一次她从火堆中爬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在祈祷。

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嚷道：“看，她还想请求活命！”

于是，她又被扔进火堆里，砖头接二连三向她砸过去。

她再也没有爬出来。

第二天，她的两位中国朋友冒着风险，从火堆里找出了她焦黑的遗体，将她埋在教堂的花园里。<sup>⑦</sup>

那天晚上死里逃生的传教士们，都集中在一位牧师的家中。他们似乎感到了安全。他们住房的门口，有地方官员派来的士兵守卫着。当然，太原城门和城墙也被严密地把守着。他们想逃也逃不掉。

七月五日。这一天，北京的义和团和军队正在猛攻使馆和教堂，而在太原，一位官员却对传教士们和其他洋人进行了慰问。这位官员一一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并传达巡抚毓贤的指示：如果传教士们搬到另一所房子去，他可以更直接地庇护他们。

传教士们都怀疑这是毓贤的一个阴谋。但他们别无选择。

第二天，六日，天上下起了绵绵的阴雨。负责此事的官员请求毓贤推迟一天再搬迁。

又过一天，七日，雨还在继续下着。官员再次请示毓贤。这一次，毓贤下了命令：“即使下刀子，也必须立即搬到新地方去。”

快到半夜的时候，来了几辆马车和一队士兵。雨下得更大了。传教士们带上一些日常必需品，坐上毓贤为他们准备的马车，上路了。

他们很快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们，这里是铁路公所。第二天，八日的早晨，他们考察了周围的环境，发现是两个较小的庭院。他们二十六人，包括孩子，都将住在这里。但他们很快发现，两个内院已经住着罗马天主教徒：两位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的主教、两位神甫，一位僧侣，七个修女，还有五个中国杂役。大家都说在这里住着很安全。那天还不断有传教士或其他身份的洋人住进来。都说是毓贤大人要他们来这里接受保护的。他们开始怀疑外界对毓贤巡抚的传闻是否有失公正。

传教士们不知道：此时的毓贤已经下达了将山西传教士和其他洋人一律斩尽杀绝的命令。此前，他所有的“保护传教士”的语言和行为，不过是“骗鬼”而已。

义和团高举火炬在太原焚烧教堂的时候，烟焰满城，毓贤登高观之，快意地叹道：“天意也！”

他身边的营官怕火势殃及百姓，请求施救。毓贤大怒，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敢违抗天意吗？！”

天意也须人为。毓贤决定把所有的洋人都齐集一处，聚而歼之。他下令关闭城门，禁止传教士出入。所有在道路上行走的人都要遭到搜身，只要有佩戴十字架的，一律逮捕。估计再无漏网之鱼，便命令把所有的教士，无论老幼，齐集铁路公所，以兵围守。毓贤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很快就会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去。众人都欢呼起来。

七月九日，性命攸关的一天。所有在太原铁路公所的外国人，都没想过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个县官，登记了在这所住宅中所有人的名字。

下午两点钟，毓贤带着几位官员和他的义和团卫队，突然来到铁路公所。他命令：将传教士立刻逮捕。他没有提出任何逮捕的理由。传教士们也没有一个人反抗。理由是不需要的。反抗是没有用的。

他们被带到了毓贤的巡抚衙门，关进一所临街大院。

没有审讯。毓贤也没有亲手杀人。他的行为很有毓贤本人的特征。

每带上一个传教士，他便问四个字：“从哪儿来的？”

有的回答：“英国。”

毓贤便发出命令：“杀！”

有的回答：“法国。”

毓贤发出同样的命令：“杀！”

在毓贤看来，他们没有中国国籍，这便是“罪行”。

但有一个稍微有所变化的杀人场景被记录了下来：

传教士皮戈特父子和一些传教士朋友，共七个人，是在寿阳县被捕的。七月九日下午，当他们从监狱里被叫出来，被押送到巡抚衙门时，发现有许多传教士已经被杀害了。在外院，他们走过被屠杀的传教士的尸体，被带到内厅。毓贤就坐在判桌前。所有的人都跪在毓贤面前，回答是哪里人。

皮戈特先生回答说是“英国人”。

毓贤一声冷笑，命令：“打！”



这时，有两个女孩子趴在一位女士的脖子上大哭起来。士兵立刻把她们拉下来，并抽打所有的人。有两个人昏倒在地上。

这时，他们听到了一声令下——“杀！”

他们七个人便被带到中心大院，立即被杀死了。

所有的殉难者——外国人和中国人——遗体都被剥光了衣服，然后由几名乞丐拖到南门内一块空地上。次日这些尸体又被扔到城外的刑场上，被狼狗劫掠，以致血肉模糊，无法辨认。<sup>⑧</sup>

那天，毓贤总共说出了四十四四个“杀”字，处决了四十四名外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枭首悬城门示众。

然后，他静下心来，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汇报他今天的业绩，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译文）：

我设了一个巧计，将洋鬼子尽数擒捉，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都在我的抚署中把他们处决了，没有一个漏网的。只有一个洋女人，我把她的乳房割了下来，她居然还是逃走啦！她把自己藏在城墙下面的洞里，后来我查到了，但她已经死了。<sup>⑨</sup>

然而——让我们提前透露——在山西，被杀人数总和为：外国人一百五十九名、中国教民二千多名。那么，除了毓贤亲自处决的四十四名洋人，其他人又是如何死的呢？

#### 4. 屠城<sup>⑩</sup>

下面一个个屠杀的场面，有的来自西方传教士的事后调查，有的来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记录。

毓贤设计诱杀洋教士后的第二天，七月十日，他命令把法国天主教堂的二百多名童贞女驱赶到桑棉局，强迫她们背叛天主教。童贞女们不从。毓贤命令，斩杀为首者二人，以盅盛血，强迫诸女饮之。有十六人饮尽。毓贤于是下令：把这十六人绑起来，吊在高处，以强迫另外的童贞女背叛天主教。但还是没人服从。所有的童贞女都要求“速死”。毓贤于是把她们交给了他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士兵们选择貌美者，掠数十人而去，准备做强奸之用。后来听说因为童贞女“无一屈从者”，那些士兵便把她们先扼杀，而后淫尸。所有的童贞女无一幸免，尸横遍野。

有一个传教士叫韩默理。他有好几处传教点。山西屠城开始后，他将他的中国教徒们集中在有二十顷地的主教所在地。但七月二十日，他们遭到袭击。近一千名教徒被杀死，一百多名妇女儿童被抢走，教堂和房子被焚烧。韩默理被清兵送到了托克托城，一个姓李的官员把他交给了士兵，士兵带他到托城游街示众三天。每个人都可以任意折磨他。他的头发被拔光，手指、鼻子、耳朵被割掉。然后又将他包起来，投入用油浸泡过的柴堆里，头朝下将他吊起来，从脚上开始点火烧他。描述这种场面的西方人不知道：这种处死之法，在中国叫做“点天灯”。他被这样烧

死后，心脏被两个乞丐吞吃了。

一位在太原教堂任职的英国传教士，被毓贤诱擒后居然逃出。他求救于民众，一边大声哭嚎，一边诉说：“过去，山西省遭了大饥荒，赤地千里，我拿出我的家产五六万元，救活了好几千你们中国的老百姓。我对你们山西不能说没有功劳呀！我救活了你们几千中国人，难道就换不来我的一条命吗？！”当时，周围有许多被他救助过的普通老百姓，闻之无不泣下。但左右都是义和团，正在高呼“杀洋人”的口号，状若疯狂。因此，没一个人站出来，为那位洋教士说句好话。所有的人都害怕大祸危及自己。最后，眼睁睁地看着那教士被义和团乱刀砍死。

一位英国妇女怀抱婴儿逃出，被士兵追上了。她跪在道路上泣说：“我是个医生，所做之事，无非治病救人。被我救治过的中国人，每年都有数百人。我请求你们，免我母子一死吧！”话音刚落，一个士兵挺长枪击刺，并把那母子推到火中。烈焰腾起，那婴儿在烈焰中一声哭嚎，立刻无声，那妇女奋身复出，被士兵再推入火中，终与她的孩子一同化为灰烬。

赵四毛，三十岁，他的母亲五十七岁，姐姐三十六岁，妻子只有十九岁，全家都是基督教徒。义和团在山西兴起后，他的朋友劝他逃跑，他拒绝了。七月，义和团逮捕了他一家四口人，房屋和财产全部被毁之一炬。然后被五花大绑，放到板车上押到忻州义和团头目那里，等候吩咐。

那义和团头目说：“我不想看到他们，押回去就地斩首。”

在返回去的路上，赵四毛一家唱起了圣歌：《他引导着

我》。

他们被押到本村外的一块空旷地，一把铡刀架起来，先切掉了赵四毛的头。然后逼迫赵家的三位妇女放弃基督教信仰。

老母亲说：“你们已经杀害了我儿子，现在你们可以杀我了。”她也被铡掉了头。

姐姐说：“我弟弟和母亲死了，把我也杀了吧。”

她死后，只剩下年轻的妻子了。她说：“你们已经残杀了我丈夫、母亲和姐姐，我还活着干什么？把我的命也拿去吧。”

赵四毛全家四口就这样全部被杀害。

有一个村庄，弟兄俩都是教徒。七月二日，村庄遭到义和团袭击，所有的教徒都被迫逃跑。但这弟兄俩的妻子都临近产期，跑不远。

老大的妻子在邻村被抓住，押到寺庙，捆在树上，然后毒打她。第二天她被押回本村的庙里，生下了一个婴儿。义和团先杀死那刚刚出生的孩子，然后开始审讯孩子的母亲。

一个义和团头目质问她：“你是中了洋教的毒啦，你到底中了什么毒？”

她回答：“我们已经摆脱了虚假的，而证实了真正的，这种恶是为了善。我们到底怎么作恶了？”

这位义和团头目吼道：“她还要讲道理呢！她不愿意脱离外国人的教派。烧死她！”

她的家本来已被焚毁过了，这时，义和团点燃起她家还未完全烧毁的那部分，用刀逼迫她和一个六岁男孩跳进

火里。

这时，老二的妻子也被捉住了，并由同一个“法庭”审讯。

她受到质问：“你是不是曾经让外国军官伤害过村里人？”

她回答说：“杀人、放火、作恶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义和团头目断然下令：“把这个娘儿们也烧死！”

她和她的六岁的儿子一起，像她嫂子一样，被扔进火里。

在山西死难的一百五十九名外国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这些遗言，有许多是在我们已经熟悉的义和团设置的刑场上说出来的<sup>⑩</sup>：

假如我们向他发问，无疑他会宣布：他不能把士兵的刀光同耶稣服装上的闪光区分开来。——约翰·沃森大夫

我并不后悔来到中国，遗憾的是我所做的太少了。——阿特沃特夫人

如果我们不能再相逢，那么请记住，我并不对来到中国而感到遗憾，上帝知道我是否已经拯救了什么人还是没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我们去他那儿啦！亲爱的人们——别了。——罗思纳·伯德

对我们来说死亡毕竟不是可悲的，因为那是上帝为我们进入生活安排的道路，我们既不敢说蒙难完全是可悲的，

也不敢说我们之中那些懂得幸福部分来自痛苦的教训的人也认为是这样，从这里面我们受到的奖赏太多了，以至于并不希望我们从未接受过痛苦的教训。——伊迪丝·安娜·库姆斯（摘自她的一封信）

如果上帝吩咐我们，我们会欣然为他献出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全都被害，而无一人逃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将去接替我们的岗位。——赫伯特·狄克逊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全体外国人要被杀头的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假如果真如此，我就准备着，毫不畏惧。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那么我甚至可以欣然一死。——乔治·B·法辛

我们准备好了。——阿诺德·E·洛维特

对于正在动摇、怀疑、否定的人们，我们留下了证言，上帝的恩惠是充分的。——C·W·普林斯夫人

儿童也未能幸免于难。

据统计，庚子国变中，被杀的洋教士中，他们的二十九个孩子同遭池鱼之殃。而中国教民的孩子被杀者更多，但却仅留下这份残缺不全的教民孩子的名单：

李保儿十三岁。王春元十岁，王富元六岁，王福元未  
满一岁，张多默十一岁，其弟六岁，王扁牛九岁，王保小

八岁，李洗柱十岁，王福小未滿一岁……<sup>⑫</sup>

只要有战争，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恐怖手段，尤其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恐怖的时候。这时，恐怖的工具已不仅仅是沉甸甸的、致命的刀斧，而且是毒害人的恐惧、犯罪感、由于觉得处处被人监视及害怕被揭发而产生的压抑。

相信山西的许多“刽子手”就是这样诞生的。他们是恐怖的产儿。他们必须制造更多的恐怖，自己才不会被投入恐怖中。在庚子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这恐怖就是：对成千上万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肆意进行虐杀。

对于阴谋家和政客来说，这区区几千条人命何足挂齿，只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随之而倒台！

但最后的倒台者是谁却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只有战胜者才能决定最后的倒台者。

## 【注 释】

- ① 这方面的原因探询，详见本书作者的另一部历史报告《流放紫禁城》。
- ② 有关毓贤的事迹，见许指严《十叶野闻》。
- ③ 见（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李喜所、郭亚平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上述文字见于该书之陈振江先生的序文。
- ④ （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P. 20—24。
- ⑤ 本节关于太原传教士的死难描述，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据（英）爱德华兹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P. 25—33。

⑥ 这些细节，是日后被救的两位女学生，在接受爱德华兹的调查时讲述的。

⑦ 十一位中国女学生后来都遭受了苦难，但最终都活了下来。

⑧（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P. 37—38。

⑨ 许指严《十叶野闻》。

⑩ 本节史料来源：①（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②许指严《十叶野闻》。

⑪（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P. 116—117。

⑫《山西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见《义和团》第一册，P. 518。



## 第十四章 战争（下）

### 1. 津门劫难

经过一夜炮击，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七月十四日清晨五时。一则史料载（译文）：

居民仓皇出奔，城中大乱。有人呼喊：“北门开了，可以从北门逃出去！”于是满城人都向北门而去；顷刻间，拥挤得不能行走。

城内居中地带，有一座鼓楼，下面有四个门，与各城门遥遥相对。洋人率领教民登楼，见北门拥挤不得出，连放排枪，每一排必枪杀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炮弹穿过人丛，冲出城门，死的人就更多了。于是逃难者也越来越多。

有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孩子，正拥挤着逃跑，一枚炮弹打来，她的孩子倒地而死。

那妇女哭泣道：“我所以逃跑，就为了我的这块骨肉，他死了，我还跑什么！”于是又回到城中。

还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妇女被炮弹打中倒地，怀中的婴儿还在哭。这时行人踏上，那婴儿也死了。

从城内鼓楼到北门外，积存的尸体有数里长，数尺高；洋人入城后，清街三日也没清理干净。<sup>①</sup>

这时，随军的西方记者开始了关于“津门劫难”的采访。他们看到，“路上尽是人畜尸体、武器、打坏的火车、手推车和人力车。在七月的炎热阳光曝晒下，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还有一股烧焦的人油味。城市西郊成了一片废墟。”记者写道：

我们穿过这些街区走到未受损失的日占区去。不过，看来似乎整个城市都被他们占领了，因为房屋、店铺都挂上了日本国旗，行人手里拿的也是日本小国旗。还见到其它国家的旗子，但比日本旗少得多。许多中国人拿的不是旗，而是一块布，上面写着表示顺从的汉字，他们看见欧洲人就表示顺从。

虽然大部分义和团和军队一起逃跑了，但不少人还在，他们解掉红腰带，混在居民当中。联军经过搜查，抓到几名义和团及其同谋，经过简单审讯后就将他们枪决了。<sup>②</sup>

西方记者记下了西方军队的“文明抢劫”：

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

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没有开着，就马上一脚踢开。天津的外侨由于对城里很熟悉——真是不公平——他们比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方便多了。英、美军的士兵们只能到处瞎碰，而他们，由于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就不失时机地跑到造币厂、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他们知道那儿堆着好多值钱的东西，到了那儿，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时拿走，而他们愿意拿的却是纹银，元宝与金条。<sup>③</sup>

西方记者认为：“要阻止抢掠是不可能的，当权者们于是采取了明智的方针，让士兵们为所欲为地抢一天。”

各国的记者都发表了在天津抢劫的新闻报道，但所有的报道都只有“部分真实”。他们披露别国士兵的抢劫，而对自己国家的士兵进行隐瞒。

但有时，他们的报道似乎也较为“公正”：

我认为，如果抢掠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的话，那么各国士兵都毫无例外地同样地失了体面。俄军、英军、美军、日军、法军都同样地进行抢掠，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流的抢掠能手。我这样说，我也可以作证。<sup>④</sup>

不仅如此，有位记者还对“抢劫”的“动人方式”进行了研究：

就个人而言，对这些抢劫者进行一次研究是非常有趣的事，比任何使我失神的事还能给我更多的快乐。它暴露了每一个国家国民的特性，而且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特殊方式。撇开例外情况，仅就一般的情况而论，抢掠是以一种动人的方式进行着的。<sup>⑤</sup>

首先研究一下英国人的抢劫：

英国士兵和水兵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在小胡同里、在后院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不会剩下。抓了这些家禽之后，晚餐的鸡肉就有了保证。

吃饱了以后，英国人开始开始抢劫绣花的缎袍与珠宝之类的物品。美国人不大理解这个，“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但英国人说：“呀！我的情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怎样高兴呢！”

于是，英国大兵和水兵的口袋里装满了梳子、小雕花发卡、精致的首饰，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物品，中国人的衣柜中这一类东西简直太多了，以致他们的口袋都要挤破了。

一个英国水兵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绣花裙送给情人，较差一点的送给他的祖母，因为她已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什么差别来。事实上，他心中充满了暴发的狂喜，他已经打好算盘，在回国以后，对想要纪念品的人就给他一两种纪念品，他说：“在英国的人，把中国的古董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在他的想象中，他已经能看到他贫贱家中的墙壁已经被昂贵的花缎扎成的蝴蝶装饰好了。

再看那些更年轻的英国大兵和水兵，不是为他们自己，

而是为国内的亲友而一再抢劫，当是有趣的事。而且他们都很慷慨。如果一个人偶尔出现在一堆士兵中，对某一件特别的東西表示赞赏的话，他常会请求你作为一个礼物而收下。有好几次，我看见士兵拿已有的珍奇物品送人而拒绝接受报酬，“拿去吧！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再弄一些。”

英国大兵和水兵关于抢劫是直言不讳的。他们的态度也许不够文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好心肠的魔鬼。他们也许会有缺点——从来没有人没有缺点的——然而，不管抢掠还是不抢，他们都具有一些非常讨人喜爱之处，而且在性格上，他们同所有穿过士兵或水兵制服的人一样，都是绝好的人。<sup>⑥</sup>

那么日本人呢？他们是否也像英国人一样“都是绝好的人”？西方记者说，是的，因为他们的抢劫很“优雅”：

日军士兵在很多方面跟英军士兵相似，但是较为沉默，并且不太急于跟别人交朋友。不列颠人民的率真与质朴，在东方民族身上却成为更加优雅，然而却鲁钝、庄严的举止。但是内心里，两者都是蛮勇之徒，如果正当对待，也都非常文雅。两者的区别在于天皇的子民身上具有天赋的对美的真实而艺术的敏感，而这一点在英国大兵身上却是全然没有的，一切古代的外观与风格高雅的，或者色彩悦目的东西，对日本人说来，具有比它本身真实价值十倍以上的魅力。换句话说，一只古茶杯、一只碗、一卷年久色黄的画轴、一幅毛笔画，都比一捆值钱的丝绸还有更大的吸引力。对丝绸之类的东西，他们似乎是不屑一顾的。

我曾走进一间日本普通士兵早已走进去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一橱的古瓷器，每一个士兵的细长的手上都有一只杯子、或者一只花瓶，或者一只碟子在翻过来倒过去地审视着，非常仔细地研究上面的图案。

“多可爱呀！”一个士兵说，用美术鉴赏家的眼光审视着。

“啊，真的可爱，第一流的！”他的身旁的人说，并且呼了一口气表示赞叹，同时试图了解每只茶杯底上的标记。然后开始了长长的谈话：这个陶器的年代有多久，形状是多么优雅，结构是多么精致。一面又不断地左右摇头，表示由于这些东西太容易打碎、不可能带走而深感遗憾。

不像那些缺少艺术修养的军队对待他们无法带走的東西那样，日本士兵对他们所带不走的艺术品，不但不摔碎它们，反而小心地把每一件东西放回橱架上。看他们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精密的物品，真是一种享受呀，而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以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使东西受到某种损伤的。

在另一房间里，一群日本士兵正在讨论他们刚打开的一卷画的优点，他们的结论是这幅画至少有三百年了。一个军官走进来了，他们把这画给他看，他说这确实是一幅很好的画儿，于是他们劝他收下这幅画。一个士兵把画卷起来，并且用一片绸子包起来，动作纯熟得像一个终身卖画儿的商人一样。

日军当然也抢劫，但是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和优雅的。他们不把事情乱扔，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破坏。

日本人最想拿的是象牙以及玉器，然而太奇怪了，尽管他们有艺术的鉴赏力，但是到实际要拿东西时，他们的思想又走到实用上去了。这些矮家伙找寻的主要是外国造的钟表，这在中国是很多的。银制的打时、分的弹簧表使很多日军士兵高兴，而在这些东西以外，没有比乐器与手提的八音盒更为他们所喜爱了。在这一方面，他们简直胜过了俄国人。<sup>⑦</sup>

俄军大部分从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表面上看，他们多少比别国的军人更鲁莽、野蛮些，他们具有强壮的蒙古人的外貌和特征，但据说，就是他们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

他们特别喜欢珠宝，而且把戒指与手镯当作个人身上的装饰品。他们似乎对钟表里面的机械有很大的反感，除非他们听到里面的发条折断掉下来，否则，他们绝不会满足。

俄军进行抢掠时，发现了一家香料铺，他们高兴极了，于是他们张开鼻孔，一瓶又一瓶地把香水洒在衣服上、裤子上。

俄军沉默、严肃，但非常有礼貌、谦恭而富风趣。他们有着毁坏瓷花瓶与钟表的疯狂的渴望，可能是联军中最乱的人了，一切对他们无用的东西他们都是乱扔一通。他们也是除了金条、银块与皮毛之外，什么也不看不上眼。

然而，有一个例外，就是八音盒。他们打开发条，安静倾听。他们爱好音乐的耳朵获得了满足之后，便小心地

揩去尘土，用手边的一块最漂亮的花缎包好，满意地带回营地，作为礼物送给一个军官。

在富有的中国人家中有大量的各色各样的八音盒，有的演奏中国流行曲调，有的却演奏欧洲歌剧的选曲和流行歌曲。

一个哥萨克在一个中国官员家中找到一个奇异的艺术品，是一只不比香烟盒子大的象牙盒。一碰到弹簧，盒盖就打开了，一只夜莺——体态匀称美丽而只有苍蝇那么大——跳出来，栖息在盒子边上，像一只真夜莺一样叫着，极为动听，在它歌唱的时候，啄一张一合地，尾巴摇摆着，两翼扑动着，甚至颈部与腿部也能合拍转动。这个小鸟是瑞士造的，盒外的题辞上说，这个盒子曾经在几个著名的欧洲收藏家的手中，为了它付出一大笔钱。我敢说，这个中国官员可能为这个盒子花了二三百英镑，因为中国人是精心巧作物品的大欣赏家，愿意花很大的价钱买这种东西。

但现在，哥萨克的大手把它“文明地”取走了。<sup>⑥</sup>

那么，美军士兵是否抢劫呢？美国的报纸报道说：在中国，美国士兵是唯一绝对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因此，美军被表扬为“品行比别的国家的士兵优秀”。但别国的记者似乎不这样看：

在抢掠方面，美军确实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是，也决然不比他们更好一些。当然，他们虽然缺少在别的国家国民身上发现的某种感情和艺术鉴赏力，却通常能表现出相当的商业才能。



美军既不特别喜欢艺术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瓷器，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别的人会喜欢这些东西。

他们抬起一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花瓶，为了免去轻轻放回原处的麻烦，就干脆扔在地板上。其他东西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摔碎陶瓷器皿的声音，让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欣喜若狂。相反地，在花瓶打碎前，那上面的精心制作的美丽的图案，却不能使他们没有艺术修养的眼睛感到愉快。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室的结果，就像一次厉害的地震一样。

根据我的观察，我能极力赞誉美国人是真正的军人。然而他们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财富。

当他们谈话时，金钱是他们唯一的话题，如果他们不能谈钱的话，他们就闭口不言。他们还管它什么艺术品呢？他们也说某些瓷器非常值钱，但是他们事实上不能区别一只值五分的茶壶跟一只值一千元茶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世上一切艺术品都不值“一分钱”！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房子中找寻的全是金条、银锭。银锭中，他们最喜爱四磅重的元宝，而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但是他们总是找了又找，通常能够找到。

在美国人那里，你随时能听他们提到“家中的老婆”，但几乎从来不提别的亲人。无疑，他们对所有亲人都热爱，仅次于对商业的关心。美军对武器有强烈兴趣，因而在南门附近守卫军械所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身上。<sup>⑩</sup>

该说说法国人了。他们的浪漫气质使他们在抢劫中看

来有点傻。不过，他们确实很像从具有骑士精神的国度中来的强盗：

跟美国士兵的商业才干、英军与日军的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进取心相对照，法军却似乎不愿意拿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他们间或挑选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还多少带有抱歉的样子。他们的兴趣似乎在那些不值钱的旧衣服上，显然他们是想用来修改他们的服式。他们不要较贵重的织物，宁愿拿走便宜的中国棉布睡衣，同时，他们大量需要的却是各种食物与烟草。

在天津城陷落的那一天，我偶然走到城里中心地带，看见一群法国人正处在非常激动的状态中。我用我最好的巴黎话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却在我的头顶上挥动着手臂，用沙哑的声音大嚷大叫着：

“前面去，去那边自己拿些，那儿有一大堆呢！”

“一大堆什么？”我小心地问。他的话使我推想他们的激动是由于发现了银子与金条。

“去，我跟你说了，那儿有火腿，火腿，你懂吗？真好吃极了。”

说话时，那个法国人咂咂嘴唇，他的伙伴也跟着咂嘴。尽管我道歉地解说我想到相反方向的地方去，他们却把我指引到火腿的地方去。

在一条胡同里，一群法国人正对着发现的东西欣喜若狂，当一只又一只火腿从店里传出堆在路中央时，赞美之声从四面八方暴雨般倾泄出来。

两三个青年人出神地注视着逐渐增高的腊肉堆，当外面的腊肉已堆积成庞然大山时，店里面又传来有了新发现的消息：里面还有更多的火腿！这时他们欣喜得简直要疯狂了。

但下面才是这个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它使我非常感动。因为知道附近有很多英国兵，他们派一个人去把他们的发现告诉英国人，并且问他们是否愿意分享这种战利品。

“我想英国人也吃火腿的，”一个士兵说，而且和蔼地又加上一句：“他们或许很高兴要吧。”

由于天津的粮食缺乏，这真是一种仁慈的想法。它说明尽管人们认为英、法之间存在着仇恨，然而在战场上却一点也不曾感觉到。<sup>⑩</sup>

其他国家的军队如何呢？例如印度士兵：

我停在一个大门前。欧洲人、印度人、美国人正在疯狂地跑出跑进。

挤极了，挤得透不过气，几乎要窒息。吵极了，人群闹嚷嚷地挤出挤进，从这间大厅跑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人们在兴奋地抢东西。

这是一个何等混乱的地方呀！灰尘飞腾，空气混浊，人们的眼睛刺痛了，喉咙干哑、发呛。后来当我习惯于这里的微弱光线时，弯下腰看看我的脚站在什么地方，原来脚底下是些最贵重的绸缎、铜烛台、皮子以及其他物品。

忽然，就从天花板附近，大约三十英尺高的地方，一只大箱子给扔了下来，差一英寸险些打着我的脑袋。我说

那是从天花板附近扔下来的，因为我抬头要表示抗议时，我看见了一个印度兵，他已爬到竹制顶的上面。这个人，不顾下面站着同类人的安全，又扔下另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不下四英尺见方、二英尺高，也像前一个那样，碰地以后就砸开了。于是好多双手从四方伸了进来。里面有值钱的皮子，如白狐皮、水貂皮、虎皮、海豹皮、松鼠皮等，都缝在华丽的绸缎衣服里面。有一些还用金线绣花，另一些是丝线绣的，都是多年精心劳作的成品。

这个印度兵像猴子一样灵敏地从高处爬下来，正好来得及从里面抓了一捆东西，里面是银元、一把金梳子、几个戒指、两个手镯以及一些金首饰。然后他把空箱子推向一旁，开始检查下面的第一个箱子还有些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可爱的皮子。“这些东西真漂亮。”我用印地语向他说。

“先生，不，一点也不好。”他带着失望的神情回答说。

他也是一个除了金条银块之外什么也不喜欢的，别的任何东西，对他说来都是没有价值的。他把这些都扔在一旁，就去打开在他右边高架子上的好多包袱。这些包袱也使他厌恶，因为里面只有绸缎和几卷经纱。

屋里面的喧闹声、尘土和炎热真使人不能忍受，而且看见几个侨民，都不是太瘦的身材，却爬上棚顶上去（因为低的地方已经抢光了），我认为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sup>①</sup>

从七月十四日攻陷天津，西方联军在这个“北京的门口”抢劫了半个多月。尽管他们的同胞还在北京的大使馆

内受苦，但他们似乎并不着急。

当然，除了抢劫，他们还开会，研究到北京以后如何分赃。

直到八月四日，日俄英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一万八千多人，才开始向北京进军。

## 2. 联军北上

八月四日，驻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携带一天的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凌晨二时，部队开拔。一切都是匆忙的，但没有喧闹声，没有音乐声，甚至没有吹号，每一个动作都在无声中完成。<sup>⑩</sup>

这支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但该日北上的只有七国部队：八千名日本人，四千八百名俄国人，三千名英国人，二千一百名美国人，八百名法国人，五十八名奥地利人和五十三名意大利人。德国是后来加入的。按照商议好的北上部署，三个国家的部队分三个纵队打头前进，日本人在左路，美国人在中路，英国人在右路。其他国家的部队分别在他们的后面跟进。

如此小心，并非没有必要。津京之间，陆路只有一百三十七公里，但在四十年前的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犯北京，以洋枪洋炮对付只有大刀长矛的清朝军队，同样的路途，走行了一个多月！今天，清军聂士成部虽在天津被歼，但总督裕禄和提督宋庆、马玉昆的部队仍在，而且是被同样的洋枪洋炮武装着的。联军预计，他们在进军北京

的途中，将遇到较四十年前更多的凶险。

果然，当日拂晓四时，行进左路的日军便与中国军队在北仓相遇。<sup>⑨</sup>

清朝守卫天津的主力部队犹在。部署在天津通往北京的必由之路——北仓地区的正规军有八千人，装备着德国造的大炮、精良的来福枪。

看来，清军撤离天津之后，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在北仓地区进行堵截西方侵略军的战略部署。天津的一座军械库就在这里，也是清军的驻扎地。沿军械库起筑有两道大堤，高一丈左右，成西北走向，延伸至一座火药库，然后向北转去。据测算，这一工事长达数里。防线右端布置了六门大炮，中部布置了九门野战炮，正西方向布置了三门大炮，东南方向架起了八门大炮，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威力无比的进攻阵地。如果能从空中俯瞰，工事与大堤之间，在一大片平坦的三角地带有两处建筑：一个火药库，一个小村庄；正是盛夏，大地上到处长满丈把高的庄稼。毫无疑问，隐密的位置和充足的弹药，对清军的防御和进攻都极为有利。

而且，守卫北仓的清军八千人，被堵截的日军正好也是八千人。双方旗鼓相当，当有一场恶战。

四点二十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借着曙光，日军开始向火药库旁的中国哨兵推进。十分钟后，四点三十分，火药库便到了日本人手里。中国阵地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攻”破了。据后来的报告，有三百名中国士兵守卫该火药库。没有伤亡。他们在交火之前便撤退了。

看来，这是清军“请君入瓮”的战术。日军的一个炮

兵连刚刚占据该地，清军的炮弹便飞了过来。一名日本士兵站在一棵树下，牵着三匹马。当一颗炮弹落在这名士兵和这些牲畜之间时，他们便同归于尽。一位西方战地记者发现，士兵被炸裂的伤口形状令人毛骨耸然，但“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时，军官仍镇静自若地吸着雪茄烟”。

很快，日本皇家炮兵团开始反击。日军军官测定了炮击清军阵地的射程。双方开始进行炮战。奇怪的是，清军“逐渐被驱赶出他们的战壕”，日本人开始进攻。日本兵前进时，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了伤。一个士兵一边跑步一边射击，几秒钟后，摇摇晃晃着，显然受了致命伤。他的同伴停下，搀扶他一会儿，但他还是倒下了，死在他的战友身旁。

日本皇家炮兵团终于占领了清军的第一阵地。紧接着，炮兵团旋即转移，占领了更北面的第三阵地。与此同时，日军骑兵团也向退至北仓的清军展开袭击，并缴获了八门大炮。

兵败如山倒。清军阵地一个个失陷，主力部队开始撤退，留下部分兵力掩护。几挺机枪封锁着日军前进的道路，其中的一挺瞄准着日军穿过的架在小溪上的一座小桥。最初冲上小桥的日本士兵在弹雨中或伤或死，无一幸免。但日军从桥下穿了过去，占领了清军的指挥所。

忽然，眼前的景象让占领军的眼睛一亮：

这真是一个风景美丽的营地。那里有几个巨大的圆锥形的白色帐篷，像画上的一样漂亮，上面插着几面战旗。三门大炮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好像是画面上的点缀。

那儿有几口大锅，满锅煮好的米饭。大碗里盛着各种

各样的菜。种种迹象显示，这是一次被中断的进餐场面。

许多士兵的尸体躺在地上，大多都是被击中了膝部。战壕里有数千发毛瑟枪子弹及许多箱未用过的弹药。还有一些小杯、刀剑和士兵丢弃的衣物。但显然有一枚日军的炮弹正落在那里的士兵中间，将一人炸得肢体分家，其惨状令人生畏。

北仓战斗被称为清军阻击侵略军的“打得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但仅仅持续了八个小时。全部战事由日军单独完成。日军有一名军官和四十一名士兵死亡，八人下落不明，十二名军官和四十三名士兵受伤。清军伤亡人数没有统计。

中午时分，一名骑兵飞马而至，向日军指挥官福岛将军报告：发现中国部队正在前方，有六门大炮，十二面战旗，估计有六千兵力，正向杨村撤退。

即使在晚清时期，杨村也算得商业重镇<sup>⑩</sup>。它距离天津城区有三十公里，铁路线在那里跨过海河。但现在铁路已被破坏，只有一些火车的锅炉和车轮，仍然挺立在河堤上。所有木结构的铁路设施都被义和团烧毁，而黄铜、螺母和镙钉等被认为值钱的东西，全被拿走。

北仓战役后，提督宋庆率领着六千清军主力，护卫着总督裕禄，退守杨村。村镇是天然屏障，在这里继续阻击侵略军是正确的战略。

但这次阻击战很难称得上是什么真正的战斗。

在联军方面，战斗几乎由美军独立承担。当时，正是六日上午十一点，美军接到了进攻命令。一个上午的长途行军，累得美军士兵疲惫不堪，饥渴难耐，许多人瘫倒在地，精神几近狂乱或完全崩溃。行军中路过几处水井，但



美军将领下过严厉的命令：不许任何人喝水！享受惯了的美国人因忍受酷热、尘沙和焦灼的阳光而痛苦万状。一名士兵唇焦舌燥，身体可怕地扭曲着，已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癫狂者。他艰难地作着手势，让同伴开枪打死他，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这般痛苦了。

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

清军在联军必经的杨村地区设置了四道战壕：公路和河岸各一道，平原地带两道。地形对清军有利，相对于只有两千多人的美军，兵力也占有绝对优势。然而，战斗仅仅经过了三个多小时，清军便再次撤退。这似乎同总督裕禄的死有关。在战斗中，他自杀了。<sup>⑤</sup>

裕禄为什么要自杀，始终是个历史之谜。在直隶总督任上，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着朝廷的方针政策，他是一个忠臣。

是因为虚报战功而害怕追究吗？我们已经知道，朝廷所以敢于下达《宣战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裕禄把大沽口的失守上报为大获全胜，于是坚定了朝廷向西方宣战的决心。而且，在战争进行中，为了讨赏，他屡屡虚报战事，就在不久前，他还向朝廷奏上一条战绩：“在天津捉得骆驼四只，杀死洋人多名。”要在平常，一个朝廷的忠臣为谋表扬而虚报功劳，可能不过使当权者一笑了之。要是在战争中胜利了，他虚报的战绩可能会被当做真实的战绩。但要是在战争中失败了，呃，那可不得了，他准定是只“替罪羊”。

可能，一直在退到杨村之前，他还抱有侥幸胜利的希望，虽然那希望很是渺茫。但现在他看出来：胜利，那

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画饼。

这位大清朝的总督，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战斗。而最近半个多月来，他的耳边无时不响着炮声。战争吓破了他的胆。将被朝廷追究失守之罪责的恐惧，更像一柄无时不高悬于头顶的利剑，使他感到随时会砍断他的头。越是接近北京，他感到那把剑离他的脖子越近。有好几次，在梦中，他的脑袋，“咔嚓”一下，掉了。于是——他身边的人后来回忆——即使在白天，总督也好像一个梦游人，“他真的吓破了胆”！

在杨村，面对着美军的进攻，清军又是一触即溃。军队被轰散了。他忽然发现，半个月来没有一刻离开他身边的宋庆提督，眼下不知到哪里去了。四周都是炮火硝烟。

有一个士兵肯定地说，这时，他看到了总督裕禄：就在田野里，一个下属拖住他的衣襟，而他神色凄凉，若有所思。“我看到，总督是被退兵的浪潮推到那里的，他闭着眼，独自一个人向着一间茅屋走去。”

后来证实了。不错，那人正是总督裕禄，梦游中的总督，他还想着逃跑。但他逃进的那间茅屋成了他命定的归宿地：那是一间棺材店！

是的，除了一口棺材，茅屋里什么都没有。裕禄惊呆了。命运呀！上天把我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还跑什么？再跑，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命运啦！于是，他躺进棺材，拔出佩剑，朝自己的胸膛刺下去。

杨村战役于下午两点半结束。美军二十一人死亡，五十四人负伤。清军死伤人数不详。

虽然早早地躺进了棺材里，没有任何人给总督裕禄举

行葬礼。但美军为阵亡者举行的葬礼却很感人：以军乐队为先导（在进军北京的联军中只有英军有军乐队），将遗体带到一大片墓地。先奏起令人伤感的哀乐，然后将遗体一个挨一个地安放好。战争结束后，这些遗体将用公费运回美国再次安葬。

此时，提督宋庆率领清军残部退守蔡村。他已经全无斗志。但就在这时，一支由李秉衡率领的义和团部队，正从北京朝蔡村方向驰援而来。

李秉衡是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的。

此前，七月十四日，西方联军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但迟迟未曾进军。十七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东南十三省督抚，再次上奏朝廷，敦促当局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人，以避免国破的命运。上谕“从之”。当天，慈禧下令“停攻使馆”，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该署，以便安排他们回国。李鸿章奉命“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事”。在这短暂的缓和时期（七月十四——二十六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和谈的曙光出现了。

本来，李秉衡到北京也是承担着促使朝廷和谈的使命的。他的职务是巡阅长江大臣，驻在南京。北京事变后，他接到“赴京晋见”的谕旨。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失时机，请他到北京后，敦促太后与西方和谈。李秉衡答应了，并在主和的南方督抚奏折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然而，到北京不过两天，他便改变了他的初衷。他看到，北京权力的天平早就倒向主战的载漪一边，而载漪也不失时机地拉拢李秉衡，让他投入自己的怀抱。李秉衡感

觉到了权力的温暖，立刻变了嘴脸，公开放弃了信仰。

当慈禧召见他时，询问他的政治态度，他坚定地回答：“战之！义和团是可以信赖的。”慈禧拿出了有他署名的奏折，问他何以出尔反尔。他眼睛眨都没眨一下便说：“这是张之洞擅自盗用臣的名字。臣从来不是他们一伙的！”

如此恬不知耻的背叛，并非李秉衡一个官员的秉性。这几乎是专制条件下多数官员的特征。他们叛离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从来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吞吞、难为情地、悄悄地离开。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青天白日，冷笑着，以一种触目惊心的自信，直截了当地投向昨天的敌人，并且立即学会了敌人的语言和论据。他们眼里只有一条：永远和最高权力保持一致。他们的背叛，由于变化疾速，透露着一种让人震撼的胆气。说什么要有良心，这话，是欺骗老百姓的。老百姓们于世俗之见沾染太深，总觉得有些事情是好的，有些事情是坏的。但官员们可不这样看待问题。他们不需要这些无聊的善恶之念、是非之分。他们在决定当官之前，已经彻底抹杀了良心。

说起来，李秉衡虽然缺少信仰，但至少还有胆气。他跟着载漪，成为破坏和谈的政治力量，但当北京城破之前，他以生命为北京抵挡了最后一击。

七月二十六日，朝廷下旨：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

八月七日，闻联军攻占蔡村，逼近北京，李秉衡请求率领义和团出战迎敌。《庚子国变记》载（译文）：

那一天，李秉衡在北京视师。他请出三千义和团民跟他出战，亲自向义和团的头领叩拜。义和团们手中拿的

兵器有：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称之为“八宝”。

那天，所有的义和团几乎都来了，聚在那里的有数十万人。李秉衡称之为国家“禁旅”。

视师之后，这支义和团大军浩浩荡荡的向蔡村进发。然而，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支数十万人的义和团大军与西方联军进行过战斗。所谓交战，《庚子国变记》中只有一句话：“闻炮声，一军皆溃”。此后还有句话：“拳匪杀平民无算而归”。他们杀到北京城外去抢劫老百姓去了。

他们当然也有人被杀。但既然不是战斗，而又死人无算，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在这场战争中，战斗少，屠杀多。

屠杀者自然是西方联军。那所谓的战场，实在是屠杀场：

到处全是死马和死人，层层迭迭，颠倒纵横，骇人心魄。死人死马把那条路填得和旷野一样高，和路边一般平，正像一升量得满满的粟米。上层是一堆尸体，底下是一条血河。血一直流到北京城边，在护城河里积成了一个大血泊。那屠杀便是由这样的密度造成的。举一个例子，一个将军把他的佩剑交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士兵，那士兵受了剑，立刻杀了三百一十一个俘虏。

李秉衡没有被屠杀。像总督裕禄一样，他是自杀的，“仰药而死”。但他的死事尚不如裕禄。没有一口现成的棺材在他的死地等待他。他死后，尸骨无存。<sup>⑧</sup>

八月八日，西方联军抵达蔡村。日军第一个到达。这时，北京一使馆密使偷出京城，带来一封书信：

目前，北京使馆内，除德国公使外，各国公使们总算还活着。只是如今粮食将尽，被困者生命危在旦夕，况且敌人的攻击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急切盼望援救军早一天到来。

日军统帅福岛少将立刻向其他联军统帅报告了北京公使馆的情况，并提出请求，改变预定的作战方案，迅速向北京进军。各国统帅同意日军的请求。福岛少将立即写好回信交与密使先行带回：

日本及其他联军于八月五日将北仓附近敌人清除，六日占领杨村。日、英、美、俄联军于当天从杨村出发，北进途中于午后八点二十分在南蔡村接到来信，得知北京详情，万幸的是大多数公使及以下人员安恙，正急盼联军解救于苦难之中。我师团长以下群情激愤。如果联军进展顺利，那么九日可以到达码头，十一日到张家湾，最晚十二日抵达通州，比预定进攻北京的时间十四日提前两天。

（八月八日于蔡村北三十四公里砖厂福岛少将）

十二日，联军准时到达通州城外<sup>⑦</sup>。一路上，有零星的战斗，但几乎没有严重的阻力。这使西方联军感到奇怪：通州，北京城外最后的屏障。从这里到北京外城，只剩下不

到二十公里。

四十年前的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官员们打出的停战旗帜下进入此城。巴夏理爵士和其他六个人被送了进去。但中国士兵紧紧包围了他们，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扔到大车里，继而尖叫着把他们从大石头铺的大路上运到北京，投进监狱。这一事件的后果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以示报复。

但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采取这种诱敌深入的战术。只在通州城外，发现了一个可怖的情景：一根木杆上，悬着四颗中国人的头颅。联军猜测：那可能是落到义和团手中的中国基督徒。

这时，八月十二日凌晨三点三十分，日军前卫部队来到城门前。其他部队亦成战斗队形散开。然而，未遇任何抵抗，只有城门紧紧关闭着。

一个工兵连用炸药炸开了城门，四点三十分，全部联军开进了通州城。

通州城内，大部分居民都已将门闭上。几小时后，日本兵带头破门而入，其他联军士兵立刻仿效。到下午，大街小巷均遭破坏，黄昏时分，死亡的中国人已是横尸遍地。一个中国青年，跛着脚走路，神情迟钝，徘徊在街头乞食，忽然发现地上一件新衣，是清兵丢弃的，于是将衣服拾起高兴地穿上，在大街走。他被日本士兵抓住，遭一顿痛打，手脚捆绑，被抛到一个路口。过了几小时之后，他死了。

酷烈的阳光下，到处都是迅速腐烂的马的尸体，正在蠕动的大量蛆虫，燃烧的房屋，远处街上的居民——几乎所有人——见到洋人走近，无不四散惊逃。沿路处处可见

靠墙上吊、血迹斑斑和身首异处的尸体，还有玉皇大帝的神像。一条斜街上，大部分房屋都被毁坏，一条可爱的小狗站在一所被焚毁房屋的台阶上，显得哀伤而又不安，不停地朝四处张望，显然正在等待下落不明的主人。

一个西方记者骑马来这条街上时，看见了这条小狗。他下马，从衣袋里掏出几块饼干，想方设法喂它，但它不吃。又诱它喝水，它还是不理睬。“这可怜的小动物看上去饿极了，也很悲痛。但它坚决拒绝离开它的家。我真想把它带在我身旁。再也找不到这般可爱忠实的小狗了。”

那天，这位随军记者向美军统帅盖斯里将军建议：“今天晚上点一个巨大的篝火，让北京城里的人们看到，心中发生恐惧。”

他对将军说：“这样一来，我想明天早晨，你们就不需要打什么仗。”

将军回答说：“啊，你知道，我们不愿激起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反抗。”

当天晚上，七国联军各路统帅，开始研究进攻北京的战略部署。此时，北京城内，正上演着庚子年间的最后一场闹剧。

### 3. 永远正确的证明<sup>⑮</sup>

听到联军北上的消息，紫禁城内一派恐慌。四十年前，大清朝的劲旅未能阻挡住英法两国的联军，今天，满朝文武都预料到，北京城被攻破的日子已经不再遥远。



在这严峻的时刻，主战派和主和派都在悄悄地想着心事和后事。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主和派都感到了真理在手的喜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旦宣战，不可收拾。这不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后果吗？他们开始悄悄地考虑如何促使这个发疯般转动的车轮停下来，否则它必然坠入深渊。有朝一日，理智与激情终将彻底分手。等着吧，今后的烂摊子还要我们来收拾呢！

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嘿嘿地冷笑了。想把真理颠倒过来，梦想！在这疯狂的赌盘上，他如果不赢，便会灭亡。他要有一次最后的拼死的挣扎，让它产生巨大的力量。你说你是真理在握，但我能封住你的嘴巴。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那原因不是别的，只为了免得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子孙后代。死人的嘴巴最严！于是，与深渊近在咫尺的载漪们，以豁出去的勇气扑向主和派，仿佛一头被围猎的鹿扑向猎人。

他命令他的死党们拟定一份杀人的名单。死党们领会了他们主子的意图，决定在即将失败的最后时刻，有五个人必须死。这五个人是：

-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
- 太常寺卿袁昶；
- 兵部尚书徐用仪；
- 户部尚书立山；
- 内阁学士联元。

当这份名单交到太上皇载漪手中时，他不胜诧异：就是这么几个大臣吗？最高的官职也不过是个部长。多渺小的对手！如果他们当初能紧紧跟着他载漪的旗帜前进，将来也许会有更好的前途。但现在，他们必须谢幕退场了。

由于儿子成了皇储，载漪成了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二号人物。第二把手，这就是说，除了上面还有一个主子，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凡是违抗他的意旨，抵制他独断专行的人，都能被他打发归天。

我们不能说这位大人物不热爱德行。不，他热烈而执著地爱着自己的德行，别人只要有一次同他意见分歧，他都不会饶恕宽容。这“德行”偏执而狂热，拒绝任何妥协，连他的敌人屈膝投降他都不予认可。哪怕从政治上考虑极端需要妥协，执著的仇恨和刚愎的骄傲都不容他让步。

名单上的这五个人他都认识。自从朝廷开始讨论战与和的时候，他们就同他作对。看来，这五个人蔑视并憎恨他，如同坚定憎恨机巧，不渝的忠贞憎恨见利忘义。现在，他们正确了，而他，载漪，看来要错了。那么，他们该死了！

有史料说，杀死这五个人的谕令都是载漪伪造的，慈禧太后并不知道。这是不确的。无论载漪如何看不起这五个人，但一下子杀死五位部委级的领导干部，这可不是一件能够隐瞒的小事情。不！慈禧知道而且亲自批准了这次谋杀。其动机和载漪的一样。

西方联军就要攻破紫禁城了。她，力主向西方宣战的最高领袖，正以令人惊异的审慎和十倍的精力准备最后一次决战。在首都，凡是还能拿得动武器或骑得了马的人征

召一空；成千上万的人在夜以继日地锻冶马刀，铸造大炮，一切值得怀疑的人都要撵走，一切可疑分子都得严密监视。在这种时刻，可容不得一点仁慈。就要与西方的侵略军决战了。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但越是这样，越是要考虑到失败后的每一个偶然因素，以防患于未然。而今后最需要防患的，就是那些因自己的失败而证明了他们的正确的人！他们是最危险的。他们会向未来出具证明，把她，慈禧太后，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过去，她没有理睬他们，那只是因为自己还有力量管住他们。但是现在，要失败了，她没有信心了，希望消除隐患。所以，她批准了这最后的解决方案：决不能让任何一个潜在的敌人留在自己的后方。

袁昶和许景澄几乎同时被捕。

那天是七月二十九日，许景澄起得很早，北京城内，义和团们还没开始喧闹，是难得的清静时刻。他吃了早饭，坐在书房中与一位来客闲谈了一会儿，然后招呼仆人驾车，说：“我要到总署去了。”许景澄的官职是礼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大臣是他的兼差。然而，当此动乱之秋，他的兼差更重要。

还没来得及整好衣冠，忽然，仆人拿来一张名片，说有客求见。许景澄看了看名片上的姓名，是个平时不认识的人。于是令仆人出去说：“我就要到总署去，有要事，现在没工夫接见来人。”

仆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仆人说，那个来的人说他就是总署的听差武弁，奉庆王的命令，请许景澄大人立刻入署，有重要的公务等他商量。

于是许景澄出去见了来人，站着谈了几句话，那个人

就走了。许景澄回到房间，一边穿戴衣冠，一边对一位客人说“昨天晚上分手时，没听说有何要事，为什么今日要聚集呢？”

那位客人说：“想必有事。您走以后，我想到城外去，看看外面有什么消息。”说着，走出门，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说：“那个请您去总署的来人还没走，刚才我见他正在门外东张西望，这很让人疑惑呀。而且总署武弁数人，我几乎是都认识，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请您多带一些人去，或有不测，您可以让他们回来报个信。”

许景澄听罢，一笑置之，不以为然。

但许景澄的车子刚出胡同口，那个武弁马上一挥手，来了一大帮子人，簇拥着许景澄的车驾，走了。

许景澄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道：“议事在提署，不在总署也。”

不一会儿，来到步军统领衙门。那个武弁立刻搀扶许景澄下车，又一挥手，让跟班的人都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奉许大人，不需要你们啦！”

许景澄走进衙门，被引到一所很小的房间内，刚进去，就听到门外落锁的声音。他刚要喊叫，忽然听到隔壁室内有一人正在大声叱咤。仔细听，是袁昶的声音。但不得相见。

那些跟班的人回府后述说经过，那位许府的客人闻听大惊，急忙来到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府上探闻消息，并请其救援。王文韶不信，说：“刚才入朝奏事时，并没有这样的谕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位客人奔走了一夜，什么消息也没打探到。直到凌

晨，才得知许景澄和袁昶都被押送刑部了。又听说，刑部已经得到谕旨，要他们“预备红绒绳”。他一听就吓呆了：清朝刑例，只有当朝廷大臣临刑时，才用红绒绳捆绑呀！

但在刑部大牢，许景澄和袁昶终于见面了。袁昶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一定要置于死地呀！”

许景澄笑着说：“我们死了以后就知道了，你何必这么计较呢。”

实际上，他们应该清楚死因。就在几天前，袁旭和许景澄联名上了奏折：大局糜烂，请太后杀纵容义和团暴乱的大臣。谁都清楚，他们指的是载漪、刚毅等权倾当朝的大臣。

当其时，许景澄是清政府中最熟悉洋务的外交官员，早先曾担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兼任比利时公使，后又改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后任驻德公使。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后，他被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礼部左侍郎。在中法战争中，他坚决主战，认为“战事将成，非严防不足以阻敌谋，非持久不足以收战效”。而到庚子事变时，他却坚决主和。

而袁昶，先任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政变后，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在庚子年的御前会议上，他和许景澄一道，也公开主和。

在和战未决的时候，许景澄对满朝文武说：“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兵衅决不可启。而且，《春秋》之义，不杀行人。

现在，竟要围攻使馆，实在是违背国际公法！”

而袁昶更加直言不讳，公开指着载漪说道：“如果你要把拳匪召来，即使你能血洗东交民巷（使馆区），战胜外兵，然而这等于向十一个国家宣战。众怒难犯，悉坏全局，这责任你负得了吗？！”

袁昶还致书庆王，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其中有云：“端郡王（载漪）所居势位，与当年的醇亲王（光绪之父）相同，尤其应当明智地善处嫌疑之地。”

有人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判定袁昶和许景澄为反对太后的帝党，实在是望文生义了。许景澄长期任驻外国大使，从未卷入帝后党争旋涡。且他和袁昶的升迁，都是慈禧一手提拔的。他们不是帝党。此时也没有什么帝党。整个朝廷都在慈禧的主持下。他们的被杀，诏书皆以“莠言乱政，语多离间，大不敬”治罪。

而且，战争期间，袁昶对敌人“心慈手软”，被视为“汉奸”。董福祥的亲兵劫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悬首于东安门”。袁昶认为“这太残酷了”！他说，在总理衙门工作期间，他认识这位德国公使，不忍心看着他暴尸于外。“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呀！”于是被视为“此等汉奸，竟然对中华民族的仇敌表示同情！”

至于许景澄，有一个最大的“罪恶”，即使载漪饶了他，慈禧太后也饶不了他。数日后，慈禧西逃时，途中接驾的县令吴永曾有一段回忆（译文）：

一日入见奏对，完事后，太后与皇上同坐倚窗炕上。我见太后意尚闲暇，就乘机奏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

臣，皆忠实为国。当时以身试法，当然必有应得之罪；论其心迹，似在可谅。据臣所闻外间舆论，都很为他们痛惜。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平反昭雪呢？”

刚说到这儿，意犹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鼓突，额间筋脉膨胀起来，露出牙齿，厉声喝道：“吴永，连你也这样说吗？”

我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惊万状，当即叩头请罪：“臣冒昧，不知轻重。”

太后神色略定，忽将怒容尽敛，从容说道：“想你也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就在这儿，你可以问皇帝。当日叫大起（御前会议），王公大臣都在廷上，他们还没轮着说话呢，许景澄等人倒叨叨切切的，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直到把皇帝哄得下了龙位，牵着许景澄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抱成了一团，放声纵哭。你想想，还有一点体统么？！你问问皇帝，这是不是当时的实在情景？！”

皇上默无一语。我只得叩头，说：“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

太后于是又说：“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间那里知道？你当日尚是外官，自然就更不明白了。”

我见太后意解，始起立。

所以后来杀许景澄等的上谕中，有“语多离间”这样的语言，当时我疑心此谕出于载漪和刚毅的伪造。其实许景澄和袁昶的死，在御前会议上就埋下了伏笔。证以太后所言，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则太后发怒的原因，可以揣想，应该是她的疑心而导致她误听误信呀！<sup>⑨</sup>

真的，许景澄和袁昶的最后被杀，可能真是一个误信。慈禧谕令各省督抚“杀洋人”，但发到各省的谕旨，“杀”字都变成了“保”字。后来刚毅“查出”这擅改谕旨的大臣，就是袁昶和许景澄二人！慈禧太后闻知此事，大怒，道：“他们胆敢擅改谕旨，就好像秦朝的赵高一样，应治以车裂之刑！”于是“传谕立斩之”。

七月二十九日，囚车载着袁昶和许景澄，驶过那条许多被斩官员都曾经走过的悲惨之路，朝菜市口而去。街道两旁观者如堵，看热闹的人群欢欣鼓舞，兴奋无比。“杀汉奸喽！”死刑成为民众的节日。沿途屋顶上，旗帜招展，窗户里传出声声欢呼，一片欢腾。当囚车到达刑场时，人们激动地齐声欢呼，震撼了偌大的广场。

监刑者是载漪的弟弟载澜<sup>④</sup>，北京义和团的二头领。

行刑之时，袁昶神色自若，对载澜说道：“我可惜看不到重见天日，消灭篡位者的那一天啦！”

载澜大怒，喝斥道：“你这个奸臣，不许多言！”

袁昶毫不畏惧，仍大声言道：“我死而无罪，你们这些疯狂而愚昧的东西，制造阴谋，祸国殃民，你们犯下的才是应当受死的罪恶。我的名字将长留于天地之间，受后人万世景仰！”

说着，袁昶转头对许景澄说：“不久，我们就要在地下相见了。人之死，就好像回家一样啊！”

这时，行刑者立下其刃<sup>⑤</sup>。联元、立山、徐用仪死于八月十一日，比袁昶和许景澄晚死十二天。这一次，所杀三位大臣中，居然有两个是满人！

联元的死，乃因为他竟然与他的老师崇绮“道不同”。



当年点庶常时，崇绮为联元的阅卷大臣，这便有了师生之谊。联元长期做外官，先后任安庆知府等职，故在帝后党争中无所表现。戊戌政变后，联元入京陛见，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补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满人，虽出崇绮门下，但在和战问题上却和老师对着干。御前会议上，慈禧已经决定宣战，联元却冒死进谏：“从来没有一下子和十一个国家翻脸打仗的道理呀！真要这么干，我们的国家先自危险啦！”

于是崇绮厉声痛骂联元：“你他妈的是咱们满人，也要仿效汉族人来当卖国贼吗？！”

联元理也不理他的老师，竟拂袖而去。

他知道，目前的北京，只有荣禄一人还有能力说服慈禧太后，而荣禄竟然一声不吭。因此，他致书荣禄，说：“请您不要首鼠两端。一旦国家糜烂，大祸临头，您身上的肉还能保得住吗？”

如此言论，自然被视为“满奸”。

联元是头一个被押赴刑场的。刽子手正要用刑时，忽然，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穿着红衣，扎着红巾，从宣武门怒马驰骋而来。马的后面，拖一巨物，尘埃汹涌，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不一会儿到了刑场，才知道那是一个人，被缚手足，系诸马蹄，脸已经烂了，认不清是何人。联元在自己的脑袋掉下来以前，竟有闲心问一声刽子手：“那是谁呀？！”

刽子手道：“是立山大人！”

说起来，立山大人之死，纯系载漪、载澜哥儿俩公报私仇。他本是慈禧太后的红人，曾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口

袋里装着皇宫的钥匙，“以心计侍中用事，很得太后的欢心”。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时，他始终在现场操持，慈禧对这样的忠心很是看重。颐和园完工后，立山奉旨赏加太子少保衔，转为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就连枢府的亲王大臣向慈禧送礼，都要请托立山，可见他同慈禧的关系非同一般。

一八九六年，宁寿宫失盗，立山犯下了“失察之罪”，但仅仅受到“镌职留任”的处分就解脱了。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再次训政，立山立刻荣升为户部尚书：整个国家的钱库都在他的手里。

但在慈禧钦定接班人的时候他失去了信任。一八九九年慈禧议立大阿哥时，立山主张立恭亲王溥伟，载漪自然对他恨之如骨。而大阿哥既定为载漪的儿子以后，慈禧又谋把光绪皇帝从内部先给废了，立山仍然觉得不妥。这样一来，他便同最高权力有了隔膜。

庚子事变后，他只有一次与事变有所关联。那是在一次御前会议上，讨论是否进攻使馆，众论纷纭，久久不决。慈禧太后说：“这是国家大事，应当问皇帝。”光绪自退政以后，从来都是恭默不语，可这一次居然侃侃而谈，力言不可进攻使馆，说“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

王文韶立刻叩头道：“皇上能考虑到这一点，真是国家的福气呀。”

载漪大怒，斥指道：“王文韶，此时你还要说这种误国的屁话吗？！”

这时，立山说话了：“我看，应该先派官员去向联军宣传朝廷的德意，如果他们不可理喻，我们再想办法。”

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那么，我就命令你去和洋人谈！”

立山说道：“我受国家的厚恩，不敢推辞。只是臣向来对洋务是不熟悉的，敢请徐用仪和我一起去。”

然而，刚出宫门，立山便被一群义和团捕获，拥至家中。门外设坛，说立山家中有一个地道，潜通西什库教堂。于是大加搜索，没有发现什么地道。最后，把立山拥至义和团神坛前。一个义和团大师兄拿出一张纸，说：“这是神符，我烧时，神符上升，你就无罪。”果然上升。但仍然把立山捆绑了起来。立山一时吓坏了，不禁跪地求饶。一抬头，看到载澜正站在一旁讪笑，忽然全都明白了。

原来，北京有一名妓，名叫绿柔，艳绝一时，载澜和立山都很喜欢她，争着要把她“贮诸金屋”，成为自己一个人的“美餐”。当其时，载澜不过一个闲散无差的公子，口袋里没有钱，根本没办法和装着朝廷银库钥匙的立山相争。于是，绿柔就归立山所有了。如此掠美之恨，澜载痛之入骨。忽然朝纲翻覆，载澜成为未来皇帝的小叔子，于是有了报复立山的本钱。

这样想着，立山站立起来。被下到刑部大牢后，他忽然大哭。同牢者询之所以，问，“怎么，怕死了吗？”立山说：“刚才，我一时昏瞆，居然屈膝于乱民。我虽不肖，也是朝廷大员。如此亏体辱国，真是悔恨交加。我决不是怕死！”

于是以载漪兄弟诬蔑立山“交结洋人，行踪诡秘”，谕“著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

但上刑场的那天，刽子手的那一刀不过走一个形式。脑袋掉下来以前，立山早就被马拖死了。

同一天，被处斩的还有兵部尚书徐用仪。他死于他自己的泪水。

他有过倒霉的日子。他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时的军机大臣，战争失败，言官交章弹劾，骂他“朋比误国”，被光绪皇帝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戊戌政变后，慈禧再次训政，徐用仪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这一年，他已经七十七岁，好友劝他不如“全身而退”。他不听，说：“我当了五十多年的官，什么都干过，就是没有当过尚书（部长），真是辜负了此生啊。我一定得当一回尚书才能退休。”后来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时值庚子国变的前夜。

而且，他忘了他有一个仇人：徐桐。

那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徐用仪以少宰为军机大臣，而徐桐以大学士管吏部。当时，徐桐久不召见，一日忽入见。散直后，他来到吏部，徐用仪已经在那里等他。徐用仪问：“听说您今天有奏折，我可以听一听是什么内容吗？”

徐桐微笑着说：“也没什么。只是引用《春秋》之义，责备贤者耳。”

原来，徐桐刚刚弹劾了徐用仪。后来徐用仪被赶出军机处，徐桐的这份弹劾是起了大作用的。这仇就结得深了。

庚子年间，徐桐卖身投靠，一跃而为未来皇帝的“师傅”，以帝师之尊，柄执朝纲。这时，徐用仪的好友再次劝说他“时事方艰，当乞身勇退”。

好友派人给徐用仪送去一封信，封识重重。徐用仪打开一看，里面却只有素纸一幅，上书“水竹居”三字而已。徐用仪一看就明白了：水竹居者，徐用仪家乡的一座别墅

名称是也。这是劝他“归去来兮”。但徐用仪还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庚子国变中，徐用仪小心翼翼地不在战与和的争端中发言，自以为可以逃脱大难。但他一个不慎，在袁昶和许景澄被诛死以后，无人敢哭，徐用仪居然“独为哭殓”。

于是刚毅说：“看来，徐用仪也是个汉奸！留下一一定是个祸患！”

徐桐也看到了机会，立刻附和道：“杀了他，可诛内奸以清朝列！”

徐用仪就这样被杀了。死后，枢停南洼破庙。开吊两日，只来了一个人：他的儿子。

仅仅十天时间，连杀五大臣。紫禁城内阴云密布，气象萧然，人人自危。但此时，距联军攻入北京，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 4. 紫禁城内一片红

八月十二日，联军占领通州当天，高级将领们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北京的时间和路径。军事地图铺在桌上，他们看到，所谓北京城，实际上包括四座小城：外城，西方人称之为“中国城”；内城，又称鞑靼城；皇城；紫禁城，也就是皇宫，西方人称之为“红色禁区之城”。

军事会议决定：明天，十三日派出侦察部队，十四日各国军队集中到离北京约五英里的战线上，十五日展开进攻。

从通州到北京有好几条路，各国部队进攻路线部署如下：

俄国军队，走北路，从通州向东直门进发。

日本军队，走一条直通齐化门（今朝阳门）大石板路。

美国军队，在大石板路南面，沿运河河岸进军，直达东便门。

英国军队，走南路，大约在美军路线南面二英里，进攻宣武门。

其他各国军队在俄、日、美、英部队进攻时跟进，并配合作战。

进军路线和时间都决定了。但第二天，各国军队到达集中地点时发现，俄国军队不见了。他们已提前进军。日本将军知道，这一行动意味着俄军决心第一个进入北京，攫取先入北京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这好处日本人也想得到，于是日军也立刻出发了。随后，各军都急速地前去攻打北京城<sup>②</sup>。

十三日晚上，夜色漆黑，十一点时暴雨倾盆。俄军一个步兵营和半个炮兵连抵达外城东便门。清军没有发现敌人，俄军司令官决定发动突然袭击。

沿城墙有一条护城河，可由一座小桥通过。俄军向着小桥悄悄地匍匐前进，企图通过小桥，夺取城门。

桥头堡内的中国士兵惊醒了，城墙上的清军向俄军猛烈开火。但漆黑的雨夜未能使俄国人遭受伤亡。

俄军将两门火炮在逼近城门处架起，开始向城门开火。北京的城门已用极厚的铁板加固。俄军火炮经过大约二十次轰击，才打开了一个仅够一个人钻过去的洞。但俄军居

然冲了进去，并打开了旁门，把三门大炮拉进去，继续前进。

清军退守内城，在一处角楼集中火力，向俄军猛烈开火。仅几分钟，俄军炮连的十八匹马就倒下了十匹，指挥官受重伤，他的士兵死亡过半。但俄军惊讶地发现，“大约二十分钟后，射击停了。”

俄军也停止前进，等待破晓。天亮时发现，中国军队仍然顽强地占领着高墙。城墙顶上，大清国旗迎风飘扬。这是李鸿章奉命于今年设计的第一面中国国旗，红色的底色，衬托着一条正在舞蹈着的黄龙。

但，这面旗帜，很快便被俄军缴获了。

中国军队开始反击，试图夺回战旗。俄军发现，这支军队的军人，身着白色的衣服和带尖角的蓝帽子，知道这是董福祥的被称为甘军的穆斯林士兵。他们成群结队，勇敢地进攻，俄国人觉得他们的阵地岌岌可危了。

就在这时，西方援军到了。远远地，俄军发现，一面美国旗正在城墙上飘扬。不久，一大批美国士兵攀登上城墙，到达俄军阵地。

一小时后，中午时分，北京内城的城墙上升起了白旗。下午二时，北京内城被西方联军全部占领。

就在这时，使馆发出了信号。俄军率先冲过去，在被围的中国基督徒和一对欧洲夫妇帮助下，用铁棍在一处腐朽的木门上插个大洞。这时，他们听到了前来迎接联军的基督徒的欢呼声。而在使馆门口，享受到张开双臂等着他们的白人男女和孩子们惊喜若狂的迎接。

北京内城被西方联军攻克了。②

但内城里面的皇城和更里面的紫禁城，仍然在中国人手中。<sup>②</sup>

八月十五日，使馆解围后的第二天，浪漫的法国人在正阳门以东一百五十码的城墙上架了一门炮，一发接一发地用炮弹轰击他们“前方的阵地”。法国指挥官身边围着一群昨天被他们解放的女士。每打一炮，她们便堵住自己的耳朵，钦佩地张大嘴巴，看到炮弹在一英里或更远处爆炸时，惊喜地叫喊。

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向皇城发动攻击。上午六点半，美国人夺取了正阳门，架起大炮，开始继续进攻。指挥官用望远镜望了望前面，说：“前面有一座皇城，占领它！”

皇城的第一座门被打开了。美军在院子中行进。只走出大约一百码，远处门顶上和院墙上的中国士兵就一齐向他们猛烈开火。大群中国士兵仍然在保卫着皇城。一颗子弹飞向正阳门方向，美军最优秀的军官瑞利上尉头部被击穿，倒在血泊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美军运来一箱又一箱的炮弹，每发炮弹都一颗一颗地填入大炮，发射出去。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北京皇城的城门颤抖着，但颤抖之后，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决不倒下。

英国人来支援了。他们派来一群日本苦力，抬着从天津带来的竹制云梯。几个日本人像猴子一样摇晃着往上爬。不知为什么，守护皇城的士兵没有开枪。日本人终于爬上了城墙，并摇晃起带上去的星条旗。这时，下面的美国人听到日本人在上面大声地报告：城门上除了一些尸体外，没有一个中国人。



轰隆一声，美国人的大炮又一次对着大门喷出火光。皇城的城门被炸开了。炮火停止时，听不到一点枪声。

大约中午时分，美国人的脸上开始荡漾着辉煌胜利的激情。他们已经到达皇城的第三道门前。通过了它，前面就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了。

美国人把大炮运到了门前。再轰一两炮就能扫除进入紫禁城的最后障碍了。美国人将获得第一个占领紫禁城的荣誉。

就在这时，美军最高司令官下达了“停火”的命令。

后来，懊丧的美国人得知，“停火”命令是各国驻华大使敦促美国将军下达的。据说，使馆送给美国将军的信上写着：“停止进攻皇城，因为那会激怒中国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现在，政治已经开始来插手战争了。

西方军队攻破了北京城，并进入了皇城。但他们没有攻陷紫禁城。在紫禁城面前，洋鬼子的脚退了回来。那是他们的禁区。

至此，西方联军进攻北京的任务全部完成。

除了董福祥的甘军轻微的抵抗，联军在北京的最后攻击战中，没有遇到任何义和团的阻拦。而且，城破之日，除了皇城内的驻军有过最后的拼搏，整个北京城内，并未发生联军曾经预料的巷战。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已作鸟兽散，西方联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历史学家曾经计算过，义和团当时在北京“城内设坛至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过八万人”。但是，城破时，所有的义和团“皆不知所之，唯地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义和团兴起时如烈火燎原，解

散时如瓦解冰消。

据历史学家统计：

四十年前，英法联军从天津进攻北京，走行并战斗四十余日，方才战胜只有大刀长矛的清军，攻入北京城。

四十年后，七国联军八月四日从天津出发，到八月十四日战胜有洋枪洋炮的清军并攻入北京，仅走行并战斗十天。

## 5. 神话消失的时候

义和团都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逃跑了，小部分同大部分北京人一道，都变成顺民了。当年的目睹者描述道：

联军攻入北京后发现，顺民旗帜遍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在道路左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有一个朝廷的亲贵，还让鼓乐队奏乐欢迎，并燃放爆竹，准备了羊肉和酒。等到内城、外城各地区被十一国军队分划驻守后，你走进那十一国公使馆、十一国警察署、十一国安民公所去瞅瞅，最为金碧辉煌的，是咱们的国民向侵略者贡献的“万民匾”和“联衣伞”。你听吧，向西方人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这要是真出于至诚，真是让人愤恨羞愧呀！

顺治门外一带，是德军驻守地，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由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之命名，有的叫“德兴”，有的叫“德盛”，有的叫“德昌”，有的叫“德永”，有的叫“德丰厚”，有的叫“德长胜”等等。甚至不相关联的字，也要

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诸界，也都是这样呀！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其《中国在动乱中》一书，同样记述了联军占领北京后，京城顺民们的类似表现：

中华帝国的首都被联军占领不久，为了巡逻的目的，便把这块被占领地分属于几个军事分遣队管辖。在这种情形里中国人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样自然。

掌握汉语书面语的日本人，是首先进入新领域的，整个城市在三天之内充满了中间为红盘状的小旗，上千个门脸上装饰上这样的标语：“日本帝国顺民”。

在一段时期里，通常遇到中国人都拿着这样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有“顺民”的字样，他们依属国家的名称留在后面填写，这是对中国人“爱国主义”醒目的评注。

如有十个人在路上行走，会有约八个人执不同国家的旗子（仿造得非常低劣，若遇到暴雨就更坏了）。中国人常彼此忠告：“万勿随洋人”，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这在人类史上或许是独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为义和团坛口的一座庙门上，令人吃惊地贴有这样的字样：“上帝基督徒的人”。

毫无办法，这都是目睹的历史事实。历史不是别的，它是一位伟大的含垢忍辱者。历史总是被迫接受令它汗颜耳赤的史实。

但历史也经常有它的闪光处。联军攻陷北京后，有两个故事开始流传。

第一个故事是西方人记述下来的。北京使馆被围困的时候，一个日本厨师出了个主意：用三百元酬金，雇佣中国人张德林（董福祥部的士兵）为密使，到天津去向联军报信。张见酬金如此丰厚，非常高兴，立刻答应完成这个任务。一天后，他返回北京，把三百元又交了出来。询问原因，得知他作为密使前往天津时，与他的父母妻子相见了，把事情告诉了他们。他的双亲听后非常气愤和伤心，劝导他不要为了金钱就给敌国作密使，那会受到上天报应的。他非常受感动，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因此，回京后将酬谢金如数归还。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留在北京的官员记述的。本来，他是作为奏折上报朝廷的，但朝廷已经没有了。于是，他把奏折作为“投稿”，投到了上海的一家报馆，并刊登了出来（译文）：

联军占领北京后，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之内，查得一表，有克林德（北京动乱时被董福祥的部下安海所杀的德国大使）图记。当铺主人说，这是一个满人名叫安海的来当的，他现在住在内城车店内。日本侦探查得此事，立刻报告，并派人前往车店内搜索。有两三个人先进去，站立在院中，问：“安海是住在这里吗？”有一人答道：“我就是安海”。于是安海被捕了。

审问时，安海神色镇定，毫无畏惧。

外国审问官问道：“德国公使是不是你杀的呀？”

安海回答：“我奉长官命令，遇到外国人就杀。我是个士兵，只知道服从长官命令。那天，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他已经死了。他的胸前有块表，我拿了。同事中，有的得到了他的手枪，有的得到了他的金戒指。万万不料，我会因这块表让你们抓来。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很高兴。你们就立刻杀了我，给那个德国鬼子偿命吧！”

翻译是中国人，问安海：“你那天是否醉了？”

安海笑着回答：“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是怕我倚酒希图减罪吧？”

安海真是个忠勇的人，一点都不畏惧，观看的人都为他而动了感情，觉得中国的军队中还是有英雄的呀！

第二天，日本人把安海交给德国人，把他在克林德被杀之地处死了。

臣思量此事，理当奏闻朝廷。安海为国而死，应当得到皇太后皇上的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还有一个并非故事，而是在长城脚下发生的一件似乎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英国学者、后来创作出版了《慈禧外传》的汉学家约·奥·濮兰德先生，在义和团似乎消失了好久之后，陪同他的一位从英国来的朋友游览长城。突然，长城的一个门洞中窜出两个中国小伙子：

他们手里举着红缨枪，吼着“我们是义和团！洋鬼子！”

死吧！”朝我们冲过来。幸亏我们都带着火枪，立刻掏出来，指向他们。

这两个中国的年轻人显然呆住了。他们忽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对我们说：“嗨，我们以为你们不是真洋鬼子呢！”

说着，他们转身跑了。头上的红巾掉下来。

事后，他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了莫理循，后者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民国后成为袁世凯大总统的顾问，当时正在英国休假。

濮兰德在信中间莫理循：“你说，他们真是义和团吗？”

## 【注 释】

① 佚名《天津一月记》。

②（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转引自《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版，P. 174—175。

③（英）萨维奇·兰德爾《中国与联军》，许逸凡译，转引自《京津蒙难记》P. 176。

④ 同上。

⑤ 同上，摘要自 P. 177。

⑥ 同上，摘要自 P. 177—179。

⑦ 同上，摘要自 P. 179—181。

⑧ 同上，摘要自 P. 186—187。

⑨ 同上，摘要自 P. 181—184。

⑩ 同上，转引自 P. 184—185。

⑪ 同上，摘要自 P. 188—190。

- ⑫ 据宝夏礼《津京随军记》，杨思慎译，见《京津蒙难记》P. 200；201。
- ⑬ 以下北仓之战的描述，据宝夏礼《津京随军记》，杨思慎译，见《京津蒙难记》P. 208—213。
- ⑭ 以下杨村之战，除特别注明者外，据宝夏礼《津京随军记》，杨思慎译，见《京津蒙难记》P. 215—217。
- ⑮ 裕祿之死，据罗惇勳《庚子国变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 ⑯ 李秉衡庚子事迹，见如下史料：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罗惇勳《庚子国变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等。
- ⑰ 联军占领通州事，据宝夏礼《津京随军记》，杨思慎译，见《京津蒙难记》P. 221—228。
- ⑱ 本节综合如下史料：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李梦符《春冰室野乘》。
- ⑲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 ⑳ 罗惇勳《拳变余闻》记载监斩官为刑部侍郎徐承煜。
- ㉑ 罗惇勳《拳变余闻》中还有一个记载，不能不记：许景澄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义和团进京后，烧杀抢掠，中国这第一所大学没法办了，七月一日，许上奏折建议暂时停办，得到批准后，派人看守住大学堂，并将所余办学款造册上缴。工作正在进行中，突然被捕。狱中，得知必死，乃把自己的部下找来，将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细开出单子，郑重交付。然后慨然就死。据悉，两年后，大学重新开学时，百废待兴，而许于死前所留款项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 ㉒ 据宝夏礼《津京随军记》，杨思慎译，见《京津蒙难记》P. 227。
- ㉓ 北京内城之战，据（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陈克译，见《京津蒙难记》P. 234—241。
- ㉔ 以下内城与紫禁城之战，史料同上，P. 248—255。

## 庚子国变大事记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3月24日	二月二十二日	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约集义和拳民三百余人，亮拳比武。
11月1日	十月七日	巨野教案发生。山东巨野大刀会众击死德国传教士韩理、能方济两人。
6日	十月十二日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欲对华采取报复手段。
13日	十月十九日	德国舰队三艘抵胶州湾。
14日	十月二十日	德军登陆，强占胶州湾。
20日	十月二十六日	德使海靖为曹州教案照会总署，要求六事（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款，山东路矿，租胶州湾），恭亲王等拒之，并言非退兵不能讲谈。
22日	十月二十八日	总署照复德使，要求撤退胶澳之兵，如生事端，中国不能任咎。
27日	十一月四日	翁同龢、张荫桓访德使，谈山东教案及胶澳事，中德谈判开始。
12月15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俄军强占大连、旅顺。
18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德皇在汉堡对东来海军演说，如有阻挠德国在华利益者，决以实力对付（翁文龢日记作“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
30日	十二月七日	曹州府群众反洋，急电山东巡抚张汝梅严加镇压。是年，山东冠县教徒改神庙为教堂，受到当地群众一千余人围攻，打死打伤教民数人。



##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月15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谕令各省督抚将军切实保护教士，谨防发生教案。
2月9日	一月十九日	中英互换《关于长江沿岸不割让》照会。
3月6日	二月十四日	李鸿章、翁同龢与德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三月七日批准）。
9日	二月十七日	俄署使巴布罗福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如能于限期内应允俄国要求，愿各酬以五十万两（?）。
27日	三月六日	李鸿章张荫桓与俄署使巴布罗福订立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允建南满铁路。
3月	二月	阎书勤、赵三多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再次邀请邱县及直隶威县、广平等地拳众数千人，焚毁附近教堂。
4月4日	三月十四日	中法互换《关于越南邻省不割让》照会。
22日	闰三月二日	中日互换《关于福建不割让他国》照会。
23日	四月四日	以直鲁交界有私立“义民会”名目，传单直隶河南江苏，欲与洋教为难，诏命严查。
6月11日	四月二十三日	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
30日	五月十二日	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将义和拳列入乡团之内，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并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6月	四至五月间	山东高密群众反对德国修筑胶济铁路，聚众包围铁路公司。
9月21日	八月六日	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戊戌变法失败。
10月6日	八月二十一日	慈禧发布懿旨，保护各国传教士。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25日	九月十一日	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勤等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在山东冠县发动武装起义。
11月9日	九月二十六日	山东发生“日照教案”。
19日	十月七日	以直隶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该党结会众多，一旦藉端滋事，势将不可遏抑，命加意弹压防范。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月9日	十一月二十八	帝以疾，诏停止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一切筵宴。
22日	十二月十一日	帝以病未愈，派庆亲王代享太庙。
28日	十二月十七日	太后连日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谋废立）。
2月2日	十二月二十二	以总署大臣裕庚接见洋人，免冠答礼，传旨申饬，嗣后总署遇有会晤，不得参用西礼。
17日	一月八日	帝以上年夏秋之交违和，尚未痊愈，命将太医院脉案，按五日一报，抄发各省督抚阅看。
22日	一月十三日	帝以病未痊愈，止各国公使请觐贺年。
2月	一月	朱红灯率拳众自长清移至茌平，设场授徒，三月之间，习拳者达八百余处。
3月14日	二月三日	毓贤继张汝梅任山东巡抚。
20日	二月九日	清政府命令举办团练。
3月	二月	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堂发现匿名揭帖。天津郊区秘密传播义和拳。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4月5日	二月二十五日	诏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剴切晓谕士民，于人教之人，不得故存嫉忌之心，遇有词讼，无论教不教，地方官应持平办理。
11日	三月二日	以山东教案叠出，密谕毓贤不得事事忍让，亦不得稍涉孟浪。
4月	三月	朱红灯率莒平拳众焚烧教堂多处，提出“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口号。
5月1日	三月二十二日	以山东德人情形叵测，亟应加意严防，预占先著，命巡抚毓贤拣派将领，严密布置，并命袁世凯等军前往。
7日	三月二十八日	袁世凯部新建陆军自天津开往德州一带（时该军约一万一千人）。
17日	四月八日	赵三多在直隶正定大佛寺与阎书勤等聚会，决定秘密结社，共图起事。
5月	四月	毓贤出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
6月16日	五月九日	以袁世凯为工部右侍郎。
8月28日	七月二十三日	美国人柔克义奉美国务卿命，拟对华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此计划出自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璧里）。
9月6日	八月二日	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17日	八月十三日	山东平原义和拳朱红灯抢劫教民。
29日	八月二十五日	英国赞同美国之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十一月三十日又正式表示）。
10月9日	九月五日	朱红灯率义和拳开赴平原县，当地群众千余人响应。败官军。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1日	九月七日	朱红灯在平原指挥拳众抵抗清军，将兵勇击退，正式竖立“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
17日	九月十三日	朱红灯率众攻打恩县刘王庄教堂和庞家庄教堂。
18日	九月十四日	袁世教（袁世凯兄）军击散山东平原义和拳朱红灯部。
10月	九月	山东义和拳蔓延直隶阜城，竖旗大书“传神助教灭洋共和义和拳”。 夏秋之季，义和拳开始进入京津地区活动。
11月3日	十月一日	以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纵兵扰民，办理乖谬，命毓贤查办。
14日	十月二日	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率拳众焚毁教堂。
11日	十月九日	吴桥县令劳乃宣刊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美使康格照会总署，要求速平山东义和拳乱。 海约翰函伍廷芳，申明美国对于门户开放之诚意。
15日	十月十三日	朱红灯率拳众攻打茌平大张庄教堂。
16日	十月十四日	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18日	十月十六日	命李秉衡巡阅长江水师。
20日	十月十八日	以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教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
21日	十月十九日	通谕各省督抚，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万一强敌凭陵，胁迫我以万不能允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必须同心协力，杀敌致果，不可预存和心。以山东时有匪徒藉仇教为名，聚众煽惑，屡酿巨案，命巡抚毓贤体察情形，密饬地方文武，加意抚绥弹压。 朱红灯在茌平被捕。
23日	十月二十一日	心诚和尚在高唐州被捕，与朱红灯一起押送济南。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28日	十月二十六日	以山东大刀会红拳会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以靖地方。
11月	十月	山东济宁义和拳树“奉旨灭教”旗帜。
12月5日	十一月三日	美使康格照会总署，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
6日	十一月四日	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24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召刘坤一来京陛见（刘反对废立）。 朱红灯、心诚和尚被杀。
25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山东巡抚袁世凯抵济南，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
26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以山东民教不和，命巡抚袁世凯持平办理。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以病免（以其反对废立）。 日本赞同美国之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29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以拳民聚众滋事，命山东巡抚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
30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徐桐、崇绮赴荣禄府商废立事。 俄国赞同美国之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措词含糊）。
31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荣禄劝慈禧太后立大阿哥。 英教士卜克斯被大刀会所杀。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年）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月1日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帝称病，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
2日	十二月二日	山东高密群众反对德修胶济铁路。
3日	十二月三日	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
4日	十二月四日	上谕对英教士卜克斯遇害，表示惋惜，命严缉凶犯。
7日	十二月七日	命袁世凯将已革补用知府袁世敦驱逐回籍，以息人言（世敦为世凯兄）。
9日	十二月九日	直隶总督裕禄致电袁世凯，两省合力捕缉义和拳。
10日	十二月十日	袁世凯复电裕禄，主张惩办匪首，以清祸源。
11日	十二月十一日	颁布上谕，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的组织。
12日	十二月十二日	因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诏命各省督抚，慎择贤吏，整顿地方，与民休息，遇民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
15日	十二月十五日	江苏通洲织布纺纱厂开锭（张謇主之）。
16日	十二月十六日	毓贤觐见，赏“福”字。
17日	十二月十七日	奖叙端郡王载漪所统虎神营员弁。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8日	十二月十八日	美使康格抗议赏赐毓贤。 李鸿章接任两广总督。
20日	十二月二十日	命袁世凯迅速妥办高密百姓抗阻德人修路一案，勿挟非用兵不可之见，致失国家团结民心本意。
24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	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为皇太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照料(是所谓“己亥建储”。据传拟於光绪庚子实行废立，改元“保庆”)。
26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绅商经元善(电报局总办)、章炳麟、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余人电总署争废立。谓“各国有关兵干预之说”，“务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
27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	美、英、法、德、意等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和取缔。
29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	经元善离上海南去(昨日盛宣怀劝其速逃)。
2月7日	一月八日	经元善自上海抵澳门。
8日	一月九日	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电致总署，危词要挟，限电报督办盛宣怀于一个月内在将经元善交出治罪。
19日	一月二十日	从总署奏，命直隶山东督抚剴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义和拳会，倘仍执迷不悟，即行从严惩办。各国公使觐见于勤政殿。
25日	一月二十六日	总署照会各国公使，已有旨命直鲁督抚剿办义和团。
26日	一月二十七日	大阿哥溥儀入学。
2月	一月	天津城厢内外发现义和团活动。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3月1日	二月一日	直隶总督裕禄布告奉旨剿办义和团。
2日	二月二日	各国公使要求正式公布剿办义和团之上谕。
7日	二月七日	总署拒绝各国公使公布上谕之要求。
8日	二月八日	各国公使夫人觐见太后于仪鸾殿。
9日	二月九日	各国公使再要求公布剿办义和团之上谕。
10日	二月十日	美公使康格电请美政府派遣海军来华。
11日	二月十一日	英美法德意五使分电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北直隶湾。
14日	二月十四日	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16日	二月十六日	英使再请英政府派海军来北直隶湾。
18日	二月十八日	雄县、涿州等地义和团四千人聚集任丘。
20日	二月二十日	美国宣布各国赞同中国门户开放。
28日	二月二十八日	天津义和团张贴匿名揭帖，号召灭洋。
3月	二月	天津城内习义和拳者日众。
4月6日	三月七日	英美德法四国驻华公使照会总署，请于两月内剿除义和团匪，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9日	三月十日	以直隶枣强县知县凌道增在拳匪滋事时，并不查办，复令拳民教师王庆一出入衙门，著即革职。
12日	三月十三日	芦沟桥至保定一带，义和团匿名揭帖，定期举事。
15日	三月十六日	禁止义和团之上谕公布于“京报”。
17日	三月十八日	诏各省督抚于乡民设团自卫，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不得藉端与教民为难。
20日	三月二十一日	中德签订《山东胶澳交涉简明章程》。
21日	三月二十二日	以直隶地方有外来义和拳会与教民寻衅，命裕禄切实开导，遇有两造争执，论是非不分民教，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只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
22日	三月二十三日	北京发现义和团。
29日	四月一日	北京街头出现义和团揭帖。
4月	三月	北京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设立第一个义和团坛口。 义和团在北京发布《最恨和约》揭帖。 天津西郊高家庄设立总坛口。 义和团在天津发布《只恨鬼子闹中原》等揭帖。 直隶完县南街天主堂被义和团焚毁。 遵化义和团焚毁教堂。 张家口有义和团练拳。 清政府调甘肃提督董福祥率军保卫北京。
5月1日	四月三日	北京西四牌楼有人张贴义和团乱语。 以义和团蔓延日甚，将及近畿，命裕禄、袁世凯通筹妥议，可否派员办理团练（寻袁奏拳会实难改练乡团，诏仍命查看情形，分别办理）。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9日	四月十一日	以义和团会渐及京师，命步军统领衙门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
11日	四月十三日	涿水义和团千余人围困知县祝芾，团教发生械斗。
12日	四月十四日	直隶涿水义和团焚教堂和教民房屋。
14日	四月十九日	以京师内外奸民，以义和拳会为名，张贴揭帖，煽惑民心，事关外交，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会同妥议章程，迅速办理，并著裕禄一体严禁。 直隶副将杨福同杀易州拳勇十八人。
17日	四月十九日	京城内外，义和团四处张贴揭帖，谕命一律严禁。
18日	四月二十日	山西大同义和团散发传单，主张灭洋。 总署照会英美公使，决力平拳乱。
19日	四月二十一日	天主教大主教樊国梁（法国）致书法国公使，速召海军入京防卫，并请派法国武装人员进驻北京西什库教堂。此系法国天主教在直隶北部的总堂。
21日	四月二十三日	十一国公使联合向总署提交照会，要求平乱。 义和团败易州官军，杀副将杨福同。 各国公使商调兵入京保卫使馆。
22日	四月二十四日	涿水义和团聚数千人。 谕令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倘若任意株连，波及无辜，即从严惩办。 命总署会商各国使臣，申明约章，教民犯法，教士不得干预。
24日	四月二十六日	总署奏，拳匪造言煽惑，人心浮动，易肇衅端，亟应认真查办。 实授李鸿章为两广总督。
25日	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步军统领衙门发布“禁拳章程”。 以查办拳匪，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命裕禄相机操纵，勿稍大意。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27日	四月二十九日	义和团三万人占领涿州。 义和团毁琉璃河长辛店铁路。 英俄公使通知总署，拟召兵来京。
28日	五月一日	义和团张贴告白，宣扬义和神拳系“保护中原，驱逐洋寇”。 义和团毁丰台铁路
29日	五月二日	各国公使会议，决召海军来北京。 以近畿一带拳勇肆扰，民不畏法，命统兵大员，地方文武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实力保护教堂教民。
30日	五月三日	义和团烧毁定兴车站，焚毁长辛店洋房。 以直隶及京城附近人心浮动，命步军统领，直隶总督等拿办滋扰为乱拳匪，并立时解散胁从。 命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专派队伍，妥为保护电线、铁路。 以辅国公载澜署步军统领右翼总兵官。 总署要求各国公使再待数日，再行调兵入京。
31日	五月四日	清政府同意各国派兵入京保护使馆。当晚，美英俄日法意等国官兵三百人，自津抵京。
5月	四月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在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率团进入天津。 天津义和团纷纷设坛。 义和团在山西太原四处张贴揭帖。
6月1日	五月五日	英教士二人在直隶永清被杀。 直隶义和团焚教堂多所，并杀教士。
2日	五月六日	北京义和团焚毁麦加利银行。 天津义和团焚毁苏家桥教堂。
3日	五月七日	谕荣禄，近畿一带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另谕裕禄，通飭地方各州县谆切劝导，不可操切，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
4日	五月八日	各国公使再电本国政府乞援。 保定外国工程师被义和团攻掠，伤亡三十余人。 义和团焚毁黄村车站，并与清军激战。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5日	五月九日	慈禧军机大臣赵叔翘、顺天府尹何乃莹至涿州宣抚义和团。 外军六百名人卫天津租界。
6日	五月十日	宣示朝廷于拳民教民一视同仁、近来拳民倡立团会，藉端滋扰，直与国家为难，命即遵旨解散，如仍不悔改，即饬董福祥，宋庆，马玉昆实力剿捕。加派刚毅前往保定一带，晓谕拳民，即日解散，毋得聚众滋事。 天津各国提督会议。
7日	五月十一日	赵舒翘抵涿州，晤义和团首目，予以开导。 俄自海参崴派兵四千赴天津。
8日	五月十二日	美国务院令美使康格，对华采取单独行动，必要时方可与他国合作。 各国公使再请总署，允其调兵入京，并请觐见太后、皇帝，被拒。 北京遍传揭帖，“焚灭教堂，杀尽教民”。 刚毅抵涿州，晤义和团首目。
9日	五月十三日	赵舒翘自涿州回抵北京。 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命董福祥率甘军进驻北京城。 义和团蜂集北京附近，毁京津铁路。 义和团焚毁京郊之跑马场。 义和团数万人聚集天津。
10日	五月十四日	英美法德意奥日俄等八国联军二千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自天津抵达杨村（铁路阻断）。 命端郡王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 北京义和团日夜持械，百十成群，巡行街市。 北京西山英国公使别墅被焚毁。
11日	五月十五日	董福祥甘军于永定门杀死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 义和团继续大批进入北京，并焚毁教堂。 西摩联军抵廊坊，与义和团接战。
12日	五月十六日	义和团在北京开始焚掠。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3日	五月十七日	西摩联军被困廊坊。 天津义和团焚毁城内教堂。 北京义和团焚姚家井及跑马厅一带教民房舍，杀教民三百余人。 俄外部电俄使格尔思请慈禧太后召李鸿章定乱。
14日	五月十八日	京津交通完全断绝。 义和团继续在北京焚毁教堂，逼近使馆区，为洋兵击退。
15日	五月十九日	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 以京内拳匪焚烧如旧，沿途喊杀，持械寻仇，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命步军统领及神机营，虎神营，武卫中军会同弹压，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正法，附和胁从，刻即解散，城内外设立坛棚，尽行拆去。 天津教堂全毁。
16日	五月二十日	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商阻洋兵进京事。(一次御前会议) 命刚毅、董福祥招募义和团组军。 命裕祿，如洋兵来京，即力为阻止，如不肯从，即相机行事。 义和团在天津毁海关道署，并释囚取械，焚毁教堂。 义和团焚烧北京前门外千余家。 各国海军提督要求天津总兵罗荣光于明日二时前交出大沽炮台。
17日	五月二十一日	晨六时，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死伤二百多人。 再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会前有人伪造各国公使要求太后归政照会，太后声言决战。(第二次御前会议) 义和团攻天津租界，津沽交通中断。
18日	五月二十二日	三召见王大臣等，议和战。(第三次御前会议) 命徐桐、崇绮与庆王、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 在廊坊的西摩联军遭受攻击，天津外兵往援被阻。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9日	五月二十三日	四召见王大臣等，决定宣战。(第四次御前会议) 总署照会各国公使，令于二十四小时内离京，否则不负保护之责(下午四时)。各使请缓期，俟外军入京偕行，并约明日上午九时面商。
20日	五月二十四日	德国公使克林德上午九时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召见王公军机大臣，通谕各省督抚，中外衅端已成，勿迟疑观望，应联络一气，共挽危局。 各国公使两次照会总署，请允西摩所率联军来京。大沽各国提督向各省督抚宣言，仅对拳匪及阻止联军进京援救公使者作战。 董福祥军及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北堂)，时为下午四时。是夜奥国使馆被攻破。 西摩联军从廊坊经杨村向天津溃退。 北京义和团纷纷焚毁教堂、洋楼及教民住处。
21日	五月二十五日	下诏与各国宣战。 任命英年、载澜、刚毅办理义和团之事。 命各省召集义民成团，藉御外侮。 以庄亲王载勋为步军统领。 各国联军与聂士成部在北仓苦战四小时。 刘坤一、张之洞、李秉衡等电请剿匪，严禁暴军，安慰各国使馆，致电各国道歉，明谕保护洋商教士，并请美国调解。 义和团继续攻打使馆及西什库教堂。
22日	五月二十六日	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 刚毅等发出擒拿洋人的奖格。 北京兵匪开始劫掠(孙家鼐宅亦被抢)。 美英德俄等国联军自大沽口出发，赴天津解救租界之围。 聂士成部与西摩联军战于天津西沽武库。
23日	五月二十七日	盛宣怀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请飭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留东南以救社稷。(东南自保议) 任命载勋、刚毅统率北京和天津的义和团。 命董福祥将现在所办之事(攻使馆)赶紧办理，腾出兵力，前赴天津防堵。 义和团和清军继续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大沽各国联军解天津租界之围。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24日	五月二十八日	诏各省督抚杀洋人(有人私改“杀”字为“保”字)。 义和团杀北京教民。 翰林院(邻近英使馆)及总税务司署被烧。
25日	五月二十九日	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各国强占大沽炮台,衅非我开,应各尽职守,以保疆土(一作六月二十三日。未再促李鸿章北上)。 慈禧赏给北京义和团和清军各十万两银。 盛宣怀电李鸿章、刘坤一等,保全东南,权宜应之(李表示不奉六月二十一日之宣战诏)。 张之洞照会汉口英领事,不承认六月二十一日后之谕旨。 载漪载勋率义和团扰及宫内,拟弑帝,太后持不可。 第一次停攻使馆(至六月二十八日),命荣禄前往议和,并派兵保护。
26日	五月三十日	西摩联军退回天津,伤亡三百余人。 赏义和团及董福祥等军。 谕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申述朝廷苦衷,此次事变,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而成,命速筹兵饷,力保疆土,勿再观望。 荣禄电刘坤一、张之洞,说明事变内情及种种为难。
27日	六月一日	北京义和团已达十万人。 各国继续向华增派兵力。 刘坤一、张之洞电奏,时局危急,一旦兵败拳散,各国直入京师,将不堪设想,请朝廷亟思变计(六月二十六日发)。 山西巡抚毓贤焚太原外国医院。 太原义和团焚毁教堂。
28日	六月二日	北京各部院概行停止办公,官员四出外逃。 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悬赏捕拿洋人。
30日	六月四日	义和团焚毁天津美国长老会。 荣禄电刘坤一,拳党万难收拾,两宫亦难扭回。
7月		唐才常等密谋在湘鄂皖起事。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7月1日	六月五日	欧洲各国得知德使克林德遇害消息。 董福祥军猛攻使馆。 上谕命教民自首，并驱逐各地传教士。
2日	六月六日	德皇派瓦德西率军七千东来。
3日	六月七日	命各省将军督抚戮力同心，共扶大局，务将和之一字先行解除于胸中。 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立“保护南省商教章程”九条，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章程”十条。（东南自保章程） 美国务卿海约翰通牒各国，建议仍当保全中国行政领土之完整，维持列强在华之商业机会均等。刘坤一、张之洞宣布不承认此后之北京上谕，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4日	六月八日	俄外务大臣电复德外部，盼德皇阻止瓜分中国，协助俄国恢复中国中央政府。 俄陆军大臣告德武官，天津俄军尚少，暂不能进兵北京。并提议以俄人任联军统帅。 诏催各省援兵兼程北上。 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军取道草地入卫京师。 清军炮击天津租界。
5日	六月九日	直隶提督聂士成率武卫前军抵天津市区。
6日	六月十日	慈禧赏赐天津义和团银十万两。 沙俄十八万军队，分六路入侵我国东北地区。
7日	六月十一日	荣禄再请太后停攻使馆。 联军将领在天津开会，商议进军北京事宜。
8日	六月十二日	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督促他可借坐俄船北上，或由陆路前来。 董福祥及义和团猛攻使馆，奥军官阵亡。
9日	六月十三日	武卫前军总统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山西巡抚毓贤杀太原及寿阳教士四十余名。 北京城十三门均由义和团派人驻守。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0日	六月十四日	刘坤一、张之洞电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先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乱匪由中国自剿。
11日	六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寿山电瓊瑛副都统凤翔，如俄兵过境，即迎头痛击（奉天副都统晋昌曾约寿山一致对俄开战）。 诏促各省勤王之兵兼程北上。
12日	六月十六日	各国联军会商作战计划。 山西大同义和团焚毁教堂两处，杀教士十一人。
13日	六月十七日	日复国书，请实力剿平匪徒，救护现存各国使臣，日后与各国商议之际，日本当出力为助（七月十八日到京）。 八国联军一万人向天津猛烈攻击。
14日	六月十八日	联军占领天津，大肆抢掠，宋庆、马玉昆、裕祿退北仓。
16日	六月二十日	李鸿章自广州启程北上（过香港与英总督卜力晤谈，卜力盼皇上亲政）。 庆亲王等致书英使，商使馆停战（时使馆守卫官兵伤亡已达一百五十人，居总数三分之一）。 下户部尚书立山于狱。
17日	六月二十一日	李鸿章等奏，请明降谕旨，保护各省洋商教士，惋惜德使，缉拿凶手，抚恤被害洋人，剿办扰民兵匪（盛宣怀所拟）。从之。 二次停止攻击使馆（至七月二十八日）。 伍廷芳电总署，美国声明三事：救在京美国官员教士商民，保护中国各处美国人民财产，保全应得权利，愿助剿乱民，望中国平静保全疆土。 命各路统兵大臣悉数更换洋操、洋装、洋号，仍归旧日兵制。 孙中山令郑士良主持惠州举兵事，日人平山周等助之（时在香港日船中，当晚乘原船赴日本）。
18日	六月二十二日	清军停止进攻使馆。 总署派人到使馆，声言保护各国公使。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19日	六月二十三日	谕各省督抚，申明保护公使非为和议之地，仍当振刷精神，力筹战守事宜。
20日	六月二十四日	总署以瓜果菜蔬赠使馆。
21日	六月二十五日	李鸿章抵上海。
22日	六月二十六日	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到京觐见太后。
23日	六月二十七日	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严惩祸首毓贤、裕禄、董福祥、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
24日	六月二十八日	李鸿章电请护送各公使往天津。
25日	六月二十九日	俄军攻陷琿琿。
26日	七月一日	唐才常等八十余人于上海愚园，商挽救时局策，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组织中国议会（国会），推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 命李秉衡办武卫军事务。 庆亲王以瓜果食物赠使馆。
27日	七月二日	德皇威廉二世对东来军队训话，命尽力屠戮，使华人不敢再轻视德人。
29日	七月四日	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董福祥军及义和团再攻使馆。 李鸿章奏，因病暂住上海。
30日	七月五日	天津成立都统衙门（即天津临时政府）。
31日	七月六日	清政府下令，停止攻打西什库教堂。诏如西什库教堂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倘彼死守，万勿用枪炮轰击。 庆亲王复英使，声明不敢再有攻击之事，并再催各公使赴津。 总署电出使各国大臣，各公使均平安。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8月1日	七月七日	诏促毓贤迅速来京。 山西太谷外人全部遇害。
2日	七月八日	从李鸿章奏，命荣禄派员护送各国使臣赴津，允各使明电本国，并命各督抚及统兵大员保护洋商教士教民。
3日	七月九日	天津各国提督会议，决即进兵北京。 从刘坤一奏，命修复电线，不得再有掘断毁坏情事。 俄军攻占哈尔滨。
4日	七月十日	日俄英美法意奥联军（德后加入）一万八千余人自天津出发，逼进北京。 北京人心惶惶，官绅大户出城避难。
5日	七月十一日	八国联军攻占北仓。
6日	七月十二日	八国联军攻占杨村。 裕禄于蔡村自杀。
7日	七月十三日	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 德皇宣布以瓦德西为联军统帅。 联军攻占蔡村，李秉衡抵码头御之。
8日	七月十四日	李鸿章电请赏假二十日（八月四日发），不允。 八国联军攻占蔡村。
9日	七月十五日	北京戒严。 八国联军抵河西务。李秉衡等败退码头。
10日	七月十六日	八国联军攻占码头，李秉衡军溃退张家湾。
11日	七月十七日	八国联军攻占张家湾。李秉衡自杀。 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12日	七月十八日	八国联军攻占通州。 总署照会联军总统，各国公使平安，已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议结一切事宜。

(续表)

公历	夏历	大事略记
8月13日	七月十九日	俄军攻占北京东便门。 董福祥及义和团连日猛攻使馆。
14日	七月二十日	联军入北京，大掠，使馆解围（英美军先入使馆）。
15日	七月二十一日	太后挈帝出北京（临行推珍妃于井）西奔。北京沦陷。

〔注〕此“大事记”摘录自台湾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陈宝辉先生《义和团大事简记》。摘录时，文字有所改动。

## 参考引用书目

庚子日记

华学渊撰红格稿本

庚子外纪

(法) 毕耶耳洛译撰 允若译 正中书局一九三二年铅印本

庚子记事

仲芳氏撰 稿本

庚子纪闻

佚名 稿本

庚子诗鉴

龙顾山人撰 民国年间刊印

庚子轶事

董作宾撰 上海人间书屋社一九三七年版

庚子秋词

王鹏云等合撰 光绪年间版

庚辛史料

许同莘辑 河北月刊社一九三六年版

庚辛纪事

王彦威编 稿本

庚子大事记

杨典诰撰 稿本

庚子寻亲记

陈浏撰 一九〇七年刻本

庚子国变记

李希圣撰 一九〇二年刻本

庚子莽蜂录

奇生撰 一九〇〇年稿本

庚子教难记

李老楞辑 上海一九〇二年石印本

庚子中外战纪

(法) 佛普爱加来等撰 著易堂一九〇二年铅印本

庚子从军日记

孙星枢撰 载于一九三五年《益世报·史学》

庚子西行纪事

唐晏撰 一九〇〇年石印本

庚子西狩上谕

西安行在所一九〇二年编印

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口述 刘治襄记 北京广华印书局一九二八年铅印本

庚子交涉偶录

程德全撰 中华书局一九三四年重印本

庚子纪事长札

赵伯声撰 中和月刊社一九四一年版

庚子海外纪事

吕海寰撰 上海办理商约行轶一九〇一年排印本

庚子使馆被围记

(英) 朴笛南姆危尔撰 上海中华书局一九〇一年铅印本

庚子都门纪事诗

(蒙古族) 巴里客廷清撰 一九一一年铅印本

庚子义和拳案杂存

劳乃宣撰 著易堂仿聚珍版铅印本

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鹿完天撰 一九〇一年刻本

庚子两官蒙尘纪实

王文韶撰 稿本, 收入《庚子拳乱资料》

庚子国难纪事本末

日本横滨新民社根据报刊资料印行

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

(外) 施达格著 吴宣易节译 上海正中书局一九四七年版

庚子拳禁义和拳汇录

一九〇〇年劳乃宣在吴桥县令任内刊印

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

杨慕时辑 一九一五年铅印本

公呈浙抚奏建三忠祠稿

王式通撰 一九一一年刊行

长安官词

胡廷撰 一九〇二年刻本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王明伦选编 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版

梅楞章京笔记

丁士源撰 满铁大连图书馆一九四二年出版

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

王照撰 一九二八年刊本

平原拳匪纪略

蒋楷撰 一九〇一年上海聚珍版

古红梅阁笔记

江东阿斗撰 上海人文编辑所一九三二年出版

石涛山人见闻志

石涛山人撰 中华书局铅印本

戊壬录（《满清野史》第六种）

宋玉卿编 成都昌福公司出版

四朝佚闻

金梁撰 一九三六年自刊

乐斋漫笔

岑春煊撰 《中和月刊》一九四三年四卷五期

永清庚辛纪略

高绍阵撰 一九〇八年石印本

西巡大事记

王彦威辑 王亮编 一九三三年铅印本

西巡大事本末记

（日）吉田良太郎等同撰 上海书局一九〇一年石刻本

许文肃公遗集

许景澄撰 外交部图书处一九一八年铅印本

花甲忆记

（美）丁懋良撰 上海广学会一九一〇年铅印本

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撰 一九〇八年金陵刻本

乱中日记残稿

袁昶撰 一九〇五年石刻本

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撰 新城王氏一九二八年刊本

驴背集

胡思敬撰 一九〇八年印本

国闻备乘

胡思敬撰 南昌一九二四年刊行

金銮琐记

高树撰 一九二五年石印本

春冰室野乘

李岳瑞撰 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一一年铅印本

省心堂杂著

何见扬撰 一九〇二年铅印本

俞廉三遗集

俞廉三撰 传抄本

恽毓鼎庚子日记

恽毓鼎撰 稿本

津乱实纪

阮国祯撰 一九〇一年刘氏铅印本

退思斋日记

刘大鹏撰 稿本

都门识小录

蒋芷齐撰 见《满清野史》第一三种

袁太常奏稿

袁昶撰 一九〇〇年刻本

袁世凯奏议

廖一中等整理出版

袁忠节公手札

袁昶撰 长沙商务印书馆一九四〇年石印本

匪乱纪闻

(日) 佐原笃介等辑

上海一九〇一年铅印本

唐文治自订年谱

唐文治撰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铅印本

悚斋日记

于荫霖撰 北京一九二三年石印本

拳祸记

李木太编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士山湾印书馆一九〇五年刊行

拳时杂记

(日) 佐原笃介撰 一九〇一年铅印本

梦蕉亭杂记

陈小石撰 一九二五年刻本

晚清祸乱稗史



444 / 最后的神话

- 徐珂编辑 上海潮锋出版社一九四七年铅印本  
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芳乃宣编 一九〇二年著易堂聚珍版铅印本  
崇陵传信录  
恽毓鼎撰 天津庸言报馆一九一四年首次刊行  
清史稿  
中华书局刊本  
清华集  
汪师依编 载成都昌福公司《满清野史》第一九种  
清季野闻  
陈恒庆撰 上海小说丛报社一九一八年铅印  
清室外纪  
(英) 濮兰德、白克洛思合著 中华书局一九一五年刊行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辑 北京一九三二年铅印本  
清季教案史料  
故宫博物院辑 一九三七年铅印本  
清朝野史大观  
小横香室主人编 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一七年刊行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陈宝琛 世续等修撰 中华书局版  
随扈西巡记  
傅谦豫撰 一九二八年稿本  
趋庭随笔  
江庸撰 北京印书馆一九三四年铅印本  
掌故零拾  
王嵩儒辑 北平鼻宝斋印书局一九三六年铅印  
景善日记  
景善撰 稿本 (一九四〇年方始考证为伪作)  
愿斋存稿  
盛宣怀撰 一九一六年后刊印  
慎斋文集  
赵叔迺撰 长安赵氏一九二四年铅印本  
慈禧外纪  
(英) 濮兰德、白克洛思合著 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一四年铅印本  
慈禧西幸记

- 陈澄之撰 上海百新书店一九四八年铅印本
- 德宗遗事
- 王熙述 一九三〇年前后出版为铅印本
- 潜庐随笔
- 甘鹏云撰 一九三三年石刻本
- 十叶野闻
- 许指严撰 上海国华书局一九一七年铅印本
- 义勇列传
- 河北献县天主堂编 一九三五年铅印本
- 天津一月记
- 佚名 已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 李鸿章
- 梁启超著 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一四年铅印本
-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 刘孟扬撰 一九一〇年铅印本
- 瓦德西拳乱笔记
- (德)瓦德西著 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二八年铅印本
- 王大点庚子日记
- 王大点撰 稿本 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 五洲教案纪略
- (英)李提摩太撰 上海广学会一九〇一年刊行 北大图书馆藏
- 太常袁公行略
- 袁允肃等编 一九〇五年石印本 北京图书馆藏
-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 (美)周锡瑞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 义和团大辞典
- 廖一中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 义和团运动
- 路遥编 巴蜀书社一九八五年版
- 义和团研究
- 戴玄之著 (台湾)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 义和团运动史
- 廖一中等编著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 义和团运动散记
- 张黎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八二年版
- 义和团档案史料

## 446 / 最后的神话

-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铅印本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一九九〇年版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
-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 李文海等编著 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版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  
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
- 路遥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 陈振江等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 乔志强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
- (英)爱德华滋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四川社科一九八七年版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
- 徐绪典主编 齐鲁书社一九九〇年版  
义和团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 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版
- 八国联军
- 张超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 八国联军志
- (日)佐原笃介等辑 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 八国联军侵华
- 马东玉、邱富生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 八国联军目击记
- (俄)扬契维茨基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 京津蒙难记
- 北京和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 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一二月版
- 中国教案史
- 张力等著 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委会主编 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委会主编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台湾)庄练著 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影印版

庚子记事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版

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

(俄)多勃隆拉沃夫著 齐鲁书社一九八二年版

美国对华外交档案(一九〇一年)

刘星显、刘海岩译 齐鲁书社一九八三年版

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董果良译 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版

山东教案史料

廉立之 王守中编 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版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英)莫理循著 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袁伟时著 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庚子事变文学集

阿英编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

晚清教案纪事

戚其章、王如绘编著 东方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旭麓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胡滨译 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

俄中战争

(美)伦森著 陈芳之译 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版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台湾)郭廷以编著 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八年影印版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熊月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 448 / 最后的神话

上海，一八六二年

于醒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著 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

(美) 费正清、刘广京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北京的隐士

(英) 特雷费·罗珀著 胡滨等译 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版

中国的皇帝

(台湾) 高阳著 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版

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音调未定的传统

朱维铮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改变中国

(美) 乔纳森·斯潘塞著 曹德骏等译 三联书店一九九〇年版

清代七百名传

蔡冠洛编著 北京中国书店一九八四年版

清代名人传略

(美) 恒慕义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张建伟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版

李鸿章评传

(美) 刘广京 朱昌峻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李鸿章传

苑书义著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李鸿章传

成晓军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张謇传记

刘厚生著 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

张謇传

张学军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张謇传

行人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张之洞传

谢放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袁世凯传

张建伟著 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刘坤一遗集

刘坤一撰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校点本)

荣禄存札

杜春和等合编 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刊行

辜鸿铭文集

辜鸿铭著 黄兴涛等译 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五月版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宋小庆译 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版

## 后 记

义和团运动，中西关系史上一个难以平复的创伤，至今那伤疤仍在，时时提醒人们警惕点什么，或者呼喊点什么。然而，对那疤痕的评价却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史家或文学家，不断地对那伤疤指指点点，做出新的历史的或民间的话语诊断。根据史家的归纳，大体上说，有五种观点。

基本否定。主要发生在世纪之交和“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仍然风起云涌，但这一时期对义和团的评价却是愚昧、落后，视之为科学、理性、民主和一切现代文明的对立物。人们认为，必须把义和团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严格区别开来。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章太炎、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等。

基本肯定。主要发生在一九二一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了一批持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伟人，他们以阶级分析的观点重新看待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义和团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其反抗精神便值得推崇，即使有缺点，也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因此是革命的，正确的。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瞿秋白等。

大唱赞歌。一九四九年以前，持这一观点的人物不多，

以辜鸿铭为代表。他说义和团的兴起正是向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开战，是为了文明社会的长远目标，是保护欧洲文明免遭毁灭。但老实说，辜氏的背景有点复杂，他的话在欧洲有些反响，但在国内，多被视为昏话。最近有辜氏的文集已经编译出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大肆神化。谁也没想到，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对义和团的神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中，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义和团从此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反帝爱国英雄，任何对它的批评，甚至拔高不够，都有“卖国”之嫌。这时，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创作了许多所谓“真实的”义和团神话事迹，至今还能使我们感到它们的“伟力”。

分析批判。这是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的新现象。基本肯定义和团的反帝倾向，但否定其迷信、落后和盲目排外。但阅读几多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史学讨论文集，这种新的史观似乎并没有占到主导地位。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呢？老实说，我少年和青年时代正是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可以说，耳濡目染的都是义和团神话。但八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了“五四”先贤们的著作，尤其陈独秀先生的义和团史论给我以极大影响。

根据他的记载，那天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陈先生正病着，忽然“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闹，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北京的学校全放假了，一连放三天，原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北京正在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中的一员，



因此，协约国的胜利，似乎便也是中国的胜利。

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

所谓“石头牌坊”，就是“克林德碑”，建在崇文门大街上，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

陈独秀先生不愿加入这庆祝的行列，因为，在他看来：

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无穷感慨，无限忧愁……

于是，尽管病着，他还是提起笔来，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克林德碑》。他说：

原来，这块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议和时设立，向德国赔罪的。为何要设立这块碑向德国赔罪呢？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必须要中国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

现在德国的民党，正在要革那皇帝和军国主义的命，协约国乘势将德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已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

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以今天的眼光看，陈独秀先生的议论算得激烈。但他对义和团在中国发生原因之看法，至今仍是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宝贵理论财富。在他看来，义和团发生的原因，从文化上看，共有五个。

道教。“义和拳真正的匪魁，就是从张道陵一直到现在的天师……道教出于方士，方士出于阴阳家。我中华国民种种迷信邪说，普遍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士造成的。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邪说的结晶，所以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的谕命来灭洋人也。”

佛教。一方面是佛教的超灵世界，“承认有灵魂世界，可以左右物质世界”；一方面是秘密宗的种种神通的迷信，所以“义和拳请的神，也把达济、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

孔教。“孔子虽不语神怪，然亦不会绝对否认鬼神；而且《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义和拳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样的意思吗？”

中国戏。这是儒释道三教归一的。义和团所请的神，多半是戏台上画着脸谱的好汉，如关羽、张飞等等，“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非是鄙人信口开河罢！”

仇视新学。这不必说，义和团和纵容义和团运动兴起

的朝廷大臣，都是新学的反对者。

于是，陈独秀先生说：

以这过去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这因果分明的事实，非是鄙人杜撰得来的。以过去的因果推测将来，制造义和拳的五种原因，现在都依然如旧；义和拳的名目，此时虽还未发生，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得将来义和拳不再发生吗？将来义和拳再要发生，保不得又要竖起国耻的纪念碑吗？

随后，陈独秀先生列举发生在当时社会的许多迷信，阴阳五行、奇门遁甲、气功奇功、算命卜卦、风水先生、求符设坛，等等等等，都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据此，陈先生又说道：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树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这是陈先生文章的结尾。但我看他的结论是明晰的，这就是建设民主科学的道路。这也是“五四”一代人奋斗终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还远远没有看到它的尽头。

看来，我们今天所见、所知、所感的许多事情，我们今天所困惑所追求的东西，我们的前人似乎困惑过了，追求过了，只是我们似乎忘记了，或者因种种原因，再不愿提起。我们倒愿意拿来许多西方人的研究成果，说，瞧啊，人家外国人都说义和团是好的哩，你是中国人，怎么反倒说义和团迷信、愚昧，这不是……等等等等。

我老实承认，我对西方某些学者对中国义和团的叫好声感到困惑，我对他们的所谓“民俗目光”也感到困惑。据说这目光是平静的，中国的学者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目光，才能让自己的学问走向世界。但我想问一句，如果这义和团发生在西方，整天装神弄鬼，并把他们的国家“爱国”爱得发了疯，爱得亡了国，他们是否还能有这样冷静的“民俗”的研究眼光，并怀着一肚子理解来打量它？而对某些中国学者学到的这等功夫，我只有钦佩而已。

我老实承认，听到、读到、看到、经历过一百多年的痛苦、希望、追求、奋斗、挫折以后，我确实还有满脑袋的“传统史观”，总是禁不住要“以史为鉴，可知兴废”。据说这是“精英意识”，我倒觉得这是个“常识问题”。你挨了一巴掌，有点痛，总要痛定思痛吧。我头脑简单，总觉得所谓历史学，其实就是干这个的。别那么多的理论，别老想着把自己的学问弄到世界上去。把历史学弄成历史教训学，经常“与遗忘作斗争”，让咱中国人自己长点记性，我看这历史学家才算当了个够格。

陈独秀先生不是大历史学家，后来还成了革命家。据说他成了革命家以后，把他批判义和团的观点也改变了，就是说，从“基本否定”转到了“基本肯定”的阵营。对此，我没脾气说什么。一个再伟大的人物，跳来跳去的时候总是有的。但我仍然总是记得他提示给我们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并对他永远心怀感激。

因为，我不愿意走后一条道路。

因此，我写出了这本不合时宜的书。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于北京西坝河